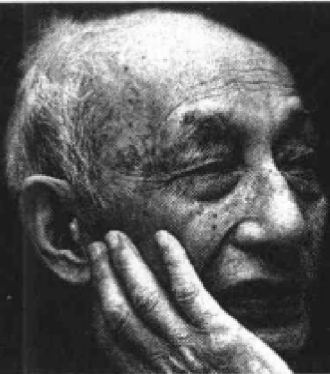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投考黄埔	(1)
第 二 章	黄埔轶事	(11)
第 三 章	跟朱德入川	(21)
第 四 章	亲历南昌起义	(27)
第 五 章	落难路上	(37)
第 六 章	风雪四川	(43)
第 七 章	结发之妻	(55)
第 八 章	身陷敌巢	(63)
第 九 章	脱离共产党	(69)
第 十 章	回家的日子	(75)
第 十 一 章	加入军统	(87)
第 十 二 章	我在“八·一三”	(95)
第 十 三 章	联手杜月笙	(103)
第 十 四 章	对付郎本	(113)
第 十 五 章	第二个妻子	(127)
第 十 六 章	遇险上海滩	(139)
第 十 七 章	遭遇珍珠港事件	(157)
第 十 八 章	辗转进山	(171)
第 十 九 章	结识孙殿英	(181)

第二十章	周旋三军间	(191)
第二十一章	生死太行	(203)
第二十二章	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退路上	(217)
第二十三章	第八战区趣事	(221)
第二十四章	走脱军统	(229)
第二十五章	战地轶事	(239)
第二十六章	战败徐蚌	(247)
第二十七章	围困陈官庄	(265)
第二十八章	成了战犯	(277)
第二十九章	最后一批特赦	(287)
第三十章	老大归乡	(293)
第三十一章	一件错事	(301)
第三十二章	探亲美国	(307)
第三十三章	世纪老人	(319)
附录一	文强年表	(323)
附录二	文强先生口述时间、地点纪实	(326)
附录三	摄影者手记	(331)
后记	(335)



第一章 投考黄埔

- 夏曦介绍我在第一师范加入CY。
- 带着毛家老弟毛泽覃投考黄埔。
- 路过厦门，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
- 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4年，我17岁，到过一次广州，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孙大炮”，还有一个是“大元帅”。我还见到程潜，见到李烈钧，见到蒋介石。那时蒋介石是副总参谋长。

回到湖南后，我考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

艺群美专有一位老师叫王基永，他每次上课并不讲公民课程，而是作时事报告，我感觉他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透彻，还有批判。有时，他问我们认清了形势怎么办？我们瞠目以对。他也并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难题，最多说一句“同学们深思！”王基永先生有时巧妙地将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有时又介绍创办黄埔军校以及学生军东征，统一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到了下课之后，还包围着他，问东问西问个没完。

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名廖仲良，是湖南宁乡县人，他比我大三四岁。有一天，他给了我一个小本本的书，叮嘱我不能给第二个人看，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而且要躲在蚊帐内去看。我觉得相当神秘，不折不扣地一切照办。这个小本本的书，名叫《马克思主义浅说》，我躲在蚊帐中一知半解地一气读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那时，湖南有三剑客：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夏曦是搞学生运动的，郭亮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三个人是分工合作。

我跟夏曦的关系很好。他对我说，国民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是改良主义的。其他的党派嘛，比如国家主义青年党，是无

政府主义的。现在革命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俄国，我们要走俄国的路。

我问：“孙中山是国民党，你怎么看他？”

夏曦说，用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孙中山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做马克思的事情。

他又说：“现在俄国有个列宁主义青年团。”

我问：“那是个什么组织啊？”

“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组织，叫CY。”

那时我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的高潮。在这个反帝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夏曦到学生中考察，看到我敢作敢为，就发展我加入CY。

一天，夏曦通知我到第一师范去。我去了一看，来了不少人。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第一师范的学生陈林达（湖南湘潭人，后来是国民党军长）也来了，我靠着他坐下。王基永给我们作政治报告，讲国际形势，讲革命形势。我坐在下面，觉得这个人了解的事情很多啊。夏曦对我说：“他是政治教员。”我说：“我们艺专的政治教员也是他。”夏曦说：“他的理论很好，很多事情我们还搞不清楚呢。”到了晚上，举行加入CY的宣誓仪式，又是王基永主持，我想：“他不但理论好，宣誓也是他来主持。”这才晓得他是列宁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组织的负责人。

我是个CY了。夏曦就动员我进黄埔军校。

我原打算以艺专作为过渡，然后再到京沪一带去深造。可是到艺专不过半年，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卷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爱国热潮中。接着又是“五卅”惨案的发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革命时代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在长沙教育会大礼堂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场中，看到了追悼人群如山似海，激动人心的挽联，挂满了会场内外及“赐闲园”整个的花园。记得有人抄下唐诗陈子昂名句来赞誉孙先生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那时既仰慕孙先生的伟大，不愧为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但又感到

“后无来者”之句，似乎又过早地作了结论，难道当代以及千百年后，就没有一人能超过他吗？我带着幼稚的心理在探索着，希望投笔从戎。

我的父亲也反对我学艺术，说：“学什么艺术啊，还是进一所大学吧。”当时，有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但是我受到夏曦的鼓动，决定投考黄埔。在动身之前，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新青年》、《湘报》等等。

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一共有8个青年，编成了一个组，陈林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6个是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去广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搭火车，火车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吴佩孚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一条是水路，从上海到厦门，这条路比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们选择了走水路。

出发之前，毛泽覃找我，说名单上没有他。

“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

我问：“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让你去啊？”

“我没有路费，去不了。”说着，他哭起来。

“你问你的大哥要点钱吧。”

“他一个钱也不给我，他一个小学教员，钱也不多，他抽烟，钱还不够自己用呢。”

我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你有饭。”

毛泽覃高兴了。

我向陈林达讲，毛泽覃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陈林达不同意：“怎么可以加带一个人呢？”我说：“他也是CY，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陈林达表示要全体通过，而且毛泽覃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呀。

我说：“我出钱。”

“噢，你有钱？可是组织上没有交待，你又搞个人来。”

“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毛泽覃。”

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

到了上海海关，一看，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台风来了，封关了。所有的船只都停开，船票不卖了，想走也走不了。大家很着急，本来就没有几个钱，又搞了个封关，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过了几天，我们只有两块钱了。毛泽覃着急“我跟着你已经花了你很多钱了，现在又封关了，怎么办呢？”

陈林达是组长，他更着急：“老文哪，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现在封关了，我们的伙食钱只够三天了，怎么办呢？你赶紧打个电报向湖南要钱。”

湖南回电报了：“一切费用自理。”青年团也没有钱。

这一下，陈林达急得不得了，陈林达跟毛泽东一起都是第一师范毕业的，我们私人感情很好。他的父亲是个木匠，家里没有钱，为人实实在在的。我一看他急得不得了，就把他叫了来，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啊？吹牛皮啊！你有亲戚没有？有朋友没有？能借到钱吗？”

我说：“你不要管这么多，我有办法。”

“你吹牛皮！”

到了晚上，我把他叫来：“你摸摸我这个棉衣呀，看有个什么东西？”他上前一摸：“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像个硬的圈圈呀？”

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备而不用。爸爸娶她时，给她一对金镯子，她脱下一个给我缝在棉衣里。我母亲给我讲过，这个圈子相当于一两黄金。”

“噢，值那么多钱呀？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妈妈很难得的。拿个金圈子给你，你妈妈很有远见啊。”他把我妈妈称赞了一通。

我对他说：“你对大家不要说，要不他们吃烟喝酒，几天就搞掉了。”

我们两人拿着金圈子跑到上海金店去问，说是值一百块洋钱。我对陈林达讲：“我把这个金圈子交给你，换成一百块洋

文

强

①

述

①

述

钱，当做我们到广东的路费，多余的钱作为公费，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达，我自己不要这个钱。”

封关八天后，恢复船运。我们买了票上船。他们打听买票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林达说：“是文强的钱，他拿出来给我们用，我们要节省着啊。”

从上海到厦门，用了四五天时间。经过厦门时，他们那些人讲：“哎，看鼓浪屿，鼓浪屿！”我问：“鼓浪屿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看见对面山上有个天文台，隔得好远，看也看不清楚。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

“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

他捂住我的嘴说：“说话声音小一点，这个地方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

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两个铜字“艺专”，帽子是白色哗叽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这是艺专的校服。

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几眼之后。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目。”

他说：“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里面丢，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抢过去了，说：“你这是幼稚的行动，你把这样好的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这不是发神经病吗？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

我笑了，说：“也对。”那时我才19岁。

我问他：“我在这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

他说：“我们住在上面的官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化元，也都是。”

我说：“我知道了。”

他又问：“你们还有几个人？”

“我们都是考黄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你老弟也上来？”

“穿得像叫花子样，不要上来。”

我说：“他现在跟我穿得一样，现在不是个叫花子啦！”

“噢？那个钱是哪里来的呀？又花你的钱吧？”

“那花不了几个钱。”

我回去找毛泽覃，故意往官舱走，一看官舱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还有廖化元也在。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化元，进了黄埔之后，廖化元是我们的政治代表，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

我对毛泽覃说：“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

“我不去，他没有好脸，看他干什么呢，那个官舱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

我说：“不去就不去嘛。”

船到香港，毛泽东离开官舱来找我，说：“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你看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们到了广东，那里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广东，我们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

夏曦问我：“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

我说：“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远，是我父亲的朋友。”

“什么人哪？”

“程潜。”

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到了广州后，你们先住在黄元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花不了几个钱，我写一个条子，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接头。”

我们到了广州，按照夏曦说的，住在黄元里的小旅馆，是湖南人开的，臭虫多得要死。我拿着夏曦写的条子去找广东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了广东共青团的负责人穆青，他后来当过四川省委

书记，被刘湘杀掉了。

穆青说：“你们是夏曦介绍来的？他是湖南方面的负责人，我们知道。”

穆青想了想：“我们这里没有专门人才，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你会画像吗？”

“画像嘛，简单的事情，用格子一套，放大就是了。”

他说：“你是专门人才，给我画一张孙中山的像。”

我画好第二天就送去了。他一看：“很像啊。”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标语要写，写标语要文化啊。”我说：“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呢？”我就把陈林达他们都叫来，穆青很高兴：“好啊，这样吧，我把你们送到罢工委员会去。”

我问：“罢工委员会是个什么机关呢？”

他说：“香港工人正在罢工，刘少奇在我们这里组织罢工委员会，你们向他报到，有饭吃，每天除了有饭吃之外，还有六块钱。”我们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

我说：“有饭吃就行了。”

我们到罢工委员会报到后，被分配到工宣部。这个地方只能办公，不能睡觉，还得找个睡觉的地方。我听说农民运动讲习所可能有地方住，就去农民运动讲习所看看。远远地，就看见毛泽覃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口，我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哥哥在这里嘛。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孙中山办的，现在他要我哥哥在这里负责。”

“噢，是这样啊。”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住啊？”

“有地方住，房子大得很，来个百八十人没问题。”

我说：“我们十几个人没有地方住，你能不能跟你哥哥讲一讲，让我们住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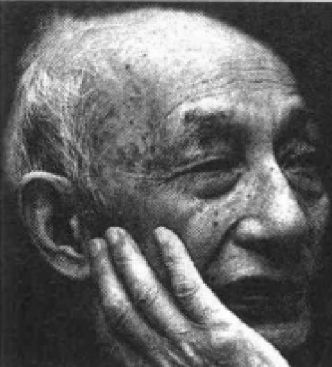
“没有问题。”

我们晚上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白天到罢工委员会上班。搞了半个月。

在广州，我们真是耳目一新，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

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简直是两个天地。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青年们为了一个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

1925年8月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国文，考了数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他们便投奔叶挺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第四军独立三十四团）。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二章 黄埔轶事

- 我同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
- 周恩来领着我们宣誓，从CY升为CP。
- 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我不了，来打吧！”
- “你还不是国民党员？你的速记这么好，我来介绍你。”邵力子写了个条子，让我加入了国民党。

1925年8月，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分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张圣阶，广东人，少年英俊，在东征战役中立过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青年军官，我对他十分敬服。

入伍生第三团各营，都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堂，此处祠堂气派很大，据说是叛将陈炯明的祠堂。

我所在的连，被人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人占大半以上。湖南人能吃苦，外籍同学称之为“骡子”精神。

我进黄埔的时候，激动得写了一首诗：

考入黄埔军校

腾飞万里气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
三类权衡知我路，丹心报国奋前锋。

开学宣誓的那一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陈林达。我们被升为党员。

墙上也是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我们坐在凳子上，陈林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吧？”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他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今天的领誓人就是他。”

周恩来就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升了级了，由CY升为CP了。”大家都很高兴。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还是班长。

我们连里，南方人多，北方人少。湖南人多，湖北人少。大家一起过的是当兵的生活。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我们每次打完靶后都要把枪和子弹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回去洗洗澡，吃完晚饭大家休息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铺，我看见林彪滚来滚去地没有睡好，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一会儿，看见他的手到枕头后面去拿枪，我这个班长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人家说“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

我总睡不着。忽然，“啪”地一下，响了一枪！

执行官拿着手电一下子跑进来了，问我：“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枪，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枪架在枕头后面。”我再没有敢往下说。

执行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那只枪拿来一闻，刚刚打过嘛，有火药味道呀，再用手电一照地下，子弹壳还在那里呢。

“林彪，枪是你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讲话呢？”执行官很生气。

林彪知道自己错了，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我就睡不着觉，老惦记有这回事，我一摸枪呵，就打了这一枪。”

“噢——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一个错误是你没上交枪和子弹，第二个错误是晚上你又打了一枪，两个罪加在一起，坐禁闭！”

我们一看，真玄！子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再往上铺一摸，人也不见了。上铺那个同学姓林，叫林伟涛。解放天津时，林伟涛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

执行官说：“哎，这个位置不是林伟涛吗？人到哪里去了？”

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涛拿个杯子跑来了，执行官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喝水去了！”执行官说：“你命大，你要是睡在那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执行官一走，林彪火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嘛。他捏起一个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

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我怎么落井下石了？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是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

他说：“你还要说？我揍你！”他越说越激动，就跑到我床铺面前。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打不了我，来打吧！”他一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火也出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上铺去了。他不服呵，还要打。大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

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八一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在会昌，我们的部队遇到与驻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钱大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去追击呀？”那时周逸群是党委书记兼师长，我是少校连长兼组织委员。

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路边，林彪在那里，你看到没有？”

“噢，林彪在那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

我跑过去了，林彪背对着我，他并不知道我在他身后，人家就指着林彪说：“你看你后面是什么人呀？”他回过身来一看，是我。我看他还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

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

后来我到潮州看朱德，在那里跟林彪又见了一面。那里有个地方叫三河坝，我们就在那里又见面了。林彪说：“老文呵，咱们又见了面啦，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我说：“你不要招待我，我也不要招待你，很短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要通过三河坝，要赶到潮州，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另有任务。”

这次分开，就再也没有见面。后来他一直打到了东北，我在国民党里面也到了东北。

进入黄埔不到三个月，入伍生第三团举行甄别考试，凡经过甄别考试合格的，一律升为军官生。我通过，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周恩寿也考取了政科，林彪考取了步科。

在升入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要经过一场口试，邓演达老师是主持口试者之一。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肃立在他面前，一点不敢马虎。

邓演达是黄埔的教育长（邓演达老师后来调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度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为时不久，宁汉合流，右派势力抬头，他逃往国外，后来归国不久，遭蒋介石的毒手殉难于南京），他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统马靴的声音，那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

邓老师对着我端详了一番，问我，“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

我立即回答：“是为了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他似乎很满意，连连说，“好，好，好，以后要多多地研读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

主义。”

我退出考场后，便琢磨新三民主义这个“新”字，究竟是什么。一连问了许多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问恽代英老师，才明白了三民主义新旧的界线。恽代英老师说：“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旧三民主义是从民治、民有、民享而来，孙中山先生已经否定了，并亲自在广东大学讲演过新三民主义。不过新三民主义要比较完善的话，必须包括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贯彻实行三大政策的精神。”

我当时很不理解，认为到黄埔军校来的目的是学军事，为何又学起政治来了？后来才了解，凡考取了军官生的，视其考试成绩，分配到步、炮、工、辎、政治五个科去受训。后来还添设了一个骑兵科，共六个科种。

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以及海外其他军校的黄埔老师，都认为政治科是一件新鲜事，是革命学校的创举，当然，也有保守的右派分子，造谣生事，诬蔑政治科为“赤化科”。

我们考取政治科的，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陈家祠堂入伍生营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报到。不料报到后，竟让我们到离校本部将近20华里的沙河营房学习。所谓营房，不过是一所全部用毛竹和蒲葵搭盖而成的简易棚。政治大队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集合我们讲话，说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毛竹营房，别看简陋，还有通风、透光、防潮等等优点呢。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等等，话说得不多，但大家高兴了起来。其实，简易校舍搭盖得挺精雅适用，宿舍、自学室、饭堂、盥洗室、俱乐部，连接着大队部、大操场。我们在沙河营房生活了四个多月，又迁到蝴蝶岗新建校舍。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训将近半年的时候，周恩来给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你们这些同学有会速记的没有？”我举手：“我学过。”我是在艺专学的速记。

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

“记录过。”

他说：“你出来。”我就出列了。他又说：“我们这里还有两个记录员，你们三个人合作吧。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后来上了艺专。”

“哦，你的资历还不错嘛，就指定你负责吧。”

周恩来报告之后，我把速记稿整理好给他送去，他连声说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高兴。

周恩来又把我介绍给邵力子，说：“我这里有个速记员叫文强，我的演讲他第二天就整理好送来了，记得很清楚，我看了一下就批复印了。不错不错。”这样一来，邵力子也找我速记，他讲三民主义的稿子，是我记下来整理的。邵力子不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呀？”

“我不是。”

“你还不是国民党员？你的速记这么好，我来介绍你。”邵力子写了个条子，让我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中山舰事变。校本部自3月19日夜间起，已进入戒严状态。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教官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李合林等等都在20日黎明前被捕了。这些情况是从大队长胡公冕先生口中传出的，因为他任过校本部的警卫队长，调为政治大队长后，他原先的部属透了消息给他才知道的。当时知道消息的，也仅限于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真相不明，整个的政治大队笼罩在疑云里，提心吊胆，窃窃私语，出操上课停止了。

我记得到了22日晨，党小组长张先梅悄悄传达说：“中山舰事变是蒋介石制造的阴谋事件，目的在于打击左派势力，矛头是对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

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黄埔岛。

另外，还从大队部传出，广州戒严，如临大敌，苏联顾问全部被扣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关押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察队被全部缴械解散。第一师的政工人员，凡是共产党员，

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外百余人都被扣押起来……恐怖气氛不仅笼罩了黄埔岛，而且笼罩了全广州市和广东全省。

我在事变的前一个星期，有感于左、右两派的斗争，主张切实拥护三大政策，把嚣张的右派势力压下去，于是冒冒失失地写了一篇《拥护三大政策是革命军人之责》的论文，投到学校出版的《黄埔潮》上发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稿子，明明是贴了邮票，投入大队部设置的邮政信箱里的，不料竟落到了第二队的队长李安定（他把左派和CP分子视为眼中钉）的手里。他暴跳如雷，派区队长把我叫到他的面前，横眉怒目地问我：

“是不是想要造反了？”

他拍桌打椅，将我写的那篇稿子摊在他的办公桌上，指责我胆大妄为，逼着我说出动机何在？是谁指使要写的？……

我苦笑着答道：“稿子是我自动要写的，拥护三大政策是拥护总理亲手制定的政策，是革命军人应尽之责，我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当，错在哪里？”这一答复，更引起他破口大骂，一脚将他办公桌前的靠椅踢倒了，指着我痛骂说：“你竟赤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正闹得不可开交，区队长蒋作舟走近我的身边，表面上是制止我再辩论下去，实际上是给李安定一点面子做台阶，蒋作舟对着我大叫一声：

“滚！”

我走出了队长室，以为大祸临头，许多同学也为我不安。但结果居然是李安定队长调走了。

3月20日事变后，蒋介石制定了一个“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在“党内无党、校内无派”。

我是跨党分子，周恩来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邵力子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遇到如此情况，应该有所抉择。经过与小组商量后，我决定选择保留共产党党籍，退出国民党。1926年3月，我退出了国民党，在黄埔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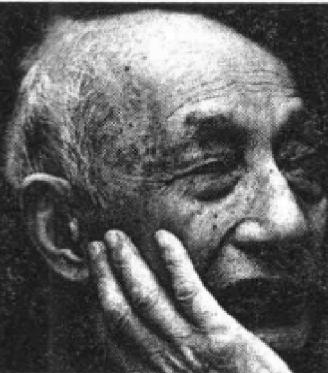
事变后第三天晚上8点多，全体师生集合在校本部大礼堂听

校长蒋介石的训话。蒋介石指着“亲爱精诚”四个字的校训，说：“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最后蒋介石两只眼睛注视着全体师生，问对他的讲话有什么意见没有？

这时从政治大队第二队的队伍中冒出个湖北口音的学生王襄，高声喊道：“请问校长，你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试问：我们最亲爱的廖党代表被英帝国主义和一小撮反动派刺死了，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呢？”（廖党代表指廖仲恺，汪党代表指汪精卫）这一义正词严地发问，使全场为之一惊。

蒋介石一下子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叫侍卫将质问的学生的名字记下来，说：“汪党代表有病，入医院了，不久就要出来的。”

5月底，黄埔军校在学生中挑选了300人，到广州办事处进行特别训练。我和周恩来的老弟周恩寿都被挑选进去了。我们这个队的负责人一个是邓演达（他已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学生们仍按习惯称他为教育长），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彭湃。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参加了北伐的誓师典礼，才知道受训后要提前毕业，因为北伐前线需要人。



第三章 跟朱德入川

- 我经过汀泗桥时还看见桥边挂着一颗人头。
- 邓演达对我讲：“朱德从德国回来了，你马上挑选40个黄埔学生，跟着朱德一道入川吧。”
- 杨森派了一艘叫做“瑞渝”的兵轮到宜昌接我们。
- 我们在万县听到杨森要对我们下手的消息。朱德去了武汉，我们这些跟朱德入川的黄埔学生只得各奔前程。

到了特别训练班后，才知道这个训练班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办的。

我们这300人编成了一个先遣大队，大队长是黄埔第一期的，由他带队，我们跑步到衡阳，集结在一个祠堂里，学习了一个月。

周恩来同志受邓演达主任之邀，自东江赶回来，为训练班作了一次题为《革命军部队政工与民众运动》的讲话。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总结了在部队中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民众运动的实施，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军队的灵魂，是民众工作的桥梁”。

邓演达老师讲的题目是《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我还记得他讲的大意：革命的英雄是从革命风暴中锻炼出来的，是经得住革命烈火的考验的。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出了无数的革命英雄。反转来，革命的英雄又推动了革命力量的发展，造就了大好的时势。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你们心目中有了孙中山先生和列宁这样伟大的革命导师，就树立了不朽的典型，因为每一个伟大的革命导师的精神，都无不统一到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含义之内……

恽代英老师在特训班主讲的课题是《青年运动的重要性》，他生动地以广州革命根据地三种类型的青年作例子，讲得大家捧腹大笑。他说：

“广东大学学生，文而雅又弱；岭南大学学生，香而艳又骄；黄埔学校的学生，黑而臭又壮。于是人们讥评，广东大学学生，怕革命、不革命、轻视革命；岭南大学学生，厌革命、反革命、

咒骂革命；惟独我们黄埔学校的学生，具有劳动人民的本色，都是受过锻炼的革命好汉，把革命当成了职业，不惜牺牲流血，是好样的！三种类型代表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三种本质，不过这三种类型是活的可变的，而不是死的固定不变的，如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那就无须做革命工作了。只要革命工作做到家，是能分化他们，感化他们，是能化敌为友的。黄埔学校初创时，广州的许多少女，见黄埔学生捏鼻而过，不屑一顾，听说现在争着要嫁黄埔学生了；广东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地要投笔从戎考黄埔军校了；岭南大学学生也不可能是一块铁板，一定也是在变化之中的……诸位到了北伐军前线，或者深入敌人的后方，做青年运动工作，比在广州要困难不知多少倍。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劳苦大众的本色，不受腐蚀，那么，一切工作都会干得好的。”

彭湃老师是农运专家，农运工作是一门新课程。彭湃同志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但通过画龙点睛般的翻译，也就全无语言的隔阂了。他以东征军为例，说明有组织的农民，可以为革命军当向导、抬担架、送茶送水，里应外合，造成声势，使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还说，搞农民运动最好要生活农民化。如果搞得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他们是不爱理睬的。

在学习的一个月时间里，陆陆续续调走了好多人，有到北伐队伍里当指导员去了。

1926年7月，我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跟着北伐军到了汉口，刘作仁的第十一军起义，汉口没有打就拿下来了。接着拿下汉阳。汀泗桥在武昌的外围，打得也很惨烈。北洋军阀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派出执法队用机关枪压阵，命令死守桥头不许后退，无奈军心涣散，吴佩孚恼羞成怒，将一个后退的旅长就地正法，人头挂在铁桥旁边的一棵树上，汀泗桥战役后的第二天，我经过大铁桥时还看见桥边挂着一颗人头。而吴佩孚自己爬上火车抢路北逃，沿途轧死很多士兵。而后是攻打武昌。黄埔教育长邓演达，这时是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兼攻城总司令，他要我们学生军当警卫队，跟着他打武昌。武昌的城墙很坚固，打了

一个多月攻不下来。我们就撤到汉口，政治部设在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天晚上，我们到了武昌城外，邓演达对我讲：“朱德从德国回来了，他来找我，我推荐他做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党代表。你马上挑选40个黄埔学生，跟着朱德一道入川吧。”他又说：“宜昌还在北洋军阀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的手里，所以入川要严守秘密，具体事项由朱德同志布置。”我在先遣队挑了二十多人，在别的队挑了一些人，一共40人，由我带上。见了朱德，他就讲了一句话：“跟我行动。宜昌有北洋军阀队伍守着，很危险。”

朱德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化装成学生或者小商小贩，各自穿便服上船，假装互相不认识，惟恐暴露身份。朱德很有经验，他用暗语打电报给杨森，说明情况。过了几天，杨森派了一艘叫做“瑞渝”的兵轮到宜昌接我们。我们登上兵轮，离开宜昌这个虎口进入风光秀丽的天府之国，很高兴，心想到了目的地可以大干一番。

谁料“瑞渝”兵轮停靠在万县码头时，码头上冷清清的，没有人来迎接我们。朱德领着我们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嘱咐我们不要上街，便服还要留着，看看风头再说。

几天过去了。我们这些小伙子耐不住了，找朱德发牢骚，朱德说：“四川军阀对革命还在观望，杨森也不例外。现在北伐军进展顺利，万县的局面很快就会打开。你们不要着急，我正在找房子作为我们的办公地点。”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森的一个姓桂的副官坐着大轿，挺神气地来到我们住的小旅馆，说总司令（杨森当时是川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把南津街右边原先是宝隆洋行的一所房子拨给我们，要我们马上搬过去。

宝隆洋行的这所房子是一个四合院，有十多间屋子，在万县是顶尖的房子了。这里成了国民革命军军队党部和军政治部的所在地，刘伯承、陈仲宏、杨闇公等同志都在这里住过。

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和住处，朱德首先要我们出版《壁报》，介绍革命形势，宣传革命道理。万县的印刷条件极差，我们找到

两块石印板，每周出版四开报纸一张，朱德除了指示报纸的重要内容，还亲自写稿改稿。

我们沿街张贴《壁报》，还给各机关、部队、学校等送去。《壁报》一出，不仅在万县是个新鲜事，在四川也是新鲜事。轰动一时。但是，反动的国家主义派跟我们捣乱，他们沿街撕毁《壁报》，同时还出了一张油印报纸叫《快刀报》，大吹吴佩孚，狂喊“讨赤”。《快刀报》一出来，每每被愤怒的群众涂上稀泥或吐上痰，还有的被揭下来贴到粪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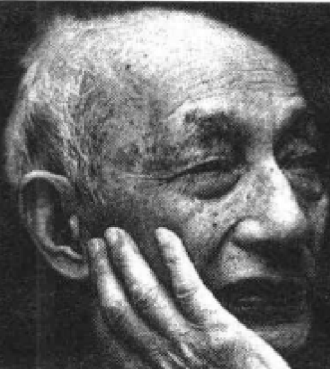
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来武汉，杨森眼见北洋军阀大势已去，便在宜昌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宜昌和万县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我们也由半地下的活动变为穿上军装堂堂正正地工作了。万县到处响起了“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歌声，我们的四合院里出出进进的进步学生和人士很多，颇有门庭若市的景观。

1927年初春，刘伯承率领杜伯乾、秦汉三等部在川北顺庆起义失败后，朱德说服杨森，致电刘伯承率部到开江县杨森辖区休整，并为之提供粮饷。朱德代表我们也汇款接济慰问。不久，刘伯承带着一些同志到万县，在我们的四合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刘伯承住在西厢房，每天伏案工作，有时自己补补衣服，朱德对我们说勤俭是革命者应该具备的美德。从此，我们也每人准备一个针线包，自己缝补衣服。

朱德对杨森说，最好在所辖部队开办一所像黄埔军校那样的军事训练机构，招收初中以上程度的青年学生，进行政治和军事教育，毕业后作为部队的骨干。杨森同意，任命他的亲信张用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立即在各地招生。不到半个月，就招上来上千名青年学生，集中在万县杜家花园受训。春节到了，杨森接受朱德和刘伯承的建议，在万县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群众游行大会，在北校场举行阅兵式。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入伍还不到两个月，但是在阅兵式中比杨森自己办的讲武堂已经训练一年多的学生要强多了，杨森不得不承认军事政治学

校的学生比讲武堂的学生训练得好。那天晚上，群众提灯游行，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庆祝北伐胜利”的口号，热闹极了，江中停泊的外国轮船悄悄地往下游开走了。

不久，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上海发生“四·一二”惨案，我们在万县也听到杨森要对我们下手的消息。朱德去了武汉，我们这些跟朱德入川的黄埔学生只得各奔前程。我先是隐藏在罗觐光的家里，然后搭船到宜昌，后来也到了武汉。



第四章 亲历南昌起义

- 周逸群跟我讲，我们今天晚上要起义了。
- 叶挺的队伍一点影子也没有，再找不到叶挺，我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
- 周恩来说：你往广东海陆丰吧。到那儿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给我们运送武器。
- 终于到了潮汕。哪里有什么苏联兵舰？什么也没有。

有一天，我得到恽代英的一张条子，要我什么行李都不要带，择日到九江贺龙独立师政治部报到。当时，我和恽代英编在一个军人支部里。他是军人支部的负责人。

我拿着这张条子，有些不放心，生怕搞错，就跑到武汉军校找恽代英，问：“这个条子是不是你亲笔写的？”

“哎，我的字你都不认识啊？”

“你平时没有给我写过条子，我不认识你的字呀，认识我就不来了。”

他说：“是我写的。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我说：“行李我也不要了，牙刷我也不要了，我准备今天下午就搭船到九江去。我去贺龙独立师找周逸群。周逸群是我黄埔的同学，他是黄埔第二期的，我早就认识他。”

“你认识周逸群那就好了。汪精卫已经在武汉反共了，你不晓得吧？那你下午就搭船到九江去吧。”

回来的路上，碰见周恩寿，他一看到我就问：“汪精卫反共你晓得不晓得？”

我说晓得。他说：“是第三国际搞的！”

我不明白：“汪精卫反共跟第三国际有什么关系啊？”

周恩寿说：“第三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到莫斯科开会。第三国际有个决议案，说中国革命要走俄国的道路，要实行列宁主义的两个策略，一个策略是要把国民党政权推倒，一个策略是再来一次十月革命。第三国际代表罗易拿着这个决议案到了武汉，把决议案交给汪精卫看，汪精卫一看，又是列宁主义，又是两个策

略，他看不懂，就把外交部长陈友仁找来。陈友仁知道的情况多一点，讲看来共产党要暴动了，要夺我们的权，不让我们吃饭了。汪精卫火了：‘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个罗易呢？他为什么把这个决议拿给我看？’陈友仁说你不是左派的领袖吗，所以罗易找你，不找别人。汪精卫说：‘现在这个事情啊，我们要采取行动了！’”

7月15日，汪精卫发表了反共宣言。在这前一天，7月14日，我还跟朱德谈了汪精卫反共的事。朱德说：“武汉究竟怎么办呢？我还不知道，现在我个人也没有出路。”

朱德问我：“你现在有没有工作啊？”

“我有工作，我在贺龙独立师炮兵营当连指导员。”

他说：“有工作就好。我准备到江西去，找朱培德，他要我去当军长，我到那里看看情况。”那时，看朱德说话的口气，他对八一南昌起义还并不知道。

我跟着周逸群到了南昌，那天晚上，天下着大雨，我们坐夜车。我问周逸群：“现在都说要东下讨蒋，你不沿江而下，反而到南昌？”周逸群知道周恩来的起义计划，他说：“现在跟你说还早啊，到了明天晚上10点钟以后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朱德，一进门，看见他坐在床铺上和周恩来不知道在谈什么，朱德向我招手，让我也到床铺上去，我就上去了。朱德向周恩来介绍我，周恩来说：“这是我的学生嘛，我早就认识他了，还用你介绍吗？”朱德“哦”了一声：“你们是师生关系呀，那就不用介绍了。”周恩来说：“他是黄埔第四期的。”

政治部主任来了，我站起来说：“我就告辞了。”周恩来把我按住：“怎么能一杯茶都不喝就走了？哎，你看见过我老弟吗？”

“你老弟我看到了，他在武昌，恐怕来不了这里了。你这个哥哥怎么把老弟也甩掉了？”

“不是我甩他，是他甩我，他不跟我走嘛。”

我说：“你老弟告诉我一个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情？”

“他说第三国际来了个罗易，汪精卫方面就说共产党要暴动，发表了反共宣言。”

周恩来说：“哎呀，你的耳朵长啊，这个事情你都知道啊？”朱德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在旁边直问：“什么事情啊？”

回到周逸群这里，我跟周逸群说了我去看朱德，还看到了周恩来。周逸群跟我讲，今天晚上12点，你不要惊慌。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今天晚上要起义了。把三路军九路军那些部队全部吃掉，朱德请他们搓麻将，趁这个机会我们发动起义。

我和周逸群住在一个饭店里。晚上还没到12点，枪声响了。饭店里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乱成一团。我看看周逸群，周逸群也不说话。我拉拉他，要他说几句，他说：“安静点，这是有计划的行动，你们不要出去，外面子弹乱飞，这里面很安全。”

快天亮了，周逸群叫我：“给你个任务，现在叶挺独立团（国民政府警卫团）从湖南赶往南昌，跟我们会合作战。我们起义时间提前了，他们还在路上，叶挺团里黄埔第四期的同学很多，你去迎接他们。你从这里过江，向平江那个方向走。”

我问：“我走大路还是走小路呢？我又不认识叶挺，怎么联系呢？”

他说：“没有别的办法，你去吧，共产党员嘛。”

我装成学生，租了条小船过江。张发奎的部队把南昌全封锁了。我还没有上岸在江里就被张发奎的部队抓住了，把我绑起来，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中学里读书的学生，昨天晚上打枪，学校停课了。我是平江人，现在要回家去。他们看着我的头问：“哎，你怎么是个军人模样？头上有个白圈，没有晒黑，戴过军帽吧！”我说：“我们学生也整天戴个帽子嘛，有什么奇怪的。”他们真相信了。他们又让我走了几步，说：“是个学生。”把我提溜过去说：“昨天晚上共产党造反了。你也不要回家了，弄不好会被打死的，在我们这里蹲几天再说。你不要乱跑，吃饭

的时候我们给你饭吃，你是个学生嘛。”

到了第三天，张发奎的这支部队开拔了。他们的指导员问：“你这个学生有没有钱哪？”我说没有，他就给了我一块钱，说：“你向平江走吧。”我二话不说，赶紧跑了。

我一路向平江方向走，到处都是张发奎的部队，到处都在检查，又把我抓住了，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学生，问我到哪儿去，我说回平江的家去。看不出什么破绽，把我放了。叶挺的部队在哪里呢？我搞不清楚，又不好问，只能自己到处找。跑了几十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迎接迎接，叶挺的队伍一点影子也没有，再找不到叶挺，我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我想，这个任务算是完不成了，回头吧！

也不知道南昌的情况怎么样，搞不好又被抓起来了，我不敢走大路，在下游的一个渡口坐着小船过了江，回到南昌。

回到住的那个饭店，一个人也没有了。我问茶房：“我们政治部的人呢？那个师长（周逸群是第三师师长）呢？”茶房说：“他们走了两天了，到林泉去了。”

“林泉是什么地方啊？”

茶房说：“林泉是王安石的家乡嘛，从这里走一条大路。”

我沿着大路由林泉跑，跑了将近一天终于到了林泉。正好碰到五军的政治部主任，他一看我：“你怎么会从那个方向来？”

“派我去迎接武昌警卫团，我没有找到，好几天了。”

他告诉我：“周逸群升官了，又是军长，又是总指挥。”他还向我讲了一些情况，问我：“你饿不饿呀？”

“饿，饿。”他拿了些饼干给我。

按照他的指点，我找到师部，找到周逸群。周逸群看到我回来很高兴，说：“你是了不起的人，你走了以后我很担心，回不回得来呀？会不会逃跑呀？我想你这个人不会。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叶挺的队伍过来没过来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你看我派了这么个苦差事让你去搞，我很后悔。”我向周逸群讲了我在一路上的经历，说没有跟叶挺的队伍联系上，只好回头。周逸群说：

“这个事情你没有错，是我们考虑不周。现在叶挺部队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后来才知道，文家市起义，叶挺带着部队到文家市去了，根本就没有到南昌来。

周逸群对我说：“现在我也不搞政治工作了，你也不要搞了，现在成立第三师司令部，我没有放心的人，你来当司令部的特务连长吧。”

南昌起义失败了，我问周恩来没有前方没有后方这个仗怎么打？周恩来说：你往广东海陆丰吧。到那儿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给我们运送武器，我们就有后方了。

我带着我的特务连（三个排一百多个人）跟着第三师向奉昌走，到了第三天，遭遇钱大钧部队，打了一夜。我们从奉昌过去，先到梅县，再到汕头，潮州。我听周恩来的，只要到了潮汕，苏联兵舰就给我们送枪炮，来援助我们。其实有没有这回事，我们也不知道。

走到一个叫“任田”的小地方，遇到一小股敌人，顶多一两个连，是听说南昌发生了起义前来侦察的。我们一打，敌人就撤退了。敌人的主力在奉昌，我们到了奉昌的外围，也不清楚敌人的主力到底有多少力量，我们一商量，打一仗！

我们把第三师全部拉上去了，还有一个由武汉警察组成的教导团也拉上去了，武器不好啊，顶不住，我们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最后，把我这个特务连也拉上去了，正面还是攻不上去，打得很激烈。这时，我看见徐特立也上来了。徐特立是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徐老师，你也来了？你不要到前线嘛。”

他说：“我在这里看看，看看。”

子弹“哨哨”地响，他说：“哎，怎么有这样多的鸟叫啊？”

“这不是鸟叫，是敌人那边打来的子弹的声音。”

他一听，趴在地上头都不敢抬了。这个老先生真有意思。我说：“你到后边去，这里太危险。不过我告诉你，你坐在这里也

没有关系，像鸟叫的子弹飞得很高，起码比这个树还要高，打不到人。如果听子弹打得很急，离地面没有多高，那就要打死人了。”

坚持到下午，叶挺的部队过来了，抢占了制高点，把敌人打退了，敌人过了一条小河，向梅县方向跑了。周逸群和贺龙带着部队撤退60里，要我坚守着掩护。我呢，没有得到命令就不敢撤退，因为周恩来搞连坐法，如果自动撤退就杀头。我的一个黄埔同学就是这样被枪毙的。可是敌人撤退了，我守着也没有用啊，我决定第二天撤退。

第二天，撤退60里，见到了周逸群，我说：“我的队伍这一仗打得只剩下三十多人了。”他说：“有人说你被俘虏了，有人说你阵亡了。你还是回来了，你这个人经得住考验。”他把自己的佩剑拿下来送给我，说：“我是打败仗的，不配这把剑。”

“哎呀”，我说，“你的佩剑是你的，我有佩剑，要你的干什么呢？”

“这是我送给你的，你那个不作数。”

“我挂两个佩剑哪？”

他说：“我送给你，把你那个收到箱子里。”

我就收下了。周逸群觉得我很勇敢，还把我评为模范，给大家鼓舞士气。

我们从梅县到潮汕的计划很快就改变了。因为蒋介石的部队已经到了梅县，如果我们再去，不是钻到他的部队里去了吗？我们退回来绕路，从西南向东南走。走到一个很大的村庄时，得到通知，要在这里召开活动分子大会。周逸群告诉我：“我们是党委呀，我是党委书记，你是组织委员，我们来布置大会。”我问：“谁讲话呀？”他说是恽代英讲话。我说：“好好好，他是我的老师，在黄埔教我们《社会科学概论》。”

恽代英看见我：“今天晚上你记录。”

我说：“我是搞军事的，让我记录？”

“哎，你会速记嘛。”

“那我怎么向师长说？”

恽代英问：“你们师长是谁？”

“周逸群呀。你要向他讲一声，我到你这儿当记录。”

他说：“见了面再说。”

一会儿，周逸群来了。恽代英对周逸群说：“文强是我的学生，他的记录记得好，有名的速记。”周逸群笑着说：“你还有这等本事呀。”

我们走到汀洲的时候，刚好是中秋。徐特立病了，陈赓（陈赓是黄埔第一期的）也病了。我到街上买了点儿月饼，到医院去看徐特立。徐特立讲：“陈赓也在这里呀，你只看我，陈赓怎么办呢？”我说：“那就把这点儿月饼分开嘛。”

我到长汀医院看望徐老回来，很有感触，写了一首诗“中秋过长汀”：

中秋过长汀

作于一九二七年秋

默默征途月正圆，长汀驻马万山前。
山城水色凝秋意，剑影刀光映九天。
话旧情殷尊太老，忘年交谊识恩贤。
婵娟天上“三边共”，梦里闽系醒有眠。

在汀洲耽搁了四五天，我们又一路走，终于到了上海。一到上海，朱德就来了。他的牌子满大——“第九军军长”，其实，他的队伍只有七八百人，住在第三军办的一个学校里。他见了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见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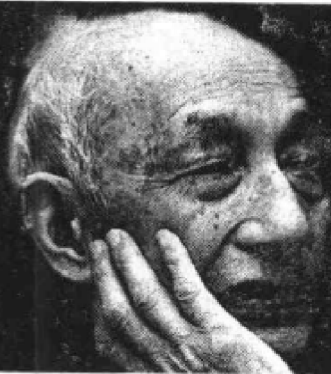
朱德说：“哎，你到我这里来吧。”

我说：“不行哪，我在第三师跟着周逸群，是特务连连长，还是组织委员。”

“哦，那就离不开了。不过刘伯承有个建议，说是我们到了潮汕后，要办一个黄埔式的学校，你是黄埔学生，又跟着我人

川，如果我真的办了这个黄埔式的学校，请你到这个学校来。”我挺高兴：“我愿意，愿意来，办教育嘛。”

我们还想着在潮汕有苏联兵舰接应，最后终于到了潮汕。哪里有什么苏联兵舰？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那回事。我们找澎湃，澎湃找不到，找当地组织，当地组织也找不到。我们一个钱也没有，只能吃点甘蔗度日，实在没有办法，队伍就地解散了。



第五章 落难路上

- 我们把军装脱了，只穿个背心，在海滩上用沙子把自己埋住。
- 有地方招收苦力，不用人介绍，只要身体棒就行，一天有六毛小洋。我们当兵的干这个事情干的了啊。
- 没钱买票混上船，把我们拽到甲板上，海风一吹，冷得很。
- 给了我们六块钱遣散费，让我们回家。

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失败了。没有后方没有补给，能不失败吗？队伍在潮汕解散了。我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我们把军装脱了，只穿个背心，找个地方睡觉吧，被巡捕揪住就打，我们只好在海滩上，用沙子把自己埋住。

我躺在海滩上没有办法。那十几个人哭啊，唉声叹气啊，发脾气啊。我说：“你们发脾气没有用，骂谁啊？骂天呀？骂地呀？”

第二天，我去街上转，忽然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布告：招收苦力，在××地方报到，每天发小洋六毛，任务是背铁砂，一木箱铁砂40斤，背上轮船。我一看，有生路了！赶紧跑回海滩对他们说：“有地方招收苦力，不用人介绍，只要身体棒就行，一天有六毛小洋。我们当兵的干这个事情干的了啊。一木箱子铁砂只有40斤，我们还背不动吗？注意啊，我们一个一个地去，不要引起怀疑。干个十多天后，我们就有钱了，有了旅费，到厦门，到上海。”大家都高兴了。

天刚刚亮，我们就一个一个地去，一验，都合格。先登记一下，然后一人发一个板，上面盖个火印，凭这个东西，下午领六毛钱，干一天算一天，第二天再来。那时，在香港一天两毛钱就吃饱了，还剩四毛呢。我对他们说：“你们就不要吃烟了，不要喝酒了，不要乱来呀。”

就这样干了十多天，积累了一些钱，但是，买到上海的船票钱还不够，我说再干几天吧，把钱搞足一些。

等到钱够了，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轮船不靠香港码头，只能

走小船，再上大船。人家说，你们这副叫花子样，小船还不愿意让你们上呢，除非你们有额外的钱给他们，他们就不会做声了。于是我就给小船额外的钱，把我们送上大船。上大船之前，我悄悄对大家说：“我们没有钱买票了，我们用剩下的钱一人买一套旧衣服穿上，然后混进统舱。”

混进统舱后，我们随便靠着，打算过夜。这时船上查票，查出有二三十个人没有票，其中包括我们十几个人。把我们拽到甲板上，海风一吹，冷得很。看管我们的人叫：“你们不要乱动，不要扰乱船上的秩序！”

饿得实在耐不住，我偷偷出主意：“船上机器房外面有个大铁桶，里面装的是饭菜，是船上管机器的人吃的，晚上我们偷些回来吃。”

到了晚上，我叫看管我们的人：“来来来，你也是中国人，让我们活动活动，到船舱那边去。”

“船长有话，你们不能下去。”

我说：“你也做点好事，我们这些人是爱国的，你放了我們。”看他没有什么反应，我又叫：“我们要拉大便！让我们下去，不让我们下去，我们就在这里解大便了！”看管我们的人报告了船长，船长的意思是船上是要清洁的，怎么能随便解大便，让他们下来。我们下到了统舱，有了吃饭的地方。统舱是一天开两次饭，我说：“你们听我的，我们一人拿一个饭碗藏在身上，开饭的时候，自己不要去盛，找一个旅客帮助去盛，这样我们就有饭吃了。”吃饭的时候，有的旅客看我们没有菜吃，还拨菜给我们吃。

有饭吃了，我在船上转一转。在通往官舱的路口上，我看见一个人穿着西装，漂漂亮亮的，还带着一个摩登小姐。他们从官舱下来，去买柚子。我一看，是黄埔第四期的庞正明，也是个共产党员，在革命委员会财委会工作。我上前拍了他一下，他一看是我：“哎呀，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你们几个人？”

“我们坐统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坐在官舱里，还带着个摩

登小姐。”

他指着那位小姐“这是我们的一个会计员哪”。

“帮我们想点办法呀，我们有十几个人。”他跟着我到了统舱，看了看说：“大致要多少钱啊？”我说：“恐怕500块钱不够吧，还要多一点，你自己安排吧。”他就拿出800块钱。

我们有了800块钱，我对大家说：“这钱是朋友送的。我们要精打细算，到了上海也要花钱嘛，我们不要吃烟喝酒，不要乱花，这钱来得不容易啊。这样吧，每个人拿两块钱，买牙刷。剩下的钱放在我这里，我们还要买船票，不要老这样偷偷摸摸的，买了票我们堂堂皇皇地有个地方坐。”

到了上海后，我们只有几个钱了。我们中间有个叫胡其仁的，也是共产党员，他跟我讲：“我是无锡人，在上海的朋友很多，你那5块钱借给我，我买点礼物去看亲戚，搞个百八十块钱，让大家吃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回家的回家，是吧？”我一想，有道理。我跟几个人商量，大家说如果胡其仁能借到钱更好嘛。我问胡其仁：“我们坐在这里不动，你什么时候回来找我们？”他说：“到傍晚的时候我就回来了。”结果，我们一直等到天亮，他还不回来，大家就说他是个骗子，我想他一定是跑掉了，不会回来了。又过了一天，他还是没有回来，生死不知。这一下，把我们的钱彻底搞光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坐在上海的四马路上，非常茫然。

忽然，我看见一个人戴着礼帽，礼帽压得很低，那个人从礼帽下面朝马路这边看了一眼，哎，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认识啊，他是四川人，黄埔第四期的，过去跟着周恩来当秘书，他叫何步青，兄弟三人都在黄埔。他已经看到我了，向我跑过来，说：“我刚才看了你一眼，你没有动，我以为看错了，结果真是你啊，你们来了多少人？”

“我们一共来了十几个人，是逃出来的。其中有几个是国民党左派。”

他说：“我是中央派来收容的。指定你们住到四马路的一个

小旅馆里，我就带你们去吧。”他又说：“给你们每人六块钱遣散费。”

我问：“那几个国民党左派怎么办？”

“那不管，我们只管自己的同志。组织上规定这6块钱，伙食费、旅费都在内，让你们回家。”

我拿着自己的那六块钱，送给了那几个国民党左派，把自己的钱送光了。

我们中间有个杨继运，邵阳人，也是黄埔第四期的，后来升到中将，是台湾国大代表。他从六块钱里拿出点儿钱，买了张报纸看，一看，有消息说邵力子在复旦大学讲课。他说：“邵老师在这里呀，我们去找他吧。”他跟我商量，我说：“也行呀。”于是我们两个人跑到复旦大学，打听到邵力子家的地址，又跑到他家。见到邵力子，看见他穿的衣服挺糟糕，又不好对他说八一南昌起义的事情，只是说校长（蒋介石）到日本去了，我们被打垮了。

邵力子说：“哎呀，你们这样困难，怎么办呢？我在这里教书也没有几个钱。”

他给了我们12块钱，说这是我最大的努力了啊，祝你们平安吧。

杨继运有些不高兴，出了门就对我说：“我明天还来。”我说邵老师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你怎么还来？

他说：“明天你跟我一道来不来？你如果不来，我拿了钱回来给你。”

“你去邵老师那儿抢啊？”

“你不要管了，你干这些事就不行。”

第二天一早，杨继运就走了。他回来的时候，送我四块钱，我问：“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从邵老师那里搞来的。”

“他又拿钱给你呀？”

“他会拿钱？我从他门后拿了他一副笔墨揣在身上，大摇大

摆地出来了，在当铺当了九块钱，给你四块，我得了五块。我还给邵老师留了一封信，说是你的学生没办法了，出此下策。”

多少年后，我到南京去看邵力子，他说：“你的同学把我的笔墨当掉了，还把当票寄给我，是个义贼。”我说：“这个人你不要喊义贼了，现在他是中将，在湖南西晋署当交通处的处长了。”“哦？”邵力子笑：“这个人发达了，不错。”后来，我告诉杨继运，杨继运笑得不行，说邵老师给我起个名字叫“义贼”呀。我说：“你以后买点礼物去看看邵老师吧。”

我们又去看望了邵力子，邵力子很高兴，说那时我也没有钱，夏衍让我去复旦大学教书，搞几个钱，家里开销很大，我也没有别的收入。

这就成了一段笑话。

当时组织上说要我们先回家，等待党的联系，要送我们到莫斯科去。后来又说不送莫斯科了，要我回家潜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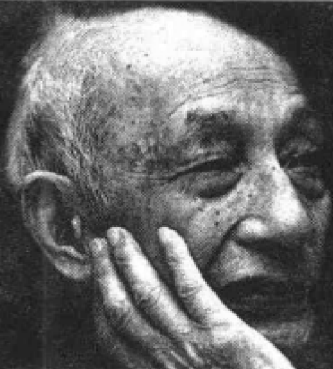
回到家，感触这一段经历，我作诗一首：

由甲子海峡至香港被困九龙滩

作于一九二七年十月

万顷云涛海天上，天公助美顺风船。
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

我在家等了半年，写了许多信，都没有答复。白色恐怖很厉害，父亲说风声不好，我也不想再写信了，怎么办呢？到哪里去找党的关系呢？我就下决心了，干脆我自己出去找党吧。



第六章 风雪四川

- 我妈妈又给了我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
- 江巴兵委书记当了不到半年，又去当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
- 李立三这个政策呵，我们提出反对不好，不反对也不好。
- 这个土匪部队，要县里起码拿出1000块钱，这样一个小县怎么拿得出来呢？

我妈妈又给了我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

到了四川万县，我不敢停，到了重庆，也不敢停。跑到成都，遇见黄埔第四期的廖宗策，他是川西特委书记。他见到我就很高兴，说：“你怎么跑到四川来了？”我就把经过告诉他。他说：“你现在还有组织关系吗？”

我说：“我组织关系已经没有了，断啦。我这次来就是找组织关系的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川西特委书记，又问：“你的组织关系没有断吧？”

他说：“你要恢复组织关系呀，你写个东西给我。”

我就写了个东西给他。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机，他说：“你同朱德到过四川，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那时我还在上海大学读书呢。”我就谈了八一南昌起义的事情。他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回到四川的只有你一个呀。”他要我写“八一”南昌起义总结，说要写详细一点。

我就写了一份总结，总结“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我写：一无前方，二无后方，也没有学生运动，也没有妇女运动，也没有政治运动，这是盲目的军事冒险，所以失败了。还说打到潮州就有办法了，苏联就派船来接济我们，结果打到了潮州，哪里有什么俄国的兵舰？一点也没有。我的材料他们看了，说：“你这个材料写得及时，写得很好呵，你如果不写，我们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怎么失败的。”

我被派到范继暄团去当支部书记。范继暄是四川人，是二十八军邓希侯下面混成旅的一个团。我说：“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就

是几个上层人物，士兵里面没有组织，所以一打败就逃命。”我说要在士兵当中发展组织，在士兵中建立党组织关系，我搞了半年，把一个团整治好了。他们觉得我干得不错。把我升为旅委书记。旅委书记我干了半年多，就又调动了，1929年调我当江巴兵委书记，“江”是江北，“巴”是重庆，这里是刘湘活动的核心地区。

1929年秋天，李家俊组织了两万农民起来暴动，闹得很厉害，请求省委派人去领导。李家俊是在德国人办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这个人在共产党里是很有名的。省委派胡洪疆到了重庆，重庆军委书记李鸣珂跟他谈话，说正在发动的农民暴动损失很大，我这里有一人最合适跟你一起去。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文强。”

“文强是我的老师嘛。”

李鸣珂奇怪：“文强怎么是你的老师呢？”

“我那时在万县，朱德办了个军事政治学校，文强是我们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我是那里的学生。这个人很能干，让他去一定可以。”

李鸣珂通知我：“要派你出去，已经有人来接了，接你的这个人是你的学生，叫胡洪疆。”我说这个名字我不一定能记得起，他说一见面就认识了。

我们一见面，还有点印象。胡洪疆向我介绍情况，说李立三搞集中兵力打大仗，所以组织起来的暴动队伍有万把人，影响四个县：成口、万源、新县、达县，要我去当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

我说：“哎，我当两县的兵委书记，还不到半年呢，又把我移调了？还调到川陕、巴山那个地方去了，我是个湖南人，适不适宜哟？我并不是怕苦，这个事情我干得下，只是我是个湖南人，你们要考虑。”他们开会讨论去讨论来，觉得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合适。

1929年11月，我们动身了。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人发了五块

钱。我、胡洪疆、莫斯科回来的王国良，还带了个挑夫，我们四个人离开重庆，向成口、万源方向走。

走到开江时，路过一个叫“大路厂”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位一百二十多岁的老人，原来是刘永福黑旗军里的人。我们听说后，买点礼物去看他。这位老人正在晒太阳，我们跟他聊了一会儿，他很高兴，说我的子孙很多，各管各的，他们不管我，我也不管他们，我靠挖药材生活。看过老人，我们感叹一番，一看，用掉了五块钱。

天下起了大雪，山路走不了，封山了。我们一住下来，把钱搞光了。胡洪疆急得不得了，我说：“不要着急，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自己想办法吧。”他说：“封山了，路不能走，天又不晴，有什么办法？”我说你们急也没有用，回重庆也要好几百里路呀，再说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能回去呢？看看，想办法吧。

一时我们都没有办法。过了些日子，天晴了，出太阳了，听见吹唢呐的哇里哇啦声，我说：“哎，有办法了！”他们笑我：“人家吹唢呐，有你什么好事啊？”我说：“吹唢呐一定是人家讨媳妇，只要有喜庆的事情，天下世界都一样，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

他们说：“道理我们都明白，现在我们要吃饭要走路，没有钱，你想起什么办法呀？”

“你们跟我走，向吹唢呐的方向走，我自有办法。”

胡洪疆不信：“老师老师你吹牛皮。”

我说：“你跟我走，不走就没有办法，一走就有办法了。”

那时，我化名李杰胜，王国良说：“我们看李杰胜有什么办法，我从中国跑到俄国，又从俄国跑到中国，我都没有办法，他还能想得起办法？”

我们走到吹唢呐的地方，山里人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们这样穿长衫戴礼帽的人，男男女女都跑到外面来看我们。我抱着拳：“同喜同喜。”他们问：“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

“从重庆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重庆大学读书的。”

“呵，还是大学问哪。请你们到屋里烤烤火。”

我们进了屋，茶啊，烟啊，都上来了，胡洪疆、王国良他们直笑。我跟一位老人聊了起来，知道他是个秀才，他说：“你们是文曲星啊，今天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赶上我们讨媳妇，我现在找些纸，请文曲星在喜筵上写四个字，写完马上发轿了。”胡洪疆他们推我：“文强你写你写。”我就让秀才搞支大一点的笔给我，把纸卷成四格，写了四个字：“花好月圆”，秀才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把字贴在花轿上了。

我们在屋里烤火，主人说：“你们四个人排在四桌，四桌都是首席，你们写了喜轿，请你们吃一顿。”胡洪疆、王国良，还有那个挑夫都笑了。这时主人又拿来了红纸，说写个喜对贴在大门口，而且要求每联写十三个字的对，我心想对子要么是五个字，七个字，哪里有十三个字的呢？写就写吧，我问：“你们这里写对子都写什么呀？”他们说乾坤忠义之类。我就把这些字写下来，一编，编出十三个字的对子，秀才一看：“哎呀，才气大得很哪，原本想难为各位，没有想到你们的才气这样大啊。”我们把对联贴在大门口，大家都很高兴。

我对胡洪疆他们讲：“这样大的雪，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想办法住在这里，留些时间，让他们给我们准备三天干粮。”我又说：“我们还要送点礼，光是吃人家的不送礼也不对。”他们说咱们身上没有钱，还送得起什么礼吗？还让人家准备干粮，你怎么好开口呀？今天晚上住在这里就不容易啦。我说：“自有办法。”

我把老乡叫过来，跟他商量：“参加你们的喜事，我们很高兴，实际上，我们到这里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到重庆的旅费用光了。我们这个箱子里有毛巾、肥皂、毯子，是准备带到山上用的，你们要不要买这些东西呢？”老乡说我们山里正需要，特别是毛巾，山里的男男女女都要用白毛巾包在头上，都要都

要。我让他们三个把东西拿出来，放在两张桌子上摆起来，呵，妇女们来了，都抢着要。我说我们定个价，那么山里也不容易，我们不赚钱，这些东西买光，一共16块钱就够了。一下子，全抢掉了。胡洪疆他们又笑了。我跟他们商量拿出两块钱送礼，他们说：“送那么多礼啊？”我说老乡至少要给我们准备三天的干粮，还不值两块钱吗？我就把两块钱送给老乡，说：“我们到这里来，你们留我们吃饭，还坐首席，我们问心有愧。我们几个人给你们送点礼。”

老乡说：“你们这么困难，还送什么礼呢？”

“你们不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也没有钱送。现在我们有钱送礼了。多的我们也送不出，送两块钱。我们还有两天半的路程就到了。”

“到底是读书人。交你们这样的朋友很难啊，平常哪有人这么看得起我们呢？我们给你们准备三天的干粮吧。”第二天，老乡提着一大篮子吃的就来了，还有酒呢，我们高兴得要命，这三天吃不完啊。

两天半以后，我们到了万源县的一个交通站，在这个川陕甘交界的地方，见到了李家俊。李家俊跟我说：“我没有带过兵，不晓得怎么搞呵，乱得一锅粥。”我说：“这样吧，先把士兵委员会成立起来。我是行动委员会书记，你呢，就当副书记，当总指挥，再推荐个参谋长来，要懂一点军事的，还找一个秘书长，另外，你这里还有军人没有？”

他说：“还有个黄埔学生。”

这个黄埔学生姓张，是达县大石桥人。我说：“这样吧，暂不安排你的职务，你就在我身边做点事。”现在我口述你记下来：这支部队两万多人，可以编成三个支队，三个支队采取三三制，一个支队里面有三个大队，一个大队里面有三个中队，一个中队里面有三个小队，作战的单位是大队，现在部队不能统一号令，各种旗子，红的，白的，蓝的，乌七八糟的，这是什么样子呀，旗子也不统一。

他问：“这旗子怎么搞法嘛？”

“共产党的旗子是学苏联，叫做镰刀斧头，我们的红旗上也是黄色的镰刀斧头。我们不能你搞个什么名字，他也搞个什么名字，我们称做工农红军。”

他给记录下来，我说：“麻烦你，给整理好，再给我看看。”我就发现这个人能力很强，把我说的整理得很好，我说：“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呢，你把这个东西搞好，开会的时候通过。”后来，开会时拿出了这个东西，李家俊一看：“哎呀，你一来就不一样了，按照这个办，就好办了。”我说：“这是我说的，那个黄埔学生整理的。”他说：“成立支队，他可以当个支队长，你带来的那个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王国良，当一个，我自己担任一个，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扩大，搞多一点。”

空下来的时候，我把李鸣珂在我动身时给我的行动委员会指导纲领读了三遍，我想，这是李立三路线嘛。“人家刘宗厚有四个师在这里，我们是乌合之众，指导纲领让我们去把人家打败，要打恶战，那怎么打？恐怕很快就让人家打败了。”

我就对李家俊说：“这个政策啊，我们提出反对不好，不反对也不好，这个政策是错误的，要全国进攻武汉，要湖南进攻长沙，一下子就把全中国打下来啦，都到处插上红旗啦，有那样的好事吗？这个路线不对呀。”李家俊也不懂什么李立三路线，我说：“这样吧，把队伍整理好，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后来把队伍整理得差不多了，他又告诉我，他还有一万多神兵，我说：“什么叫神兵呀？”

“就是白莲教的神兵。”他说：“神兵很厉害，刀枪不入。”

我说：“你也是个大学生，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有那样的事情嘛？刀枪不进？什么枪也打不进？”

“哎，我试验过了。”

我说：“过两天你召集神兵，我来看一看，刀枪不入，有这个事啊？”过了几天，召集神兵一试，神兵在地上吃了神水，画了神符，果然刀砍不进去，我想，这也是个怪事，刀真砍不进

去，真有这个事呵。难怪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时，也用过神兵啊。

后来有内行对我讲：肚皮鼓起来，发硬功，刀砍不进去，但是拿刀一捅，肠子什么都捅了出来，我说：“噢，还有这个情况哪。”我就告诉李家俊：“内行说，拿刀子一捅，里面什么都出来了。你也不用试验了。”

李家俊不信，再试。神兵在地上画个符，开始用枪打，一打，子弹打在胸口上打了两个包，没有打进去，也没有事儿。我说：“慢点慢点，步枪只能打380米，超过380米就没有力量了。打枪的地方到神兵站的地方有多少米呀？你去量量看。”一量，250米！我心想怎么还没到300米？我问：“刚才是什么枪打的？”李家俊说：“手枪。”我说：“手枪嘛，只在150米内有效。”他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呵？”我说：“你不是个军人，你不懂啦。”我说：“这个神兵靠不住，我们把神兵整编改造，另外成立一个大队。”

队伍整编后，旗号统一了，李家俊一看，高兴得很，“啊，我们一下子能把刘宗厚四个师打垮。”

我说：“不要说大话，刘宗厚的部队是从民国元年起学日本的军队训练起来的，武器也好，如果跟他打，几个钟头就把我们打垮了。”

他说：“这样吧，你指挥一个方面，我指挥一个方面，把主力放在我这里，你带着参谋长另打一面。”

我说：“你看到不行了，马上转移，不要硬打，一硬打马上就被打败了。”

一打起来，果然，李家俊就支持不住了，我们隔得好远呢，我通知他：“赶快分头撤退，没有别的挽救的办法了。”

我们这边的部队向陕西撤退，死伤得不多。到陕西的定巴县，当地的一股土匪有一千多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只有三百多人，我就跟参谋长商量说：“别跟他打恶战，他们在这个地方流窜好多年了，我们不如人家，他们一千多人，我们只有300人，

我们不跟他们打。”我们一边转山头躲开土匪，一边喊话，把自己装成土匪部队，愿意跟他们合作。我们喊：“我们有500人，我们愿意合并过去，拥护你作大哥。”他们停止打枪了。

我对参谋长说，让土匪派一个人过来，我跟他们讲条件。“参谋长出去喊话，他是当地人，说话土匪听得懂。参谋长就喊：“你派个人来，我们谈一谈。”那边果真就来了一个人，是土匪头子程德山。

程德山问：“你们谁是领头的呢？”

我说：“我，我是一个主要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参谋长，另外还有一个书记官。”

“噢，就是你们三个人哪，看来我们首先来个桃园结义。”我们吃了一顿饭，就算是桃园结义了。程德山年纪大一点，是老大，我们的徐参谋长是老二，我跟书记官就是老三。我们提出条件：第一，让我们到我们要去的地方；第二，我们没有粮食，你要搞点粮食给我们吃；第三，我们的部队不跟你们的部队混编在一起，分开。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到了晚上，我跟参谋长讲了：“程德山这个人身边有一个人要注意，那个人只有一只眼睛，程德山喊他作师爷，程德山说的话，出的主意，都是那个人讲的，那个师爷呀，将来坏事就坏在他手里，现在，我们不去找程德山，以后他可能会让师爷出面来找我们。我们接近师爷后，慢慢就把他内部的情况摸清楚了。

第二天，程德山说：“请老二当军需官。”

我们商量：“请他们吃饭，我们也准备一桌饭答复他们，把独眼人也请来，看他说什么？我们再说。”

吃过饭之后，就坐在那里谈天，独眼人那个家伙，就讲了：“我们这个部队没钱，吃饭也吃不了几天了，我们有1000人，你们有500人，更加拿不出粮食了。我看军需官年纪很轻，请军需官出马，向地方政府借个千把块钱，越多更好。你们考虑考虑。”

我说：“我现在没有主意了。”这个土匪部队，要县里起码拿出1000块钱，这一个小县怎么拿得出来呢？这个小县还住着西

文

文

①

述

①

述

北军的一支部队，也是专门对付程德山的。

我们几个人一起商量，那天晚上商量到好晚哪，没办法。参谋长说：“如果我们坚决不去，那就不会有好结果，去呢，这个钱也不一定拿得到。”我说：“睡觉吧。大家再想一想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明天早上起来再说。”第二天我问他们，他们说：“凶多吉少，这个事情难办。”

我说：“我如果不去，他们马上翻脸，一翻脸呢，可能就把我们扣押起来了，那就没得办法了。”

他们说：“你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去呀，到哪个山上唱哪个歌，我去！”

“你怎么去法？”

我对参谋长说：“你跟他讲，派个毛驴，再派一个人给我牵这个毛驴，还要他给我写两封信，一封写给县长，一封写给驻军的团长，让帮我们筹一点款，数目不要定。”

程德山说：“要个毛驴？那个容易呵，还派个赶毛驴的，你去吧，两封信也准备好了。”

我们就向县城走。走了三四个钟头就到了。城楼上的城门关了，城楼上的人喊话：“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拿着程德山的信，还有封信是给县长的，有事情来找你们。”他们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和赶毛驴的一个人，一共两个人，就说：“现在城门关了，要向上面请示才能开城门。你就到城墙底下来吧，我们不会打你们。”等了一会儿，城门开了，他们出来连毛驴一起把我们五花大绑，就抓进去了。说：“你们这些土匪，还要见我们的团长，是先见团长哪，还是先见县长？”

我说：“我要先见团长。”那个团长派个书记官来，跟我见面了。书记官一看到我这个人长得满文雅的样子，就说：“你进过什么学校？”

“我是湖南大学毕业的，以后又到了四川，进了重庆大学。”

他问：“你怎么搞得当上土匪了？”

“我被土匪抓去啦，走也走不掉，安了我一个军需官，到你

这儿来要钱。”“噢。”

我一看他也是个文人的样子，就说：“我看你也是很文雅的样子呵？”

他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怎么也在这里搞呢？”

“军阀作乱，当个书记官还不容易呢，唉。”

看样子，他对我很同情，我就说：“我今天是冒死命来的。不过我也请你们想一条路，程德山这个土匪在这个地方已经10年了，他占的地方有6个县，危害地方啊，你们怎么不把他收编呢？你们如果招安他，我可以说话。”他说：“我们也是个团长，他也是个团长，不好办。”

“你们把旗号打大一点嘛，你们自己改编成一个旅，把他招过来，他还当团长，你们不是搞到一起了吗？如果他愿意，你们就把他收编过来。”这个书记官回去，就向团长讲了。团长说：“来的这个人很有脑子，如果把程德山收编过来，我们6个县都安定了。”

后来团长接见我，问：“你是要钱的？这个小县城拿不出钱来，今天晚上，我要县政府安排，你住到教育局去，我派书记官也去，代表我，见见教育局长，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让县长也参加，我们嘛，在1000块钱以内，七八百块钱也还是可以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教育局商量了一夜，县长看到我，也问我为什么裹在土匪里，我说我是湖南人，被土匪抓去了，现在跑也跑不了。县长也很同情我，教育局长就更加同情我，说：“我给你出主意呀，你也来谈过了，从这里逃跑吧，”

我说：“逃不掉啊。”

教育局长说：“我教育局有护照，下次你来，我给你教育局的护照，”书记官也说：“我帮你的忙，花几个钱把你救出来。”

后来，他们决定拿800块钱，书记官说：“你明天就回去，我同你一起去，为了完成招安的任务，我不出面不行，我拿几百

文

文

①

述

①

①

块钱去了他们也不会把我扣下了。”我说：“有道理。”

第二天，我们一起牵着毛驴回去了，到了住的地方，嘴，程德山一看高兴了，800块钱，好几个人挑呀，五六个人挑着走不动啊，他问我：“哎，你搞到多少钱回来了？”我说：“1000块没有弄到，只有800块。”他说：“哟，我们在这里搞了10年，这是头一次，喜事喜事。”我说：“来的那个书记官有话跟你谈。”

我说：“他们的目的是招安，想把你们编过去，当正规军团长，这样地方也安定了，你程德山也有一个出路了。那个书记官他会跟你谈的。”

“好！”

那天晚上，搞了一只羊，一起吃，我就跟那个书记官说：“你们谈，我就不参加了，你需要我参加的时候我就参加，你们自己去谈。”书记官说：“把他招安了，我看他不愿意。那个独眼人，他这里的师爷在这里出主意。”我说：“那就只好这样了。你留一个机会再来，我找个机会送你回去。把问题搞稳当一些。”书记官住了两晚，我就把他送走了。程德山从这800块钱里，拿100块钱送给我，拿200块钱送给来的那个书记官。

我告诉我们的参谋长，说：“老徐呀，你是本地人哪，我不离开，我一离开，你就有危险，你的办法是两个办法，一个是把队伍带回成口，到成口就有二百多里路嘛，到那边整理我们的队伍，我呢，到重庆去找省委。”



第七章 结发之妻

- 她在燕京大学学外文，是最聪明的一个。
- 她是四川省的第一个妇女部长，第一个女省委委员。
- 吴芳吉说：我今天做介绍人。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结婚。
- 1941年她害子宫瘤动手术，日本飞机来轰炸，慌乱之中，手术医生把手术刀子丢在她肚子里，就把肚子缝起来了。她就这样死了。

我的第一个妻子叫做周敦婉，也叫坚如，比我大三岁。燕京大学毕业。她的父亲是在日本学习法律的法学家，周敦婉是他最小的女儿。她开始住在北京。她的父亲到日本留学时，把她送到天津，住在一个英国人家里。那个英国人是她父亲的朋友，她父亲要英国人照顾他的女儿，教她学外文。这个英国人看小姑娘很聪明，一方面教她学英文，一方面教育她，说：“你呀，到燕京大学去读书，司徒雷登是我的朋友，你学外文，要把英、日、法这三门外文都要学到，你就可以成为外文专家了。”周敦婉就听从父亲的这位英国朋友的安排，考取了燕京大学。她在燕京大学学外文，是最聪明的一个。三年学成毕业后，个人自己找职业，周敦婉就回到四川。

四川有一个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敦婉去当英文教员。她这个人对中国文学研究得很好，学校就跟她讲：“你除了当英文教员以外，还可以在我们学校当教务长，你还要多做点事嘛。”

她大概在这个学校搞了两年，就回到了她的家乡四川江津。在江津，她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恽代英，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萧楚女，他们在四川泸州中学教书，认识周敦婉了。

一天，他们对周敦婉说：“我们介绍你加入共产党。”

“有你们两个人介绍，我很高兴哪。”

他们说：“那你不必离开江津。”

后来，周敦婉当了江津中学的校长，恽代英和萧楚女正式介绍她加入了共产党。周敦婉后任县委书记，在共产党四川组织

内，她是第一个女县委书记。

在这时候，周敦婉认识了一个叫刘愿庵的县长，这个人在四川是很出名的，后来还当过省委第一书记，以后还当过共产党中央的候补委员，到过苏联。他们两个人发生了感情，后来，周敦婉跟刘愿庵结婚了。

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之后，1928年又到了四川，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这时，周敦婉就知道我这个名字了。

我当旅委书记的时候，重庆军委书记是黄埔军校跟我一道毕业的李鸣珂，他说：“你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我当个军委书记，是个省委常委，你怎么到了四川才安排当了个旅委书记呢？这不对。”他就向四川省委请求，说他当副的，要我去当军委书记。我们两人又见面的时候，我说：“你这样不好，你是组织派来的，你是周恩来派来的，周恩来是中央军委书记，这不是我私人的问题，你怎么能让位呵？让给我呵？我当正的，你当副的？变成我们两个人的私人行为呵？那不对。”他说：“这样吧，现在我来了还不久，还没有打开局面，你过去在四川干过，你熟悉四川，暂时让你当江巴兵委书记，管江北和重庆。这时，周敦婉已经调到省委，是省委委员，省妇女部部长。她只知道我这个人跟我没见过面。

这时已经到了1929年。刘愿庵在四川开会，被刘湘的特务发现了，被捕后刘愿庵一口咬定就他自己一个，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没几天就被枪毙了。

我从程德山土匪部队里逃出来之后，回到重庆，通过王维舟的介绍，找到四川代理省委书记程子健（后来是四川的财政部长），他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资格老。程子健说：“你如果没有王维舟的信，我不敢见你。有了王维舟的信，我才相信确实是你到了。”

王维舟是刘伯承的一个团长，后来在开江活动。我在开江找到王维舟，他对我讲：“我在此地也很困难，隐蔽了多年，也没做什么工作，我在党里面只是一个通讯员，也不负什么责任。你

文

文

①

②

③

④

今天来，我藏了一张报纸，你看一看，刘愿庵也死了，省委书记李维湘也死了，军委书记李鸣珂也死了，还有刘大明等等十几个人都死了，被刘湘抓住杀了，你现在回来就好了，恐怕你要在省委里面负很大的责任。”王维舟把一些情况告诉我了。我说：“经过这次失败，看来李立三路线是失败的。”王维舟说：“现在程子健是省委代理书记，这个人是个好人。我写封信给你，去跟他见面。”

我拿着王维舟的信跟程子健见了面，他当天就把我带到省委机关，我说：“你们住的这是个什么地方哪？”他说：“这是我们省委办公的地方，你这个人我们相信了，你就住在省委机关吧。”

进了屋，程子健介绍：“这是过去军委书记李鸣珂的妻子，带着小子女儿住在这里，帮助做饭，是个遗孀，又没有钱，很困难。”他又叫一个人出来跟我见面，这个女同志就是周敦婉，程子健说：“这个人你知道吗？叫周敦婉，还有一个名字叫周坚如，她的丈夫刘愿庵被杀了。她也是个遗孀，她现在在军委负责，担任军委的秘书长。”

“噢”，我说，她是四川省的第一个妇女部长，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她当省委委员，是四川省女的里面头一个。”

周敦婉奇怪：“怎么我的事情你都知道呀？”

“你是著名人物呀，怎么不知道呢？”

当晚，我跟程子健睡在一个铺上，我对程子健说：你这个地方空气不好，两个遗孀，屋里搞得死气沉沉的，应该改变一下子。他说：“那怎么改变？没办法改变呀？”

我说：“我来给你改变，现在过春节了吧，先写幅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以做生意为掩护的。我说：“这是个商人的家庭嘛，对子在门口一贴起来，也有点春意了嘛。”

我写完对子后，就贴在大门上，噢，她们几个人一看就高兴了。“哎呀，你到这里来了就有生气了，过去我们都没有注

意这事。”

我说：“你们这个家庭姓什么？”

“姓李。”

我又写了四个字，作横批，“紫气东来”。

我说：“晚上呢，可以开开座谈会，谈谈世界，谈谈国内的情况。”她们很同意，我们果真过一天两天呢，就开个家庭会议，买一点零零碎碎的东西吃吃。家里的这个空气就改变了。

有一天，我站在大门口，看见来了一个人，带着礼帽，个子比我还高一点，他要进门，我就挡在那里：“哎，你这位老先生来找谁呀。”他上上下下打量我好像认识似的。

“哟，面熟呀。”他说：“我是来看周敦婉的，周敦婉是我表妹，我们俩都是江津人。”他这么一讲，我恍然大悟，问：“你是吴芳吉先生（吴芳吉先生是毛泽东的老师）吧？”他说：“你怎么晓得我是吴芳吉先生？”我说：“我是湖南明德中学的学生，我们两个人还有一段笑话呢，你还记得嘛？”

“什么笑话呀？”

我说：“明德中学有一次发水灾，淹死了一个同学，你就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亭子上面，我那时只有15岁，糊里糊涂地拿着笔把你写的那副对联给改了，我把对联左边放到右边，右边放到左边，校长说我不尊重老师，要开除我。”

“噢，这个事情我记得起记得起。”

我说：“还是你出面保的我。校长要开除我，你说：‘不能除名，不能除名，这个学生是很难得的，他把我的对联换一下，比我原来的好！’我们那个校长也是个诗人嘛，对于诗词很有研究，他一看，不错，也说改得好，你说：‘改得好，你还把他开除？’校长说：‘他不尊重老师，不对嘛。’‘他不尊敬老师？我们有这么好的学生，你不能开除他。你如果今天开除他，明天我就辞职，回四川去。’还是你保的我呵。”

他说：“哎呀，巧事巧事啦。”

我就跑进去喊：“周敦婉，你有个表哥来看你啦。”周敦婉

跑出来，把表哥迎进去坐。她就问表哥：“你怎么认识他呀？”吴芳吉就讲这段历史。

吴芳吉说：“你们俩在省委的地位差不多啊。”又问我：“你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

他问：“你怎么过了30岁还没有结婚啊？”

我说：“现在还结什么婚呢？到处打仗，弄得不好还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呢，我没有打算结婚。”

他说：“我今天做介绍人。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结婚。”周敦婉和我经不住这七说八说的，程子健也说：“那最好了，你们结合在一道很好。”

那天晚上，办了很多菜。吃了一顿饭，就算结了婚。我跟周敦婉结婚有10年。1941年她害子宫瘤动手术，日本飞机来轰炸，慌乱之中，手术医生把手术刀子丢在周敦婉肚子里，就把肚子缝起来了。周敦婉就这样死了。

周敦婉临死前，在遗书中嘱我续弦葛世明为妻，这是后话。

周恩来曾经有书信要周敦婉去延安，但是周敦婉没有完成去延安之志，抱恨终生，是我连累了她。1940年，我写诗10首吊亡妻周敦婉（坚如）：

才女多情革命花，几多恩怨寄天涯。
人生朝露如萍逝，蜀水湘波岁月遐。

闺阁大度攻经史，不谙人间多苦荆。
月下老人吴白屋，恹肖马列启明星。

蜀中女杰盖群雄，人崇龙凤自谦恭。
燕京硕士成名早，蜀水巴山架彩虹。

一生平淡且无私，苦苦辛辛只自知。
十载艰辛全不顾，安危度外谱新诗。

十载夫妻如梦过，离多聚少惯蹉跎。
新闻天地挥长剑，高唱平倭救国歌。
(后来携妻回家办通讯社)

烽火关山步步迁，护儿把卷返四川。
频传鱼雁相思切，沪上秋风梦不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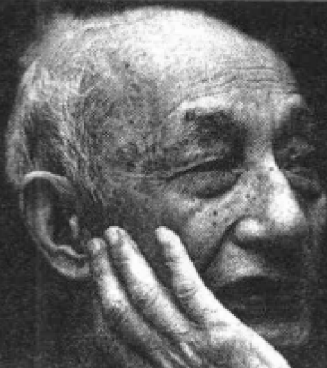
犹记家书锦字间，归心似箭去延安，
我知此志生平志，遗恨终天有泪颜。

祸从天降寇机狂，手术台前吊国殇。
痛骂庸医伤玉陨，沪江闻噩碎心肠。

细读遗书暗自豪，再娶心推患难交。
从此孤儿终有母，我妻再世建金桥。

往事难安我赘疣，终身遗恨我心忧。
我当立结申君志，早有恩来寄语稠。

李鸣珂死了，省委要我接替他的这个位置，当了省委常委，后来，我当了川东特委书记，我领导23个县，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第八章 身陷敌巢

- 我被押到敌人特委会，当晚，他们审问我：“你怎么去找省委？”
- 我看见窗外有个黑影，把窗子叩了一下，从窗缝塞进一个东西，我一摸，是个纸团。
- 犯人中有江洋大盗，牢里的尿缸归他指挥，如果得罪了他，他就让你睡在尿缸旁边。
- 我顺着布条蹿上高墙，逃了出去，拼命往重庆方向跑。

文

强

①

②

③

④

1930年，我被捕了。这是刘湘部队的一部分，是地方军阀，专门对付共产党。我被押到敌人特委会，当晚，他们审问我：“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你是个老共产党，你的名字叫文强，第一次入川是跟着朱德，第二次你又来了。从江巴书记一直到四县军委书记。”他们知道了，我一想，顺着他们说吧。

又问：“你从哪里来？”

我说：“我从成口外面来，我的部队被打散了。”

“你回来找谁？”

“找省委，还没有找到省委，就被你们抓来了。”那天下雨，我穿的长衫被雨打湿，沾了很多泥巴。他们问：“你来都经过什么地方？”我说：“走达县、川江、成寿，到重庆，路我很熟。”

“你怎么去找省委？”

我瞎编一通：“我到重庆以后，在朝天门码头的一块石头上画个高鼻子，因为我有个绰号叫高鼻子，他们就晓得我到了，就会有人跟我联系。这个约定是一年以前的事情，现在是不是还灵，我就知道了。另外还有一个联系办法，就是到重庆新街口邮局看盲信，我们约定，信送到邮局，写个没人收的地方，这就是盲信，我去查盲信，这也是一年以前规定的。”

他们还真相信了，在朝天门码头的石头上画了个高鼻子，在那里等，在邮局也等，等了好多天，也没有见有什么人来接头。

一天晚上，我看见窗外有个黑影，把窗子叩了一下，从窗缝塞进一个东西，我一摸，是个纸团。打开一看，上面的笔迹我认

识，是我们特委组织部长写的：“你的情况怎么样？”我把纸团毁了。我知道了这里有组织，还有救我的人。

过了几天，又审，还是老一套，还把我吊起来。我说：“你们要杀也好，要剐也好，我不眨眼睛。但是我现在没有找到组织，再吊我也不知道。”他们看也问不出什么来，就把我关到监牢里。

一天，有个女的来看我，她姓贺，说是这里军部的一个参谋让她来的。我问：“这个参谋是谁啊？”她说：“姓于，过去在杨森那里当过宪兵司令，他要来看你，有话跟你谈。”说着，拿出100块光洋塞进来，说：“这是于参谋送给你的。”我说：“几年以前我见过于司令，他还好吧？”那女的说：“还好。”

当时在万县时，于元当杨森的宪兵司令，朱德就跟我讲，你要接近于元，要把于元吸收为我们的党员，后来我和朱德介绍于元加入了共产党。

“现在于司令他在干什么呀？”

女的说：“在刘军长这里当参谋，知道你被捕了，要我把这100块钱送给你。”

她走了，看守就讲：“这100块钱不能放在你身上，我们替你保管。”

“那你就拿走吧。”

又关了十多天。犯人中有个在江湖上说了算的江洋大盗，起码比我大10岁。他在监狱里也欺负人。牢里的尿缸归他指挥，如果得罪了他，他就让你睡在尿缸旁边，如果谁给他送点东西，他就让你睡在好一点的地方。我看这家伙欺负人太过火了。一天，他对我说：“我看你很有来头啊，人家还送了钱来了，你怎么不拿出来花呀？”我说我没有钱。

我说：“我告诉你，你对我好一点啊。你整天欺负这个欺负那个，你拿这一套对付我，我不会怕你的。像你这样的本事，恐怕五个都打不了我。你要是再欺负我，我就要对付你了。大家都

是坐牢的，命都不要了，还怕你不成？”监牢里其他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站在我这一边，说你帮助我们伸了冤，我们吃他的苦头吃够了。我对江洋大盗说：“这个尿缸边上大家轮流睡，包括你自己。”江洋大盗看我挺厉害，就出去汇报，他出去说话的声音我们能够听到。他没有想到监狱官也是看人说话，监狱官说：“文强这个人，外面的参谋都给他送钱，还送得很多，这可不是好惹的，你不要惹他。”

江洋大盗说：“现在不是我惹他，是他惹我呀。他说尿缸边上轮流睡，我不去睡也不行啊。”

监狱官说：“那你就按这个道理办嘛。”

我听见监狱官这样讲，心里就更有底了，大声说：“尿缸旁边，今天晚上我睡一夜，明天就轮到他了。”第二天晚上，这个家伙就睡在尿缸旁边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家伙是个杀人犯、强奸犯。

他睡在尿缸旁边，不服，踹了我一下，反倒说我碰了他，我说我没有碰你，是你踹我了。他说：“是你打了我，倒说我打你。”我说你这个家伙黑白不分。

他火儿了：“我跟你拼命。”

“你来拼吧！”

他一拳打过来，我哇地一下就扑到他的后面，把他打出好远。他再不敢上前来了。后来这个人被提审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大概是被枪毙了。

有一天，一个胖头看守对我说，让我到刘湘的特委会去谈话。我一看，这个胖头看守不是原来的四川共青团的省委书记吗？

“你原来是共青团的省委书记，现在怎么干上这个了？你是不是有愧啊？你受过高等教育，是个大学生，现在专门做坏事，是要有因果报应的呀。”

他点头：“我知道我知道。”

“要我到哪里去？”

“请你到特委（刘湘的特委）去，有人要见你，还要给你照相，还要请你吃饭。”

我想这一定是用软办法对付我，就说：“好吧，我跟你去，你现在有权有势，要来就来，要去就去，随便把我提走，我去！”

到了地方，看见桌子上摆着水果等等好多吃的，刘湘手下的一个军阀跟我谈话，说：“我们的督办本来要见见你，他忙，今天来不了，要我代见你。今天晚上专门为你安排了宴会，可以随便一点，打打牌，心放宽一些，明天还到别的地方游一游，看一看。”说完他就走了。

有人把我带到另一间屋子里，说今天晚上请你搓麻将，你会不会啊？我说当然会。“你是黄埔学生，我们这里黄埔学生很多。他们都尊敬你，你又何必这样走极端呢？”他劝我。看我不理他，就不好再说下去。他出去之后，又换了一个人跟我谈，谈不出什么道理，我还是爱理不理的。这个人讨个没趣走了。以后有人进来送茶，看看左右没人，往我手里塞了个小纸团，我偷偷打开一看，几个字“打麻将注意”。我把纸团吞到肚子里。

宴会过后，去打麻将。打了八圈之后，觉得有人在下面踢我的脚，我想这是个什么人？是不是这里面有我们的人呢？我抬头一看，正是塞纸团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也不好再丢纸团。我看见他用手指了一下门外，我就说：“哎，我们休息一下，我出去小便。”大家说：“你这个人真是事情多。”塞纸团的那个人把我送到厕所里，告诉我今天晚上准备逃跑，有人接应。他指着一个方向说：“那里有一个洞，一个人钻出去没有问题。”我点头：“知道了。”

等打麻将的人都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出去走到墙下一看，果然有一个洞，我钻出去之后，洞外还有一堵墙，起码有三丈高，怎么翻得过去呢？这怎么办？我急中生智，从地上摸起一块石头，脱下长衫，扯成几条连起来，把布条系在石头上，一下子把

文

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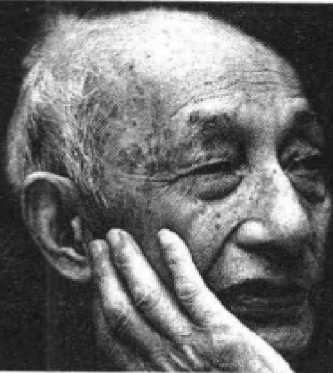
①

述

②

③

石头扔过高墙，刚听到石头落地，有一个巡逻兵从后面走过来看着我，我很镇静，假装在墙边看月亮，巡逻兵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他一走，我就顺着布条蹿上高墙，逃了出去。我拼命往重庆方向跑。我听见高墙里面又是吹哨又是打枪，闹得一塌糊涂。一路上看见刘湘警备司令部到处张贴缉拿我的布告。



第九章 脱离共产党

- 罗世文说：“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查看。”
- 我那23个县里有许多很好的共产党员都被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
- 好不容易找到周恩来住的地方，听见里边有说话的声音，但是一敲门，里面就是不答应，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了。
- 我和妻子抱头痛哭啊：“革命革命，革到共产党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无路可走。”

我逃回重庆，回到家，我的妻子周敦婉和一个娘姨看见我回来，很吃惊，我说：“我活着回来了！”她们不相信：“活着回来了？”隔壁一个老板娘也过来了：“哎呀，你这个大学生，这次出去赚钱去了很久吧？”我说有半个多月吧。

“生意还好吧？”

“还好。”我应付着。

这时周敦婉是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夜深人静，她说：“为了救你，我们想尽了办法，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我说：“我一逃出来，那里面就乱了，吹哨子，开枪。你赶快收拾一下，我们到你娘家江津去躲一躲。”

我到了江津后，周敦婉办好移交也来了。她说：“你被捕后，省委机关一点损失也没有，没有死一个人，你也脱险出来了，我们一道去成都，找省委书记罗世文，我帮你把被捕经过说明白。”

这时是1931年8月。我们从江津一路坐轿子，到了成都。我去找廖宗策，他让我住在他家里，我说现在重庆到处都在通缉我，我不能连累你。我们还是住旅馆吧。

周敦婉去见了罗世文。回来后，周敦婉告诉我说，罗世文对我的态度很不好。

我问：“为什么？”

周敦婉说：“他说你不应该泄露党的秘密。”

“我瞎编了一套骗敌人，有什么错啊？我问心无愧。”

“你们见见面，但是他对你不好，不是平常的样子啦。”

我跟罗世文在一个小茶馆里见了面。罗世文说：“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哎”，我说，“罗世文啊，你见到我也不问问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我们两个在党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什么？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我也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有这样的责备那样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我有什么错呢？”

罗世文说：“你不晓得党里出了王明李立三路线，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

我问他：“我那23个县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共产党员都被暗杀了，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为省委代理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他一拍桌子：“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23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噢？铁的纪律就随便来啊？”

“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

我也拍桌子：“狗屁！你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是省委常委，你是党的省委书记，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

“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党内这样做啥呀？把好的党员都干掉，岂有此理！”吵来吵去，他老是那么几句话：“我们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

那个环境是个茶馆，我们两个一吵，人家直看我们。怕暴露身份，我就跟罗世文说：“罗世文呀，我们两个都不要拍桌子了，我把茶钱付了，我们到城墙上谈。”罗世文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胆子小，是个书生，他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要和他到

城墙上去谈。

我把茶钱付了，我们就跑到城墙边，我拉着他上了城墙。这样一来，罗世文心里犯嘀咕，猜想我要对付他了。

他说：“你是搞军事工作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办呢？”

我态度缓和了一些。“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是我的最高领导了，我把事情问清楚，我就回去，我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

“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

“我们两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犯什么错误呢？”

“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搞得越来越僵，我急了。“罗世文，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罗世文看我这样，就说：“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斯大林这个国际（指共产国际——编者）做出个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农兵，你懂不懂啊？我们党内有个王明路线，好多地方都把好的党员搞掉了，像你我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义家庭出来的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不是工农兵出身的，这些人都要清洗。”

“噢，我知道了。”

他说：“你要小心哪，我告诉你，我们党是有铁的纪律。”

他一说铁的纪律，我又火了：“马克思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我就骂罗世文：“你连共产党的起码知识都没有。”骂完我就走了。

回到家，周敦婉看见我的脸色不对，就问：“你跟罗世文谈

什么了？”我说：“谈得很不好，现在党执行铁的纪律，我感到忧心忡忡。”

“你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忍受。我也知道咱们内部的情况，你也不事先问问我。”

她了解情况比我多，她就跟我讲：“你这一次去，是自己找麻烦，我们两个还没被列入黑名单，过两天再说吧。不过，你这样一搞，不是早点儿进黑名单了吗？那我们还跑得了？只不过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

我自言自语：“我早就发现被自己人活埋的、扔到江里的同志多得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知道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过几天看看再说吧。”周敦婉也没有办法。

她这一说，我倒提高了警惕，说“再过几天哪，恐怕就把我变成鬼了，把你也变成鬼了！”听我这样讲，她也急了。

我说：“今天晚上就走，离开重庆！”

周敦婉同意我的意见了。

“那就这样吧”，我说：“我们到党中央去找周恩来，向周恩来申诉我们这边的情况。”

周敦婉说：“你找周恩来，我就去找杨尚昆。杨尚昆不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嘛！”

“你跟杨尚昆有什么关系呀？”

她说：“杨尚昆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他中学没有毕业，就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了，是我帮他的。”我说：“哎，你还有这样一个人可以申诉呵。”

杨尚昆的大哥是杨闇公，也是个日本留学生，相当于省委书记，被刘湘把舌头割掉，把眼睛挖掉了。

我说：“我们走得光明磊落，我们不是叛变共产党，找到党中央，找到周恩来，找到杨尚昆，向他们申诉，可能还有挽救的余地。”

我写了一封信留下：“罗世文同志：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

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我还写了一句外国话。署名“文莱之”。我那时在四川党内叫做“文莱之”。

我们顾不得拿行李，只带了牙刷。我带着周敦婉跑到江边，雇了一条小船，顺江而下。先到江西周敦婉的大姐家里隐藏了一个时期，找大姐要点路费，大姐送了50块钱，当做路费。路上遇到土匪，把50块钱又抢了。我们又偷偷跑回重庆，找周敦婉二姐，二姐也缺钱，给我们凑了40块钱。这样，我们才离开重庆，到了宜昌。在宜昌呆了两天，后到了上海。这时是1931年年底。

到了上海，好不容易找到周恩来住的地方，听见里边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是一敲门，里面就是不答应，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门里面的人肯定听出我们的声音，就是不理。

一次，我们又去敲门。这时从门里面塞出张纸条来，我拿起来一看，纸条上面写了一个“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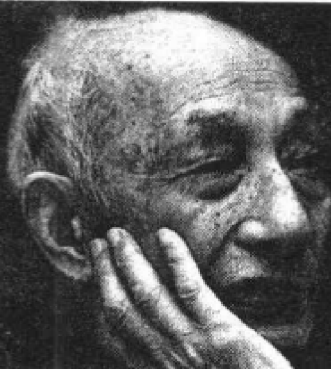
我就猜了，是到苏联去？

周敦婉接过条子看，她说还有一个解释呢，到苏区去。

当时拿着条子就觉得不好办，我们失望了。

周敦婉还有点糊里糊涂，说：“我们再慢慢找吧。”我说：“你这个人，看问题看得很单纯，我们找不到周恩来、杨尚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王明路线的立场呢，如果他们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来呀，就是自投罗网。”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我说：“革命革命，革到共产党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走投无路了。”周敦婉也很着急，我还有个家可以回呀，她连家都回不了了，我就对她说：“我父亲是个很仁爱的人，对我很好，对共产党他也不反对，咱们回家吧。我和父亲讲讲，你是个大學生，给你介绍一个工作，没有问题。”



第十章 回家的日子

- 妻子临走时，我对她说：“我们两个要以共产党为友，不以共产党为敌。不管你干什么，不管我干什么，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 我们少年通讯社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拍了一张风华正茂的照片。
- 何键是家派，我们是野派。
- 黄兴的大儿子介绍我跟长沙律师会的会长蒋伦楷见了面。

文

强

11

述

11

11

回到湖南老家那一天，天下着大雪。一到家，我的母亲就去世了，她才47岁。父亲看到我：“你可回来了，家里境况很不好，你妈妈死了，一个妹妹也死了，还有个弟媳妇也死了，孙子也死了一个。你们回来了，多了两个人呵，我养活你们。”

过了几天，一天晚上，父亲问我了：“你好多年不跟家里通信了，现在忽然间跑回来了，你这么多年在哪里，干什么呵？我不了解，你向我说点真话吧。”

我就跟妻子商量，我说：“父亲的话很有道理，我准备跟他全讲真话。共产党里面我也没关系了，国民党那边也通缉我，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啊。”

我对父亲说：“今天您这样问我，我也不好再骗父亲了。国民党通缉我，要杀我，共产党是王明路线，我也活不成。”我向父亲坦白了。父亲望着我笑了笑，拿出一张报纸：“你看看报纸。”

“报纸上有什么？”

“你的事情哪，报纸上登啦。你的叔父拿回来一张四川的报纸，你看看，你是个共产党，还是共产党里面很重要的人物，你的名字是不是改了？改的叫‘文莱之’呵？你看看。”

“不错，这是我，不过现在我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了。”

“这样吧，我来安排，你的妻子是个大学生，是个外省人，我现在办了个女子学校，让她到这个学校代替我当校长，乡下人看到我的媳妇回来了，一下子就当了校长，不是有点地位了吗？”

乡下人哪，觉得她有地位了，人家就不多心了。”我妻子很感激，说：“你父亲为人很厚道。”她就当了校长。

父亲安排我走亲戚，说：“你去走亲戚，姑母姨母家去转转，转个把月两个月，看环境怎么样再说。”我们的亲戚都是门当户对的大地主官僚家庭。

过了一个多月，父亲把我接回来说：“乡下人对你的看法不错，你拿着我的信到城里去，找到我那些朋友，当个中学教员或者小学教员都可以，当记者也可以，拿着我的信，他们会安排的。”

这时，周敦婉的姐姐来信，要她到北平去，在中学当英文教员。周敦婉就到了北平。她临走时，我对她说：“我们两个要以共产党为友，不以共产党为敌。我们两个人来一个君子协定，不管你干什么，不管我干什么，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我拿着父亲的信到了县城里。找到我以前的中学同学，他说：“你回来的好，就在我们这里任职吧，你的程度我很晓得，当个中学教员没有问题。”我说：“随便你们怎么安排都行。只要有饭吃就行。”他说：“你是军人出身，给我教体育。”我说：“教体育就教体育吧。你们的课程，我都教得下来，你们缺什么，我都可以代理。”这里是湖南长沙的三里街，有个清真寺，在清真寺里办了个“敬信学校”，是个高级小学，我就在学校里当起了教员。

我没有那么多课，很闲在。这时，淞沪战争爆发了，十九路军在上海打日本。我写了篇稿子，哪个报纸都想要，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很有爱国思想。

我的小文章在报纸上一登，我在长沙就出名了。长沙《岳麓日报》的一位老先生跑到学校找我。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教体育，我问：“你这位老先生找谁呀？”

他说：“我找一位没有见过面的人，他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长沙各报都登了。这个人现在有名了。”

文

文

11

11

11

11

我问：“他姓什么呵？”

“姓文，叫文浮生。”

“就是我。”那时我化了名了，叫做文浮生。

他把我看了一下，那时我只有25岁。他很惊讶。

“看你那篇文章，起码三十多岁的人才写得出来呀。不晓得你这样年轻，就写得这样好的稿子。”

我把他请进屋，坐下谈了一阵，他说：“我想请你去报社当个特约记者，每个礼拜写一篇文章，写出来送给别的报也可以，但是，要先送给我这个报。”

我说：“那也可以。”

他问：“你在这里当个小学教员有多少钱呢？”

我说：“不是为了钱啦，我在这里当小学教员是尽义务，挣20块钱。”

“太少了，你给我当特约记者，每个月给你60块钱。”

“60块钱？比这里还要多40块钱。”

后来我就告诉我的那个中学同学：“我当个特约记者，你们这个钱不给我也可以啦，我有60块钱啦。”

他很奇怪：“60块钱？当个中学教员还拿不到60块钱呢，待遇很高呀。”

我很高兴，马上写信给周敦婉，说你回来吧，我这里学校有20块钱，再加上60块钱，你不做事也有饭吃，你回来吧！她回信说还没有找到组织关系。

大概不到半个月，又来了一个人，西装革履，是《建设日报》的社长，他要请我到《建设日报》当副主编。

我说：“副主编？我没有干过这个事呀，什么叫做副主编呀？我不知道。你不要把我的能力估计过高，办不了事情会害了你们。再说我已经在《岳麓日报》搞事情，再搞恐怕忙了一点。”

他说：“你还是教你的书嘛，不用住到我们那里，你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注意一下我们报纸上的社论，给修改修改，有事情

你就可以不来，我有事情出去也好有个人托付啊。”

我一想：“那也可以阿。可是我没有干过这事情阿。”

“报馆的事可以慢慢熟悉，你先试试看，你如果干得好，就请你当总编，你愿意干别的事也行。”我答应下来了，负责在报纸上写社论。

过了些日子，他又找我来了。“你的社论写得很好，给我们报纸添了光彩。每月给你100块钱工资。”

“《岳麓日报》已经给我钱了。”

他说：“《岳麓日报》是《岳麓日报》，不要扯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大报，就照这个发吧。”

“《岳麓日报》给我60块钱，你给我100块钱，我一生没有拿过这样多的钱呀。”

我又给周敦婉写信，说你赶快回来，我忙得干不了了。现在我当副主编，每月又给我100块钱。

周敦婉回来了。她挺有脑筋，说：“我们自己搞个通讯社吧。”还有人也这样劝我。有了这个想法，我就跟很多同学探讨这件事情。

有一天，我出去遇见一个姓谢的朋友，他是湖南大学的学生。他说认识国民党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冯运宾，此人在湖南很有实力。假如去找他，办个通讯社备案就容易了。姓谢的同学后来跟冯运宾一讲这事，冯说：“你讲的这个姓文的我不认识，倒是读过他的诗。这样吧，我的一个朋友办了一个通讯社，现在他正在上大学，没有时间搞，让姓文的去见见他吧。”

我和那个人见了面。他办了一个通讯社，叫“少年通讯社”。他正在读书，大学还差两年呢。

他说：“我没有时间发稿，如果再有两个月不发稿，通讯社就要被撤销了。就把这个通讯社送给你吧。”

我说：“主权还是归你，你什么时候要收回，我就还给你，等于是借给我。”

他说：“那也行啊。”

一搞通讯社我就忙了。我叫妻子不要教书了，给我当副社长，又请了几个青年人当记者，后来老家有个女孩儿来看我，写了篇文章，挺不错，也留下来当记者，还有个老弟也来了（这个老弟现在还在台湾）。通讯社里男男女女都是年轻人，是名副其实的少年通讯社。

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拍了一张风华正茂的照片。1975年，我特赦之后，当年的一个年轻记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弟弟找到我，说：“我哥哥临死的时候，交了一张照片给我，让我保存到底。‘文革’很乱，我就把照片放在桶里，用漆封好，在地下挖个洞埋起来。现在交还给你。”我一看，正是当年我们少年通讯社几个年轻记者一起照的那张照片。

少年通讯社搞了五年，在湖南就有点名气了。

湖南有势力的通讯社有八家，称为“四通”。“四通”联合在一起欺负其他的通讯社。其他的通讯社找到我说，你是少年通讯社社长，有主意，要把“四通”搞掉。我说暂时还不能，否则“四通”先把我们搞掉了。但我在考虑这件事。后来我提出搞一个“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我对其他的通讯社说：“你们不要急，我来筹划。至少拿过来四家大报，再拿过来几家小报，在长沙支持我们，就能够搞起来了。”

我的一个叔父是《前民日报》的社长，他说：“我支持你，我给你联络湖南的《大公报》，然后再联络几家，条件是要把那些名人摆在你的前面，你这个资格拿不出来呀。”我说“那更好啊。”一下子，拉过来六家大报，有《大公报》、《前民日报》、《民国日报》、《国民日报》、《建设报》等，小报拉来了十几家，我们成立了理事会，我当了理事长。在长沙召开“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成立大会的时候，冯运宾对我讲：“何键是家派，我们是野派。”

“四通”在湖南扰乱社会，扰乱正义，我想要对付他一下。我对记者们说：“我们要团结一致才有力量，然后我们对‘四通’发动进攻，只有进攻，才有胜利。”湖南有个律师会，律师

蒋伦楷是个著名人物，从日本留学回来，很扶正义，在法律方面是湖南头一把交椅，是长沙律师会的会长（我离开湖南几年后，他就去世了）。黄兴的大儿子介绍我跟蒋伦楷见了面。过后，蒋伦楷对黄兴的大儿子说，你介绍的那个姓文的，很讲正义，不愧为文天祥之后，和我很谈得来。我知道蒋伦楷对我印象很好，就跑去对他说：“长沙记者工会是何键办的，是我们湖南的一个毒瘤，应该把它割掉。”

蒋伦楷问：“你有什么消息？”

“长沙有‘四通’，另外还有二十多个通讯社，一共三十多家通讯社，那‘四通’包揽一切，做尽了坏事，我们奈何不了它们。”

他说：“我们把其他的通讯社团结起来，这是一股力量，你们起来搞，打倒‘四通’，现在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现在长沙成立市政府筹备处，何键的一个侄子何元文是市政府筹备处处长，这个人受过新式教育，是回国留学生，他借何键的势力来做官，叫我跟他一道做事。我介绍你跟他见见面。”

我们的“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开始活动了。“四通”知道后说，“你们没有用的，谁能把我们扳倒啊？”他们是说大话，我们是办实事，我们把“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牌子挂在我住的屋子门口。牌子一挂出来，税务机关来了，还有一些大机关也来了，说我们是非法机关。

我问蒋伦楷：“他们说我们非法，怎么样才叫做合法？”

他说：“不要怕，我们去找何元文。”

何元文说：“你们‘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归市政府筹备处，全省的记者都要到你们这里来报到。”

“做得到吗？”我问。

“做得到的，你们已经正式成立了嘛。”何元文又说：“你是全省的，我是长沙市的，你比我大嘛，是一个省里的大机关咧。”

他给我写了一封公函：长沙记者工会即日撤销，所有新闻机关的人事关系和一切事务归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管辖，他说：“把你们的大印盖起来。”

“八通”里一些人跑到我这儿来求我：“我们都是长沙人，高抬贵手。”我说：“这是大家的事，是市政府筹备处要撤销你们，又不是我要撤销你们，你们找政府嘛，找我有什么用呢？”很快，“八通”内部分裂了，只剩下“三通”了。

我又遇见了一件事。我在《岳麓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湖南各家报纸都要转载。文章的意思是说，湖南社团办事处到处转，每家每户都要出钱，商店里出的更多。

长沙社团办事处是怎么来的呢？还得从彭德怀打长沙说起，那时长沙是一座空城，城里没有队伍了，为了维持秩序，就成立了二十多个社团的联合办事处，而且武装起来。后来何键的兵来了，彭德怀撤走了。社团办事处在非常情况下成立，没有备案，是临时性的组织。但社团办事处权力很大，在长沙很有名，一切事情都包办。上海战争爆发后，他们借收爱国钱来发财。我在文章里写：“未曾抗日先伤股，不出钱的打屁股，打完之后再出钱。”这篇文章搞得全长沙都知道了，小孩子们到处唱。刘文焕问：“这是什么人搞的？”手下说这是文浮生写的文章。“文浮生是什么人啊？”手下答：“是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理事长。”

二十多个社团联名告到地方法院。我去找蒋伦楷：“又出问题了。我写了篇东西，有人告了我。法院要我出庭，我是被告啊。”

蒋伦楷说：“我还不太了解情况，一下子答复不出来，你把报纸和有关的材料给我，我研究研究。”

过了几天，蒋伦楷找我：“你是一个人出庭，他们是24个人告你，出庭的势力比你大得多。咱们这样，跟二十多家通讯社联络，让他们派代表旁听，这样一来，你的人比他们更多。”

我没有把握：“这个官司打得赢吗？”

“打得赢”，他说，“你写得好，为民请命哪。法律不是空的，一要有人证，二要有物证，没有人证物证就是空官司，打不赢的。你回去把湖南登你这篇文章的报纸都找来，剪下来贴好，开庭的时候把证据送上去，不要多说话，只说是为民请命，希望依法处理。我替你辩护。”

“这些报纸哪里有呢？”

“我们这里有报纸，多找几个人，翻嘛。”

我把登我这篇文章的报纸找齐，把文章剪下来，贴了两大本。

开庭时，法官说：“被告文浮生，他们告你诽谤、造谣，侮辱了他们团体的名誉，侮辱了他们的人格，你有什么要申诉的吗？有人证物证没有？”

我说有，请允许我呈上来。我说我报道的都是事实。法官看了我剪贴的两大本，宣布暂时休庭。

继续开庭，法官说：“记者文浮生搜集的这些剪纸，一共有二百多篇，所写都是事实。原告是非法组织，敛财是事实。明天继续开庭，我们会依法办事。但是，对于你们这些社团，有两句话你们回去考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些原告弄得没有面子，心里嘀咕明天怎样宣判呢？

第二天，法庭宣布：文浮生无罪，文浮生代表新闻界为长沙人请命，做了一件好事，这样一宣布，旁听的记者都站起来鼓掌。

原告那些人不服，还要上告。蒋伦楷对我说：“他们上告，告不赢。不过你也要釜底抽薪，马上写个东西，以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名义发出去。再去找何元文，这些社团也归他管。”我就打电话给何元文，说社团联合办事处是非法机关，何元文说：“撤销！”何元文一批，就把社团联合办事处撤销了。

这场官司打赢后，大家都想见见我。《妇女报》过去一直看不起我们少年通讯社，现在也要跟我见见面。妇女联合会里面都是些国民党元老的夫人，地位挺高，我一去，她们说：“真是少

年英雄哪，你的官司打赢了，我们也敢说话了。”

这一年，日本派了兵舰到湖南示威，一直开到湘江里头，何键怕出事，就派了自己的一个机要秘书和一个报社的社长，给日本人送礼物，拍日本人的马屁。那天，有两个记者跑到我这里来说：“何键这家伙给日本人送礼拍马屁，我们湖南人向来是不怕外国人的，何键拍马屁，把湖南的省格也失掉了。”我说：“也失国格啊。”

他说：“你得站出来说话呀。”

我说：“我们要爱国嘛。你拿一支笔来，我们要代表湖南人，代表中国人出来说话。请你们两位动笔。”

“只有你写，我们还敢写呵。”

我就写下一个题目——“湖南当局的荒谬言论”。指责何键，但没点何键的名，只说湖南省当局不应该拍日本马屁，向我们的敌人送礼物，还说些不要人格不要省格的话。文章后面落的是我的笔名“文浮生”。

第二天，报纸上刚刚登出来，省政府就知道了。何键派他的秘书长易侍州，跑到我这里来了，他一进门就喊：“你们这里哪个是少年通讯社的社长，又兼《建设日报》的主编？”

“就是我。”

“噢？省主席特别派我来，你写的一篇文章污辱了我们的省主席，命令你明天更正这篇社论，如果不更正，后果由你自负。”

我就喊：“你这个秘书长我早就晓得，你和我们的何主席都是秀才出身，今天我听你这话呀，你跟何主席一点法律知识都没有。”

他一听就火了：“哎，你指责我跟何主席一点儿法律知识都没有，是什么道理呀？”

“社论代表我们报纸的立场，从来没有听说有更正报纸社论的，这些你都不懂哪？”

“你不要说我们没有法律知识，我们是没有研究。”他又说：“你这个态度不对呀。”

他站起来要走，我就上前送他，他把我一拉，拉到他近旁，说：“你这个话我回去不好答复我们的主席，请你当面答复他，你到省政府去一趟。”

我没办法了，去吧，就跟着到了省政府。他说：“你等一下，我进去报告。”一会儿他出来说：“主席请你进去。”我一进去，何键“啪”地在桌上拍了一下：“你就是那个报纸写社论的吧？”我说：“不错，是我。”他说：“让你更正，你不更正，还骂我们没有法律知识，你怎么是这种态度呢？”我说：“这种态度是我们报纸决定的，我是《建设日报》的主编，我的立场是代表报纸的立场。新闻可以更正，社论不能更正。”

何键说：“你想找麻烦？你现在回去，如果不更正的话，后果自负！”

我想：“要抓我？”我就回来了。我们那些同仁说：“啊呀，这个事好麻烦，那个家伙可厉害呀，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的。你暂时离开一下吧。”到了晚上，来了一伙人，把报社封掉了，臭鸡蛋砸了一屋，搞得一塌糊涂。那天晚上，我一口气跑了五十多里，跑到乡下见到父亲，把这个情况向父亲谈了，父亲出主意：“现在湖南的权力都抓在何键的手里，你过去是共产党，可能他还不知道，他如果晓得你过去是共产党，你就活不了了。你就离开湖南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我又赶紧回到城里，买张火车票，准备到杭州去。

后来与我的新闻事业有关的事情是，几年以后，1935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难”大会，要各省选代表参加。这时我已经在国民党军统，忽然接到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信，说我已经被选为出席“国难会议”的代表。我回电报，说我现在另有职务，湖南我回不去了，南京也去不了，你们还是从常务理事中另选人去吧。戴笠看到这封信问我：“你还在搞新闻工作吗？”我说没有，是他们推选我当“国难委员”。戴笠说：“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938年，范长江跟着周恩来到了湖南，范长江说：“我在湖

文

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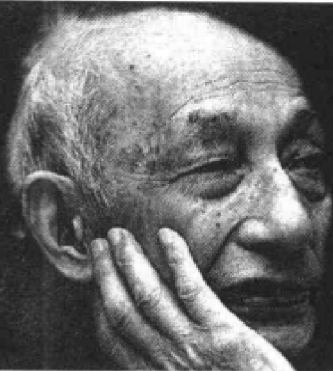
口

述

口

述

南新闻界没个立足的地方啊。”我在南京知道了这件事，就告诉我在湖南的新闻同仁：“你们把‘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这块招牌送给范长江吧。”范长江接受了，“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以后是范长江接手来搞了。



第十一章 加入军统

- 在火车站遇到四川共产党里有名的廖宗策，原来他比我早一年离开了共产党。
- 西湖上，有一个人叫我：“你是不是那个文强呵？”我想这会是谁叫我呵？回头一看，是父亲的老朋友程潜。
- 戴笠说：“你的通缉令还没有取消，如果跟你算老账呢，还要出麻烦！”
- 我拿着程潜的信去找张治中，国民党把对我的通缉令取消了。

文

强

口

述

自

白

得罪了何键，搞得在湖南呆不住了。父亲给我出主意，走为上策。我说到四川去太远了，父亲问：“你还有什么朋友在浙江杭州这个地方呢？”我说：“有。”他说：“那你们就向杭州走吧。”

我急急忙忙跑到火车站，一到火车站，就看见前面有个人坐在黄包车上，我一看，这个人我认识啊，是廖宗策嘛。他并不晓得我在他的后面，我就喊我坐的那个黄包车，说：“你走快一点，赶到那个黄包车的前头去。”赶过去之后，他也看到我了，就停下来，很惊喜：“我们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说：“我现在在逃难，越逃越远啦，国民党抓住我要杀头，共产党里王明路线也要杀头，我找周恩来也找不到，我妻子找杨尚昆也找不到。”

他一听：“噢，你现在已经不在共产党里头了。”

我说：“我离开四川你还不知道啊？”

“我是在你头一年离开的。”

他就讲了：“我的情况也和你相同，也是那个王明路线，死了好多人，开始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搞到最后我们才晓得，这是斯大林出的主意，说是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混进党里，斯大林要中国共产党整党，要把大资产阶级出身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都淘汰，都杀掉，要跟俄国一样，搞工农兵，搞工农兵这个政权才靠得住。”

“噢，你的情况跟我一样呵，那你逃到哪里去了呢？”

他说：“我就跑到上海，找宗克钧，他是黄埔一期的，是国民党的十三太保之一，很出风头的一个人。我到上海找到宗克钧，这时蒋介石的政策变了，抓住共产党也不杀了，送到化成院，如果表现很好，就放出来，对于共产党是这样，对于黄埔学生也是这样。我和宗克钧的关系很深，他看到我去，就说：‘你就住在我这里，你是个共产党，在四川很著名，你万一被抓，我就不好救你了，你住在我这里，我随时可以救你。’”

我问：“那现在不抓你了吧？”

他说：“不抓了。”

我说：“你干什么呢？”

“我在军事杂志社当记者。”

我就笑：“怪得很呢，我也当记者。”

“不晓得你当什么记者？”

我说：“我们不要谈记者的事了。”

他又说：“我要到武汉去。再回杭州去看妻子。过一个时期，我就要到南京去做事了。”

“你做什么事啊？”

“哎，我是记者嘛，是军事杂志社的记者。”

他又说：“我把我家的通信地址告诉你，我在杭州有许多认识的人。我在杭州还有个住的地方，我妻子现在住在杭州，你到杭州就住在我家好了。”我们两人就分开了。

我就到了杭州。住在廖宗策家里。我对他妻子说：“我这次是逃难来的，湖南那个主席要抓我，在车站碰见你的丈夫廖宗策，他要我到你这里来躲几天，过几天他就回来。”他妻子讲了：“你跟我们廖宗策呵，两个人是好朋友呵。”

过了几天，廖宗策妻子说：“你住在我们这里，也太寂寞了，你过去出来游过西湖没有呵？”我说：“没有，只知芳名，没有游过。”她说：“明天我陪你去游西湖。我还有个小孩，两三岁，我们一起去游西湖吧。”

西湖，好漂亮啊。我们坐在小船上，廖宗策妻子又跟我

文

强

11

述

11

述

说：“我们到三潭印月去看看。”我说：“那好。”这时，后面来了一条大船，忽然，大船上有一人叫我：“你是不是那个文强呵？”我想这会是谁叫我呵？回头一看，是父亲的老朋友程潜！

他说：“你现在在干什么呢？好多年不见你了。”

“我当记者。”

他看我挂着个记者的牌牌，就说：“你怎么不务正业呀？你是个军人嘛，是黄埔毕业的嘛，怎么搞得当记者去了？”

“我身体有些不太好，人家就介绍我当记者。”我也不好说我是共产党，是逃难出来的。

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正要人！”又说：“你的父亲跟我是日本留学认识的，一起跟随孙中山先生的。你当什么记者呵，到我这里来吧。”

我说：“老伯，你现在干什么？”

“我是国民政府参谋总长。”

“老伯，你如果让我到你这里来，我很高兴。”程潜就把上海住的地方告诉我，他说：“你到南京参谋本部来找我也可以，到上海家里来找我也可以，我不会亏待你。”

我想：“现在也没有一点政治关系。难得遇见他这么一个人，可以照顾我嘛。”就说：“程老伯，我一定去看你。”

我知道他两个通讯处，到上海他家一看，他家里人讲，他到南京去了。我又跑到南京，见到程潜，他很高兴，说：“这样吧，你从黄埔出来好几年了吧？在参谋本部第二厅做上校参谋吧。”

他又说：“你的父亲书读得好呵，是个学者，你的书也读得好呵，黄埔学生里你也是少有的人，你给我当参谋吧。”

我问：“你这个参谋总长管什么呢？”

“什么都管！我这里管两个厅，一个第一厅，一个第二个厅，还管一个陆军大学，我是总长。”

我说：“是这样啊，那我还要回杭州，看一个朋友，我迟到

一下可以吗？”“可以，你自己选择时间来吧。”

我告辞程老伯，回到杭州。

我一到杭州，廖宗策也回来了。他告诉我：“有个戴雨农，我跟他讲了你的情况，他要接见你。”

我问：“戴雨农是个什么人呢？”

“也是黄埔学生，是黄埔第六期的。年龄比你大10岁。”他又说：“他在我们校长身边干特务，是十三太保，他身边的秘书长跟我讲，他要接见你。”

我去见了戴笠。我还穿着记者的衣服，戴笠把我打量了一番，“你是老大哥呀，你是黄埔第四期的，我跟你比，我还差两级呢。”我说：“听说你的年纪比我大10岁。”他就问我多少岁，一算，比他小10岁。

一见面，他对我有些好感。我的情况，廖宗策已经跟他说了。我是逃出来的，他也知道这个情况了，很感慨地说道：“老大哥呀，人生很难，做人很难，像你们这样的人，在共产党里搞到这样的地位了，当过省委常委，当过特委书记管23个县，你在共产党里地位很高呵，你比我还要小10岁，如果我跟你比官，那我比你小得多。可你现在搞得这个样子。”

他又说：“你过去的路，我看是走错了，走错了嘛。你到杭州来，希望我们合作，现在我们的校长要复兴民族，要把中国搞好一点，搞强一点。”

我一听就不高兴了，说：“雨农先生，我们头一次见面，你就说这个话，我接受不了啊。”

“你为什么接受不了呢？”

“我的路并没有走错啊。”

我回去之后，把情况告诉廖宗策，他说你不要马上到程潜那里去，你的问题还大呢，国民党对你的通缉令还没有取消，万一你去了被捕，就搞不清楚了。你不要离开。他又让我去见他的头头戴笠。

戴笠一见我很客气，说老大哥，你的情况我了解，现在想请

你在我们这里的杭州警官学校当第一大队的指导员，受训的都是大学生。这样，我们两人就谈得不错。忽然，他又冒出一句：“你的事情哪，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好好团结起来，把国家建设好。”我没有做声。

当戴笠又说我说走错路的时候，我生气了，我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他经常给我们讲话，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汪精卫是我们的党代表，他喊革命的向左来，我加入共产党，就是受了这个话的影响。以前我走的路，我没有走错。”

他看我反对他的态度，就说：“我们不要讲得远了嘛，你们那时第四期分左派右派，我们到了第六期还分左派右派，现在愈搞愈凶了，闹得很厉害。我在学校里是靠校长吃饭，也分不清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只知道跟着校长就有饭吃了，有官做了。我刚才说的话，说的不对的我收回，你也不必发脾气啊。”

“我倒不是发脾气，我不承认那个时候有错误。”

他说：“你要好好思考呵，你在共产党那里负过那样重要的责任，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共产党要杀掉你，国民党也通缉你。你这个革命革得怎么回事啊？两方面都要把你杀掉？”

我说：“那是人倒霉了。”谈了一会儿，他又说：“过去的事情都不谈了，你如果到了我们这个学校，我是这个学校的政治特派员，人事权在我的手里边。”

戴笠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党代表，在这里受训的人都是些大学生，有男的也有女的。他说：“当一个大队的指导员，你的资格够了，我的权限也只有这样大了。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个学校，每个月可以拿800块钱。过去的事情不谈了，一笔取消了。”

临走时，戴笠请我吃了一顿饭，问我：“你对我的意见有什么看法？愿不愿意留在学校啊？”

“还在考虑。”

他说：“你不能老在考虑呀，我们这里检查邮电的时候，检查出你的一封信，你在信上说，这个学校的规模也不大，并不想

在这个学校里头搞，你还说我是个特务头子，不想在这里搞，你根本就看不起这个学校呵，你很有问题。现在我们要复兴民族，把中国搞好一点，搞富强一点，所以成立了复兴社，这是学德国，学墨索里尼，学意大利。”戴笠又把他那套东西讲了一顿。我没有做声。

过了一会，我说到那封信：“哎，我到你这个学校里头来，连通信自由都没有得了？通信自由都剥夺啦？”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我们要检查邮件，这是检查出来的。”戴笠又说：“我很坦白地告诉你，你究竟愿不愿意在这里，愿意就留下来，不愿意，你可以走。不过我告诉你，你的通缉令还没有取消，如果跟你算老账呢，还要出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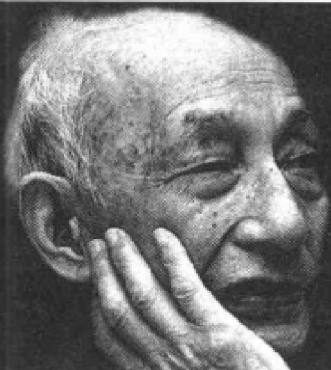
我说：“我现在告诉你，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走，你也不要控制我的时间，当几个月的大队指导员，我干得下来就干。”他说：“你能力没有问题，你愿意就愿意喽。”

廖宗策问我：“你干不干呢？”

“我已经表态了，一定去。”

我决定在戴笠这里干之后，就去上海找程潜。程潜给了我一个少校参谋的头衔。这次，我跟程潜说实话了，说我在共产党里干了多年，国民党一直在通缉我。程潜说：“还有这个事情啊？”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拿着这封信去找张治中，张治中找了五个黄埔学生，联名证明我已脱离共产党六年，跟共产党已经没有关系了。这样，国民党就把对我的通缉令取消了。

我回到戴笠这里，他给我发了一个登记证，我加入了军统。



第十二章 我在“八·一三”

- 戴笠说：“日本就要动手了。我想请你专门研究日本问题。”
- 我每天坐着我那辆汽车，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收集战况。
- 张发奎说：“你是高级参谋，给我参谋参谋，我在这里守浦东，恐怕守不住。”
- 实际上，金山卫并没有重兵防守，也没有派炮兵部队，只派了东北军一个师的兵力。

1936年，我在杭州警官学校当指导员，“西安事变”后不久，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变，日本少壮派把日本首相、外交大臣、财政大臣杀死了。这时，戴笠到了杭州，见到我说：“日本少壮派很快就要打中国了，我们校长已经有个10年计划，要把我们自己的军队整理好，办这个警官学校，就是要把情报队伍搞好。要搞10年，准备跟日本人打。现在我们中国这个破破烂烂的队伍，打日本人是打不赢的。戴笠还说：“现在我们在上海、江阴、无锡这些地方，修马其诺防线。从上海到苏州一直到南京，都修马其诺防线。”我听了这些情况，也不太懂。

有一天晚上，戴笠又从南京来了，他向我提个问题：“文学家啊，你当这个大队指导员，你认为行不行呢？”

“还适宜。”我又说：“雨农先生，日本发生政变，他们把首相都杀掉了，把财政大臣都杀掉了，这个政变搞得很厉害呀，这个少壮派将来会成为我们的大敌。”

戴笠说：“你这个人很能干，看问题看得很高，我想要成立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你看怎么样？”

“噢”，我说：“成立日本问题研究会呀？现在报纸上不是登了吗？日本的少壮派搞政变，就是为了打中国。”

戴笠说：“现在少壮派胜利了。校长的10年计划还没有完成呢，日本就要动手了。我想请你专门研究日本问题。”

“我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大事呢。不过，我们这里政治教官和日文教官都有。”

“我看你能力够。研究日本问题，我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

龚德伯，他经常写文章，一个在我们校长身旁，叫王文生。他们两个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你一出来，我就有第三个了。”

我说：“他们都是专家，在日本留学多年，我怎么能跟他们比，成为第三个人呢？我只能跟他们做学生。”

“你先起草一个办法，第一要有个名称。”戴笠说。

我想了想：“名字就叫‘日本问题研究会’，基本成员呢，是我们警官学校的教官。”

戴笠表示同意：“对对对，就这样定了。”

我问“还要经过一些什么手续呢？”

他说：“我告诉参谋总长程潜，在他那里立案，我已经跟他商量的，他说人选问题最好是那个文强。参谋总长讲他愿意由一个黄埔学生负责研究日本问题，我对参谋总长说，我这个警官学校里，英、日、法、德十几个国家的教官都有，研究日本没有问题。对了，你这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也搞些外国人参加，有一个德文教官，是个女的，很能干，还有个王作化，是日本毕业的，对日本最熟悉了。你以他们作基础。你担任会长。”

后来，戴笠的秘书长也跟我讲：“戴老板看中你呀，他先已经跟我们讲了，要你研究日本问题，你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学问一钻进去了，你就可以成为专家了。”

我在警官学校里发动当教官的黄埔学生，自愿参加“日本问题研究会”，结果大家都愿意加入。于是，我当了“日本问题研究会”会长。

“日本问题研究会”成立后不久，南京成立了一个警官学校，浙江省杭州市警官学校撤销，并入南京中央警校。当时我在西湖边遇到程潜，他要我到 he 那里做事，后来见到戴笠在杭州警校工作，也一直与程潜保持联系。这时两个警校合并，我到了南京，就去看望程颂公，对程颂公说两个警校合并了。程颂公对我讲：“现在我们军队的情报制度，应该改变。我这里要办一个训练班。甲种训练班专门管作战，乙种训练班专门管情报。这是学德国的。我这个训练班教官的名单上有你。你现在是个什么官阶啊？”

“我在警官学校没有定官阶，发的工资是每月150块钱，相当中校。”

他说：“工资太低了，给你个上校军衔。按军事方面规定，上校就是高级参谋了，这样你就可以随时见我了，怎么样？”

“那我当然高兴了。我的上司是什么官衔呢？”

“你的上司是第五处处长郑介民，还是个少将呢，教导主任是余乐醒（沈醉的姐夫），是个上校。”

这样，我到南京当了参谋本部的乙种训练班的训政主任。我一到差，嗬，看到很多中校、上校，包括留过学的，都调来在训练班受训。

程潜到训练班来视察，我跟程颂公讲，我另外还有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啊？”程潜问。

我说：“我在杭州警校成立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雨农先生让我做会长。现在我到了你这里，其余的人都到了南京警校，这个研究会摆在哪儿呢？”

“哎”，程潜说：“就在我这儿嘛。我派几个人来加入你这个会。”

“我们这个会放在你这里，我们不够格呀。”

他说：“你不够格，我也不够格吗？有我在这儿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就把日本问题研究会搬到了参谋本部，程潜把戴笠推荐的龚德伯和王文生也找来了，我就拜他们为老师，让他们介绍我读些什么书。

8月13日这一天，日本人用飞机轰炸南京，上海也打起来了。在这之前，日本人跑到我们在上海修的飞机场去捣乱，那些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开枪打中国人，我们马上打长途电话到南京去，说日本人到我们飞机场了，还开枪打我们的人，问怎么办，蒋介石下命令说：“他打，我们也打！”我们的部队就把日本人打掉了。日本人说是中国人先打的，把罪名安在中国人身上。实际上是日本人先打中国人，他认为中国人不敢打他，但是我们打了！

打死了好多日本人，丢到海里去了！就这样，第二天日本人就炸南京，炸南京后，在上海就打起来了。

日本人首先打上海的白龙港，白龙港是上海浦东的一个小岛。他们要在白龙港登陆，打入上海。我们有最大的兵舰防守在白龙港，日本人没有得逞，每次一打，都失败了。日本人没有办法在白龙港登陆了。这个战争打了好久，动用了70个师，每个师有2.5万人上阵。从“八·一三”开始，中国跟日本打了三个月，蒋介石把他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把在美国训练的教导总团也拿出来了，胡宗南的部队也调到上海，连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这些部队都参加打了。

这时我在程潜的参谋本部，是上校参谋，程潜对我说：“八·一三”战争爆发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中日战争不知要打多少年，训练班停办（这个训练班只办了三期），所有受训人员都回部队去。派你到上海，你这个参谋呢，跑各个高级司令部，张治中、张发奎、顾祝同等所有这些高级将领你都要认识，特别要熟悉他们的参谋长和情报主任，你的任务是把每天的战况整理一份，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南京。

程潜是参谋总长，他需要了解战况。他说：“你整理战报的时候，整理三份，一份送给委员长（蒋介石），一份送给我，另外一份送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免得我们再来整理，要争取时间。”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心情豪壮，写下一首诗：

“八·一三” 奉调上海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
男儿爱国争先死，护士扶伤竟向前。
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
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第二天，我就到了上海。我每天坐着我那辆汽车，跑各个高级司令部，到各个高级司令部收集战况，回来整理。送到南京最

早的战报就是我的，每天晚上9点钟以前，我的电报就到了。参谋总长程潜要求我：每份战报整理三份，一份送蒋介石，使他最先看到。第二份送给程潜，再送一份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后来程潜说，我报的战报最实在，有些战报搞到晚上几点还报不到，还有些战报都是假的。

这些高级司令部里都有我在情报训练班时的学生，其中有的是上校，有的是中校，也有还是少校的，他们很尊重我，喊我老师。一次，我去浦东，浦东防守司令是张发奎。我去的时候正赶上吃饭时间，我一走进食堂，军官们就站起来围住我，都叫我老师，张发奎看到好多人起来围住我，喊我老师，觉得很奇怪：“哎，我这个司令部里怎么有你这么多学生呢？”那些军官说：“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参加参谋业务训练班时，他是我们的老师。文老师很有学问，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张发奎就高兴了，“哎呀”，他说，“我跟你只见过两次哪，我看见你的那个衣服穿得很文雅，我还不晓得你是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后来，我跟张发奎成为朋友啦。

吃饭的时候，张发奎说，“你是高级参谋，你给我参谋参谋，我在这里守浦东，恐怕守不住，浦东第一站是川沙，第二站是南汇，第三站是奉贤，第四站是金山卫，一直到杭州湾，我防守这样长的一条战线，蜘蛛网一样的小港小河多得很，不晓得日本人在什么地方登陆，你是本部来的高级参谋，你回去向上面汇报，要上面来人做个地形调查。”我说：“这个问题我带回去，跟戴雨农先生商量商量。”

回去后，我打了个电话给程潜汇报这件事，程潜说：“浦东一直到杭州湾的地理环境连我们自己都不了解，张发奎守浦东怎么守呢？日本人一登陆就糟了，把后路就切断了。哎，你是高级参谋，你们去张发奎那里调查一下。”

我说：“这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先要有个计划，才能去调查，没有计划怎么调查啊？”

“你做个计划，沿途调查，张治中、顾祝同的部队都在那里，

你去找他们。”

“你上面不发命令，他们能听我的吗？上面要发命令给他们。还有，要戴雨农先生出来，让他领头，这个事情才能办好。”

程潜说：“好吧，我请示委员长，让他下命令。”

委员长的命令下来了，戴笠急急忙忙把我找去，让我从川沙、南汇、奉贤、金山卫，一直到杭州湾，把这些地方的地形条件调查清楚。他说：“特别要注意哪些是硬滩，哪些是软滩，硬滩可能是日本人会登陆的地方，软滩日本人上不来。”还特别要注意川沙的白龙港，那里水深，能停大兵舰。我跟戴笠商量，把余乐醒叫来，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带十几个参谋，就把这个事情办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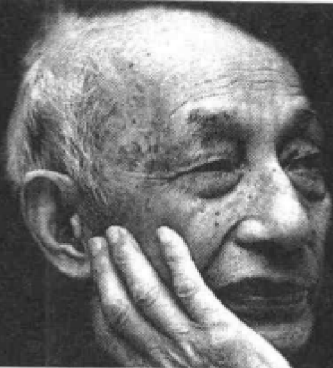
临走的时候，我对戴笠提出要找熟悉情况、熟悉地形的人给我们带路。戴笠想了想：“除了朱学范，没有第二个人，他是杜月笙的徒弟。”这样把朱学范找来，朱学范一来就跟我讲，杜先生（杜月笙）是最熟悉浦东情况的人，他会告诉我们一些情况。我说那也行，去见见面。

在浦东，我们一路日以继夜地调查，争取早些搞完。川沙、南汇和奉贤都是软滩，测量的竿子插下去到不了底，都是烂泥。到了金山卫，县政府和当地老百姓都来了，说古时日本海盗就是在这个地方登陆的。再从金山卫过去，又是软滩了。

完成任务后，我写调查报告，建议在金山卫那里要增兵防守，特别要增调强有力的炮兵部队协助陆军防守，蒋介石批准了。

实际上，金山卫并没有重兵防守，也没有派炮兵部队，只派了东北军一个师的兵力。11月15日，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东北军的那个师也怕死，把金山卫放弃了。日本人一上来，就控制了青浦、淞江，上海的退路切断了。

我从“八·一三”那天到差，一直到日本人11月15日从金山卫登陆，我才离开了上海。



第十三章 联手杜月笙

- 戴笠说：“我送一部汽车给你吧。”
- 路遇袁国平，他对我说：“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 蒋介石要戴笠跟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內组织1万人的别动队。
- 戴笠这个家伙很厉害，把杜月笙拉到我们这边来了。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我奉程潜的命令，作为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到达上海的时候，见到郑介民，我问：“我住在哪里呀？”郑介民对我说：“有个地方可以住，无线电学校现在搬到汉口去了，你就住到无线电学校去，这个学校在法租界，你就当个校长吧。”

“学校都搬走了，还要校长干什么呢？”

他说：“看着房子，你就住在那里吧。”

我一到无线电学校的房子里去，从楼上下来一个人，我一看，是戴笠！他看到我，做出很奇怪的样子：“哎，我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是介民要我来的。郑介民恐怕我没有地方住，要我住在这个地方来。”

戴笠说：“这是我的意思。我就住在楼上。”

我有些吃惊：“你也住在这里？”

“是呵，我住在楼上。”他对我说：“这个无线电训练班已经停办搬到武汉去了，这里的房子保留着，我们在这里办公。楼下的房子给你。你在这里可以帮帮我。”

我说：“我天天要跑好几个司令部，又要到张治中那里，又要到顾祝同那里，在这里我不见得干得下来呀。”

“你跑你的，剩下的时间帮帮我。实际上，就是守着房子，我们有地方住，有掩护，免得人家注意，办不好事。”

过了几天，戴笠看我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搜集战况，很忙碌，就说：“我看你工作很忙呵，你少一样东西。”

“我少一样什么东西呀？”

“你少部汽车。”

我说：“我没有那种想法呀，我可以两条腿跑，可以打黄包车，我并没有想要部汽车。”

他说：“这样多的事情都放到你一个人的身上，你没部汽车怎么行？”

“我也不好再问程潜要汽车，是不是？我这个高级参谋的职务是他给的，我再跑到他那儿要汽车？不合适。”

戴笠说：“你问他要干什么呀，我送一部汽车给你吧。”

“哦？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呀？”

“我看你这个人很能干，在黄埔同学中，你和别人不同，难怪你在共产党里搞得那样高的地位。我有两部汽车，送一部给你。”

哎，我一看，戴笠待人很好啊。

戴笠的这部汽车给我了。我坐着汽车，在上海一天到晚到处跑。

一天，我在上海马路上遇见一个人，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个戴近视眼镜的人是谁，他看我站在那里迟疑，就叫：“怎么，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袁裕啊。我现在的名字叫袁国平。”

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第四期的同学。

我也叫了起来：“啊，苞谷老（‘袁国平’的声音听起来像‘苞谷老’，我们喊他做‘苞谷老’）啊！”

“你还记得我是苞谷老啊？”

“我记得，怎么不记得呢！我们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

我们两个一下子又都叫了起来：“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袁国平说：“很难得遇到，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话啊。”他又说：“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

“归队？归什么队呀？”

“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

“周恩来到哪里找我？”

“具体的地方我不了解，就晓得他在找你。你还不知道呀，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我说：“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说：“送到四川。”

“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

“噢”，我说，“周恩来还帮我平反了，那我这个以共产党为友的决定没有错。”

我对袁国平说：“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周恩来呀，我妻子也找不到杨尚昆，共产党要杀我们的头，国民党也要杀我们的头，我们只好回湖南老家，我当了个新闻记者，改名文浮生。我现在记者不当了，到了参谋本部。”

袁国平说：“我们难得见面，找个地方谈谈话吧。”

我问：“你认识张治中吗？”

“张治中是我们的教育长呀，怎么不认识？”

我说：“现在上海作战，他指挥宋希濂好几个军，浦东那边是张发奎指挥，还有顾祝同也在这里指挥。”

“那我们一道去看看张治中，找个地方谈谈。”袁国平拉着我就走。

我们一起到了张治中那里，张治中问我：“这个人是谁啊？”我说：“第四期的同学袁裕嘛。”

“噢”，张治中说：“袁裕，我记得起，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说：“是共产党员，他在新四军，我在马路上遇到他，我们是好朋友。这个人很好，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嘛。”

“好啊，今天上午我还要开会讨论一些问题，你们两个到隔壁房间先谈吧，最后要走的时候，我再见见他。”说完，张治中就开会去了。

我和袁国平来到隔壁房间，袁国平说：“你跟周恩来没有接

上关系啊，他给你平反，现在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你怎么还没有接上关系呢？”

我说：“你把你们延安内部的情况多给我谈一点。”他就谈到毛泽东。

他说：“有一个消息我说给你听听，现在共产党把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了，把抗日打日本放在第一位。阶级矛盾是内部的事情，降低到第二位了。这个还是个好事哩。”

“哎”，我说，“这是谁提出来的？”

他说：“毛泽东，现在延安方面是毛泽东负责。”

“他是多变的人，恐怕三个月以后他又会变的。”

“你好像对毛泽东没有信任呀？”

我说：“向来没有信任。不过这个提法很好啊，毛泽东看到这一步，国共两党就用不着那样斗了，合力共同对敌，应该这样。”

袁国平问我：“你对你自己的问题考虑了没有？”

实际上这时我感觉找周恩来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也没有了，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就表示：“我有这样一个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也不追究了，蒋介石的宽大政策越来越宽，不追究既往了。我并没有向国民党自首，国民党也不追究，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当时张治中说，取消通缉令，要有五个黄埔学生证明你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了，我就找了四个黄埔学生，还少一个，戴笠愿意担保我，他也算了一个，这样就取消了通缉令。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党籍（共产党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

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凭你跟周恩来的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

我说：“老实说，共产党犯错误有自己的因素，过去在江西搞AB团，杀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个王明路线，一个党的政策

老是这样，自己杀自己。我对这样的搞法没有信心，毛泽东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师，我对他有个人的看法。”

袁国平听我这样一讲，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回来？”

“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7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共产党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他说：“我不好怎么说，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见，也不好不同意。打好这个仗，把日本打败了再说，把日本打败之后你还要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还是那句话：“有这个想法。”

“越搞越远了，那不是脱离的时间太长了吗？”

我说我的想法不变。袁国平说：“好好，我们两个的友谊关系保持。我留在新四军里，以后你写信给我，就写到江苏宜兴县府里，我就收得到。”我也把我的通讯地址告诉他，说你写到里口陈佑铭政治部，下面加上“军邮”两个字，就万无一失，可以收到。

分手时，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过得也很困难，我就送他100块钱。

后来，我给袁国平写过几封信，接到他的一封回信，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彼此问候一下，以后再给他写信，就没有人收了，皖南事变，袁国平被自己的警卫员一枪打死了。

9月4日这天晚上，戴笠从楼上下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份电报给我看，说是校长来的电报，说蒋介石要戴笠跟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内组织1万人的别动队。当时，上海到处是日本特务，每天晚上打信号枪，需要一支部队维持秩序。

戴笠接到电报急得很，说：“办这样大的事情，我身边没有人哪，还只有一个月？”

我说：“一个月之内组织1万人的部队，需要多少干部呀，兵源怎么来呢？”

“我正要跟你商量，我们计划怎么办啊？首先我们要起草个

大纲，要搞个几条，好跟杜月笙谈。我的身旁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

我说：“我可以，电报说得很清楚，成立1万人的别动队，把上海的日本特务肃清，来保障我们军队作战。”

他说：“噢？你还看得很容易呀？我看这个很难办，今天晚上就要，你写个东西给我。”

我连夜写了个计划给戴笠，我在计划里写1万人编成五个支队，给养、军需另外编队。他一看，说：“哎，你很有才气呀，没有办过的事情你一夜就写好了。那就这样吧，约杜月笙明天开会。”

我说：“你再拖个一天，更好一点。计划里面还有问题，最重要的是经费啊，1万人的别动队没有钱，没有饭给人家吃，怎么办呢？要杜月笙拿钱？他拿不出来的，要你拿钱出来，我晓得你也拿不出来呀。你禀告委员长，要委员长在国家的预算里马上列个拨款，没有钱是不行的？”

他说：“我只晓得有几条就和杜月笙谈去了。你说了一个基本问题。你的意见对，见杜月笙，你跟我去，还有余乐醒，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吧。”

戴笠给蒋介石打电话，蒋介石说：“我要军政部做1万人的预算，已经办好了。”

过了两天，我们几个人去见杜月笙。杜月笙带着几个人来了，其中有我们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杜月笙就一个一个地介绍，第一个是他的大徒弟陆京士，第二个也是他的徒弟，国民党邮电协会的朱学范，当时国民党邮电协会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没有杜月笙的牌子他们就活动不了。还有一个是佟玉山，是个黄埔学生，另外有个穿长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人了。杜月笙介绍，那个穿长衫的人是要来别动队当秘书长的。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大汉，戴笠问：“这位先生是干什么的？”杜月笙说：“哎，你还不知道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志陆。”戴笠问：“是不是那个在广东郑学民手下当过师长的刘志陆？”杜月笙连声说：“就是就是。”

他们来的人比我们的多。坐下之后，戴笠把电报给杜月笙看。杜月笙没有多少文化，只会签个名，戴笠只好把电报读给他听。

杜月笙是从卖水果的阿三起家的，搞了很多徒弟，成了青洪帮的头子。那时上海申报的史量才（史良的叔父）很有野心，想自己搞个新党，很多次跟蒋介石谈判，没有谈成功，后来史量才在上海附近被刺杀。史量才一死，杜月笙就把史量才手下的文化人收拢到自己手下，把这些文化人安置下来。这些文化人喊出一个口号：“改造杜月笙”，要把杜月笙的流氓习气改掉，从一个流氓军阀，变成一个民族资本家，要杜月笙开银行，搞交易所，搞轮船公司，这样一来，杜月笙在上海就搞得很开，地位越来越高。

戴笠跟杜月笙怎么成的朋友呢？戴笠曾经对我讲，杜月笙走私鸦片的时候，被戴笠扣留了，当时杜月笙大发脾气，说戴笠这个家伙不给面子，就要暗杀戴笠。有人告诉杜月笙：你这样做不好，你得罪了戴笠这些人，他们也会暗杀你，那还搞得清楚啊？杜月笙怎么办呢？又有人给杜月笙出主意，说：“你送点钱给戴笠，把他收买过来，你起码拿100万给他吧。”于是杜月笙送钱给戴笠，戴笠把钱退回去：“岂有此理，我是给委员长做事的，能要你这个钱吗？”杜月笙就更火了，说：“钱也不要，搞得我更没面子了。”章士钊是杜月笙的法律顾问，章士钊出了个主意：“戴笠这个人我认识，你不能用钱去买他，用租界的势力压他也不行，我给你拉拉线，你跟戴笠交个朋友，大家不必闹成这个样子。你请戴笠吃顿饭，我作陪。”章士钊办了一桌酒席，去请戴笠，戴笠对章士钊说：“你这个办法我不能接受，如果搞得委员长知道了，就要对付我了，这个饭我不能吃。”章士钊告诉杜月笙，戴笠不是摆架子，而是恐怕蒋介石处分他。杜月笙心事重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正在这时候，戴笠突然找章士钊，说要见杜月笙。杜月笙奇怪了，戴笠怎么要见我呢？这时，杜月笙的卫兵报告：戴笠已经在客厅等候。杜月笙赶快走进客厅，戴笠

说：“我很对不住你，你送钱我没有收，请我吃饭我也没有来，得罪你啦。现在我们两个交个朋友。我们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禁烟委员会，想请你当南京禁烟委员会委员，你卖鸦片把自己卖臭了，当上了禁烟委员会委员，你就变成了一个正当的人了。你为什么不走上这样一条光明大道呢？你又不是没有钱，何必卖鸦片呢？不要那样搞了。”杜月笙连连答应：“这个禁烟委员会委员，我当，我当，以后再也不卖鸦片了。”

我们和杜月笙谈了一通，回到住处后，戴笠问我：“你对我跟杜月笙的关系是怎样的看法？”

我说：“你们之间的事情我搞不清楚。”

“现在我们组织别动队，又要和杜月笙搞到一道了。我们搞1万人的别动队，还要成立租界行动委员会，把杜月笙放在我们前面，让他当租界行动委员会的委员长，让上海的流氓为我们服务。”戴笠又说：“委员长给我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委员长要我掌握杜月笙，不让他当汉奸，如果杜月笙跟日本人搞到一起，上海就会一塌糊涂，租界也会更糟。现在杜月笙向我表示，决不当汉奸，不论上海处在什么环境，也决不走汉奸那条路。”戴笠这个家伙很厉害，他把杜月笙拉到我们这边来了。

别动队成立了。杜月笙很有心计，五个支队，其中三个支队都是他自己的人，还让大胖子刘志路当总指挥，戴笠也不好说什么。

戴笠对我说：“别小看杜月笙手下的这个刘志路，很厉害呀，他把我们国民党的人都拉过去了。这1万人，我最多还能安两个支队进去，这一步我们没有防备，吃亏了。”

我说：“你没有吃亏，我有个办法，你现在打个电报到南京，把黄埔学生中失业的都要到上海来，让他们向你报到，把别动队里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队长都顶下去，这样，大队长、中队长、中队副不都是你的人了吗？”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戴笠直点头。

文

文

11

12

13

14

“还有，那些流氓怎么能够从军呢？你得安排班长，起码训练半年。”

戴笠问：“班长又怎么来呢？”

我出主意：“你找张治中，找张发奎，他们都能指挥很多人呢，在他们的部队里挑一些人，班长不就有人了吗？”

“哎，你这个办法好，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说：“在青浦、淞江这两个地方办两个训练班，挑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训练一个月，安置到部队当指导员。”

戴笠说：“你很有办法啊，无论如何，请你当我的人事科长。”

“我兼你这个科长可以，但是我不能把全部时间放在这个上面，我还有任务啊，我就挂个名吧。”

按照我的建议，这事情办起来了。

过了几天，我对戴笠说，我要到浦东张发奎那里去一趟，我看要张发奎给我们搞300个军士，不是正班长，副班长也行。戴笠说：“好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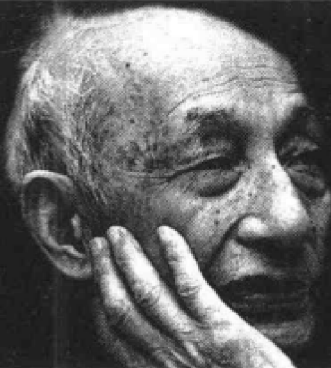
我在跟张发奎吃饭的时候，说：“戴雨农先生要我跟你交涉一个问题，蒋委员长要雨农先生搞个1万人的别动队，队伍在一个月之内就要成立，主要是肃清上海的日本间谍，维持我们后方的安定，希望你这里抽调300人做骨干。”

张发奎想了一下：“抽调300人恐怕不行，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呀。”

“那你就分两批好不好？先给我们150个，过几个星期再抽150个。”我同张发奎商量。

张发奎说：“雨农先生的事情我一定完成，分两批好了，先给你们150个。”

上海一战，我们失败了，陆京士跑了，朱学范也离开了，只有佟玉山坚持着，这个别动队全部归戴笠管了，杜月笙当个主任委员，实际上是空的。后来，这1万人的别动队对于收复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十四章 对付郎本

- 在上海，日本特务活动的中心地方，一个是海军俱乐部，另一个是同文书院。
- 派两个懂日文，会照相，会骑马，会射箭，会打枪的小姐给我。
- 戴笠急了：“你是个书生！你是个书生！那一定是定时炸弹，你还拿回来干什么？一炸就炸掉了！”
- 把郎本他们请到上海德租界见面，我们在那里埋伏几个人，把那几个家伙杀掉。

文

强

口

迷

口

传

1万人的别动队，还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戴笠问：“这1万人的队伍主攻方向是什么呢？”

我说：“我们有10万人在前线打，你这个乌合之众不需要到前线去打，也根本抵挡不了几个小时。”

“那组织这个队伍干什么呢？”

我告诉戴笠，上海是作战的后方，到处都有汉奸，每天晚上都有人打信号枪，把这些汉奸肃清，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戴笠感叹：“好困难啊，这个事情不好办。”

我说：“你这个别动队不做这个事情做什么呢？你这个部队装备也不行，去打仗一打就垮了。别动队不是在前方打，是在后方镇压，把汉奸肃清。”

戴笠问：“怎么肃清？用什么办法肃清？”

“办法有的是，我调查了一下，在上海，日本特务活动的中心地方，一个是上海的海军俱乐部，谁也进不去海军俱乐部，另一个是同文书院，这两个地方里面净是日本特务。”

戴笠跟我讲：“你指出来的那两个地方，日本海军俱乐部进不去，我们没有内线，同文书院有许多特务隐藏在里边，这些特务都是些高级的教授，最熟悉上海的情况。”

我说：“这两个地方我们要派人打进去。”从明天开始，你派两个小姐给我。

“给你两个小姐干什么？”

我提出：“要懂日文，会照相，会骑马，会射箭，会打枪，派两个这样的小姐给我。”戴笠就找了两个在警官学校受过训的

小姐给我。我把小姐调来了，说：“从明天起，我买个照相机给你们，你们两个人把同文书院进进出出的那些人照下来，照完之后，你们就跟踪他，看他到哪里去，到哪里落脚，他到的地方你们也照下来。”这样干了几天，我就掌握了一些日本间谍的行踪。

戴笠问：“那个同文书院有什么办法啊？”

我跟戴笠讲：“昨天晚上我跟余乐醒研究了，余乐醒有个很好的建议，说我们去同文书院绑架几个人，回来一拷问，就什么都说了。”

常到同文书院的间谍是几个教授，经过几天的跟踪，他们的住处已经被我们掌握。第二天，我们绑架来了那几个教授，那几个教授根本不用打，就什么都说出来。他们交代说有个仁丹胡子的日本特务，知道我们有个水井，在水井里放毒，害中国人。说日本人掌钱收买了上海附近的一批农民，跟着做特务。他们交代出了几十个日本特务，说晚上打信号枪的也是这批家伙。还说日本人在铁路边上建造的水塔，实际上是日本人的炮兵测量点，后来，这几个教授还把日本间谍的名册交给了我们。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抓住了一些日本特务。由于这几个教授交代得还算老实。我们就优待他们，把他们送到南京关起来了。

戴笠说：“你把同文书院的教授一绑架，特务们都被关起来了。现在我们在上海作战，是很安全的。你这个事情做得好。你这个人，好像有三个头八个锅。”

“什么三个头八个锅？”

“就是没有办不成的事。”

一天，我跟戴笠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戴笠问我：“念观兄，你认识不认识章乃器呀？”

“不认识。”

戴笠告诉我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从苏州监狱里放出来了，又说：“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恐怕只有你出马才行呀。”

我说：“你派给我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啊？人事科长是我，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是我，程颂公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

文

文

11

11

11

11

也是我，你又要把什么事放在我身上呀？我恐怕精力不及。”

戴笠说：“明天一早，章乃器约我见面，不知他要讲什么，他说他要讲的事情很重要，你去跟他谈谈吧。章乃器那些人我知道，他们自有道理，你这个人事科长要负起这个责任。”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淮海路去见章乃器。一敲门，出来个女的，我不认识，就问她：“你贵姓啊？”

她说：“我是《妇女杂志》的主编。”她反问我：“你找谁呀？”

“我找章乃器先生。”

“噢，我是章乃器的妻子，他打太极拳去了，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讲就行了。”

我想《妇女杂志》社有个胡子婴，很著名的。就问：“你就是胡子婴吧？”她点头：“我就是。”我说：“《妇女杂志》登过你的文章。”

她问：“不知道章乃器约你来要谈什么？他打太极拳去了，马上回来。”

一会儿，章乃器回来了。我看见章乃器长得高高大大的，他问：“你是雨农先生派来的？你是干什么的呢？”我介绍自己是黄埔学生。

章乃器说：“我在上海大学教书，现在日本方面有汉奸要找我，我处理不了，准备交给戴雨农先生处理，这三个汉奸一个女的两个男的，那个女的到现在还没有露过面，男的一个叫彭克祥，一个叫邵元生，都是江西人，都是上海大学毕业的，他们在日本那边当汉奸，现在想反戈一击，要爱国，为我们国家工作。他们找到我，但是我不了解他们，只有求助戴雨农先生。”

我说：“我要跟那三个人见见面，谈谈话，才能够做出决定。”第二天，章乃器约他们来了，那个女的还是没有露面，我跟那两个男的见了面。我问他们是哪里毕业的，他们说：“上海大学。”

我问：“为什么当了汉奸呢？”

“我们上海大学毕业后实在没有工作，就到日本人那里工作。现在我们要爱国。”

“你们是真心爱国呢？还是日本人派过来的？如果你们是日本人派来打入我们这里，你们就是罪上加罪呀，将来就没有好结果了。如果是真心实意，我可以帮你们引荐。希望你们反戈一击，不会亏待你们的。”

他们说：“你这位先生说话好像很有谱，你负什么责任啊？”

“我全部可以负责。”

“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啊？”

我很肯定：“我有那么大的权力。”

他们就说了：“我们想过来之后成立一个文友社，以文会友，以记者的身份帮助你们做事。我们要求，第一，在法租界租个房子，有个办事机构；第二要辆汽车；第三，我们还要介绍两个女记者进来。还有，每月要两千块钱活动经费。”

我说：“除了两千块钱活动经费我不答应你们，其余都答应你们。”

“为什么两千块钱活动经费你不能答应呢？”

“我还做不了这么大的主，还要回去汇报。不过你们说的那几个条件，我可以做主，汽车给你们一部，半新半旧的。房子问题呢，我们在法租界准备一栋房子，房子里有两个很能干的小姐，介绍给你们当记者。文友社嘛，在上海市政府备个案。”我问章乃器：“你上海市政府有熟人吗？”他说：“有。”

回去后我向戴笠汇报，戴笠说：“他们要的那点钱，都给吧，给他们一个痛快。”戴笠又说：“这两个人我在南京见过，会打枪会照相。不过，给他们租的房子，你要找个最靠得住的人去当门房，监视他们的一切活动，看看他们搞些什么名堂。”

我想了想：“有个黄埔第三期的王立，是杭州警官学校的指导员，作战负了伤，成了瘸子，把他调来当门房。”

“为什么调个瘸子呢？”

“瘸子有瘸子的用法。”

戴笠一个电报就把王立调来了。我告诉王立：“你来了，是我要来的。”他说：“我是一个瘸子，你把我要来干得了什么呢？”

我说：“做大事。”

“有什么大事可做啊？”

我说：“这里有个文友社，你就专门看着这个房子，在里面当收发，我有两个小姐在这里出进，这两个小姐也交给你，归你指挥。这里住着两个日本特务，一个是彭克祥，一个是邵元生，都是中国人，你注意他们的行动，他们一天到底干些什么。你自己不要暴露身份，你的身份就是门房，如果暴露身份，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他说：“我一定为国尽粹。”

后来，彭克祥他们一直在搞日本的军事情况，并且及时告诉我们。在南京沦陷之前，我们把彭克祥送到南京。之后他到了香港，给宋子文当新闻处处长，最后在香港被人暗杀身亡。

还有那个日本俱乐部的事情怎么解决呢？有一天晚上，戴笠问：“你再讲讲那个日本俱乐部，你有什么办法进去呀？”

“暂时还没有办法。”

我就问他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他也说没有。

戴笠又对我说，他要调一个参谋长到那个1万人的别动队去。戴笠说：“我看见王敬久师部的参谋长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我想把这个人调过来，给我当别动队的参谋长。部队里没个参谋长也不行。杜月笙安了一个总指挥，我安一个参谋长，不是好办一些吗？”

我跟王敬久（黄埔第一期）商量，说要把他的参谋长调到戴笠这里来。王敬久很神秘地对我讲，我身边有个参谋长是日本留学生，我怀疑他是日本特务。他告诉我：“那个参谋长姓杨，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我最近发现他在上海租界，晚上经常有日本人看他，对他很尊敬，我当面不好问他，很怀疑他。”

“噢”，我问：“那个姓杨的是什么地方人？”

“是江苏人。”

我说：“你借口吃饭把他请来，我有办法问他。”

第二天，按照我的安排，请姓杨的吃饭，我问：“你这个参谋长是哪毕业的？”他回答：“我在日本士官，后来在日本陆大。”

“你是日本陆大毕业的，你的资格很高啊。你到我们一个师里当参谋长，不到将官，你愿意吗？”

他说：“我们是国军，虽然是一个上校，到了战场上凭本事，如果我打几个胜仗，就升上去了。”（后来这个姓杨的在江北搞了十几万人，成了江北的汉奸头子）

我说：“讲得好，讲得好。”

我总在考虑怎样打入日本海军俱乐部。我跟戴笠商量：“海军俱乐部还是进不了，那个地方看管很严，有没有什么办法？”戴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是说这件事一定要我去办。我说：“那我就盯着那个姓杨的，跟他研究研究。”

我又约姓杨的见面，说：“我现在有个事情请教你，请你帮我的忙。”我说：“那个海军俱乐部都是日本特务，我想打进去，很困难。你有没有认识的人？”

他说：“有啊，跟我同学，日本陆大毕业的，这个人叫做郎本实仁，是个少将，那时50岁，比我大20岁。”

我说：“哦？你认识这个人？”我记起戴笠前几天拿着几份从北平、天津来的电报给我看，说是日本的一个少将郎本实仁到了上海，这个日本少将过去在东北、北平、天津等北方地区活动，会说一口天津话，是个中国通。

我问姓杨的：“你跟郎本实仁的关系怎么样？”

“我跟他的关系嘛，我也不瞒你了，我已经打湿脚了，你还站在岸上。”

“好不好把那个郎本实仁介绍给我见见面呢？”

“可以，我约他一下吧。不过，你见他，拿什么话跟他

说呀？”

我说：“没问题。日本人打上海已经打了两个月，蒋介石出动了70个师，也打了两个月，他打不下我们，我们也打不下他们，是个持久战，消耗战。”

他说：“你这样一说，可能郎本实仁要找你了。你是不是有任务啊？”“我现在没有任务，看跟他接近得怎么样，我就有任务了。”

姓杨的跟郎本说了这事，郎本说：“噢，这个人，见见面。现在我们打上海打不下来，九国公约就要开会了，如果上海打不下来，这个问题会提到九国公约会议上讨论。如果九国干涉，我们在外交上失败，我们这个战争非停下来不可，一停战，我们就大失特失了。”

日本人很着急，我估计到这一点。没过几天，日本人找姓杨的约我见面。姓杨的对我说：你到静安寺100弄10号，开门之后有个日本女子引你上三楼，就可以跟郎本见面了。你敢不敢去？我说静安寺路在英租界呀，为什么不敢去呀？我想他也不敢杀了我吧。

我把这个话跟颂公说了，跟戴笠也说了，他们讲，日本人狗急跳墙了。打不下上海，他们着急了。这个时候，他要准备见你，你大胆地跟他见面，他没路可走了。

按照约好的时间，我就去了。静安寺路是英租界，背后有条河，我们布置了很多警戒。日本人要抓我是不可能的。我到了100弄10号，就叩门，出来个很漂亮的日本小姐，她问我：“你是李将军吧？”（我化名李文焕，自己封了个将军，实际这时我是上校）

“你怎么晓得我是李将军？”

“我们的郎本将军已经告诉我你的大名了。你叫做李文焕先生，李将军请三楼谈吧。”

日本小姐把我引到三楼，我一看客厅很大，很多外国酒啊中国水果啊摆了一桌子，跟郎本一见面，看见他个子不高。大约五

十多岁。他拿出张名片递给我：“郎本实仁。”我想这个家伙很慷慨呀。一个高高胖胖的日本人来了，也送张名片给我，我一看，是日本的一个宪兵大佐，名字叫做“松正宜”。我说：“噢，你是要人啦，在日本人里面升到一个大佐很不容易呀，你再跳一步，就到将官了。你是属于文官范围，比武官高啊。”还有一个人没拿名片，我就问：“这一位呢？”他们说：“这是我们部队里搞政工的人员。”还有一些其他人，我就不理他们了。好多的水果、酒，我也不吃，恐怕酒里有什么催眠剂。郎本看见我不吃，就拿水果掰一半给我，另一半他自己吃，看着他吃完后，我就跟他讲：“我头一次到你们这里见面，你们日本人的习惯太不好了，有好多入一见面就出不去了。我不吃你们的东西，你们也不要难为我。”我跟他讲实在的话，他自己也笑。

坐下后，郎本说：“今天来，就是见见你，表示认识了，也不谈别的问题，我们要送点礼物给你。”我听他这么一说，就说：“那我就告辞了。”他们几个人把我送出100弄10号时，把一包用报纸包着还系着蝴蝶结的东西，往我汽车的座位上一放，说：“小小的意思。”我判断，这不会是别的东西，一定是钞票。如果要害死我，扔个定时炸弹，那下次就不会同我见面了，他们毫无所得。

我们住的地方，是杜月笙的一个公馆，杜月笙送给我们作办公室的地方。我一到住地，看到荷花池，拿出那个包，摆在荷花池旁边。

已经很晚了，戴笠还在等着我，还有好几个小姐等着我。他们说：“今天好危险啊，我们怕你回不来了，把我们急得不得了。你回来了，好了好了。”

我说：“雨衣先生，我临走的时候，日本人说小小的意思，往我汽车座上扔了一包报纸包的东西，捆得很紧，我放在荷花池那里，没有带进来。”

戴笠就急了：“你是个书生！你是个书生！那一定是定时炸弹，你还拿回来干什么？一炸就炸掉了！”

我说：“他们头次跟我见面，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就把我炸死啊？没有那样愚蠢的人嘛。”

戴笠就急得不得了。说：“怎么办，怎么办？”

这时，余乐醒进来，问怎么回事？我说：“乐醒哪，日本人送了一包东西，雨农先生急得不得了，怀疑那个纸包里面有炸药，你是个专家，怎么对付这个纸包？”余乐醒是戴笠手下的专家，那时我们每月只有一百多块钱，他拿三百多块钱。余乐醒说：“这个好处理，我去处理。”

戴笠连忙问：“你怎么处理？”

“我拿个引爆的东西，看看里面是不是定时炸弹，我在隔壁一引爆，它不就爆炸了吗？第二，我准备一块石头打下去，碰炸。如果也不爆炸，就没有问题。第三步，我就用剪刀把绳子剪开，慢慢地打开，就晓得是什么东西了。”

他这个人还有些办法。后来，按照这三个步骤做，他就跑回来了，他说：“这包里是1万块钱！”

戴笠也笑起来了，他说：“我过去还没有做过这样危险的事情。”他又对我说：“我太急躁了一点，话说得重了一些，你原谅啊。”

后来，戴笠要把这1万块钱给我，我向戴笠讲：“国家正困难的时候，南京的钱还没有来，我们这里马上就要开销，我一个都不要。”我说：“我是为要你这个钱来的吗？我文强不是那种人。”

戴笠和我两个人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戴笠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主意，就要我讲，我说：上海“八·一三”已经搞了个把月了，日本人打不下上海，我们70万人作战伤亡很大，我判断日本人很着急，怕我们借助九国公约的力量从外部打击他，还有10天九国公约就要开会了，日本人很可能想抢先一步把上海打下来。我预料郎本实仁可能会提出很多难题，让我们办。”

戴笠问：“你预料是什么难题呀？”

“我预料，他们要拿钱收买我们当汉奸，替他们做事，他不

是送了1万块钱嘛。”

那时的钱很值钱，1万块钱可以买四五部很好的汽车。戴笠说：“这个见面礼很大。”戴笠又问：“明天还跟郎本实仁见不见面呢？”

“还见。”

“怎么见哪？”

我说：“在日本租界见面。他们有一部汽车，汽车上带着一个红球，一看见有红球的车，就是他们来接我们的车。也可能他们会提出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上海有多少兵力，防守的重点在哪里，等等。我们要做些准备，沉着对付他们，引他们上钩。”

戴笠问：“你的车又怎么办呢？”

“我的车也挂个红球，停在附近。两个球对上号，就算接上头了。”

戴笠说：“你要好自为之啊，看你怎么对付他们。”

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方式，我上了郎本的车，到了海军俱乐部，跟郎本实仁又见面了。一见面，郎本说：“你这个人说到做到，什么也不怕就来了。”他还表示，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希望这个战争早一天结束。我说这个战争是你们带来的，又不是我们打你，既然打不赢，赶快把兵撤回去。他点头哈腰：“是，是。”我说：“我们国家当然不能跟你们比了，你们工业发达，但是，你们的人口只相当我们四川省一个省的人口，这个战争打长了，不见得对你们有好处，你们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郎本说，“你讲的是事实，我们大日本的政策是天皇决定的，我们没有办法的，你们是一个大国，我们日本这个岛国比你们小40倍，但是制海权在我们手里。你们是陆地大国，我们是海军大国，我们并不次于你们，我们还要发展空军，空军厉害呀。不过，现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快要开了，看来这场战争是我们自己打坏了。”

我说：“那又怎么办？你对我有什么话说？”

他提出好多问题，第一个是要我们暗杀宋子文，宋子文是蒋

介石的外交部长。第二是要我们到九国公约会议活动的地方放几颗炸弹。我拒绝了。我说：“你们这是什么主意呀？要把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杀掉，引起外交混乱，问被谁杀的，我们又不能说是你干的，你就把我看得那样简单？”

这样一来，郎本说：“那没别的好办法。”

我说：“坏事都让我们来做，好事都归你，你们日本人太坏了。”

郎本实仁看我挺硬，就说：“好吧，这两个办法取消。”接着就要我们的上海防守分布图，他说：“你们有多少兵力？怎么布置的？这些情况我们都需要了解。你如果把上海防守分布图给我们，我们一次送200万块钱给你们。”

“我们送的图你会相信吗？如果是个假东西呢？你不是上了当吗？”这就叫做先发制人，把他们的口给封上。

他就讲：“希望你们先送来，我们一次拿400万出来。”又加了200万。

“汉奸钻到我们内部，可能了解一些情况，我是个正规军人，是个少将，跟你们见了两次面，就把我什么都买过去了，有那样简单的事情吗？这样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关头了，你们开的价已经开到400万了，我回去再考虑这个问题，明天我们有个东西交给你。”我离开的时候，郎本追上来，又送了我五万块钱。还要我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说三天以后在什么地方见面，再通知我。

我回去后跟戴笠商量：“现在九国公约要开会了，他怕在外交上失败，就提出来要杀宋子文，我拒绝啦。再有，让我们在九国公约会议活动的地方放几颗炸弹，我也拒绝了。他又向我们要上海城防图，我答应回来写个东西交给他。”

戴笠又着急了：“搞个假东西给他，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再说搞假的，也不容易搞啊。谁个能搞啊？”

我出主意：“今天晚上在我们自己的参谋中挑几个人，让他们写些自己知道的情况。他们只知道是考核他们，也不晓得我们做什么用。每个人至少给50块钱吧。”戴笠同意，我就挑了五六

个参谋。这几个参谋跑来问我：“今天晚上戴先生请我们吃饭，还出几个题目叫我们考试，他怎么想起要考我们呢？”我说：“那你们不要管。你们硬着脑筋写吧，他要做什么用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搞到很晚，一个人写了一篇，我拿给戴笠看了，写得好的，打了个圈圈。戴笠宣布：“今天晚上你们辛苦了，你们写得都很好，不分等级，请你吃顿饭，一个人送50块钱。”

我对戴笠说：“三天后我就拿这些去跟郎本见面。”

戴笠说：“非你去见不行。”

我又去见郎本。郎本问：“你们写的那个东西给我们看吧，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我没有料到他们还有问题，郎本说：我们讲好拿400万块钱出来，可是这400万块呢，要打一个六折，就是100万只能给60万。我问：“为什么要打这样大的折扣啊？”

郎本说：“我们是为天皇服务，假如你们写的这个东西是假的，我们就剖腹自杀。我们死了，我们家里的老小还要吃饭，所以我们要扣下一些钱。”

我说：“你们把我看得这样小啊，站在我们这边看，这是国家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出卖给你了，400万还要扣这么多。我们是看国家，你们是看天皇。”他们的样子很尴尬。

七说八说，扣了三折。我说：“就三折，这个钱就给我带回去吧。”郎本又说来不及准备，这么多钱，要作三天的准备。我说：“来不及了？那到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又去了，郎本实仁把钱给我了。

戴笠看到这么多钱，很高兴，说：“你真有办法呀，这样多的钱我们两年也用不完，你真能干。”

后来，郎本他们以为我送去的东西是真的，又找我谈，说他们还可以加到800万到1000万，在日本政金银行取款。郎本把门关得很紧，说钱多拿一些可以，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啊，搞不好

文

文

①

②

③

④

要剖腹自杀。这钱，就一半一半。

我说：“这个事情办不到。什么剖腹自杀？你浑水摸鱼，应该给的你不给，还搞掉一半。”他们也不作声。后来，他们给我开了一张400万的政金银行的取款单，说：“恐怕三天之内还取不到款。”我就晓得这个钱他们是搞假了。

我回去跟戴笠商量，说：“这个事情搞得不好，我就活不成了，他们要把我干掉，我从他们说话的神情中已经发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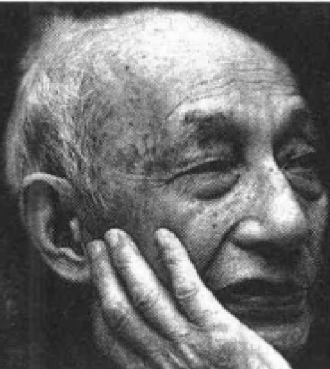
戴笠就问我：“那怎么办呢？”

我说：“这样好了，这两三天我们先发制人，把郎本他们请到上海德租界见面，我们在那里埋伏几个人，把那几个家伙杀掉。”

戴笠说：“你去安排吧。你把他们弄出来，在阁楼上埋伏几个人，找个地方把他们干掉。”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埋伏下来。到夜里两点钟还不见他们来人，我就奇怪了，“怎么还不来呢？”

原来，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了，上海沦陷了。那天夜里等到两点钟，我们才知道上海失守了。郎本实仁他们得到这个电报，知道上海打下来了，他们还来找我们干什么呢？



第十五章 第二个妻子

- 有人报告：“刘参谋在后面带一个女的！”
- 有人给我和刘参谋一个人打了一件毛线衣寄来了，我一看落款，是葛世明！葛世明没有死啊！
- 妻子周敦婉去世时留下遗嘱，要我跟葛世明结婚。
- 有一天晚上，她把房子里的煤气罐打开，把窗子都关上了。

上海沦陷后，我任前方办事处处长，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我收容了四万多人，经过改编后，把其中三万多人送回原部队，留下万把人，成立一个教导团，叫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俞作柏当教导总团的团长，我当教导总团的政工室主任，协助俞作柏训练部队，俞作柏原来是桂系，是个上将。我们到达广德时，在广德成立了第二战区，之后，我们到了安徽荆门县一个叫做里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小地方到了很多国民党中央的要人，如安徽的柏文蔚，辛亥革命时他是安徽起义的都督，还有国民党的一个监察将领，也到了这里，另外还有好多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在这里。我们的部队一到，就开军民联欢大会，当地的人就跟我们讲，你们开军民联欢大会，好啊，这里有好多中央要人，柏文蔚柏都督都在这里。俞作柏就知道了，就要我一个一个地去看这些中央要人，对他们说我们开军民联欢大会，要请他们都到。这些要人高兴极了，说：“你们来了我们就高兴了，有部队保护我们了。”

布置会场时，我写了八个字的横批：“抗日必胜，建国必成。”人家就跟我讲：“你光写个横批不够，你还要写副对联。”我想了想，就提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起：

痛此际河山破碎，傀儡登场，助寇逞横行，禽兽衣冠能几日。

喜今日盛会联欢，军民合作，犁庭操左券，中华旦复有春秋。

这个地方有个非常有名的清朝状元，他看见对联说：“你们这个部队里还有这样的人才呀。这个对联写得好看啊。”说我有雄心，就把我叫过来，问：

“你多大年纪呀？”

“30岁。”

“负什么责任啊？”

“政训室主任。”

“你是大材小用哪。”

“我们的总指挥是个上将呢。他负总责。我年纪小一些，我还可以向他学习。”

他说：“你的口气大得很哪，有这样大的气魄啊。”后来，那个状元还上台去讲了话。后来，那些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那个监察委员都来了，军民大会开得很好。

我们撤退，撤退到一条小铁路附近，可以一直通到芜湖，我们那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宿营，我的身边有三个参谋，其中有一个叫刘仁贵。刘仁贵过去也是共产党，在四川时是重庆军委书记李鸣珂的秘书，八一南昌起义后被俘，后来释放政治犯时把他释放出来了。我在上海时，有一天，突然他在马路边喊我，喊我过去的化名“文莱之”。

我听他喊文莱之，就冲他招手：“你过来过来，你怎么认识我呀？”

他说：“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老关啊。”

“你是老关？”我看见他头发很长，“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像个叫花子？”

“我刚从监狱里出来，你还不知道啊？”他说：“我被关起来了，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遇到释放政治犯，我就出来了。”他问我：“你现在干什么？”

我说：“我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啊。”

他说：“我怎么不知道？都是王明路线搞的，当时就是派我

来干掉你的，你晓得这个事吗？”

“我就是为这个事情跑掉的，但是并不晓得要你来下手。”

他说：“我怎么能够下手啊！”

“那次，我跑到上海去找周恩来，没有找到。周敦婉跟我去找杨尚昆，也没有找到，把我搞惨了。我以后就不敢找周恩来了，也不知道他们的路线是什么路线，怕自投罗网。后来我就回湖南，当记者。直到现在，我也没在共产党里搞。”

他说：“你怎么没在共产党里搞？周恩来给你在延安平反了。你现在不在党里面干了？”

“我不知道给我平反的事。现在要我回去困难了，不晓得他们对我的态度怎么样？”

刘仁贵直摇头：“我告诉你，共产党里头搞得并不好，今天我见到你，我也不想回去了。”

我问：“他们让你去干什么啊？”

他说：“去组织新四军。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在军事委员会，担任前方办事处的处长。”

他说：“这样吧，我同你一道走，我也豁出命了。”

我对刘仁贵说：“我住在无线电训练学校，你来看我吧，我送点钱给你。你连衣服都没有的穿，搞成这个样子，我还有西装，送你两套，还有被子，送给你。”

第二天，刘仁贵就来了。我们的门房不让他进来，像个小瘪三一样，鞋子都没有穿，还要进来，那怎么行？门房就打电话给我，问要不要让他进来，我说：“让他进来。人家有困难，你怎么不让人家见我呢？”

刘仁贵进来见了。我说：“我拿50块钱给你，我的两套西装也给你，这西装呢你穿着有些大，你这个人瘦，把裤脚挽高一点，把袖子也挽高一点，就可以穿，这个被子、毯子都是给你准备的，你去理个发，把自己整理好一点，再来见我。”

过了两天，他又来了，说：“我那天说的事情你考虑了没有？”

“什么事啊？”

他说：“什么新四军不新四军，我不想去搞了，我见了你呢，就等于见了李鸣珂一样。”

我说：“那就这样吧，抗日战争如果胜利了，以后你要去搞共产党，你要去搞新四军，我不留你，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也不愿意以共产党为仇，而是以共产党为友，到现在也是这个宗旨。”

“我跟你一样，我跟你一样。”

我说：“我看你可以到部队里去当大队副。”

后来，日本人在上海登陆，刘仁贵的队伍散掉了。他又跑来找我，我说：“这样吧，你不要回部队了，给我当参谋。”

我们撤到湖南附近的时候，我给刘仁贵一个任务：“你到了一个地方，就问问当地的治安情况，当地的商店里面缺不缺粮食，人心怎么样，一切调查情况向我报告。”另外还有两个参谋，一个参谋管敌情，敌人现在恐怕要过苏州了，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一个参谋负责调查我们上前线的道路有什么情况？有没有土匪？

一天晚上，参谋们向我汇报完情况后，两个参谋回自己住处去了，不知为什么，刘仁贵磨磨蹭蹭地不走，我问：“你怎么不走啊？”他说：“我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中心学校，里面有个女教员，叫葛世明，她是宁波人，高中毕业后进过复旦大学。现在这个中心学校停办了，她没办法，哭哭啼啼的，我也没办法救她，只有你可以救她。”

我说：“我是收容部队，不是收容老百姓，这些事情归地方管。”

他说：“你这个事情都不管，那怎么办啊？”

我有点不耐烦：“先睡觉去，不要在这里麻烦了。”说完，我就休息了。他一看我躺下了，也就走了。

过了没多长时间，刘仁贵又来了，坐在我这里又不走了。

“你怎么又不走了。我说我管不了这个事啊。”

他挺固执：“你的朋友也多，关系也多，现在她吃的也没

有，路费也没有，钱也没有，你给她几块钱吧。你给你的朋友写几封信吧，把她送走嘛。”

“那也可以嘛。”我拿出10块钱给他，那时的钱很值钱。又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是给我在武汉的朋友的，如果那个葛世明去武汉，就让我的朋友们给她介绍工作。怕她到武汉找不到我的朋友，我又写了一封信，让她到长沙，去找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周敦婉很有办法，给她安排一个小学教员什么的，我看没什么问题。我说：“就这样吧。”刘仁贵就走了，他也满心高兴。

第二天，我们的队伍出发了。刘仁贵平时都在我身边，今天怎么就不见了呢？

有人报告：“刘参谋在后面带着一个女的！”

我很生气：“叫他来！”

刘仁贵跑来了，我说：“我昨天晚上跟你讲了，我们部队里不能有女的，如果有女的搞在里面，就是反了军令。你把她送走不就了了吗？”

刘仁贵说：“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这里到芜湖的小火车，上不去！上面净是伤兵，满地也都是伤兵。她哭哭啼啼的，非得跟着我们的部队一道走。”

“还有这样一回事啊？”我说：“这样吧，到前面那一站，队伍停下来吃饭，把那个女的找来，我跟她谈几句话。”

到了前面的一站，有一些小饭馆，我搞了一桌饭，与刘参谋和葛世明一道吃饭。我对葛世明说：“现在你同我们的队伍先到芜湖，到了芜湖呢，你自己买票上轮船，那里中国轮船也有，外国轮船也有，到武汉找我的朋友。”

我又问：“你家里的人在哪里呀？”

她说：“我家里还有亲戚在上海。现在回不去了，老家的人也没有几个了。”

“你结婚没有呀？订婚没有啊？”

“没有，也没有订婚。”

我就讲了一句：“你呀，认识刘参谋了，刘参谋这个人是个

好人，他也没有结婚。”一说到年龄，刘仁贵和葛世明同年，都比我小六岁。我挺高兴：“如果将来有缘，你们可以结为一对夫妻。”

葛世明表示同意。她说：“我把你和刘参谋两个人都看作我的恩人，我心里很感谢你们。”

我说：“我懂。”

吃了饭之后，她还没有走，我说：“你去买到武汉的票，那10块钱不够，再另外拿些钱给你。”又对刘参谋说：“你把她送上船，送上船之后，这个事情就算了了。”刘仁贵给她买了船票，把她送上轮船。

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芜湖的对岸，这个地方是一个水陆码头。有人就给我讲：“你救人做好事，也不容易。我们看到有艘英国轮船被日本飞机炸掉了。”

“噢？有这个事啊？”我扭头问刘仁贵，我说：“老刘，你送的是不是那艘英国船？”他说：“好多船，我没有看清楚。恐怕就是那艘船。”

我说：“糟糕了，你也想做好事，我也想做好事，我们不做这好事，恐怕她还逃出去呢，我们做好事害了人家啊。”

说着，大家心里都是很难过。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小县城。我这个人爱管闲事，认为在我职权里应该下的事，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对于地方有利的东西，我都去尽可能的干。到了这个小县城一看，乱得很。满地都是伤兵，变成一个无政府世界了。伤兵们把商店也占领了，把年轻漂亮的妇女霸占了。搞得一团糟，我就叫了几个参谋来一道商量。这里乱得这个样子，我说：“我们应不应该管？”他们就跟我讲：不要管不要管。那么多伤兵，我们的队伍只有千把人，管得了吗？

“你们要我不管，是管好还是不管好呢？”

他们还是说：“不要管！我们还要走很远的路，还要到芜湖，还要到安庆，好长的路啊，到处是伤兵，得罪不了啊。”

“你们的话有一半的道理。也不是全有道理。”我说：“日本

人还没有来，这个地方就搞得没有人过问啦？这些伤兵没有吃的，也没有人负责把他们送走，当地政府干什么去了？这是当地政府不负责任嘛。”

我说：“当地政府不负责任，我们要管，把这些伤兵组织起来维持治安，解决这些问题，你们哪，只怕事不管事。”我这一说，参谋们觉得有道理。

“这样，”我说，“刘参谋，把我这一千多人，改编组成巡逻队，在街上多跑几趟，那些伤兵看到我们有武器，他们就不敢乱动了。”

我又喊另一个参谋，给我到商店里买一些白布。他不解，“买白布干什么用啊？”

“买来你就晓得了。”

我们住在县城的一个澡堂子里，那个澡堂子有三层，很高的一个房子。白布买来了，我就拿笔写了几个字：“县警备司令部。”我写好后，让参谋从屋顶上挂下来，我们就是警备司令部啦。这时，我还是个少校，但是我搞了一个少将的肩章，自己戴了起来，我这个官是个假官。

我命令：“你们哪，现在马上调查：那些商店是被哪些人抢的？谁要不服从，马上把他们抓来，男的女的都把他们抓来，女的抓来，送到后方。”部队把那些做坏事的人五花大绑都抓来了，其中真的有妇女，我就把那些妇女送到后方放掉了，对她们说：“你们逃难去吧。”

我自己戴着少将的军衔，站在一个大八仙桌上，对着抓来的伤兵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军队，一打了败仗就把地方闹得这样糟，变成无政府状态了！地方被你们搞乱了！他们地方上也不负责任，他们有责任，你们自己也不对！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啊？谁个没有父母啊？谁个没有妻子儿女啊？你们反过来欺负中国人啊？谁干的？我今天要抓几个！”他们看着我杀人的样子，就揪出几个人叫嚷：“就是这几个，这几个是最坏的家伙！”

我说：“捆起来！”

把那几个家伙捆起来了。我说：“你们说说道理！为什么要这样干？”很多伤兵，看看不对了，就溜了，说：“这个官哪，还是个少将呢，是个警备司令呢。”

我说：“我本应该把你们就地枪决！但是，我现在不这样做，我不枪毙你们。你们自己出来承认错误。现在我们要到芜湖，先把你们送走，伤重的上担架，不许你们在这里停留。”

我这一搞，不到三天，这个地方就一点事情没有了。后来，有人告我的状，说我这个官是个假官，我就一个电报打给顾祝同，顾祝同回电说：“你这个警备司令部在我这里备案了。”接着顾祝同又来个电报，说：“正式委任你为少将。”

这件事情安静下来后，我找几个参谋来讨论，他们就笑：“你的做法，我们学不了啊。”一个参谋说：“你真有办法，要我去买那匹布，买那个干啥用？我都不晓得。没想到有大用场。没有三天地方上就安静了。”

差不多有八个月了吧，我们走到芜湖。我接到一封信，信是写给我和刘仁贵的，信上称我们为恩人，说天冷起来了，给我们一个人打了一件毛线衣寄来了，我一看落款，哎，是葛世明！葛世明没有死啊。

原来，葛世明坐的不是炸沉的那艘英国船。她到了武汉，找到我的朋友，那个朋友说我们这里很需要人。就要她学无线电。她学了两个月的无线电，学好之后，她把我写的信就寄给我的妻子，说我也不晓得文先生和刘参谋现在在哪里，想问问地址，把线衣寄给他们。

我们收到信很高兴。大概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奉命到上海浦东、江阴、无锡去视察，那时我已经是少将政治部主任了。刘仁贵参谋长是个上校，我还带了个军需处长也是个上校。我们到上海住在东方饭店。一天，饭店的门卫对我讲：外面来了一个女士，她说要见她的长官，这位长官姓文，你们这里有长官没有啊？”

我说：“姓文的倒是有一个，让她进来吧。”

葛世明进来了！

文

强

11

12

13

14

我很奇怪，“我们到上海来视察，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上海啊？你还怎么知道我们住的这个饭店叫东方饭店啊？”

她就讲：“你们的电报打到我们那个地方，我们译出来，知道你们的行踪，这样就遇到一道了。”

“很有缘啦。很巧。”我跟她讲：“刘参谋也来了，他也还没有结婚，我在芜湖跟你们讲的话，你还记得吗？”

“记得。”

我很高兴：“你们两个人准备订婚。订婚酒呢，我来安排，不要你们花钱。你们双方送的礼物也归我买，你们只订婚就对了。”

我想了想：“我代刘仁贵给你买个大戒指，代你给刘仁贵买个手表。”

我把一切都办好的时候，就问刘仁贵，他着急了：“这个事情不行啦。”

“怎么不行啦？你也没有结婚，礼物少啊？”

“不是不是，不是的，我在江阴作战时，被日本人打了两枪，几乎死了。后来是一个护士救了我，给我医好了伤，那个护士对我很好。我就和她订了婚。”

“哦？这样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说：“葛世明那边，我替你买的礼物还是送给她，总是有这样一件事吧，是不是？”我买的那个戒指就作为刘仁贵的礼物送给葛世明。

到了后来，第二次把我调到上海来对付汪精卫，我到中央会计处办事时，中央会计处的负责人拿个照片给我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呵，这是葛世明嘛。”

他说：“她早就离开上海了，被英国人带出上海了。”

我问：“那怎么走的呢？”

“走香港过去，走云南。”

葛世明离开上海后，到了我的老家湖南，跟我的妻子周敦婉见了面，在周敦婉的姐姐那里住了一阵子。后来我调回重庆，去

看周敦婉的大姐。我的这个姨姐说：“葛世明一直在照顾周敦婉，我的妹妹去世的时候，留个了遗嘱，说你的儿子由葛世明带着，遗嘱要你跟葛世明结婚。”

我问：“你晓得不晓得，她在什么地方？”

姨姐说：“只晓得她在贵阳，具体地方我不知道。”

我回到重庆后，到处打听，才找到葛世明在贵阳住的地方，这时，又把我调到洛阳，成立华北办事处。我就寄了1500块钱给她，把周敦婉的遗嘱也寄给她了。我说：“周敦婉希望你带好我的小孩，要我跟你结婚。我现在暂寄1500块钱给你，你到西北来，做路费够了，另外再寄1500块钱给你，一共3000块钱。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到洛阳来，我在重庆有一部汽车，你就坐那部汽车，绕道西安，再到洛阳。”

葛世明到洛阳时，我又到太行山去了。

日本人扫荡太行山，当时洛阳方面有我的三个消息，一个是以为我阵亡了，第二个消息是日本人把我抓起来了，第三个消息是失踪了，这三个消息都不好啊，葛世明在洛阳哭了一天，她说：“文强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不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吧。”她这个人有些迷信，到洛阳街上去测字，测字先生就对葛世明说：“这个人命大。青天何其高，我有上天梯。陆水何其深，我有分水犀。”“犀”是什么东西她不知道，但是她相信了测字先生的话，相信了我没有死。

不到一个月之后，我从太行山突围出来，到了河南的新乡，河南新乡的那个乡长就打电话到郑州，说文强已经在新乡了，现在我们正要帮助他过黄河。

我渡过黄河的那一天，给长官部打了个电话，蒋鼎文司令长官亲自接的电话：“哎呀，你回来啦，我们得到的三个消息都不好。噢，高兴，高兴啦，我们在洛阳欢迎你。”

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回到了洛阳，跟葛世明结婚了。这时她问我：“‘犀’是什么东西？”我告诉她：犀是淹不死的。

我跟她结婚六年，生了三个儿子。一直到1949年，蒋介石政

府垮了，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时候，我还在淮海战场上，我就寄了一笔款给葛世明，大概有几万块钱吧，我说：“你呢，按政府的安排，到台湾去。”她听了我的话，把我们在河南盖的房子卖掉了，带着三个儿子，还带着个副官，到台湾去了。

我在淮海战场上被俘了。葛世明在台湾听见电台里广播说，国民党的将领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说国民党的战犯在这边很好，她每天晚上听广播，就想：“我自己蹲在这个地方干啥嘛？”她就带着三个儿子离开台湾逃回大陆。一逃回来，到了上海，上海市市长陈毅得到报告：“从台湾回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妻子，带着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奶妈，还有一个副官。”陈毅跟我很要好，当年我跟朱德到四川去，我是朱德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陈毅是师里的宣传干事。陈毅得到报告后一看：“噢，文强的家属，好好地对她。文强是我们的同志，在延安给他平了反，这个人不是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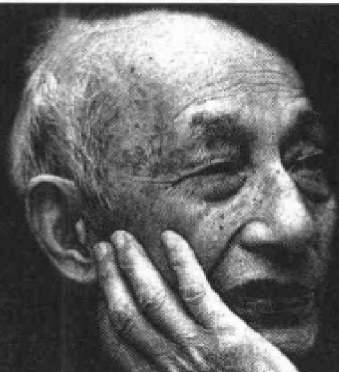
在陈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加入了妇联。葛世明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嘛，还安排了两个学校让她去教书。对她很优待。我原来在上海的房子，也发还了。

到了后来，陈毅调到北京当外交部长了。大陆的政策也变了，开展了大镇反，有人说上海的政策对反动派太宽了，一个战犯家属还加入中苏友好协会，还加入妇联，还在两个学校当老师，真是太优待了，一下子，把葛世明的工资全部取消，把她管制起来，连出个门都要向居委会报告，而且天天逼着她，要她交代我的问题，每天又批又斗的。葛世明气得很，气得没有办法。

她刚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到山东沂州关押我的地方，想看看我，但是没有得到允许，她跟我就再没有见着面。

她觉得绝望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房子里的煤气罐打开，把窗子都关上了……

被人发现后，把她送到急救站里去，人还活着，本来还可以抢救过来，但是那时候不给抢救，说是自绝于人民。就这样，我的第二个妻子葛世明在上海离世了。



第十六章 遇险上海滩

- 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特务机关“76号”，悬赏200万，一定要在“双十节”抓到我。
- 董竹君突然发现走廊上有日本人正准备冲着我开枪，她急中生智，把走廊的门“啪”地掀了一下，日本人吃了一惊，子弹从我的头上擦过去！
- 突然，蹿上来四条大汉，猛地一边两个把我胳膊往后一翻，摁倒了。
- 日本人和汪精卫在报纸上登出名单，把我们叫做蓝衣社，把我写在蓝衣社的第一名。

文

强

11

11

11

11

我从上海撤退，一路收容在上海作战的部队，最后到南京的时候，南京已经变成一个空城，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问所有到会的将官：“谁个出来守南京？”这些将官都不吭声，这个任务太重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在上海已经消耗殆尽了，到达南京的部队已经是不堪一击的残兵。蒋介石一看，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了，就是唐生智。唐生智是北伐时第八军军长，后来当了一个方面军的总司令，在武汉他的力量差不多发展到四十多万人了。唐生智那时是军事参议院的院长，他说我出来打。他说：“我们的首都不能随便放弃。”蒋介石说：“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其实唐生智自己手边也没有什么部队。日本军打到苏州的时候，很快就将南京包围了，同时封锁长江，一点都没有退路了。唐生智也没有办法抵抗了，只好向浦口撤退。胡宗南的部队在浦口，搭好渡桥，把唐生智接跑了，其他的部队还是撤退不了，守在南京最后的部队打得更惨了，南京被日本人杀掉的俘虏就有三十多万，这里边包括老百姓。南京失守了。日本方面在休整，我们也休整，差不多有两年，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

1941年，给我派了一个任务，让我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我已经是少将。具体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付日本人和汪精卫，一是代表戴笠驻上海，主要搞情报工作。

我带着一个副官，一个译电员，从温州动身到上海。刚一上船，没走多远，说是船只一律要检查，就把我们的船扣留了。我们搭乘的这条船是运牛皮的，温州宰牛很多，牛皮运往上海。几

天过去了，由于天气热，牛皮味道散发出来，搞得满船臭烘烘的。船上有一百多人，淡水吃光了，海水又不能饮用。大家都急得要命。我更着急，我在枕头里还藏着一个密码本呢！日本人上船检查了一通，什么也没检查出来，就走了。我找到船员问问情况，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做生意的，“这样扣押下去，走又走不了，什么时候能到上海呀？还活得活不得啊？”

我向船上的旅客做工作，说：“我看上船检查的日本人中，有一个翻译，我们看看要不要跟这个翻译沟通一下，第一问问这条船为什么被扣留？第二请他跟日本人通融，我们又没有犯什么法，为什么扣押我们这些人？如果需要花几个钱，我们大家凑几个钱，送点礼物给那个翻译，必要的时候，给日本人也送点礼。”旅客们纷纷说我说得有道理，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

我说：“我去跟翻译谈谈，如果需要拿钱，希望大家帮助一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这一百多人要平平安安到达上海。”

第二天，日本人又上船检查，日本人走在前面，翻译走在后面，我一拍翻译的肩，他一惊，回头一看：“你拍我干什么？”

“你是个中国人，也做点好事啊。你看把我们关得这样久，放也不放，船上吃的没有了，淡水没有了，我们死路一条啊。我们还不晓得什么原因把我们关在这里？”

翻译左右看看，小声讲：“这个船长是个白俄，我们要扣留他。”

我说：“船长你们已经扣留了，为什么要我们在这里受苦受难呢？”

“你讲的也有道理，我去跟日本人讲讲看。”

我看这个翻译还有点爱国心，就拼命地说：“你也是中国人嘛，做点好事吧。”

他答应了：“好吧，我明天帮你们去说。你们不要乱来，日本人知道了不得了。”

天又亮了，日本人上船检查，那个翻译偷偷把我拉到一边：

“我昨天跟日本小队长讲了，小队长的意思是这条船被扣留了，要搞另外一条船送你们走。”

“你们不是皇军吗？搞条船都搞不来啊？”我问。

“要打电报到上海去调。”

又过了四五天，翻译又找个机会悄悄跟我说：“你们恐怕要花几个钱，并不是我要钱，是要给日本人送点东西，不送东西也可以，拿出些钱来。”

我说：“我们不但要给日本人送礼，对你也要酬谢一番，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

我跟大家一商量，凑了七八百块钱，我塞给翻译：“这些钱都交给你，你自己留下一些，其余的送给日本人。把我们平安地送到上海，我们就感激你了。”他还推脱几下：“我不要，不要。”我拿出一些钱硬塞在他的口袋里。

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到了上海。这是我第二次到上海。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了一个少将专员冯作仁代表第三战区驻上海，顾祝同要我到上海后跟冯作仁联系，说他熟悉情况，可以帮助我。我一到上海，就去找冯作仁。我跟他接头时，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但是，没过一个月，他就被捕了，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给他的那张名片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日本人知道我到了上海。

过春节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政委袁国平是我的同学，陈毅也是我的朋友，还有张云毅，他们平安不平安呀？我很关心这些人，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

搞了半年之后，日本人知道我在上海活动，汪精卫也知道我在上海活动，日本人和汪精卫特务机关“76号”要抓我，他们手里有我的照片。“76号”的头目万里浪，是章乃器介绍来的五六个学生中的一个，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的大队长，后来当了汉奸（抗日战争胜利时，以汉奸罪被处决了），他知道我到了上海。我派人打进了“76号”，这个人叫金乃阳（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八

十多岁了)。金乃阳送出一个消息，说“76号”有人认出了我照片，一定要在“双十节”抓到我。开始是悬赏50万美金，后来慢慢增加，从100万一直加到200万。有两次把我抓到，我又跑掉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是“狡兔四窟”，有四个住的地方，在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都有。

因为活动的关系，我经常到锦江饭店去吃饭，与董竹君认识了。一次，我约几个客人在锦江饭店吃饭，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正在餐桌边的时候，日本人在走廊上隔着窗子，对准我举枪，董竹君突然发现走廊上有日本人正准备冲着我开枪，她急中生智，把走廊的门“啪”地掀了一下，日本人吃了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胡乱地打了一枪，跑掉了。我坐在桌旁和客人说话，子弹从我的头上擦过去！

我成立了一个策反委员会，我自己是策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下面有个参谋长，叫做沈忠毅，是浙江人。他当过杭州警官学校的指导员，黄浦第三期的。开始我们是平起平坐，后来我当了少将，他给我当参谋长。参谋长下面有一个管人事的，还有个搞宣传的，这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外文很好，都在浙江警官学校做过事，很可靠。

我在静安寺路有一处房子，是我在策反委员会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平常不大去，就是那个参谋长沈忠毅带着妻子住在这里，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我有时去一下，就跟他们说要小心，不要到外面去跳舞，不要乱花钱，不要出去，在屋里一人一天写一篇文天祥的《正气歌》，然后在家里三四个人打打扑克打打麻将都可以，不要打输赢，自己要爱惜自己，上海这个环境是很危险的。后来他们把《正气歌》读得很熟了。

虽然成立了一个机关，但是在上海很难把局面打开。我在上海跑马厅那个地方有一幢房子，表面上是一家黄金交易所，我自己是黄金交易所的老板，邻居们看我整天坐着汽车，神神气气的，还以为我真的是做黄金交易的。有一天，我的参谋跟我说：“你高高的鼻子，挺像个外国人，你坐在汽车里，脸总是向前看，

谁跟你说话也不理，从侧面看上去人家以为你是个外国人。你要是换一顶新一些的帽子，就更像外国人了，外国人不会戴你那样的旧帽子。”

“哦？”我拿起礼帽一看，哎呀，我这个礼帽戴了三年了，应该换一换了。我在上海这个环境里，应该买个漂亮一点的。我平时出去都带着保镖坐汽车。这犬就自作聪明，心想跑马厅这个地方一出去就是上海的南京路，出去没有几步路就有大商店。我想，我今天出去就不带保镖了，也不坐汽车，我自己跑到百货商店，买顶帽子就回来。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我跑到一个百货商店卖礼帽的地方，说：“拿一顶礼帽我试试看。”一戴，很好。卖帽子的人把我的旧帽子装到盒子里，我说：“旧帽子我不要了，买一顶新帽子就够了。”老板说这个盒子你拿回去，新帽子不戴的时候装进去，省得落灰，我想也对，我就戴着新帽子，拎着盒子走出大门。

刚一出门，突然蹿上来四条大汉，猛地一边两个把我胳膊往後一翻，摞倒了。哎呀，我想，糟了，自己不应该来冒这个险。我定睛一看，汽车里还坐着两个人，其中有个人我认识。我说：“你是李参谋吧？”这个李参谋是原来别动军的一个支队参谋长。他看着我笑：“你还认识我啊？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还是搞别动军的时候见过面的，我们见面不容易呀。你到上海，怎么不通知我啊？今天哪，我们也是遇到你的，请你上我们的汽车，到上海浦西饭店走一趟，我们的头头在那儿等你！”

他看我不理他，又说：“我现在不是别动军的参谋长了，我是浦东丁锡山国民爱国军的参谋长了。”

我一想这个事情很坏。

车门打开，把我推进去了。我在车上说：“李参谋，我们当年搞的部队是为了抗日，你现在越走越远了，你走到了哪条路上去了？”

他说：“我走到哪条路上去了？我们是得到汪先生支持的。”

“汪精卫是什么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应该大义灭亲。我们中

华民国只有一个政府，汪精卫又成立了一个政府，那是汉奸政府，你投靠汪精卫，不应该呀。”

他“嘿嘿”两声：“我们这些人，地上的蚂蚁一样，那些大人物都投靠汪精卫，我们是哪里有饭吃就到哪里去。”

“你现在把我弄到哪里去？”

“到愚园饭店，我们的头头要和你见面。”

我一看他的汽车还是防弹的，说：“你这个汽车倒是保险。”

他很得意的样子，说：“这是日本人给我们的。”

车到了愚园路，经过愚园饭店，不停车，转了一个圈，向浦西开了。浦西是日本人和汉奸的世界，我说：“李参谋，你不是说丁锡山要和我见面吗？愚园饭店到了，为什么不进去啊？”

他说：“改变了，不到愚园饭店了！”

“那到什么地方去？”

他回答：“到浦西，百乐门饭店！”我想糟糕了。

到了浦西百乐门饭店，车门打开，把我抓了出来。说：“你上楼，我们的头头要见你。”我只好听他们的。上了二楼。门一打开，就把我推了进去。我一看，是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坐着一个人，是汪精卫手下的一个汉奸师长。这个人坐在沙发上，左边有个小凳子，前面是一个圆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下，说：“文将军，你还认识我吗？”我说：“我认识你丁锡山，没有杜月笙把你保出来，你活不到今天。你是杀人越货的海盗，你今天想把我怎么样哪？”

丁锡山手在圆桌子上一拍：“你们这边的人，把我们的一个师傅杀掉了！”

他讲的师傅，叫做何天枫，是个支队长。他说：“现在是一个抵一个吧，要拿你抵何天枫的命。”

我叫骂：“何天枫当了汉奸，犯了国法，应该镇压！你现在干什么？你也当了汉奸了！你就是今天把我抓到，把我整死，会有人来替我报仇。你知不知道啊？你是汉奸！你是自己往死路上走啊！”

文

强

11

12

13

14

他一听我骂他，一下子就掏出手枪，在桌子上一拍，狞笑着说：“我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你对我还是这样神气？”我一想，这个家伙是一个海盗，跟他讲这些话也没有用，他把我抓住，一定是送给日本人，我这条命就没有了。我跟他大概隔一丈远的样子，我是练武的人，我有我的一些办法，我一个箭步蹿到桌子前，那个手枪到我手里了，我一下子摀住他，用手枪抵着他的头，说：“今天究竟是你死还是我死？你把我弄死了，你也活不成！”

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呼啦”一下五六支手枪都对着我，我说：“你们要开枪，我先把你们这个头头打死！”他们那些家伙不敢开枪，眼睁睁地看着我用枪抵着丁锡山的头。

忽然，外面走进来两个人，喊：“你们想干什么？”

这两个人很神气，手一挥，把屋子里的其他人轰走了。我正在全力对付丁锡山，忽然听到其中一个叫：“文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看，救我的人来了。这两个人是洪帮中地位很高的人，是我那个策反委员会的委员，一个是高翰生，是湖北人，北洋军阀时候的国会议员；另一个龚君普，也是洪帮大哥，是吴佩孚手下的少将监务官，是个将官，也是策反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帮会论辈，那些小喽喽一见他们辈分高，就双腿发抖。他们一进来之后，看见我拿着手枪跟丁锡山在那里斗，高翰生跑到丁锡山跟前，“啪啪啪”照着丁锡山就是几个耳光，说：“你今天想把文先生怎么样呢？你这个家伙忘恩负义，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就是文先生说的话，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今天怎么还对付他呀？你这身汉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

丁锡山跪在两个人面前，流着眼泪，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支支吾吾地说：“我对不住你们。我看他们把我的师傅杀掉了，我要替师傅报仇。”

龚君普又打了丁锡山几个耳光：“你报什么仇啊？何天枫自己当了汉奸，不当汉奸能杀了他吗？你的救命恩人是文先生，你

这个家伙简直是莫名其妙！”

我一看这种情况，就一边把手枪交给龚君普，一边大骂丁锡山。我对他们两位说：“我很感激你们，丁锡山呢，我还要跟他说几句话。”

我说：“刚才他们两个讲得很对，你就是不明大义，只晓得报仇，跟着汪精卫你想做大官，你这条路走错了。你如果今后好好干，我可以把你这个汉奸的名义刮下来。杀日本人杀汉奸，并不是没有路，有路你自己不走。”我把丁锡山骂了一顿，他跪在地上磕头：“文先生，救我的命，救我的命。”我说：“你呀，今天是这两位救了你，他们不来呀，你不死在我的手里，恐怕我就死在你的手里了。”

高翰生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他过来揪了我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赶快脱离这个险境，如果日本人知道了就没有活命了。高翰生喊：“丁锡山！赶快让你的部下好好把文先生送上汽车，跟我们走，有一点不对，你这个家伙就活不成了！”

丁锡山连连说：“就这么办，就这么办，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

“到了车上我们会说的。如果文先生出了问题，你也活不成！”

丁锡山就喊他的手下把我送上汽车，到了愚园路英租界路口，我们下了车。高翰生另外叫了一辆汽车，我们脱险了。在车上，他们两个人对我说：“今天好危险，我们不晓得你被绑架了，我们是以洪帮的身份，来做丁锡山的工作的，没想到把你救了。好危险哪，丁锡山是个最坏的家伙，我们身上都出了一身冷汗。”

戴笠给我拍来电报，说上海太危险，要我注意。我回了一封电报，“为国牺牲，义无反顾”。

我在霞飞路开了一家照相馆，两个照相的都是我的人。一次，打进“76号”的金乃阳到照相馆来送消息，说“76号”把我的照片放大，由一些特务拿着，在租界的出口处，日夜盯着我的

文

文

①

②

③

④

汽车。当时，处境很危险。晚上10点以后我才敢出去活动。

有个叫左篆的，过去是个科长，湖南大学毕业的。这时他把科长辞掉，带着妻子到上海来找我，非要跟着我干不可。我说既然你来了，就搞宣传工作吧。我这里本来没有什么宣传科，因为他来了，因人设事，成立了一个宣传科。他是个湖南人，妻子是上海人。左篆来了没两个月，突然失踪了。他妻子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说：“你至少知道一点动静啊？”她说一点也不知道，他早上出去就没有再回来。

我问“76号”内线，有没有抓住一个姓左的？回答也是不知道，说如果抓来，我们一定会知道的。我又问在日本人那里的内线，内线告诉我，日本人抓了一个姓左的，这个人很刚毅，受尽了酷刑，什么也不说。嘴里不知念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日本人，说这个姓左的念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不到两个月，左篆被日本人活活地打死了。我们追认他为烈士。

我在静安寺的房子里请了一个娘姨，我问她：

“你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她说：“我是宁波人，我的丈夫是当兵的。”

“当兵的？在哪里当兵？是在国民党里当兵呢？还是在汉奸那边呢？还是在日本人那边呢？”

她说：“在汪精卫那一边。”

“那你到这边来工作，你丈夫知道不知道呢？”

“知道。我写信给他，我在这里，是做生意买卖的，对我们很好。”

“你的丈夫到过这里没有？”

她说：“没有，他是宁波乡下人。”

她还认识点字，有一天，我跟她讲：“我出钱送你的小孩上学，把她当成我的女儿一样。你呢，谨慎一点，就不要出去了。”

她说：“开始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是干什么的，后来我看清楚

了，你们是重庆派来的高级官员，你们不是做生意买卖的。”

我说：“你看清楚了吗？”

她说：“看清楚了，那个参谋长是代替你负责的，他的妻子也很好，是杭州人，对我们很好。”

我说：“我们是为了抗日，救国救民嘛，我们住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家庭，实际上不是个家庭。”我问这个娘姨在上海几年了？她说：“我家里到上海做娘姨的，我是第一个。”当时，宁波娘姨是第一等，上海娘姨是第二等，第三等是江北娘姨，她说我们宁波娘姨的待遇都比较高。我说：“送小孩读书都是我花钱，你还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我会关照下属多给钱给你。”

一天，忽然闯进来五六个人，娘姨一看他们来头不对，就赶快把文件、账目藏起来。他们抄家什么也没有抄出来，这个娘姨很机警，趴在我窗子上喊：“我们这里来了流氓，抢东西！”巡捕房里马上就来了人。那五六个日本人看到来了巡捕，就逃掉了。如果不是这位娘姨叫来了巡捕，那些日本人只要一掀里屋的门帘，账目名册之类的东西都在里面，好险呀！巡捕问娘姨：“你喊叫什么？”

她说：“这几个流氓看来像日本人，所以我就报警了。”

这个娘姨很机警，后来我奖励了她一笔钱。

巡捕刚走，我刚好来到这里。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感觉屋里的气氛很紧张，参谋长不在，会计科长也不在。娘姨出来了：“哟，你怎么回来了，你回来就不要再出去了。看来日本人在外面还有探子。你出去把你抓起来不得了。”娘姨说：“我带你到隔壁的一家去躲一躲。”

我问：“参谋长呢？”

她说：“参谋长没回来，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我告诉娘姨：“你站在窗子边注意着，如果参谋长回来，你就赶快从窗子上丢衣服下去，让他不要进来。”

一会儿，参谋长果然回来了，娘姨把衣服丢下去，参谋长一看，知道发生了情况，就不敢进门了。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会

计科长回来了，娘姨还没有来得及把衣服丢下去，日本人扑过去把会计科长抓走了。重庆汇来的经费都归他负责，然后再发给上海军统的各个机关。这个会计科长姓马，叫马仁湛，他是个大学生，在我这里是半天读书，半天工作。他被捕之后，被日本人把两条腿都打断了，他始终没有投降，始终什么都不承认。后来上海解放以后，他还坐着轮椅来看过我。

有一天礼拜天，我的副官跟我讲：“主任哪，你到上海两年多了，日本人跟汪精卫天天悬赏要抓你。你白天没到过茶馆，也没到过公园，你把自己焊死在一个很小的圈圈里，这样吧，明天我给你安排一下，愚园路有个公园，那个公园是一个犹太人修的。你也去晒晒太阳。”

我说：“不能去，很危险。”

他说：“你也晓得怕？对自己的身体一点都不爱惜还行啊？我们到公园里去一趟，晒晒太阳，转一个圈就回来了，那有什么问题呀？”

我还是犹犹豫豫的，感觉我们总是在一些我们预料不到的地方出问题。副官就望着我笑，说：“你听我的，我们到愚园公园去晒晒太阳，顶多耽搁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回来了。”

我听他的了。那天我们坐着汽车来到愚园公园，我们买票进去，我走在公园中间的马路上，两边是小湖，前面有一个亭子，我往那边走，糟糕了！那个郎本实仁穿着将官的衣服，坐在亭子里！

他看到我，我也看到他。这个家伙很机警，他一看到我走过去，那个样子就很警觉。

我悄悄告诉副官：“亭子里坐着的那个人，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个日本人郎本实仁，当年他要把我杀掉，没能做得到，今天他看到我，装作没有看到我，我也装作没有看到他。你看他穿着将官衣服，是个少将。听说他调到宁波，在蒋介石的家乡当防守司令，他怎么到上海来了？”

副官说：“我听你讲起过这个人，但是没有见过面，我不知道。”

我说：“现在怎么办呢？”

副官很紧张：“我们现在赶快回头吧，坐汽车回去算了。”

我说：“很可能公园外头他布置了人，我们一撤退，他就把我们打掉了，到了这种关头，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怎么办呢？”

我告诉副官：“郎本实仁很可能是有计划地对付我们。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知道我们要出来。”

李副官没有办法了。我说：“不要慌，你从亭子那边转过去，隔着郎本八步到九步之间，监视着他，如果他有什么行动，你就先发制人，一个箭步上去用手枪把他打掉！”

副官说：“我知道了。这个我做得得到，做得得到。”

“你不要慌慌张张的，如果不出现什么坏的情况，你不要乱打枪，这里是租界，如果把郎本实仁打死了，租界上的巡捕会把我们抓起来的，我还要进巡捕房。你不要轻举妄动。”

“我知道了。”李副官就转到亭子另一边。

郎本实仁从亭子一边的小桥上下来了，直接对着我走。我想，糟糕了！我是回头走？还是迎头而上呢？我紧张地考虑。我想：我如果向后退，公园外面他会安排人。干脆，我向前走，迎着他过去！

郎本实仁装作没有看到我，手老是放在衣服里，我就判断他衣服里面有手枪，我想，可能他一过来就用手枪把我打掉，或者把我打到湖里去。

我和郎本实仁擦身面过时，我感觉他要对我动手了，我就一下子先发制人，把他左手逮住了，把他伸在衣服里的左手向下一拉，他左手里的手枪就到了我手里了。我用很大的力量，一拳打过去，郎本实仁倒在马路上！李副官看见我把郎本实仁打倒了，一个箭步蹿过来，骑在郎本的头。

郎本跪在我的面前哭，我指着他骂：“郎本！我们两个从‘8·13’起就是对手，现在已经四五年了。你想把我除掉没有做到，我想把你除掉也没有做到，今天怎么样啊？我今天也不整死

你，我是为国家，你也是为国家。我知道，你是宁波那个地方的防守司令，我这次把你放走，你如果在宁波做些好事，以后我还可以原谅你！”

他还是跪在地上哭：“你就宽大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做坏事了。”

我把手一扬：“好吧，我就放你走。”

他回头看了一下两个副官，使了一下眼神，赶紧跑走了。

后来郎本实仁在宁波，为了修蒋介石母亲的墓，花了很多钱，还做了很多好事。

一直到日本投降，我们从西安到了北京，有一天，我的部下马汉三问我认不认识郎本实仁？

我说：“你怎么知道啊？”

他说：“现在这个人被抓到北京，我们把他关起来了。”

我说：“这个人还算做了一些好事呀，不要杀他。”在北京，我又跟郎本见了面。没想到见了面，郎本实仁不认识我啦！

他打量我好久：“你这位长官，我好像见过面，又好像没有见过面，你是谁呀？”

我说：“你现在不要问我是谁，你这个人在东北杀了好多人，在天津杀了好多人，到在上海又杀了好多人，但是以后你改了，你给我们校长的母亲修了墓，在宁波还做了些好事，这次我不抓你，不把你当战犯，你回国好了。”

很快，郎本回国了。

那时军统局还有一个单位叫“上海区”，上海二区的区长程国绪是个少将，黄埔第五期的，在北伐时号称八大金刚之一，后来带着四个行动大队在上海杀汉奸。另外还有一个区长负责情报，两个区长互相不能联系，不能见面，戴笠规定由我每个礼拜与他们两个分别见面一到两次，每一次都是我规定见面地点。

一次，我和程国绪约好，28日在一个黄埔同学家里见面。

27日这一天，我们一个中央会计蒋志云急急忙忙跑到我住的地方来。我问她：“这样急急忙忙地发生了什么事啊？”她哭了：

“你还不知道啊，”她说，“程国绪带着日本人和汪精卫特务把上海区都破坏了。我是从后窗子逃走的，日本人没有抓到我，我没有地方去了。我只晓得你这里，跑到你这里来躲一躲。”

我问：“他什么时候叛变的？”

“昨天晚上。”

幸亏她告诉我这个消息，不然我第二天就要和程国绪见面了。我说：“你来得正好，你救了我的命啊！”我想了想又说：“你到我这儿并不安全，我派副官送你离开上海，先到乡下去躲几天，然后给你买票离开上海，到香港去。”这样，我又救了她。

我说：“现在中央要把我调到重庆去，你先走，我大概10天以后就离开上海，上面的命令是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到浙江温州，从温州到金华，走陆路，坐汽车到重庆，这个时间花得长一些，路上也辛苦一些，我采取走香港这条路，我们到了香港再见面吧。”

后来，蒋志云到了台湾，还当了国大代表。她很感激我，说：“我的这一生啊，是你把我提起来的，当会计也是你保的我，我当国大代表，也是你帮助的。我救了你，你也救了我。”我说：“这件事情就不要谈了。”

有个湖南湘乡人，叫肖克文，人称“小耳朵”。过去在警察局里干过，后来他到上海卖酒，全家都住在上海。他得知我到了上海后，就来找我，说是不想卖酒了，想在我这里谋个差事，我考虑一下，说：“这样吧，我很忙，这个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我也不兼了，请你来代理一下。”他后来把三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弄到办事处里来做事，都成了军统在上海组织里的交通，连他的外甥都到军统里当了交通，一家人生活过得不错，我一看这一家都为爱国服务，就嘉奖了他们。

“小耳朵”被捕了。刚一被捕，他就叛变了，把我供了出来。“76号”特务问他，知道不知道我住的地方，他说：“文强住的地方我搞不清楚，但是我可以找到他。他对我很信任，如果我约他，他一定会跟我见面的。”汪精卫“76号”特务的意思是，让

文

文

①

②

③

④

“小耳朵”约我见面，一定要把我抓到，抓到我，奖金有“小耳朵”的一半。

“小耳朵”看有利可图，就通过一个关系写信给我，大意是说：“文先生，这次程国绪叛变了，我也被捕了，现在他们逼着我找到你，我说我能够见得到文先生。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我接到这封信，就和参谋长研究，要不要去见“小耳朵”呢？参谋长说你决不能去，太危险了。我再三考虑，做出决定，说：“如果不去，这个线就断掉了。假如去了，我有办法保护自己。”

我就派人给“小耳朵”送信，约好他在董竹君的茶馆里见面。

我在茶馆里布置了一些人，都带着武器。如果“小耳朵”一个人来，我的副官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他，把他塞进我在门口准备的汽车，弄着他兜圈子，中途换三部汽车；如果他带人来，我们的人就一起上，打掉他们。

“小耳朵”来了，他前后左右都没有人，就他一个，我的副官迎上去。“小耳朵”认识我的副官，说：“我约文先生在这里见面。”副官说：“你跟我走，汽车在外面。”“小耳朵”心里发毛，不想走，副官一招手，上来几个人一把抓住他，把他塞进了汽车，兜了很多圈子，换了三部汽车，到了一家公司里面，我在这里等他。

“小耳朵”一见我，双腿一跪。

我问：“你怎么样？”

“你不要误会我”，“小耳朵”说，“我已经告诉你有人要抓你，我不会害你。”“小耳朵”又看着我说：“我家没有饭吃了，不晓得中央会计那里有没有钱？你是不是可以再借点钱给送去，让我家里人有饭吃。”

“这是小事，我会借钱给你。你说老实话，你这次出来要跟我见面，有什么背景？”

“他们要我把你引出来，抓住你。”

我问：“你来的时候，跟着几个人？”

“小耳朵”说：“我们一共三个人，有两个人藏在茶馆外面。”

你这位副官先生突然把我推上车，那两个人回过神儿来时，汽车已经开走了。”

“我相信你说的话。”我问，“另外还有什么任务给你？其实你不讲，我也清楚！”

“另外没有什么任务。”

我说：“他们一定要你策动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周维仁，这个人也是湘乡人，跟你的大女儿两个人是姘头，我知道‘76号’一定要你策动周维仁，让他投降汪精卫。”

“小耳朵”听我这样一说，露了一句：“你怎么了解得这样清楚啊？”

“我不是讲了吗，你不说我也知道。”

“小耳朵”以为我真的摸底，就全交代了：“‘76号’要我带着我的大女儿肖淑英一道到广东，去见周维仁，策动他的部队投降汪先生，没想到你已经晓得了这个计划。”

“那么你去不去广东呢？”

“小耳朵”说：“我打算去，不过他们要先抓你，这一步成功后，再去策动周维仁。”

我说：“那好吧，你今天没有把我抓到。你家里困难，我会派人送去5000块钱。你的路不要走得太远，不要当汉奸连累了你的子孙。”

他跪在地上又哭了一顿，我就把他放走了。那时，我30岁出头，“小耳朵”已经快60岁了。

我的策反任务基本完成，从华北、苏北到东北，策动汪精卫部队一百多万人投降。当时，那些汉奸的心理是脚踏三只船，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共产党，他们看看当时局势，还不愿意到共产党那边，经过我们的策反工作，愿意跟着蒋介石走。

我奉命调重庆，离开上海之前，把参谋长叫过来，说：“你跟我好多年了，是我的参谋长，现在调我到重庆去，要是我指定一个人在这里负责，代替我的职务。我现在指定你代替我。”

参谋长讲：“我们现在这里没有钱了，你走了以后，没有钱呀，把我留在这里也没有用。这样多的人要花钱，我到哪里弄钱呢？我弄不来。”

我说：“这样吧，我走之前，至少要弄2万块钱，我自己带1万作旅费，另外1万块钱给你，你维持个把月就可以，是不是啊？以后我给你汇钱来嘛。”

过了几天，正好王良正来看我，这个人是国民党，在上海开有私人银行（后来加入共产党），我就跟他讲：“现在我奉命要调离上海了，对你我也不保密，我现在马上要走，身边没有钱。”

他问：“你要多少？”

“大概两万块。”

他说：“两万块钱我给你拿出来。”

“我可能到了重庆以后，这个钱才能还你。”我又说：“现在上海局势很紧张，我的预测是太平洋可能要打仗了，我们这些人都要离开，你那个银行恐怕在上海也存在不了几天，你要想办法离开这个上海。如果不早做计划，恐怕临时来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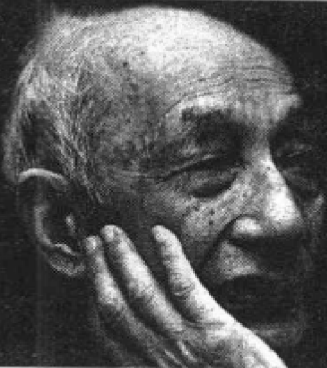
他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照着办，我马上拿两万块钱送给你。你到了重庆，再归还我。我也不要你的息钱。”

他拿了两万块钱给我。我带了1万块钱离开上海，留下1万块钱给参谋长。

我离开上海不到一个月，“珍珠港事件”就发生了。代替我留下的参谋长被日本人抓住了，我们留在上海的电台人员也叛变了。我一到香港，上海方面就打电报给我说：“你离开还不到半个月，什么都变了，日本人和汪精卫在报纸上登出名单，把我们叫做蓝衣社，把你写在蓝衣社的第一名。”

这件事其实我已经知道，我在离开上海买船票的时候，我的副官买了一份报纸，看到上面登着我的名字，说我是蓝衣社的头头，他把报纸给我看，并说：“你看看，你要小心哪。”

这张报纸我一直带到香港，后来我把这张报纸带到重庆。



第十七章 遭遇珍珠港事件

- 星期五早上，我刚要动身到机场，忽然，香港到处拉起了警报！我看到印度军队向飞机场的方向跑。
- 茶房跑来了：“哎呀，幸好你出去了，日本的小钢炮打过来，正打在你这个房间。”
- 我们组织一支保卫队，叫做MP。
- 张发奎说：“我给你准备了1万块钱路费，你回重庆，委员长要召见你。”

我在上海搞情报时，发现日本关东军有两个师团由东北集结到青岛，之后再乘兵舰南下，沿途没有停留，一直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一个师团下了兵舰，另一个师团又去了菲律宾。关东军这两个师团装备精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的海岸不登陆，在香港也不登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教会里的人跟我讲，说他们听到的消息是，日本人要去对付英美，好像有什么行动。另外，我们还破译了日本人的一个密码，发现日本人确实到了新加坡。我判断，日本人在太平洋能够有一个大动作。我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参谋本部，很快，参谋本部回电，说这个情报恐怕不准确，日本人打中国都打不下来，转向英美的可能性不大。军政部长何应钦把我的报告给英国人和美国人看了之后，英国人和美国人连连摇头，说这简直是笑话。根本没有相信我的报告。

我又继续调查，之后再次发出电报，说不要轻视日本人的此次行动，以防万一，出了事情就来不及了。

很快，参谋本部又回电，大意是，并不是我们不相信，是英美不相信。

双十节之前，蒋介石来电，要我离开上海，取道香港，或取道金华，到重庆报到。我想取道金华，不但辛苦，而且很危险，于是我就坐上了海船，到了香港。

这时已经接近双十节了。我和香港处的处长王兴桓见面，王兴桓是宁波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我向他讲了太平洋的情况，他也直摇头，说：“你这个情报，不可能不可能。”他说：

“世界上哪有蛇吞象啊？”他把日本比做蛇，把英美比做象，“你说日本要转向英美，我不相信，不相信。”

我说：“日本已经付诸行动，东北两个最精锐的师团南下，在中国的海岸线没有停留，到东南亚去了这不能不注意。还有，日本的海军也出动了，这是事实，你们还在讲什么蛇吞象！就连英美自己也不相信呀。”

王兴桓问：“你买的哪天的飞机票去重庆啊？”

我回答：“买的星期三的飞机票。”

“何必这样急呢？后方的物资很困难，你在香港做几套好衣服。我们已经从重庆方面得知，戴雨农先生担任了全国缉私处处长，你们这些大员要调到省里当缉私处的处长，名单里有你，让你到湖南去，当湖南缉私处处长。”

“我没有接到命令，我不知道。”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

他说：“你要上任了，做几套好衣服。”

“礼拜三就走了，怎么来得急啊？”

“礼拜五走！”王兴桓说：“西装店我有熟人，我让他们加班，不误你礼拜五的班机。”我一想，也行，礼拜五走，只耽搁两天嘛。

量完衣服后，王兴桓说：“香港有个凯乐门酒店，是我们自己人开的，离飞机场又很近，你搬到那里去住，衣服做好了我给你送过来。”按照王兴桓安排的，我搬到了凯乐门酒店。

住了两天，我在街上还碰到个熟人，姓廖，廖根绍。他是黄埔学生，在军统里投降了日本人，这次他逃出日本人的监视，带着老婆和三个朋友一起跑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逃难到了香港。我在香港正好碰见他，我说：“你虎口余生逃出来了，回重庆吧，回到重庆一定对你优待，有可能的话，还可以当个什么省的缉私处长。”他听了很高兴。

星期五早上，我刚要动身到机场，忽然，香港到处拉起了警报！我看到印度军队向飞机场的方向跑。

廖根绍的老婆跌跌撞撞跑到我屋子里，一进门就哭：“走不

了了，完蛋了！完蛋了！这是日本人的世界了！”

“瞎说，赶快想办法逃嘛。”我打电话问王兴桓发生了什么情况，他说好像是防空演习。我说：“这个防空演习怎么跟真的一样呢？”

后来才知道，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王兴桓对我说：“老兄啊老兄，这个蛇真的吞象了。”其实就连我这个搞情报的，也没有料到日本人打得这么快。

王兴桓跑来找我，说老兄赶紧进防空洞吧。

“这个防空洞怎么搞得这样高级呀。”我一进防空洞，很惊讶。

王兴桓说：“英国人厉害，好多年前就修好了。这里很自由很宽敞，像你这样西服革履的，一点都不妨碍。”

我在防空洞里躲了几天。有一天，我离开防空洞，到凯乐门酒店去，心想凯乐门酒店我还有点行李放在那里，去看一看吧。

我跑到凯乐门酒店，刚进房间，茶房说下面有人找我，我赶紧就下了楼。迎上来的是我这个朋友廖根绍，他说：“我上次遇到你，有好多话还没有跟你讲完呢。在新加坡那个地方，英国人说我们中国人靠不住，把我们赶出来，我还有三个朋友，一起跑到香港来，我们身上没有钱了，也没饭吃了，你不是跟我讲过一句话吗？你接济我们，你说你还有一万块钱，准备给我们一部分。你也不知道我们住在哪里，今天我来找你，巧了，正好碰见。”

我说：“这样吧，先上楼去，我们到里面吃些点心，我本来要回重庆的，现在看样子也走不了啦，我那一万块钱哪，还是拿一部分给你吧，我只有一个人，你还有妻子，小孩，还有三个朋友，你正需要，我拿一半给你。”

我们吃了点东西之后，我说我还要回我的房间去看看，把我的行李带到防空洞里去。我跑上楼去一看，我住的那个房间，门上打了好大的洞！

茶房跑来了：“哎呀，幸好你出去了，日本的小钢炮打过

来，正打在你这个房间，你如果不出去，可能就活不了了！”我一看，我的箱子已被打破了。我跟廖根绍说：“你今天来得好啊，你不来，我在屋里面，一炮弹打来那还活得了吗？”

“赶快离开，赶快离开！”我就又跑到防空洞里躲起来。在防空洞里，有人给我出主意：“如果要安全哪，到皇家俱乐部去，那儿有十几层呢，飞机投下炸弹来也死不了人。”

我觉得有道理，赶紧又转移到海军皇家俱乐部去。气喘吁吁刚一跑进门，一个老人家跟我打招呼，我一看，噢，是个海军中将！

海军中将看了看我，说：“你是个将军哪，我也是个将军，你是陆军少将，我是海军中将，香港打得这样子，我们两个都不出来出点力呀？也太不像话了吧，有愧啊。”

我说：“听你的，你是海军中将，是跟随总理的人。”这个海军中将比我大20岁，是个老资格，姓陈名策，保卫孙中山、打掉陈炯明的就是他。海军中将说：“这样吧，我看见英国人一天到晚慌慌张张的，日本人厉害得很，晚上抢劫、强奸，把香港搞得很坏，我们出来做点事吧。”

“做点什么事啊？”当时，尽管我说听海军中将的，但是我真不知道能不能逃出去，一点办法也没有。

陈策说：“我们组织一支保卫队，叫做MP。把商店里的店员和平时受过训练的人都组织起来，组织个千把人，维护香港的秩序。”

我说：“你讲得很好，这方面我有过经验。我‘八·一三’在上海，上海到处都是间谍，搞得一塌糊涂，我和戴雨农先生奉委员长的命令在城里组织了1万人的别动队，维持后方的秩序。我还把同仁书院的日本人绑架了几个，拷打一顿，他们就什么都说出来了。”

“噢？你在上海办过这个事啊？那你还有经验呢。”陈策高兴了。

我说：“我可以办，不过我认为组织1000人太少，香港又这

文

文

①

②

③

④

样大，至少要搞5000人。”

陈策说：“英国方面我还有些朋友，我就把你的大名列上去，我的名字放在前面，我们两个人出面，看英国人愿意不愿意？”

我们很快写了个方案给英国人，到了第三天，英国人给陈策回话，说你这里还有个少将啊，你赶紧带着这个少将来见我们。

陈策和我到英国人那里谈了我们的计划，表示我们马上就干，组织5000人，白天巡逻，晚上把守街道，那些流氓地痞不许进来。就这样，我和陈策两人把香港的MP组织起来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就把那些流氓地痞都抓住关起来了。英国人又说：“还请你们替我们保护防空洞，服装不整的不许进来。”后来，英国人讲：“你们组织的这5000人，比我们两个旅的力量还大，你们做了好事。”不过，英国人胆小，香港守了18天，就打着白旗子投降了。我跟英国人讲：“你们投降了，MP这5000人怎么办呢？日本人要抓他们，你们发些钱给他们，把他们送走，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英国人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中将，一个是少将，怎么办呢？”

我说：“我们不靠你们，你们已经自顾不暇。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们会自己逃出香港。”

陈策搞到一个快艇，跑到山东，日本人追上他，开枪就打，陈策负了伤，当时陈策的干儿子在快艇上，他会游泳。他一看干爹被日本人打伤，日本人也快要追上了，一下子就把他干爹背上岸，岸边山上有我们的部队，部队一开枪，日本人逃跑了，陈策得救。之后陈策逃到重庆。

陈策后来的命运不大好，他的一个小老婆拿了他积攒多年的财宝，跑掉了。陈策一气，就死了。

我在1万块钱里拿出一半给廖根绍，他是福建人，会说广东话，又会说福建话。他说：“你这个人太好了，我们一家人如果没有这5000元，早不晓得哪里去了，你看现在这样好不好，海里

的情况我很熟悉，我能保护你，我们要逃出香港。”

我说：“那好吧。就靠你帮忙来救我吧。”

我们搭了一条渔船。我对廖根绍说：“你有海里的经验，你看看我们这条渔船，那几个手里拿着铁棍，总把我们的行李敲敲拷拷打打的，我看这船上的三个人是坏人，恐怕是海盗。”

廖根绍不以为然：“哎呀，你不要疑神疑鬼的了，什么海盗到这个鬼地方来，你也没有见过海盗，瞎说，瞎说！”

廖根绍的妻子说：“文大哥，文大哥，别看你小几岁，你的阅历比我丈夫高得多。他一生大事也糊涂，小事也糊涂，不像你这个人很谨慎。”

船离开常州岛，向澳门和香港之间的澳头走，所有的船在澳头都要停下来检查。快到澳头时，有一条船向我们开来，廖根绍在船舱里，我叫：“老廖，老廖！你来看看，那里来了一条海盗船！”

他从船舱里爬上来：“我没看到。”

“你再看！”

他说：“那不是海盗船吗。你见过海盗船吗？”

我说这条船很窄，两边坐的人有三四个，划着桨，我读过小说。这种船叫蜈蚣船，凡是坐蜈蚣船的，就是海盗。廖根绍觉得好笑：“瞎说，你又没真的见过海盗船，从小说里看来的，你不要开玩笑。”

那条船直接向我们这条船驶过来了，廖根绍把他的老婆也从船舱里喊上来看，他的老婆说你听文大哥的，文大哥经验多。廖根绍说：“那条船是干什么的，我也搞不清了，那条船向我们来了嘛。”

蜈蚣船靠近我们的船，铁链子甩过来，把我们的船勾住了，那些海盗手里拿着双筒猎枪，跳上我们的船，不许我们动，谁动就开枪打死谁。海盗把我们的行李抢跑了。不过我事先已经有了警觉，把我的图章，还有一个手表，装在一个袋子里，在后舱掌舵的地方吊在水里面。除了这些东西没有被海盗发现，其余的行

李都被海盗抢跑了。所有搭乘这条渔船的旅客都没有钱物了，有一家人坐在甲板上哭：“哎呀，我们什么都没有啦，我女儿身上有100万港币，被海盗搜到抢跑了，还有一缸子猪油，猪油里面差不多有10斤金子，都给抢跑了，我们是在香港做生意的，现在家产都没有了。”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想了一会，我悄悄向廖根绍讲：“让你的妻子出来，求求海盗，对着他们哭。”

他问：“哭什么呢？”

我说：“行李里面有条小被子，海里很冷，你的小孩没有小被子，在海里会冻死的，要他们发点慈悲吧，把小被子还给我们。”

他妻子就跑到海盗面前跪下哭：“我的小孩子才一岁多，海上这样冷，你们连个小被子都不给他呀，在海上会冻死。”海盗把小被子挑出来，用手搓了一顿，看看没有藏什么东西，就把小被子甩过来了。

船经过澳头，到了澳门，我们上了岸，坐在海边上，都在那里哭，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我跟廖根绍讲：“这里的情况你最熟悉，你做点工作吧，你们五个人，加上我们六个人。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住一晚吧。”他说我们又没行李，又没钱，怎么找地方住呢？

我说：“你找个小一点的客栈，今天晚上过一夜再说吧。”

他就不去，一分钱也没有啦，再小的客栈也不让住啊。我一看廖根绍坐在海边垂头丧气，就喊廖根绍的妻子：“你叫点饭来，我们从昨天到今天还没有吃饭呢，小孩子饿得哇哇哇地哭，不吃点东西不行哪。从客栈搞一点饭菜来。”廖根绍的妻子找到一家小客栈，叫来饭，没想到，大家一吃，越吃越饿，越吃越多，我说：“再去叫一点饭来吧。”廖根绍闷着头什么都不吃，他说：“你光顾吃，谁付钱哪？”

我说：“你这个人哪，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我把廖大嫂叫

来，说：“我为什么要你跪在海盗那里哭啊？那个小被子里我放了有50块大洋，你把被子拿过来拆了，把账付了，今天晚上我们还可以开两间房间，还有地方住，一切事情到明天再说。”

她一拆小被子，把50块大洋拆出来了，说：“文大哥你这个人，神仙一样。”

我们住了一晚，一切开销过后，钱还多出来一些，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放在廖大嫂手里头，节省一点来花，我又喊廖大嫂：“你把我这件夹衣下面拆开，我在这里面还藏有一百多块钱的表链子，这个表链子，也交给你，你不要告诉廖根绍，他又抽烟又喝酒，吃不了几天100元又没了。”廖大嫂说：“你这个人怎么跟变戏法一样，被子里也有钱，衣服里还藏着金链子，你这个人什么都是有准备的呀。”

我对廖根绍讲：“我们两个人对澳门的情况不熟悉，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朱执信纪念馆吧，我们看看那里有报纸没有，了解一些情况，也许能想点办法。”朱执信是孙中山身边最有名的一个秘书，澳门有他的纪念馆。我和廖根绍找到朱执信纪念馆一问，他们给了几份报纸，我一看，都是几个月以前的报纸。

我说：“你们这里还有人管事没有啊？”

纪念馆的人问我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从香港逃难来的。”

“我们纪念馆也没有钱救济你们哪。”

我和廖根绍在朱执信纪念馆东张西望，四处看看。忽然，跑过来一个人，给我敬了一个军礼！我一下子也慌了，在这个地方怎么有个人给我敬礼呀？这个人叫我主任，我想，他叫我主任，是我当教导团主任时候的人吧？我又恐怕他是日本人的什么间谍，就说：“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要叫我主任。”

这个人说：“主任，你说笑话吧，我是俞作柏先生的警卫，在教导团你教过我的书，你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你姓文，你叫文强，我赶紧捂住他的嘴：“你小一点声音，小一点声音。”廖根

文

强

①

①

①

①

绍在一旁看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跑得好远好远的，不见影子了。

我说：“你给俞作柏先生当过警卫，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我是广东人。”

我问：“你怎么到澳门来了呢？”

“那个时候，我还当过大队长，上海方面让我去杀汉奸，结果汉奸没有杀成，反倒把我们带队的人抓跑了，我们没地方去了，往老家逃吧，就逃到这个地方了。”

我又问：“那你怎么生活啊？”

他说：“我在这里做事，还有点收入，主任你大概很困难吧，我可以救济你，你信不信得过我呀？”

我说我可以信得过你，他就把他住的地方告诉我，还告诉我：“我住的那个房子，安电铃安不起，我吊了个铃子，安了一个钩钩，你一晃那个钩钩，里面就听得着，里面也有个铃子。我回家去看一看，我妻子快要生小孩子了。”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就瞎说一气，说我住在澳门中央酒店。

他问：“中央酒店几号房间呢？”

“住楼下2号房间。”

他说：“我回家一趟，就来看你，暂时告退。”我一想，人家拿一份诚意对我，我也没有住到什么酒店，又没有那个房间，瞎说一顿，我是在逃难，太对人家不住了。这时，我到处找廖根绍，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后来，看见那个俞作柏的警卫走了，廖根绍又跑回来了，问：“那是个什么人哪。”

“是我的部下，姓梁，叫梁东华。”

“他找你干什么啊？”

我说，这个人很有用呀，他从上海逃到这里，结了婚，他的妻子要生小孩了，他还可以救我们，要离开这个澳门，他还有办法送我们。

廖根绍说：“你不要信他的，我看他是日本人的间谍。”

“你瞎说，你不认识他，你瞎说干什么？”我说：“我现在感

到内疚，他留个地址给我，我留个地址给他，我那个地址是假的。我看，现在赶快到他家里去看看他。”

我身上还有点零钱，就叫了一辆洋车，按照梁东华留给我的地址，找到地方，果然门上吊着个铃子。我一拽铃子，出来一个女的，我一看那个女的肚皮，是要生小孩子了，看来梁东华没有骗我。那个女的请我进去，我问：“你认识梁东华吧？”她说：“是啊，是啊，这里住的是梁东华，我的丈夫是你的学生，他说今天来了个长官。”

我想，一点都没有说假话啊。“他现在到哪里去啦？”

“他回来跟我见了面之后，说是到中央酒店看老师去了。”

“哎呀”，我说，“糟糕了！你这里到中央酒店有多远呢？”

“没有好远，过一条横街就是。那里有个赌场。”

我拔腿就往中央酒店跑。刚跑到酒店的门口，我就看见梁东华出来了，他没有看到我，很不高兴的样子，我上前拉拉他，小声说：“小梁哪，刚才很对不住你，我们是逃难来的，我们五六个人住在一个地方，不好告诉你，我说的中央酒店一楼多少号，都是假的。”

他说：“是啊，一楼是个赌场，根本没有什么房间号的，我跑到楼上到处去找。”“唉，那是我骗你的，所以我马上赶来，向你道歉。”

他上上下下把我看了一通，说：“老师，我们去吃碗面条吧，有话到那里谈。”我们吃面条的时候，他问我住在什么地方？说：“明天10点我再来看你，你要脱离这个危险地方哪，我可以救你。不过有一点，我的妻子就在这两三天要生小孩，假如她要生小孩，我就来不了了，那我就恐怕要一个礼拜以后再来看你。”

我说：“那好吧，你如果有情况，就不要来了。”

第二天，我就一直等，等到10点钟，梁东华没有来，廖根绍把我骂了一顿：“你老是相信人家，你晓得他是个什么人呢？该不是日本人派的间谍？你自投罗网！”

我说：“你这个人哪，他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嘛，我马上到他那里去看看。”我又搭车到他住的地方，一拉铃子，出来一个小娘姨，拿着一个棉包，还带着一些吃的东西，我问：“你是不是梁太太家请来的一个小娘姨？”

小娘姨觉得有些奇怪：“你是什么人啊？是不是他们讲的你 是他们的长官？”

“是的。”

她说：“梁先生昨天晚上到医院去了，太太生小孩了。”

我想了想，问：“你现在到医院里去吗？”

“我去送东西给太太吃，再送床被子去。”

“那我跟你一道去。”

我跟小娘姨一起到了医院里，梁东华看到我很高兴，说：“你这个老师，我还没有去看你，你这样快就来看我。”

我说：“这位小大姐告诉我，你的夫人已经生了小孩啦，我应该来祝贺嘛，所以我来了，带了点小小的礼物，带了5元港币作为见面礼，送给你夫人和小孩。”

“你在困难当中，怎么还给我送礼物啊！”他说：“可能再住三天，我的妻子就可以回家了，把她安顿了之后，我再来跟老师计划，把你们如何送出去。”

过了三天，梁东华到我们这里来了，他说：“我要救你的办法要通过石基（石基就是孙中山出生的地方），到了石基这个地方，才可以走出澳门。还要有日本人的良民证，没那个良民证也通不过，办良民证还要验大便，看有没有传染病，还要有个照片，你们6个人都要照片。”

我们只好去照照片吧。梁东华给我们办了良民证，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陪着我们一道离开澳门。他说：“我在这里走私，把乡下的土特产送到城里来卖，做生意，我的生活就是靠这个钱，你们也可以这样办嘛。”梁东华把我们送到安全的地方，给我们指路说：“从这里一转过去，是江门，江门就是梁启超的家乡，到那里要坐小火轮，到三部，三部是个三不管的

地方，日本人也管不了，国民党也管不了，汉奸也管不了，你们就平安了。”他又说：“我晓得你没有钱，我给你带了100块大洋先应急吧！”

我对他说：“你送到此为止。我账面上还有点钱，你送给我100块钱大洋，我送你300块钱。”

他很惊讶：“你怎么还有钱呢？”

我说：“我在澳门会了一个从重庆来的朋友，他借了1000块钱给我。我可以送300块钱给你。”他无论如何不要，说你们的路还长呢。我说：“到了这个三不管的地界我就不怕了，我就回重庆去了。”梁东华把我的钱拿上后，我对他讲：“我告诉你，澳门不是久留之地，日本人如果晓得你是我们部队里出来的，你就没有活命，我希望你带着你的妻子、小娘姨、小孩到韶关，我介绍一个长官跟你认识，你拿着我的信，他们就可以保护你，还可以把你送到后方。这是一条生路啊。”

一年以后，梁东华拿着我的信一直跑到重庆，我在重庆见到他了。他说：“你这个长官真是太好了。”现在，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了。

从香港、澳门逃回来，我到了柳州，柳州是第四战区的司令部，张发奎在那里，张发奎一看到我，高兴得很。他听我讲了逃难的情况，就说：“我给你准备了1万块钱路费，我派一个处长送你到桂林，我已经打电报给蒋委员长，说你已经脱险了，你到重庆后委员长就要召见你。他急需了解香港各方面的情况。”

桂林有一个大酒店，叫做光华大酒店，我住在这里，一天晚上，杜月笙派了一个徒弟来找我。他说，杜老板知道你到桂林了，送你1万块钱做旅费。我说我的旅费已经够了。张发奎司令长官已经送给我1万块钱了。

我从桂林坐飞机回到了重庆。逃难三个月，终于回到重庆。

戴笠知道我要到重庆，就派人到飞机场接我。我刚下飞机，就碰到那个海军中将陈策的干儿子，我说：“你怎么到飞机场

文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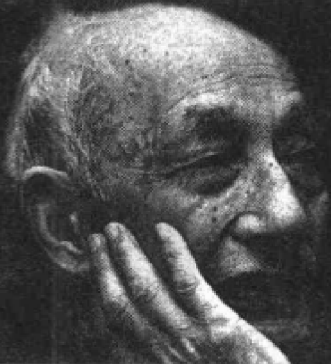
田

迷

田

迷

了？”他说：“我干爹今天下午从烟台到重庆，我来接他的，我没想到把老师也接到了。”陈策的这个干儿子姓徐名亨，是黄浦第四期毕业的，陈策当广州警备司令时，他是上尉参谋，调到重庆训练，是我的学生。后来他到了台湾，是台湾省体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第十八章 辗转进山

- 戴笠对毛人凤说：“邀念观兄到曾家岩戴公馆赴宴。”
- 戴笠又随手塞给我一张纸条，发给我特别费1万元，又叫副官挑了一支马牌三号左轮手枪送给我。
- 蒋介石指着宋美龄介绍：“这是夫人。”我敬了个礼，喊了声“师母”。
- 在二十七军补充团长饶石夫部队的掩护下，夜间渡过黄河，通过日本人的三道封锁线，进入了太行山区。自重庆辗转入太行山之行，竟然历时10个月。

1942年春，我在珍珠港事变后从港澳逃回重庆，正是戴笠做了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不久，原定我为湖南省缉私处处长，不料，在宣布我为缉私处处长的这一天，毛人凤请我到渝舍吃饭，席间，毛人凤突然对我说：“戴老板深知你这次不避艰险地自海外归来，早内定你到湖南主持缉私处，但目前华北局势复杂而紧张，必须加强对孙殿英部的工作，在本局高级官员中，以吾兄担任这项作为最适宜。”毛人凤问我意向如何，我几乎什么都没有想，马上表示个人没有什么打算，只要是工作需要，一切听从安排。毛人凤听了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当时军统里认为各省缉私处长一职，是难得的美差肥缺，为此明争暗斗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毛人凤很高兴，不等散席，就用电话报告了戴笠，戴笠对毛人凤说：“邀念观兄到曾家岩戴公馆赴宴。”

第二天，我到了曾家岩戴公馆。席间，除了戴笠，还有人事处长龚仙舫，情报处长何芝园，电讯处长魏大铭等人。戴笠说：“念观兄，你不愧校长的学生，我已签报加委你为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这次要到太行山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华北局势很复杂，孙殿英、庞炳勋是两个很难对付的老狐狸，尤其是孙殿英，很狡诈。我与他之间，是拈香拜把的特别关系，又有胡宗南的嫡系部队在山上，现在派你去，我就放心了。”

接着，毛人凤，龚仙舫、何芝园谈到一些军统组织在华北遭受日伪打击而整个垮台的情况，要我此去恢复组织，在太行山成立军统局华北办事处。

我有些糊涂，问戴笠：“这次我去太行山最主要的任务是

什么？”

戴笠想了一下，说：“刚才人凤、仙舫他们说到恢复本局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固然重要，但若对孙、庞控制不了，不能利用他们开展敌后工作，华北工作是打不开的。校长指示，在中条山区沦陷、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不利形势下，太行山成为华北惟一的敌后根据地，必须稳稳地控制住孙、庞两部，配合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才能确保山区为我军所用，否则，必将被共产党吃光，黄河以北无我军立足之地，则中原地区旦夕可危。你的主要任务是要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太行山这个惟一根据地确保不落人日寇和八路之手，这样才能在国际上说得起话。”

我听完戴笠的话，大概戴笠察觉我面有难色，为了打气，在饭后又向我说：“校长在一两天内要召见你，不要穿西装，穿中山装，或军便服都可以。”戴笠又随手塞给我一张纸条，发给我特别费1万元，又叫副官挑了一支马牌三号左轮手枪送给我。毛人凤在一旁看了，向我说：“老文，老板待你可以说是特别厚爱了。”我刚从上海、香港、澳门死里逃生回来，又要到那么复杂的环境里去，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为了见蒋介石，我在重庆观音岩中央饭店里，几乎整天都不敢出门，等了两天，到第三天中午，戴笠坐车接我到曾家岩去见蒋介石。戴笠笑着说：“服装不错。对校长说话要简明扼要，有问就答。”

我们先在蒋介石的特工室登记，然后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坐在当中，旁边坐着宋美龄，有个青年参谋站在蒋介石身后，手里拿着个记录本。蒋介石指着宋美龄介绍：“这是夫人。”我敬了个礼，喊了声“师母”。

蒋介石问：“四期的？”

“四期政治科。”

蒋介石叫我们坐，我和戴笠在他对面坐下。蒋介石很客气，说：“雨农向我报告得很详细，你在上海几进几出，很辛苦，你给雨农先生的电报我都看到了，我记得你电报里有这样一句话：

‘为国牺牲，义无反顾。’你从‘八·一三’起到现在，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黄浦学生里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只有你一个，很辛苦啦。”

我站起来答道：“为国尽忠，应该做到的。”我说：“我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蒋介石说：“我看到了，写得很好。简单明了。有些是我过去不知道的。看了你的报告，全部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关于香港沦陷的情况，你写得很详细。对于珍珠港事件，我们太大意了，当时我们这里也破译了日本的电报，但是美国人英国人不相信，搞成这个样子，教训哪。”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的第四天，香港的钞票就不让用了，只能用日本钞票，看来日本人准备得非常周全。”我把香港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蒋介石说：“你这次回来的工作，雨衣想让你到湖南去当缉私处处长，我改变了，你是研究日本问题的，要搞远一点，你到西北去，帮助胡先生（胡宗南），在西北遥看日本问题。我告诉你，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为止，香港失掉了，新加坡失掉了，马尼拉失掉了，美国把珍珠港也失掉了。而且我们送给英美的情报都是你整理出来的，英国人想不到美国人也想不到，他们会吃亏，后悔不及。总结一句，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很高。中美英苏这四大国里面，现在把我们中国摆在第一位，我们是控制日本人的主力啊。日本人在滇缅路，有四百多万人，是日本人的主力，如果没有我们的军队上滇缅路，没有美国的武器帮助我们，连印度都失掉了，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失掉了。”

蒋介石又说：“还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呢？美国的石油从印度修一条油管，一直修到缅甸，一直修到云南，这是历来没有的事，这样一来，我们打破日本对我们的封锁，它对我封锁不住了。这样相对地，把我们的国际地位提得很高。可是，中国在西北方面有大祸，大祸临头啊。”

我不明白蒋介石在说什么问题，问：“西北方面大祸临头是

怎么回事呢？”

蒋介石说：“开罗会议决定要俄国人帮助中国，这样俄国就出兵东北，看起来俄国出兵是件好事，实际上是一场大祸，搞得我们新疆也没有啦。蒙古也没有啦。俄国人在旅顺港驻军，还把中东铁路控制住，我们使用这条铁路，还要通过俄国那个顾问团。俄国充分暴露了大俄罗斯主义，利用东北为它服务。你想想，国家要出大祸的。”

蒋介石向我布置任务：“胡宗南就在西安，你在他那里设立一个机构，遥看对日本的问题。你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你到第八战区去，胡宗南会给你安排好的。你从胡宗南那里再到太行山，将来要到东北，现在看来很明显，日本问题已经快要结束了，日本人垮了，俄国人起来了。你的任务要对付俄国人，你从太行山起一直到东北，要就专门对付俄国人。”

当时，我不知道蒋介石讲这些话给我听干什么，只是感到自己的任务非常重大。

“你这次去华北的任务，比在海外也许还要困难一些，要注意与党、政、军、团各方面通力合作来对付华北的复杂局面。我要说的话，已经向戴副局长说过，你知道吗？”蒋介石问。

我答：“戴副局长已经将委员长的指示详细向我说过，为确保太行山敌后根据地，要以控制孙庞两部为主要任务。”

我起身告辞时，蒋介石问：“家眷安置好了没有？子女上学了没有？”

那时我妻子周敦婉在成都去世，葛世明照管着小孩，但是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回答：“安置好，上学了。”

见过蒋介石后，戴笠催我马上动身。临行前戴笠交给我两封他的亲笔信，一封加盖火漆密封给胡宗南，一封敞着口给蒋鼎文，还有一本密电码本给庞炳勋。

动身那天，毛人凤、连谋、余乐醒、杨清植等送我到珊瑚坝飞机场。

到太行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飞到兰州改乘西兰公路

文

强

①

②

③

④

的汽车到西安停留一些日子，再坐闯关车到洛阳，到洛阳后，还要等军统局派的随行人员到达，才说得上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的事。

说来也不顺，第一天，已经飞到了天水上空，不料天气突变，飞机上都结了冰，凑凑合合飞了一整天，不得已返回重庆。第二天，我又到飞机场，毛人凤等再到机场送行。飞到秦岭上空，天气竟然和昨天一样恶劣，飞机只好再度折回重庆。第三天，我和送行的毛人凤等都失去了信心，上飞机前，我向送行的朋友们说：“如果飞机再返回，我决不惊动你们了，送行已经送够了，谨此辞谢。”

第三天，总算飞到了兰州。我在兰州特警训练班（兰州铁桥头西北特务养成所）住下。一些军统朋友来会我，他们向我谈了不少西北的情况。我在兰州停留了一个礼拜后，坐了两天的长途汽车，到了西安。

我在西安住在玄枫桥甲十四号戴笠的公馆，里面住的还有西安军统负责人王鸿骏和他的老婆。在王鸿骏的陪同下，我拿着戴笠的加盖火漆密封信，见到了胡宗南。胡宗南对我说：“老同学，校长派你到太行山是好事。你在西安多住些日子，同我身边的幕僚多认识认识，为进入太行山做些准备。”

胡宗南说：“我帮助你在这里建立第八战区调查统计室，你是少将主任。你在这里住两个月，一切准备好了以后，你就到洛阳，洛阳属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你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关系搞好，然后你就到太行山，现在华北只有太行山这块地方还在我们手里头了。”

当晚，胡宗南请我和王鸿骏到胡公馆进餐。席间，在座的还有参谋长罗泽凯、战干团教育长蒋坚忍、陕西省耀县专区专员梁干乔、政治部主任顾希平等。胡宗南向诸位介绍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要诸位多多与我谈有关西北和太行山的情况。

一连好多天，胡宗南都给我安排得满满的，要我到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战干团、游击干部班、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等单

位去讲话，胡宗南还经常问我一些问题，如“上海、香港、澳门沦陷后的情况”，如“你对抗日的前途是乐观呢还是悲观”，还有“对国共合作前途有什么看法”等等。有一天深夜，我和胡宗南谈话后回到戴公馆，王鸿骏还在等着我，见我回来，说：“老兄到西安一个月了，连背影都难见到，真是大忙人，也是大红人啊。”

我把心事也就端了出来：“要去太行山就赶紧去太行山，要留在西安就留在西安，现在这算是怎么回事？”

“胡戴不分家嘛。胡长官和戴老板两个人在干部的任用上，常常是互相在暗中考察的。胡手下的干部，要送戴处考察，戴认为忠实可靠，才调回任用或者留在戴处工作，戴手下的干部，要经过胡的考察后，才调回戴处。”王鸿骏指着自已说：“别看我在西北多年，我也是经过考察的。老兄不必性急，既来之则安之，反正你是有前途的。”王鸿骏的一番话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禁想起戴笠的那封加盖火漆密信，不知道信上说的究竟是什么。

从1942年3月到西安，一直到6月，我在西安呆了很长时间。戴笠从重庆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到洛阳城里办事处开始工作。我想，是不是考察结束了？

胡宗南对我说：“雨衣催你先去洛阳再到山区去。由范汉杰率领的二十七军在太岳区，正准备对付日本人的夏季扫荡。这次日本人扫荡，不但是对中央部队的考验，也是对庞炳勋、孙殿英的考验。校长规定的任务你是知道的。如果到了山上有困难，随时打电报给我。”

出发前，胡宗南为我饯行，给我一个联络的密码本。

到洛阳要坐“闯关车”。当时，陇海铁路从潼关到宝鸡的一段，有日本人隔河炮击，火车必须在夜间悄悄闯过去，所以叫“闯关车”。我因为没有去过洛阳，就请在天主教会活动的军统人员李敦宗同行。

洛阳是蒋军的重镇之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就设在这里。

司令长官蒋鼎文总揽了华北的党、政、军大权。蒋鼎文跟我还有一层特别的关系：他是黄埔的老师，我是黄埔的学生。

到了洛阳，我在洛都饭店住下。第二天，带着戴笠的那封敞口信到长官部见蒋鼎文。

蒋鼎文看完信，把信递给我让我看，我犹犹豫豫接过信，我现在还记得信的内容：“铭公老师钧鉴：兹奉委座批示，派文强同学为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前往太行山展开敌后工作，并切实达成联络我敌后作战部队的任务，谨函介谒，请赐指导。俾有遵循。”

蒋鼎文说：“雨农一个月前有电报给我，说你去太行山的任务重要，太行山遭大旱，日本人乘机扫荡，根据近期战报，胡宗南的基本部队溃不成军，军长范汉杰落荒而逃，竟然不如孙殿英、庞炳勋杂牌部队经得起拖。但是庞炳勋刚愎自用，特别是孙殿英狡诈多变，内部暗藏有共产党八路军分子，已经被发现的都被禁烟或者被赶走。艾经武（黄埔第四期），是我让他接替俞庸任游击纵队司令，不想他也经不起扫荡，投降作了汉奸。真是太丢人了！山上如果不好好整顿一番，将来不是日本人的天下，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委员长要确保华北这一敌后惟一根据地的决策是英明的。”

蒋鼎文让机要秘书周心万介绍我跟参谋长董英斌、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荫梧和冀察鲁豫四省的高级官员联系。

8月底，我正准备进入太行山区，忽然接到戴笠的电报，要我参加会审军统负责人赵理君活埋豫东专区专员韦名芳以及洛阳复旦中学教职员五人的案子。我为此在洛阳又耽搁了两个多月。

11月初，戴笠到西安主持缉私干部训练班的毕业仪式，我就又到西安向戴笠汇报了赵理君活埋人一案的调查结果，并汇报了北渡前的准备工作。直到12月初，蒋鼎文派二十七军补充团长饶石夫部队掩护我，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渡过黄河，通过日本人的三道封锁线，进入了太行山区。自重庆辗转入太行山之行，竟然历时10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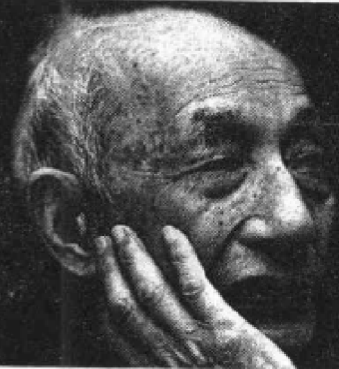
1942年的太行山，蒋军根据地遭到日本人的夏季扫荡，虽然经过半年的整顿，仍然异常混乱。胡宗南把中央军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调回西安，派刘进接任正军长，李蓬仙接任副军长，另调胡长青的第四十五师和陈孝强的预备第八师入山。

我进山后先到二十七军根据地陵川，在军统局派驻太岳区的晋东南站站长乔家才的陪同下，与刘进见了面。

刘进很客气：“你是老大哥，黄埔第四期的。”

我从刘进的口中得知山上的情况确实很复杂。蒋军对待八路军是如临大敌，划地为界，严密封锁；庞炳勋、孙殿英这两支杂牌仇视中央嫡系部队刘进的二十七军；同在山上，几乎不相往来；胡长青和陈孝强的眼中只有胡宗南而没有刘进。刘进捶胸顿足，大发牢骚说胡宗南把他推到烂刺堆里。他可能想到我一定会向重庆汇报，又言不由衷地说了些效忠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类的话。

刘进与我约好密码，以便随时联系。我怕军用电台万一有失，又与乔家才约好密码，如果一部电台出了问题，还有一部电台可以联络。我在陵川住了三四天后，前往孙殿英的驻扎地林县临淇镇。



第十九章 结识孙殿英

- 孙殿英见到戴笠倒头便拜，连连说：“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割下耳朵，今日难得见面，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
- 驮袋中装的都是大饼，每张大饼里还夹着一张钞票，孙殿英一路上是逢人就撒，副官还一边喊着：“这是孙大爷孙老殿给你们的。”
- 庞炳勋对我说：“孙麻子多变，是山上之患，并非山上之福，我指挥不了他。”
- 孙殿英说：“每年初九有这天，我要亲自传道，向徒弟们撒一手，要钱的有钱，要烟土的有烟土，要官的有官，要女人的有女人。”

我未见孙殿英之前，戴笠就向我说起过孙殿英。戴笠在执行蒋介石“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密令时，同刘健群一道去天津租界与孙殿英见面，发现孙殿英所关心的事，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找靠山。回到北平后，戴笠撇开刘健群，另作去天津见孙的准备。戴笠说：他找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亲笔介绍信，又找到孙殿英的好朋友，北方著名的政客张璧（张玉衡）和洪帮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到天津。戴笠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住下，摆出很大的派头，请孙殿英在饭店见面。孙殿英知道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一见面倒头便拜，连连说：“上次相见，有眼不识泰山，实在罪过，我们同在江湖上闯荡，只要蒋委员长用得着我，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割下耳朵，今日难得见面，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笠当时收下，回南京后交给了蒋介石。

有一次，孙殿英向戴笠派在平汉路活动的张振武、徐静远两人表示，要面见戴笠，有要事相商。戴笠得到报告后知道孙殿英有求于他，觉得正是可利用的机会，就打电报请孙殿英到武汉见面。孙殿英带了大批的礼物到汉口法租界戴笠的住处，吹嘘自己有万余条人枪，而且还可以召集旧部数万，或者抗日，或者打八路，凭他闯江湖的本领，总不会落到石友三（石汉章）的后面。谈话之后，戴笠和孙殿英还拈香拜了把兄弟，孙殿英年长为兄，戴笠年少为弟。戴笠聘孙殿英为“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是戴笠、杜月笙、杨虎等搞起来的统一的帮会组织，名义上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实际上归戴笠操纵）。

更为重要的是，戴笠引见孙殿英见了蒋介石。

进入太行山，我第一次见孙殿英的那天上午，进了一个院子，只见孙殿英在院子里的影壁前，抬起头注视着影壁上悬挂的一把用红绸裹着的宝剑，左右两边站着几个穿长袍的彪形大汉，低着头听孙殿英讲话。孙殿英的副官对我说：“孙大爷正在传道，请稍等候。他已经知道高参要来，一大早就我们要准备好了茶点水果。”副官的话还没有说完，孙殿英一眼看见了我，几步过来好像老朋友似地搀着我的胳膊，大声说：“高参老弟，昨晚就知道你要来，我一早就等着欢迎你。雨农是我的把兄弟，你来了就和雨农弟来了一样。”

孙殿英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那次到武汉得雨农弟的保引，亲自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了四五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正视。委员长向我说：‘你的情形戴科长向我说明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何部长扩编你的部队为一个暂编军的番号。’当我听到扩编为一个军的番号，立即站起来谢恩，又经过几次叫坐，我才坐下去问了一句：‘今后还有啥要指点的？’委员长瞪着眼睛把我从头到尾瞧了一遍，然后慢吞吞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大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这一下，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立即站起来倒身便拜，我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我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农盟过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委员长叫一个参谋把我扶起来，改变了刚才严肃的面容，笑着连声说了几声好好好。第二天见了何部长，果然让我当了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若不是雨农老弟拉我一把，我怎么能今天啊。文高参，以后仰仗的地方很多，请进请进。”

走进一间大厅堂，孙殿英请我在一张大红漆桌旁坐下。我看见一张长条案的正中，摆着镜框镶着的蒋介石的大照片，照片左

边放着蒋介石亲笔信的影印件，这封信是孙殿英手下的一个副师长靖任秋从重庆受训回部队时，蒋介石亲笔写给孙殿英的。孙殿英指着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对我说：“一年前有人在洛阳告发我的副军长邢肇堂和副师长靖任秋是共产党，庞老总（当时庞炳勋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归庞炳勋指挥）乘机找我的麻烦，说我养共产党想造反，我是一个老粗，哪里分得清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只好把靖任秋先抓起来再说，邢肇堂得到风声，带着副官和勤务兵跑掉了。庞老总非说是我把邢肇堂放跑了，三尺土上有神明，欺骗长官要遭雷劈的，我孙殿英一生不做这样狗屁倒灶的事情。可恨的是靖任秋，我让他到重庆受训，谁想他是共产党。这次高参老弟到山上来，好啊，如果发现我这里有不顺眼的人，该杀该刚，你说一句话，我照办，还望高参老弟见着庞老总，或者给重庆、洛阳去电时，为我美言。”我呢，也就顺着说了几句如果山上有什么困难，愿意尽力等的恭维话。当晚，孙殿英摆开盛大宴席为我接风洗尘。

在孙殿英的房间里，挂着一把宝剑，用红绸子包着。我问：“这是个什么宝剑哪？”

“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

“噢？”我有些惊讶：“乾隆皇帝的宝剑？我看看可以吗？”

“哎呀，老弟，你不必看，我这个剑骗不了你，你们哪，又是孙中山先生，又是蒋介石先生，又是黄埔学生，又是军事委员会高参，来头大得很，骗不了的。我孙殿英是个老粗，我手下当兵的是老粗，当官的也是老粗，他们到我这里来，我让他，向宝剑磕头。”

我还追问：“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嘛？我看看，看看。”

“哎呀”，孙殿英说，“算了吧，乾隆的宝剑我能挂在这里吗？挂在这里还不让人家偷跑了？你不必看了，这是不值钱的一把剑。”

我问他：“我没有过黄河之前，中央汇来三笔款，是伪钞，都汇给你了，你收到没有？”

“收到了，收到了，我记的有账。”

我说：“我带来了一个会计科长，明天他来对账。今天就不多谈了。”

孙殿英找了一个地主的院子给我做办事处，第二天，他来看我，送了一瓶酒，一只羊，一些肉。我带的会计科长等着对账，我对孙殿英说：“把你的军需科长找来吧。”

他说：“我的事情不要他管，和我对账就行了。”

我问：“账本呢？”

孙殿英不在乎的样子：“有什么账本啊？我在墙上划些道道。”我一看，墙上很多道子，这是划的什么东西啊？

孙殿英说：“你们看不懂的，这是我做的记号。”会计科长和他对账，他对着墙上的记号说，一点都不错。我想这个人的脑子厉害啊。

不久，春节快到了。我建议孙殿英一起到庞炳勋总部，借拜年的机会联络一下，也许能消除隔阂。孙殿英表示同意：“庞老总一向对我有看法，这次我们一道去拜个吉利年，也许他的心眼能改变一些吧。”孙殿英的手下与庞炳勋处通了电话，讲了前去拜年的意思，庞炳勋的参谋处长兼机要秘书刘泽圃来电话，表示非常欢迎，约定大年初二前往。孙殿英有点意料之外地说：“难得难得，庞老总一毛不拔，最怕客人去吃掉他的办公费。”

大年初二我们出发时，只见孙殿英带了一个卫士排，二十多匹骡马和大包小包的驮袋，我觉很奇怪。上路后，我才发现驮袋中装的都是大饼，每张大饼里还夹着一张钞票，孙殿英一路上是逢人就撒，副官还一边喊着：“这是孙大爷孙老殿给你们们的。”

我惊讶：“山上是不是有这样的风俗？”

孙殿英大笑：“我孙老殿要抗日救国，不能不要老百姓，连年大旱，老百姓哪里还有大饼吃，老弟，老殿是苦出身，不能忘本。”

“我懂我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驮袋中有几大包是送给庞炳勋的礼物，其中还有孙殿英亲手制的海洛因鸦片烟的混合

膏子。

到了庞炳勋的彭城镇总部，我和孙殿英住在招待所里。趁孙殿英不在的时候庞炳勋对我说：“孙麻子多变，是山上之患，并非山上之福，我指挥不了他，也制服不了他。孙麻子有奶便是娘，一肚子鬼谁也猜不透，前途如何就看委员长的福泽了。”

庞炳勋向我讲了一些情况，我发现孙殿英和庞炳勋都很嫉妒驻在陵川的刘进二十七军，庞炳勋说二十七军是中央军有爹有娘，控制了晋东南自古就有粮仓的太岳地区，不给我们两个杂牌子军放粮。如果日本人一扫荡，我们就会不攻自溃。

我和孙殿英在庞炳勋的招待所同住一屋，没有事的时候就东拉西扯。一天，孙殿英的副官送来一叠公文，孙殿英自己不识字，当时秘书李国安（李国安是南京汪精卫的办事处处长，是前线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是个很坏的家伙）不在屋子里，孙殿英就让我给他念公文，他闭着眼睛听。我一份一份念给孙殿英听，其中有一份是唐佑樾（蒋介石派在孙殿英身边的政治部主任）从洛阳来的电报，说他携带的大批礼物和现金，在洛阳和重庆分送给一些军政大员，后面附有这些军政大员的名单，我记得有在重庆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次长林蔚等等，在洛阳的有第一战区参谋长董英斌等等，唐佑樾在电报中请求加发现款数十万，“以相机择要分赠，等到将来大事有成，不愁没人出来说话”。我感到这个被蒋介石派来的唐佑樾已经被孙殿英收买了，不知道“等到将来大事有成，不愁没人出来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对孙殿英说电报上的字不太好认，要看一遍再念，我又将这封电报看了一遍，顺手翻到一叠公文的最下面，故意不念，在孙殿英要我喝口水吃点水果的时候，我趁机溜了出去。

初五，下起了大雪，山路很不好走，庞炳勋也再三挽留，于是我们又呆了下来。初七，孙殿英说：“明天就是下枪下炮，我也非回去不可。不瞒你说，初九是我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

“初九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日子啊？”

“老弟，我有一个‘庙会道’，几十年来闯江湖就靠它。每年

初九这天，我要亲自传道，向徒弟们撒一手，要钱的有钱，要烟土的有烟土，要官的有官，要女人的有女人，有徒弟不远千里而来赶‘庙会道’，我不能叫他们失望。我孙老殿之所以垮不了，就是靠这些人捧台。”

我开玩笑：“老哥的‘庙会道’收不收我这个徒弟呀？今天晚上你就为我传道好不好？”

“老弟，甭胡扯了，我这一套只能骗骗老憨，还能骗上你嘛？骗不了读书人，得了吧，不要拿我开心。”

我们一直胡扯到深夜才睡。第二天一早，孙殿英先打道回府，我又在庞炳勋总部呆了四天才离开。

后来（1943年3月2日），我和孙殿英一起再到庞炳勋总部的时候，又是同住一炕。晚上孙殿英硬把我推醒，要聊天。我们两个人披衣坐在热炕上，孙殿英问：“老弟，你知道我一生最得意的是啥时候？”

我说：“听说你在西北军做过总指挥，还做过安徽省主席，在张汉卿指挥下当过长城抗战的英雄，现在你是新五军军长，是不是最得意的时候啦？”

孙殿英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说的这些，算啥鸟？什么总指挥，什么省主席，几乎死在日本人手里，就说现在，不是雨农担着，还有什么鸟军长呢？告诉你，我孙老殿一生最得意的时候，是当年包运五省鸦片烟。那时打着我的旗号，华北五省无关不通，连外国人的洋码头，我都打通了。”

我有些好奇：“你是怎么打通五省关卡？”

“老弟，钱可通神哪。包运五省鸦片时，我撒人出去，摸清各个关卡的大小头目，先拣大头目送钱送土，再一层一层地，都送到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沿途送到了北京天津，一本万利，除了能把送出去的收回来，还能大捞上它一把。我们是不等人家开口，主动上门，烟土未到，钱先到，既打通了关卡，又交了朋友。他们都说孙老殿是江湖好汉，够朋友，其实没有钱，哪来的朋友！”

“你又是怎样打通洋码头的呢？”

“中国人要钱，外国人更要钱。中国人要小钱，外国人要大钱。有钱没有什么打不通的。”

我从孙殿英嘴里得知，上海租界的烟赌娼三大财源被青帮的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包干了，根本没有孙殿英插脚的地方。孙殿英终于通过天津租界一个帮会头目与黄金荣搭上了线，先是互赠名片，不久黄金荣汇来十万块钱，托孙殿英买烟土运往上海。孙殿英认为这是打通上海洋码头的机会，就把这十万块钱退还给黄金荣，自己掏钱给黄金荣买了十万元烟土，亲自押运到上海，亲自送上黄金荣的门。果然，孙殿英不但与黄金荣交上了朋友，他的烟土也在上海洋码头畅通无阻，就连他自制的“殿英牌”海洛因也在上海销得不错。

那天晚上在炕头，孙殿英说得高兴，又对我说起他盗墓的事情。他说：“满清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我要报仇。怎么报仇？我枪杆子没有几枝，只能蹦皇帝陵，革命革命，我是革死人的命。吴稚晖在北京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说我盗墓，把风潮闹得很大。不管盗墓不盗墓，我是对得起祖宗的。”

孙殿英说乾隆皇帝的墓和慈禧太后的墓是用炸药炸开的，他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经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很多，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时送给他作了见面礼。还有一把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雨农怎么处理的，我没有再问。慈禧太后的墓炸开后，墓堂不如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要多得多，老佛爷从头到脚一身穿挂的都是宝石，量一量大概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我托雨农赠给宋子文院长了。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之后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间可以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以使尸体不化，难怪老佛爷的棺材劈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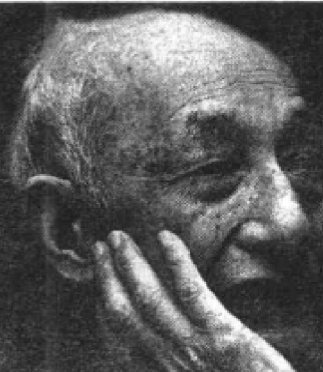
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见了风之后，脸上才有些发黑。我把这颗夜明珠托雨农赠给蒋夫人。宋院长和蒋夫人得到宝物后，孔祥熙夫妇眼红了，我接到雨农的电告后，就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那九龙剑，究竟是送给了委员长还是送给了何部长，我现在还不明白，高参老弟有顺便时代我打听，也不必当面问雨农，不然，显得我小气，拜托拜托。”

孙殿英又说：“老弟，你知道蒋委员长一生做的是哪两件大事呢？你们是委员长的贴心人物，应该比我知道得透。”他这样一说，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看着他。

孙殿英看我发愣，很得意地大喊：“老殿把你难住了吧。”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他得意地说：“老弟，在我看来，蒋委员长做的两件大事，一是怎样把钱挣来，二是怎样把钱撒出去。钱挣来不易，撒出去更不易。我平日向徒弟们说三句话：‘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钱要撒得呱呱叫。有钱不会撒，不行！冯焕章、张汉卿，广西的李白，广东的陈济棠，先先后后垮了台，不都是因为委员长的钱撒得好嘛？人家说孔、宋是财神，我看他们不过只是管管账，撒钱是有本事的。老弟，我这都是一辈子闯江湖得来的窍门呀，我这一生，被人耍过，也要过人。”



第二十章 周旋三军间

- 我发现山上的国民党三个主力军队——庞炳勋的四十军，胡宗南手下刘进的二十七军，孙殿英的新五军，互相不和。
- 劝刘进放粮下山，三军共济。
- 我们成立一个三军粮食问题委员会，让庞炳勋当主任委员，刘进跟孙殿英当副主任委员。
- 军事委员会上，制定了“对日防共”的作战方案。

我到了太行山，发现山上的国民党三个主力军队——庞炳勋的四十军，胡宗南手下刘进的二十七军，孙殿英的新五军，这三个军队，互相不和，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再有，1943年到1944年间，河南省发生大旱，山上没有粮食，粮食被控制在晋东南，晋东南有11个县归刘进的二十七军管。我跟庞炳勋、孙殿英交换过意见，他们在粮食问题上倒是意见一致，说我们山上的粮食在刘进的手里，没有粮食我们怎么打仗呢？认为要确保敌后根据地，关键在于刘进放粮，而且，他们把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当着庞炳勋的面，发电到洛阳、西安、重庆，想借大帽子压压刘进。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在1943年2月中旬，又一次到了陵川，对太岳区产粮及被二十七军囤积奇居等做了一番调查。

见到刘进，我先不提粮食问题，谈一些如何团结孙、庞，如何防止八路军扩大游击区等等。

刘进说，在他的防区内，与日本人，与八路军画地而守倒也相安无事。面临的情况是，从各方的情报判断，今春日本人必定入山扫荡，如何对付，还没有把握。

我说：“日本人在山西、山东、河北境内调集了几十万人来扫荡哪，山上搞成这个样子，这个仗不好打。”

刘进很关心孙、庞是否有决心对付日本人的扫荡，我就趁机说：“如果二十七军控制粮食不放，孙、庞大有可能兴师抢粮。”劝刘进放粮下山，三军共济。

刘进直叫屈：“洛阳、西安、重庆都来电责备我垄断贪污粮

食，实在是天大的冤枉。请你去电代我洗白。”

我问：“你把粮食弄到哪去了？军队没有粮食吃，老百姓也没有粮食吃，怎么打仗呢？”他说：“晋东南11个县的粮食都归我控制着。”

“你怎么不发下去呢？”

刘进说：“要拿钱买啊，粮食是老百姓的，把粮食发下去，这钱谁给呀？找到我头上啊？我也不敢放啊。”

“你说的有道理呀。”我对刘进说：“你们三支部队里，孙殿英是靠不住的，他随时会投敌，他一投敌，就影响庞炳勋。他们两个人都投敌了，靠着你这一个军，那这个太行山又怎么办呢？不把粮食解决了。这个仗也不好打。”

刘进语气缓和多了，说：“我知道有两个部下很不好，贪污粮食。”

我说：“你这个省里面是不是有个秘书长呢？这个人很贪，打着你这个军长的名义，把太行山的土特产都抢在他手里，运过黄河去卖掉了。”

“噢？”刘进说：“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我说：“你们太行山出的那个党参，很贵的，那个秘书长的楼上啊，都盛满了。人家跟我讲，搞不好党参会把他住的房子压垮的！”

刘进马上说：“检查，检查他的楼！”

我说：“你知道这回事就行了，不要盲动，一来他不承认，二来就是检查出来，他说把党参运过黄河，卖点钱，是为了抗战。盲目就去搜查，这个不对，你要搞清楚再说嘛。”

没过几天，刘进真的去调查那个秘书长，查实之后，就把秘书长关押起来，把那些土特产退给老百姓。我对刘进讲：“这个问题是解决了，我主要跟你讲讲怎么解决粮食问题。”

他说：“我没办法，没办法解决。没钱！”

我说：“这样，我们成立一个三军粮食问题委员会，让庞炳勋当主任委员，你跟孙殿英两个人当副主任委员。这太行山有18

个县归河南管，那里有个行政监察专员，姓张，叫张炳森，这个人后来是办教育的，我认识他，让他也参加粮食委员会。”

“噢？”刘进说：“这个办法好啊，成立一个粮食委员会。不过，让那个行政监察专员也参加干什么呢？”

“筹钱。”我说。

“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我把办法告诉你，第一，你们二十七军是国家的军队，国家让你们打仗，要有一笔钱给你呀。你这里有一笔粮款，把这笔钱扣出来，就可以买粮食呀。我打个电报，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这笔钱扣下来，这样，粮食的钱就有点着落了。那个张炳森参加干什么呢？他管22个县啊，要他找地主和条件好一点的，要他们出钱，拿钱出来专门解决老百姓的粮食。”

他说：“你这个办法很好啊，问题就是孙殿英，他可能不但不给钱，还要捣乱，跟日本人勾结一道。”

我表示：“孙殿英我慢慢对付，我有办法制服他。”

刘进就高兴了。我说：“你高兴了？你同我一道走。到庞炳勋那里去，办这个事情，你是个军长，他是个集团军总司令，由你提出来，请他报告，组织一个粮食委员会，以你们三个军为主，张炳森也参加，你一提出来，庞炳勋就好说了，你这个军长是负责的，粮食在你手里嘛。这个人情你去做，我不做这个人情。”

刘进及副军长李蓬仙跟我一道到了庞炳勋住的彭城镇总部，把孙殿英也找来了，庞炳勋指挥的四十四军军长马法五来了，那个行政监察专员张炳森也到了，刘进提出来成立粮食委员会，他们几个人都说这个办法好啊。刘进说：“我们已经打电报给长官部，买粮的钱在长官部手里。”

庞炳勋任粮食委员会的名誉主委；刘进任副主委，负实际责任；孙殿英自告奋勇要多负一些责任，于是又让孙殿英为副主委。

我又提出一个办法：“今年联合国得知河南河北遭了大灾，救济中国的粮食有十多亿。我们马上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来解决，我们要2亿，要河南省把这笔钱拿出来，现在抗战是第一嘛。”

他们高兴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我说：“你们没有注意，报纸上都登了。”

成立粮食委员会，他们几个人说：“你是委员长派来的，又负责与胡长官那里联系，你也要加入粮食委员会，你也是委员会的一个委员。”

“你们要我加入，我就加入嘛，我在太行山，起码要有两年的时间。可以！”我答应了。

他们说：“你现在是粮食委员会委员，在你这里还要加两个字：粮食委员会的监察委员，你不属于哪个军，也不属于河南，你是代表国民政府的。”会上，孙殿英提议马法五用照相机为大家拍照留念。

蒋鼎文来电批准由兵站总监部拨款1000万元，蒋介石也来电，准在河南省赈济款项下挪用1.5亿，所差之数由三个军和地方分垫。

粮款基本筹足之后。孙殿英建议召开军事委员会，在会上，制定了“对日防共”的作战方案。当时，日本人要扫清黄河北岸的蒋军，所以这个方案的重点是确保根据地，粉碎日军的企图，歼灭日军有生力量的一部或大部。对八路军则仍然采取隔离封锁的方针。

孙殿英说三军首脑聚在一起不容易，要求把指定的作战方案，每个军发一份，由军长亲自带回去密存，大家没有异议，就都照办了。

庞炳勋主持的军事会议结束后，刘进回陵川，派副军长李蓬仙到孙殿英的住处联络感情，孙殿英与刘进约定，待李蓬仙访问完，他自己亲自到刘进总部回访；庞炳勋派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作代表，到孙殿英总部做答访。

我在离开庞炳勋总部的前一夜，庞炳勋跟我一直谈到深夜，还不肯让我回招待所。我看庞炳勋好像有什么心事，有话不好说的样子，就催着庞炳勋把心里话说出来。庞炳勋迟疑了一会儿，还没有张嘴，先流泪了。

庞炳勋流着眼泪说：“我深受国恩，身兼要职（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省主席），委员长待我，可谓仁至义尽。委员长指示确保华北根据地，这个重任我是万死不辞地来干。但是山上形势复杂，你来山上时间不长，恐怕还不完全知道底细，孙麻子没有一天不在盘算着篡夺我的军权和我的主席一职，他门道多，暗地里勾结日本人，又与八路军通气。还有二十七军的刘进，是胡宗南长官派到山上另有任务的（指监视孙、庞两支杂牌军），哪里瞧得上我这把老骨头！”

庞炳勋拿出一封信递给我，我一看，是刘伯承将军写给他的一封信，他说：“这封信讲的是共同抗日，实际上是要对付我们蒋军，如果八路军全力对付我，我拿出四十军也是难以敌过的。我对这封信不理睬，也不能让外人知道，请你将此信迅速呈给蒋长官（蒋鼎文）或委员长，以证我心。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我决不辜负委员长之重托。”

我拿上这封信，庞炳勋送我回招待所，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一再说：“你再到陵川刘进那里去一趟，山上的好坏，就取决于粮食问题是否顺利解决了。”

粮食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来了潞王坟会议事件。

就在我准备起身到陵川刘进总部去的前两天，接到蒋鼎文的电报，说日军安田大佐在太行山下面平汉铁路旁边的潞王坟车站举行了和谈会议，孙殿英派李国安到会，庞炳勋派王有正参加，汪精卫也派人参加。来电要我查清此事速报。

我找来我身边的情报科长一起研究，综合了来自汤阴的情报和新五军军部传出来的情报，发现潞王坟车站会议确有其事，孙殿英、庞炳勋派去参会代表的名单也大约不差。和谈会议开了一整天，主要内容是拥护汪精卫“和平反共救国”的主张，孙殿英

的代表李国安在会上很为活跃。

我想起当初到临淇镇见孙殿英不几日，他就向我介绍了他的机要秘书李国安，李国安是军统平津军事流动情报组长，现在李国安竟成为潞王坟车站会议中最活跃的一员。我觉得这事很蹊跷，决心把潞王坟会议之谜搞清楚。

蒋鼎文得到我的复查报告后，认为事态紧急，便直接电请庞炳勋调查有无派代表出席潞王坟车站会议的事情，电报中有这样的话：“吾兄为党国柱石，大义凛然，向所钦敬，诚恐为奸逆所乘，至污清白，弟不信有此事，空穴来风，有不得不深虑及之……”庞炳勋接电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给我来电话，大声地说他冤枉，要我即日去他的总部一趟。我放下电话，马上骑马赶去，我刚刚走到临淇镇上，遇到了孙殿英把我拦住，说有急事要和我谈。

我摸不清孙殿英找我干什么，就假装说，我正要找他商量到刘进总部去的日期，孙殿英急急地说：“三天之内就去”，一边非得让我到他总部去不可，一边苦着脸说，“老弟，你得到情报了没有，天大的冤枉哪，新乡、洛阳都传开了，日本人在潞王坟车站召开会议，竟说有我和庞老总的代表参加。我派驻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来电报，说蒋长官为了这件事，好几天睡不着觉。老弟，这件事关系太大了，我决不会做这种丢人的事。庞老总可就不同，他平时口口声声称硬骨头，这次恐怕硬不起来，听说这次他派代表王有正（总部专跑新乡的采买）参加了日本人的议和会议，我看他打击马法五，一个劲地提拔刘世荣（四十军副军长）这个干儿子。庞蹙子平日嘴里说得硬，骨头不硬。我孙老殿倒霉就倒在他的名下。潞王坟会议，十有八九是他抖出来的花样。我看你责任重大，不可不注意，以我和雨衣的关系，我也不能不提醒你。”

孙殿英拽着我到了他的住处，他拍着桌子大骂庞蹙子连累了他，害得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我问：“照老哥的意思，如何是好？”

孙殿英看了我好一会儿，说：“老弟，说句心里话，你对我的话相信不相信？如果相信，就赶快上报，你还得去庞鳖子那里去一趟，外面已经闹翻了天，他还在假装正经，你给他指破，看这老鬼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正不知说什么好，听了这话，趁机赶紧脱身，到庞炳勋总部去。

在路上，接连有两批庞炳勋的骑兵来接我，看得出庞炳勋心里很着急。我到达庞炳勋总部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庞炳勋在深夜还等着我，看到我来，把身边的卫士和参谋支了出去，拿出蒋鼎文的电报给我看，说：“日本人在潞王坟车站捣鬼，准是孙殿英在山上牵的线。”他说完，看着我，大概是想等我说什么。我只好东拉西扯地再把山上的复杂情况和粮食问题说了一遍，并不提潞王坟会议的事情。庞炳勋听得有些不耐烦，打断我的话，把话题又扯回孙殿英身上：“高参，我告诉你，一个月以前，在我的防地上发现了可疑的奸细，被哨兵捉到了三个，当时哨兵审问他们，其中一个闭口不言，我怀疑是日本人，在把奸细带回审讯的路上，三个奸细被埋伏的武装劫走了。那些埋伏的武装穿着和我军一样的服装，却没有符号，他们带着那三个奸细向孙殿英新五军的防区逃走了。后来，在四十军的防地上，又出现过拿着新五军证件的情报人员，以联络为名，暗中测绘地形，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孙麻子在捣鬼嘛？这件事，我一直压在心里，没有与外人谈过，也严禁部下泄露出去，我看潞王坟会议可能是孙麻子早有预谋。”

天快亮了，庞炳勋是越说越有精神，我很困了，想赶紧结束谈话，就打断庞炳勋的谈话问：“庞长官这次叫我来有何指示？”

庞炳勋说：“你说得客气了。这样吧，能否叫剑东一道来谈谈？”

“行啊。”剑东是张宝树的别号，张宝树任河北省党部书记长，是康泽组织的头目之一。我想，把张宝树找来，一定有什么文章。

当时，张宝树在太行山上，名义是河北省党部书记长，实际上整天为庞炳勋抄写中央通讯社发布的新闻广播稿，抄好后还要誊正，还要给庞炳勋念，忙忙碌碌的。我记得庞炳勋把他叫来的时候，他红着一双睡眼，手里拿着一份抄好的广播稿件，糊里糊涂地不知道庞炳勋找他来干什么。

我催庞炳勋有话快说。庞炳勋这才说：“孙麻子看来不可靠，粮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前，山上将难保。”庞炳勋要我和张宝树一道火速上报洛阳、重庆，表示“忠心爱国”，“万一根据地不保，我要以死报国。至于对孙殿英如何处置，听上面指示”。庞炳勋说自己本身处在嫌疑之中，不敢擅自作主张。之后，庞炳勋又让张宝树第二天到洛阳、重庆面报。

我赶忙表示遵照庞长官的意图给洛阳、重庆方面拍电报，并答应写两封信托张宝树带到洛阳交蒋鼎文，庞炳勋松了一口气，大声喊叫吃早饭。下午，庞炳勋又设宴招待我。开宴前，我做了一首诗赠给庞炳勋：

燕山早勒纪碑文，虎帐威仪太岳闻。
饮马长城规北阙，万方俯首服将军。

我回到孙殿英总部，又和孙殿英一起到了刘进总部。孙殿英的这次行动，又是大量的驮马。

刘进准备好了机关招待所，招待孙殿英和我，还有四十军、地方行政单位等，大吃大喝，开流水席，每次都是几十桌。席间，大大小小几十个单位，名片到处递，都是想求见长官的。我问刘进：“山上这些不三不四的游击队头目，与粮食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大肆招待呢？”

刘进说：“山上与平原有所不同，我军与八路军防地犬牙交错，正规部队不够使用，游击队用途就大了。既可用于封锁隔离，又可多制造一些麻烦，让八路军睡不好觉。你看，这些人都是地头蛇，吃掉点喝掉点，又算什么！”

孙殿英直咂嘴：“刘建一（刘进的别号）气魄不小，不愧是胡长官的正牌子军长。”

我们到达陵川的第二天，刘进以为副军长李蓬仙补行就职典礼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刘进一再请孙殿英在阅兵式上讲话，孙殿英也不客气，大大咧咧地说：“今天是李副军长就职的好日子。我孙麻子是老粗，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大道理你们的军长都讲过了，用不着我再讲，我就不讲了！”说完敬了一个礼，逗得台下官兵哈哈直笑。典礼后，又是大规模的宴会，摆下百多桌。

我们在陵川的情况，竟然在新乡出版的一家汉奸报纸上登出来，醒目的大标题是：“孙殿英偕同挺进第八纵队司令文强到陵川有所图谋（我任军事委员会高参的同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当时我并不知道消息是怎样传出去的，后来从孙殿英的机要秘书李国安口中得知，当时有日伪特务的电台在山上，侦探我们方方面面的情况。

我和孙殿英这次到陵川刘进总部，主要还是为了解决山上的粮食问题。但孙殿英有所图谋，我当时没有察觉。

1943年4月，日本人扫荡太行山时，我身边的会计主任熊杰在突围时被捕，被孙殿英保释从太原回来之后对我说：“太原日本驻屯军师团长水清，在扫荡之前就勾结了孙殿英，孙殿英这次到陵川，日本人为他准备了两千万元华北伪联钞，作为收买刘进之用。而且告诉孙殿英，钱要暗送，不要明送。日本人的计划是，切断二十七军后方补给联络线，使刘进成为孤军，最后被迫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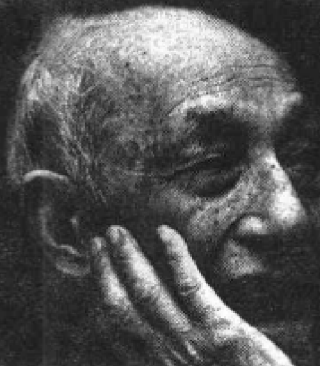
听熊杰这样一说，我想起孙殿英到陵川时，那么多的驮马，驮的可能就是大批钞票。孙殿英从陵川返回自己驻地临淇镇的路上，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购办粮食的款项，是不成问题的，要多少有多少，洛阳、重庆的拨款一分不到也没有关系，我已经交给建一（刘进）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由他支配。我还送了刘进太太相当数目的见面礼。”我听了这话，觉得挺突然，问孙老

殿送给刘进的购粮款到底有多少，他就是不说具体数目，一会说属于新五军应垫粮款之内，一会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在日本人扫荡中被俘的军统头目陈仙洲和所率领的平汉北段爆破总队，也被孙殿英保释出来回到洛阳，陈仙洲对我说了当时在陵川的一个情况：孙殿英瞒着我，与刘进拜了把兄弟，暗中送给刘进一笔巨款，送给刘进大老婆二百多万伪联钞和古董之类的贵重物品。

我和孙殿英在陵川住了一个礼拜，看来孙殿英和刘进的关系搞得不错。这时，日本人扫荡太行山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而山上这三军的情况是，刘进认为二十七军与新五军之间，已经由仇视、隔阂变成了互通往来，以前范汉杰在山上打不开的局面，被他打开了，觉得很自慰，庞炳勋对孙殿英是既怀疑又害怕，无形中，刘进和庞炳勋都听孙殿英的，都看孙殿英的颜色。

山上三军的粮食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日本人的扫荡提前开始了。



第二十一章 生死太行

- 日本人调集了三个师团到五个师团的兵力，大约20万人，集结在太行山麓。
- 走到太行山山口寺院的时候，发现山口已经被日本人占领。
- 我身边的三个卫士也被炸死了。
- 大家饿极了，把十几棵山楂树的树叶都吃光了。

1943年4月15日前后，日本人调集了三个师团到五个师团的兵力，大约20万人，集结在太行山麓，严密封锁铁路和公路，沿着两年前在山上筑起的封锁墙封锁了山上的路，计划将孙庞刘三部切成三段，重重包围。日本人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的周密部署，在21日拂晓，开始了分进合击的攻势。战斗打响的当天，我随孙殿英的新五军驻临淇镇。

刘进部胡长青一个师被冲散，陈孝强率领的预备队八师，一个不漏地投了降，投降后被编为汪精卫的警卫师。刘进陷人重围，日本的水清师团长亲自到山上，双方约定不带武器和武装卫士，在陵川东南的一个高地上见了面。水清劝刘进投降，刘进犹疑不决，水清大怒，下令日军冲上高地，刘进在混乱中侥幸逃走了。

我把刘进的情况向胡宗南口头汇报，胡宗南大骂刘进上了孙殿英的当，贪小利而误人事，没有骨头，但因为委员长要留着孙殿英和庞炳勋走“曲线救国”的路，只好对刘进也宽容一些。胡宗南特地嘱咐我：“严守秘密，不可向外人道。”但从此以后，刘进在胡宗南的门下只好坐冷板凳。

刘进的队伍垮了，孙殿英的部队还在那里跟日本人打，实际上是做个架势。孙殿英对我讲：“文高参哪，你多发几个电报到重庆，到洛阳一战区，现在山上就靠我这个部队在这里打。唉，山上的情况你也不了解，日本人抓到你我就没有活命了。”我表示：“对对对。我给你拍几个电报出去。”

20日中午，临淇镇的上空出现了日本人的机群，前后三次盘旋侦察，这是日本人开始攻击的信号。下午，我把带到山上的军

统华北办事处工作人员分成两大组，第一组让宋波、孙义珍率领，携带一部电台，准备一个月的粮食物资，潜伏在临淇镇的北山上。第二组由我率领，准备与孙殿英一同行动。因为戒备孙殿英，我对第一组去北山潜伏绝对保密。

我派人在新五军通到前方的军用电话线上搭了一个耳机，随时可以监听孙殿英、参谋长冯养田与前方部队的通话，以掌握新五军防地前方作战情况，还可以与蒋介石派在新五军中的政工人员联络。

这时，新五军政治部主任唐佑樾给我介绍了政治部的一个科长李守静，要我向军统保荐李守静作情报组长。唐佑樾是蒋介石派到新五军来的，但是早就被孙殿英收买了。唐佑樾没有电台，又舍不得在政工经费项下开支特种用途，在得到孙殿英的同意后，就把李守静介绍给我。李守静与我见面时，也极力表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使中央和山上的联系不中断。我将计就计，向军统局去电，保荐李守静为新五军随军组长，按上校级待遇，该组所领的电台经费，也按照军统局规定办理。

21日拂晓，日本轰炸机群在临淇镇上空扫射和轰炸一通，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对孙殿英指挥部一点没有惊动。就在前四天，孙殿英的机要秘书李国安曾经向我领取活动经费，带着电台到平津地区去建组，可是他忽然在21日战斗打响这一天回来了。我正在对李国安突然回来疑惑不解，孙殿英派来两个卫士骑马到我住的北河沿村找我，要我立即到军部去，并带上随行的所有人员随军部行动。

我带着第一组成员到了军部，孙殿英见我来了，说：“接到岗塔口刘月亭师长的电话，刘率部与日本兵拼刺刀，打退敌人几次冲锋，活捉了一个日本小队长和几十个日本兵。日本人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次给他们颜色看看。”其实，我已经从监听电话中得知，孙老殿在电话中指示刘月亭等人不要抵抗，对空放枪，向预备阵地撤退，并且告诉他们李国安已经回来，李已然接上了头等等。孙殿英说了一番假话，还要我上报洛阳、重庆，我也就记

下来，拟好电报稿发出去。

接着，孙殿英把李国安叫来，李国安又编了一套假话，说他在去平津的路上，在汤阴车站被日本人扣留，花了一笔活动费才脱险回来。孙殿英在一旁很赞赏地说：“李秘书很机警，密码没有被日本人搜出来，电台也托人转移走了。花了点活动费算什么，算在我名下好了。”

孙殿英对我说：军部位置目标太大，为了避免日本人轰炸，今天午后必须转移。他说：“离镇不到10华里有个关帝庙，很隐蔽，军部连同老弟带领的中央人员都可以在关帝庙宿营，只要与军部副官主任王志刚接上头，吃的喝的都不成问题。”

孙殿英一副不满的样子：“山上刚刚打响，庞老总彭城镇的电话怎么也叫不通，与二十七军也无法联络上，我早就跟庞老总说过，一条线路靠不住，要多架一条，他不听。我看线路一定是出了问题，不是有人故意破坏，就是被汉奸割断了。庞老总向来只顾自己，日本人在潞王坟车站开会他派代表参加，又到处打电报洗清自己。这不，山上刚刚打响，他的电话就不通了，怎么指挥三军哪？老弟，你对庞老总有过怀疑没有？”

孙殿英一边说着，我忽然想起在山上打响的前一天晚上，孙殿英在离临淇镇不远的山上挖了一个大坑，活埋了十多个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被活埋的都是些什么人。当时想起这件事，我有些毛骨悚然，不知说些什么才能对付孙老殿，只好应付着说：“要防止日汪破坏山上的团结。华北敌后这块惟一的根据地如果不保，你我都是有责任的。庞老总电话不通，赶快派人去联络，总部和我们这里只有五六十华里，骑马半天就可以打来回；同时检修线路，限时接通。”

“老弟，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孙殿英急急地说，“我对庞老总没有成见，电话不通我也着急，我已经派了参谋去庞老总驻地，一早就出发了，到现在中午过了还没有回来，是不是路上出事了？”话好像还没有说完，孙老殿忽然急急地一头钻到一间小屋里去，大概是烟瘾犯了吧。

趁这个空隙，我赶到新迁的驻地作些应变的准备，把锅灶埋起来，装好干粮袋，规定夜间联络的办法等等。这时，孙老殿派一个参谋送来一些编造的“前方捷报”，要我发往洛阳、重庆。我在这些“捷报”上批了“限一小时译发”的字样，要参谋回去交差，实际上，我与译电员约好，凡是有关捷报一类的电稿，没有签署我的别号（念观）的，一律不发。

同时，我收到庞炳勋和刘进的分别来电，意思都是山上刚刚打响，电话线就遭到破坏，无法修复，看来山上隐藏的汉奸不少，要我设法扫清这些暗藏的汉奸。庞炳勋的来电，是他在这次太行山战役中的第一次来电，也是最后一次来电。

我和孙殿英在关帝庙里过夜。日本人没有夜袭，孙殿英和参谋长基本上没有与前方通话，夜显得很静。孙殿英一会儿给我送水果，一会儿给我送点心。我的心里反而很不踏实。

天亮了，这是22日拂晓。日本人的飞机又开始在上空盘旋，我赶忙从行军床上起来。看见飞机在关帝庙前面的空地上，低空投下了几大包宣传品。我的副官捡起一包交给我，我正要打开看，忽然孙老殿的副官连喊带叫地举着一包已经拆开的宣传品，说：“军长请高参看完，马上去军部一同进早餐，有要事相商。”

我接过宣传品看，是一份通电，标题是：“孙殿英将军通电拥护和平反共救国主张，战地率部起义，弃暗投明。”另有两份的大意是：如果庞炳勋、刘进、马法五三将军效法孙殿英将军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大日本皇军化敌为友，不加讨伐。凡持此敦劝书来投降者，一律优待，保证生命安全，保证财产不受损失。我又打开我的副官交给我的一包，里面除了宣传品，还有一些放大的照片，照片左右印着字，一边是“和平救国”，一边是“弃暗投明”。其中一张照片正是我们在庞炳勋彭城镇总部成立粮食委员会时，马法五照的那张，庞炳勋站在中间，刘进、孙殿英一左一右站在两边，马法五和我站在他们旁边，日本人在照片上每一个人的下面都注上了姓名、职务。我很奇怪，我们的照片怎么会跑到日本人手里？我有些怀疑孙老殿，当初他提议我们一起照

相，是不是就别有用心？

我见到孙殿英时，把日本人飞机投下来的宣传品和照片往他面前一放，我还没有说什么，他就拍着胸膛说：“老弟，天大的冤枉，日本人通电说我拥护和平，弃暗投明，这不是日汪捣的鬼，就是庞夔子捣的鬼。老弟，我对你说过多少遍，庞夔子一肚子鬼，根本就靠不住，你看，这张照片，不是马赧虞（马法五的别号）给我们照的吗？不是庞夔子捣的鬼，照片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难道照片长了翅膀自己飞去不成？庞夔子骗得了你老弟，骗得了洛阳、骗得了重庆，骗不了我！我在江湖上闯荡了一辈子，这次被庞夔子把我推下粪坑了。老弟，你火速向上面报明此事，不然，我就是和鬼子拼死在山上，也闭不上眼睛哪！”

我说：“日本人投下来的东西，不可全信。这张照片，确实是马法五给我们照的那张。马法五洗好照片后，又写了亲笔信，送给我一份，你的那份交给了李国安。可是李国安后来说，夜间从彭城镇回军部的途中，骑马时丢了一个背包，里面有两封信，可能还有照片。这些情况你是不是了解？”

孙殿英愣了一会儿，勉强地说：“你不提，我倒忘了，信和照片的事我追问过，确实是李秘书在马上弄丢的。年轻人毛里毛躁的，我教训过他。难道被日本人拾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哎，照片的底版在马法五手里，日本人不可能捡到一张照片就能放大的。哼，我看是庞夔子捣的鬼，连阎老西都跳不过我的手心，庞夔子这一套，还能瞒得过我？”

我不想扯这件事，扯也扯不清楚，还是说眼前的事：“假如敌人今天逼近临淇镇，军部要不要转移？部队的弹药给养能支持多少天？与庞老总的联络问题怎么解决？”

孙殿英不说话，一边看地图，一边摆弄牙牌。过了一会儿，他取出一本金钱课占了一卦，好一会儿，才慢慢腾腾地说：“老弟，你念念这一卦是怎么说的？我奇怪，孙老殿平时对卦辞早就背得滚瓜烂熟，干吗让我念卦辞？我一看卦辞，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忽闻楚歌，一败涂地”。

孙老殿掐了一下诸葛马前的神课说：“两次都打在空方上，我看今天过得去，明天过不去。我占卦很灵的。老弟，你刚才问我的那些，往后看情况再说。粮食弹药十天半个月没有问题，你到山上不久，人生地不熟，安心吃喝吧，安全问题，有我担着。”

22日，我们在关帝庙呆了一天，庞炳勋那边的情况仍然不了解，孙殿英部队节节后退。我从窃听电话中得知的情況判断，孙殿英并没有和日军交战。下午二三点钟，日军机群在北山头盘旋侦察，但是对孙殿英军部原址和现在住的关帝庙始终没有轰炸过。孙殿英派人到镇上挨家挨户对老百姓说，前方有部队顶着，你们不要跑。

晚上，孙殿英找我说：“今天的损失很大，比他在长城抗日时的损失还要大。刘月亭真不简单，他带领的庙会道众徒，符法护身，以一当十，到底比普通穿二尺半的强。”

我问：“北山头发现炮声，恐怕敌人已经抄到我们的后路，今晚军部是否转移？”

“我找你来，就是商量转移的事情。军部今晚7时向西移动，靠拢总部。不管庞蹙子搞什么鬼，我还是要靠拢总部，免得他骂我不仁不义。我们宿营的具体地点，等摸清总部的位置再定。”

我又问：“出去与庞老总联络的参谋回来没有？电话线修复了没有？”

“派出去的参谋还没有回来，电话线看来是修不好了，修了这里又坏那里，就是把通讯排长枪毙了也没有办法。”

过了一会儿，孙殿英又改变了主意：“今天晚上我们不能向西走了。”

向庞炳勋靠拢是向西，他说向东走，我说：“那不行，向西走，我们那里还有庞老总的部队呀，向东走要到平汉路啊，那里都是日本人了，为什么向日本人的那个方向走啊？”

“你不了解山上的情况，如果向西走，日本人已经埋伏在那儿了。只能够向东走。”

我感到这里面有鬼，就把我的人分开一半，向他们布置说：

“你们一部分人带着电台在山上埋伏，我不得不跟孙殿英走，不跟孙殿英走，他马上就可以抓起我，把我送给日本人。”

晚7点，孙殿英命令军部转移。孙殿英骑着大白马，带着卫士排走在前面，要我跟在他的马后面，我的随行人员在军部与特务营中间。我们行至离关帝庙大约30华里的山谷时，突然听见枪声！我怀疑是不是与四十军没有联络上而发生了误会，孙老殿喊道：“大事不好了！可能是日本人进山了！”枪声越来越紧，黑暗中，有人喊：“赶快后退啊，日本鬼子打来了！”队伍顿时乱成一团，只见孙殿英一边拨转马头，一边拼命叫：“文高参，文高参，老弟随我来，老弟随我来！”

他说：“你不要怕，跟着我一道走，有我的生路就有你的生路。”

我应付说：“好好好好，我不怕。”

天黑，他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只觉得他把马一带，另外走一条路。

我小声对我身边的副官说，赶快通知随行人员，一个挨一个地脱离孙殿英的队伍，跟我向南山方向走。我的打算是，先脱离孙殿英的掌握再说。但是，天黑，山路又难走，随行人员跟不上来。

我带着一部分人在山沟里转来转去，一个通宵过去了，还没有到达南山。我清点一下人员，发现才跟上来二十多个，其余的不知去向。

这时，已经是23日拂晓。因为山路不好走，我们弃马步行，想赶到南山隐蔽起来再说。走到太行山山口寺院的时候，发现山口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他们居高临下一顿枪炮，不久日军飞机又向山沟里猛炸，远远地，看见临淇镇飘着太阳旗。到南山已经不可能了，我只好带着二十多个人向北走。

正是谷子成熟的时候，我带着随行人员钻进谷子地里。我看见山上到处都是日本人，我就告诉随行人员：“我们不要动，日本人离我们很远，这里是谷子地，他们不知道我们躲在这里头。蹲到下午，天开始黑了，我们再行动。”

等到黄昏的时候，我们刚刚从谷子地里跑出来，哎，孙殿英的特务营也从谷子地里走出来了，拼命地喊：“文高参，文高参！”

我问：“军长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军长在距这里不到两里地的村子里。昨天晚上哪，找了 you 一晚，找不着你，军长急坏了，差点把我们营长枪毙了。”

我说：“他找我，我也找不着他。”实际上我心里想：怎么又落到孙老殿手里了？

他们说：“找到你们就好了。你们不要多讲话，跟着我们走。”

我到了孙殿英那里，他赶忙让副官王志刚拿出大饼牛肉之类的让我吃，说：“老弟受惊了。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离开我一步呀。昨晚糟糕极了，军部的人跑散了很多，到现在也没有找回来，你的人我倒是收容了二十多个。”

我只好假说我迷失了方向，幸好遇到了特务营。孙老殿说：“有我在，一切不愁，你先休息吧。”远处又传来枪声，我判断是四十军在与日本人打。

很快，日本人从四面包围上来，孙殿英并不抵抗。我正怀疑孙老殿又搞什么鬼，忽然，从我们临时驻扎地的西南方向山头上，响起密集的枪声。

只听孙殿英在外面喊：“陈仙洲的爆破总队没有几个鸟兵，还在山头上打得起劲，名义上归我指挥，谁指挥得了他？快叫文高参出来！”

孙殿英喊：“爆破队不听我的指挥，只有你指挥得了。”

我走到孙殿英身边说：“如果真是陈仙洲的部队，当然要听军长的调遣……”没等我把话说完，孙殿英抢着说：“今天可能过不去了，我们已经处在四面重围中，你赶快让陈仙洲他们不要打了，被日本人发现了目标，我们就更不好办了。”

我按照孙殿英的意思写了一张字条，派人送给隔着两道山沟的陈仙洲。过了一会儿，那边的枪声停了，部队也隐蔽起来了，派去的人回来后交给我陈仙洲的一封复信，陈仙洲要来与我会面。

到我，从马上下来了，说：“部队隐蔽在山沟里，日军已经合围，我们活动的范围不到四五华里，孙殿英的部队已经不打了，竖起了白旗。我们怎么办？”

我悄悄地对陈仙洲说：“孙老殿派李国安去与日本人联络，已经投降了。”我告诉他：“你先不要过这个沟，回到沟上面，我们开个小会。”

我问：“你有多少干粮？”

“干粮可以吃一个礼拜。”

我说：“你的武器里有多少机枪？把机枪调集到最前面，架在山头上，用最强的火力打出去。等太阳落山了，向西南方突围，渡过黄河再说。我这二十多个人跟你一道走。”

陈仙洲按照我的部署，把机关枪放在最前面，日本人冲上来，我们的火力猛啊，把日本人打死了好多，我们冲出去了。

我们走到一个山沟里，日本人派了好几架飞机低飞，扫射，又打死了我们好多人，我的部下好几个都负了伤。打了一阵子，我们冲过这条沟，只听隔着一道沟有人大声喊：“有人看到文高参没有？”我心想坏了，怎么又撞到孙老殿了？我让陈仙洲隔着山沟也大声嚷嚷，以转移目标。我躲在树下，远远地看到孙殿英的卫士排沿着山沟到处喊，还看见孙殿英骑着高头大白马，一边叫喊，一边向东去。

下午5点多钟，四十军的一大队骡马在沟里乱窜，被日军飞机发现，大肆轰炸，把我和陈仙洲集结起来准备突围的部队炸得七零八落，我身边的三个卫士也被炸死了。

我对程贤州说：“你这个部队向南跑，不要管我们了，我就剩这十来个人，趁着黑夜，我们也向南跑。”

后来陈仙洲的队伍没有冲得出去，被日本人都抓去了。

我这十多个人紧跟着向西南方向突围，我一边跑一边想起皮包中还有庞炳勋交给我转送洛阳蒋鼎文的一封信（信是刘伯承将军给庞炳勋的）和密码，我怕落到日本人手里，赶紧把信撕成碎片，让风吹走。

文

文

11

述

11

11

我们冲出日军密集的火力，突过几道山沟，冲出了包围圈。身边的人告诉我：“天亮了。”我说：“白天不能走了，被日本人发现，我们就一个活不了。”身上带的干粮没有办法煮，只好吃生的。很快，干粮没有了。这时，我忽然看见有一排山楂树，树叶刚刚长开，我认识山楂，就高兴地说：“你们看哪，这个树叶可以吃，也没有毒。”大家饿极了，把十几棵山楂树的树叶都吃光了！

24日早上，我们逃到林县西南约60华里的刘庄附近的山头上，我正要派副官去找吃的，忽然听见有小孩的哭声。副官说：“这里一定有老百姓！”我说：“不要去惊动他们，等有人出来了，再接近他们，见见面。”

不久，从远处屋子里出来一个老百姓，他一见我：“哎呀，你是文高参吗？”噢？他认识我？

我答：“我是啊。”

他说：“我是庞炳勋总部的情报部长，我们的队伍打垮了，打乱了，我就带着我的两个老婆，两个小孩隐藏在这个地方。”我记起来了，他叫张懋臣。

他又问：“你们有吃的没有？”

我说：“还有点干粮。”

他说：“你不要急，我这里还有些鸡蛋，还有点吃的。”你们还有多少人哪？”

“11个人。”

张懋臣说这里四面都是日本人，白天黑夜都不能行动，让我们在这里躲藏几天再说。“我让一个窑洞给你们住。”他说：“你们要逃啊，要逃出这个山，山上我全熟，我可以带路逃跑出去。”

我们还带着好多现款，我看张懋臣这个人很好，就拿出2000块钱，塞给他的小孩，藏在小孩的衣领里，他妻子发现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说是钞票，“你们好好藏起来，这2000块钱你们够一辈子用了。我们还有钱。”

张懋臣说：“你们现在逃难的时候，还给我们那么多的钱。”

我说：“不但给你钱，我还有打20发的德国造的小机关枪，送一支给你，但是你不要拿出来，不要使人知道。”我又送了一支枪给他。

我们在张懋臣的窑洞里躲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大雨天，张懋臣把我们向南送到黄河边上。我对张懋臣说：“我过了黄河就有办法。你呢，就留在山里，先察看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南渡黄河后，我打了个电话给长官部，给蒋鼎文司令长官，他亲自接的电话：“哎呀，你回来啦，我们得到的三个消息都不好啊，一个是说你被俘了，一个是说你失踪了，再一个说你阵亡了。现在你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九个人，万幸万幸，噢，高兴，高兴啦，我们在洛阳欢迎你。”

感慨太行山突围，我写下一首诗：

太行山突围

又是纵身沦绝境，感怀涕泪满衣裳。
非为一死关生命，恨少三牲吊国殇。
四面陈尸愁愈结，五更鸣镝苦奔忙。
云山惆怅悲南渡，牛斗星高照远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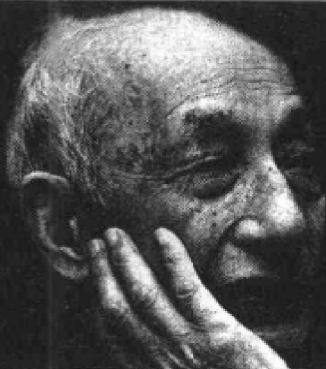
回到洛阳后，我得知了孙殿英和庞炳勋的情况。孙殿英在临淇镇投降日军后，日本人把他送到新乡，并准许他组建“和平反共救国新五军司令部”。在新乡的汉奸报纸上，登出了孙殿英发的和平反共救国的通电，报上还有一篇日本人写的文章，讲述了日军通过李国安策动孙殿英投敌的经过。我在洛阳见到了逃回来的陈仙洲，陈仙洲说，日本人一个月的扫荡结束后，在山上搜索了很多天，不见庞炳勋的踪影，于是大骂孙殿英两面捣鬼，限期孙殿英把庞炳勋交出来。孙殿英也不知道庞炳勋藏到哪里去了，担心马法五把庞炳勋送过了黄河。不几天，孙殿英得到情报，发

现庞炳勋并没有渡过黄河，很有可能还藏在山上。

庞炳勋在日本人切断了三军的联系后，一直藏在离彭城镇总部不到五里的山洞里，随身的有小儿子庞先正、副官和勤务兵等四个人。庞炳勋抽惯了孙殿英制作的掺有海洛因的鸦片烟膏子，所以孙殿英推测庞炳勋在山上最多只能藏一个星期。孙殿英带着李国安和日本特务进山，在彭城镇附近转悠，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庞炳勋的烟瘾犯了，实在熬不过去，派副官化装成老百姓下山到镇上买烟土和吃的，被孙殿英抓个正着。审问出庞炳勋藏身的山洞，孙殿英亲自把烟土和食品送到山洞里去。

庞炳勋在山洞里没有等来副官，却见到孙殿英，破口大骂孙殿英坏了他庞炳勋的名声，要自杀等。但是不久，庞炳勋就半推半就地随孙殿英到了新乡，与孙老殿一起打出了“和平反共救国”的汉奸旗子，日汪要庞炳勋发表广播讲话，用专车把他从新乡送到北平，见了日本的冈村宁次大将和华北的汉奸头目王揖唐等人。在北平不到半个月，庞炳勋又被送到南京，汪精卫封他做“开封绥靖主任”。重庆的蒋介石为了稳住庞炳勋，保留了庞炳勋中央监察委员的头衔，已经不足1000人的四十军残部，也保留和补充起来，戴笠还派了一个情报组带着电台在庞炳勋身边，以随时掌握庞炳勋的动态，孙殿英在一旁眼红：“庞鳖子走了红，越跑官运越亨通。”

孙殿英投降到了新乡后，向日本人提出要求：凡是新五军被俘的官兵，一律遣返。日本人照办了。在新五军招牌的掩护下，很多派上山去的中统、军统人员都被掩护住了，连被俘后已经被押往太原、北平的中统和军统人员，也被孙殿英保释出来。所以这些中统和军统人员大说孙殿英的好话，洛阳、重庆也再三致电孙殿英，表示“嘉慰”。我在洛阳见到蒋鼎文时，他对孙殿英掩护那些中统和军统人员表示很满意，只是洛阳警备司令部、兵站总监部要优待孙殿英部的眷属和新五军留驻洛阳人员。这时，不管是蒋介石，还是蒋鼎文，并不提“确保华北敌后惟一根据地”的事情了。



第二十三章 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退路上

- 戴笠在河南办了个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
- 我走马上任，到了中美合作训练班。
- 我们这个班的美国人有最好的炸药。
- 1945年2月，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改成中美合作所，后来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我回到洛阳后，重庆方面来了一封电报，要我回重庆，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我因为病了，没有马上动身回重庆。这时，戴笠又来了一封电报，说不要我回重庆了，戴笠在河南办了个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有三千多人，其中一千多美国人，戴笠兼第三班主任，让我前去做副主任。

我就照戴笠的意思，不回重庆了。当时，我的妻子周敦婉去世已经三年了，她留下遗嘱，让我跟葛世明结婚。葛世明接到我的电报，带着我和周敦婉的儿子，来到洛阳，我们很简单地结了婚，我就走马上任，到了中美合作训练班。

1944年3月，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4月，日本人又开始了中原扫荡。我带着中美合作训练班正好在汤恩伯十三军防守的地盘。为了安全起见，我给十三军军长通电话，我说：“你把我这个训练班放在你的防线里。”

十三军军长答复：“你这个班有几千人，装备超过我们部队了，比我们一个师的力量还大，不能把你们放在我们防卫的区域里。”

我说：“哎，那不对呀。你不把我们放在防区里，日本人来了把我们吃掉，你要负责呀。你看我们的装备好，就放在你的防区里，我们合作，等于你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

他哈哈大笑：“你愿意跟我合作，那是好事啊。但是，这个仗打起来，日本人一下子就到了这里，我们的部队能不能顶得住还是个问题。”

我想，他这个话很有道理。我就打电报给蒋鼎文，说我们这个训练班还没有放在防区里，我们要赶紧撤退，先到洛川，再从

洛川到豫南，从豫南上公路，向陕西撤退。

不等蒋鼎文回电，我下命令撤退。在撤退的路上，我给蒋鼎文打电话，说我们这个班的美国人有最好的炸药，我们可以做三件事，第一，从郑州到开封，有日本人修的一座公路桥，如果不把公路桥破坏掉，日本人几个晚上就过来了。”

蒋鼎文问：“你有这个力量去破坏吗？”

我说：“你不要担心，我有这个力量，我可以调一千多人去，还有最好的炸药。另外，廖宗策（黄埔四期同学、原中共四川川西特委书记）是第五纵队司令，我可以他作掩护部队。”

果然，我们把公路桥给炸掉了。蒋鼎文来电话说：“你炸掉了公路桥，我们和缓了好几天哪，保住了好几个军没有被消灭。”

我对蒋鼎文说：“日本人坐上汽车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河南边上的公路，这是一个挨打的地方，你为什么把长官部设在这里啊？”

蒋鼎文无可奈何：“我们没有地方撤呀，一撤就到了陕西，那是胡宗南的防区，不让我们进去，再说把我们的指挥部设在陕西也不对头。”

我说：“我有个建议，到长官部的路上有两条河，如果把河上的两座桥炸掉，山上只要有一个师把守，日本人就过不来，即使日本人来了，只要一阻击，就可以保卫长官部的安全。”

“哎，哎，你这个建议很好，可是我没有力量办这个事，部队都调走了，我手里没有部队啊。”

我说：“你这位长官啊，你只要说可不可以这样干？”

他还是那句话：“我没有这个力量。”

“你没有这个力量，我有。”

蒋鼎文很奇怪：“你怎么会有这个力量呢？”

我说：“我班里有三千多人，有最好的炸药，我们还不能把桥炸了吗？再有一个办法，我可以打电报到西安，请胡宗南长官派一个工兵营来协助我们。还有，你部队里的家眷起码好几千人，带着小孩，又没有吃的，都在公路上哭，你长官部不负责把

她们送走啊？让这些家眷死在日本人手里吗？”

蒋鼎文在电话里说：“还有这样的事啊？”

我说：“你在长官部里不知道。还有，第一战区的辎重也撤到这条公路上来了，走也走不动，这不是要归日本人了吗？辎重要赶快撤离，送到西安最好。”

蒋鼎文着急地说：“我又没有车，又没有粮食，又没有部队，怎么运送辎重呢？”

我说：“我班里有四十多部最好的美式汽车，还有粮食，我们负责把家眷们送到西安。”我又给胡宗南打电话，请他再派一个军前来把辎重抢运走。胡宗南很快派来了一个军，军长是黄埔一期的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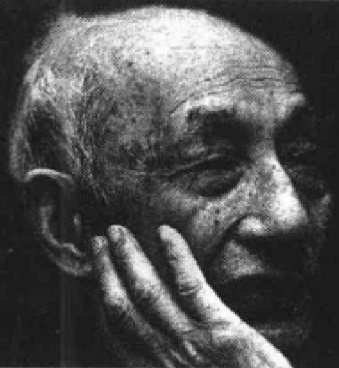
我在公路上的时候，碰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个委员长，号称“中国半个军长”。他的汽车坏了，也没有汽油了。我说：“你的问题我来替你解决。我这个班里还有汽油，送两桶给你。”他说：“发动机也坏了。”我说：“发动机坏了，我班里有人可以修。”一切解决后，把他送走了。

到了商州，我又出了一个主意：“假如日本人追来了，我们要过山，这个山是当年刘邦人关的地方，我们在山上纵深一里路的地方埋好地雷，如果日本人走这里，就把日本人炸掉，再集中火力打。”我们连夜在山上埋地雷，那些美国人干得很高兴。后来日本人没有走这条路，我们自己又把这些地雷炸掉了。

这次撤退，中美合作训练班没有伤亡一个人。

1945年，我调到西安，当北方处处长，这是戴笠搞的军统里最大的机构，管着晋、陕、豫、冀、察、鲁六个省和平津两个市。这时，中美合作训练班还在办，驻扎在西安附近。1945年春天，戴笠带着一个美国海军少将到了西安，到中美合作训练班去视察，戴笠拉着我一道去，说把这个班从河南带出来不容易，一定要我到训教育练班去讲话。

1945年2月，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改成中美合作所，后来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第二十三章 第八战区趣事

- 胡宗南身边的那些共产党直接与周恩来联系，他还打什么仗呢？
- 蒋纬国在第八战区结婚时，胡宗南和戴笠是主婚人。婚礼上，新娘已经大着肚子。
- 蒋纬国坐下来问我：“哎，老大哥啊，胡先生要我布菜，是干什么事情啊？”
- 胡宗南：“赶紧找个裁缝来，给我做一套新的，这身旧衣服不配这个皮带嘛。”

北方局设在西安，西安是第八战区的防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是胡宗南。胡宗南是浙江人，对任何人也不发脾气，从来不骂人，不像戴雨农那样脾气暴躁。胡宗南当了很长时间的小学教员，对人很平和，如果批评部下，也是很轻微地说几句。胡宗南这个人，依我看，是个好人。但是如果作为将官，让他搞个很大局面，他没有那个才干。

胡宗南有30万人，蒋介石信任他，让他封锁延安，可是他对付不了延安。他身边的三个副官，其中两个是共产党，一个是钱啸飞，一个是孙健（后任驻印度大使），胡宗南一点也不知道，还送这两个人到美国留学。他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军需处长是共产党，作战室的参谋也是共产党，他都不知道。所以他的部队还没有出发，延安就一清二楚了，搞得胡宗南30万部队一点用也没有，而且，他身边的那些共产党直接与周恩来联系，胡宗南还打什么仗呢？

蒋纬国在第八战区结婚时，胡宗南和戴笠是主婚人。蒋纬国与石凤翔的女儿石景宜结婚。虽然是婚礼，但石景宜已经大着肚子。石凤翔是个资本家，湖北人，大华纱厂的厂长，在日本留过学。大华纱厂原来在湖北，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到西安。

蒋纬国的婚礼很简单，就是一桌饭，陕西省主席去了，国民党省党部的组织委员去了。举行婚礼前，胡宗南说把自己的公馆让出来，让蒋纬国结婚，但是蒋纬国的岳父不愿意，所以蒋纬国不让他岳父来参加婚礼，搞得他岳父很不高兴，发牢骚说：“我那房子都装饰好了，纬国不用，胡宗南把自己的公馆让出来，他

们在那里结婚，胡宗南这个人怪得很，看不起我。”

我跟蒋纬国岳父石凤翔很要好，我对石老说：“石老啊，你不要说怪话了，胡宗南就是这样的人，他待人很真实，很有礼貌，他喊出一个口号‘抗日战争不胜利就不结婚’，是个光杆儿，直到抗战胜利才结婚，妻子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结婚第三天，就把妻子送回南京，后来又送到美国受训。哪有结婚第三天就把新婚妻子送走的？为了打延安嘛。我看胡宗南也是书生气，你还生什么气呢？不要生气了。”

在蒋纬国的婚礼上，胡宗南交给我一个任务，不要让人破坏捣乱。我就跟西安方面联系，让他们派一些警察来保卫。

石凤翔成了蒋纬国的岳父大人，很高兴地请我们吃饭。蒋纬国比我小十多岁，我是少将的时候，他是上尉。所以他一直到死，都称呼我为“学长”，他自称“后学”，我给他写信，称他为“纬国弟”。

还有一次，胡宗南请客，请身边最亲信的高级幕僚，其中最年轻的是蒋纬国，是个上尉。蒋纬国对来的那些年纪大、官阶高又不理会他的人不大接近，一下子看到我，就挨着我坐下。胡宗南走过来对蒋纬国说：“你站到门口，帮人家拿拿帽子，挂挂大衣。”

蒋纬国回到座位上坐下来后，我对他说：“我注意到你，你给人家拿帽子，接大衣，做得不好。你站在那里，人家还没有来得及摘帽子，你就从人家头上一抓，把帽子抢过来，人家刚刚脱掉大衣，你就一把抢过来，人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你应该慢一点，两只手去接，这才有礼貌。皮带呢，不能和大衣挂在一道，要另外放在一个地方，有次序地摆放，这都有讲究。有些人不要你代劳，有的假客气，有的是怕你办不好，情愿自己动手，他客气到第三句，你就随他好了。我还看见人家不吃烟的，你也给人家点烟，人家当然不愿意了。”

他说：“老大哥呀，我不懂哪，我把事情看简单了。”

我说：“你是大少爷出身，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嘛。”

过了一会儿，胡宗南过来，带着蒋纬国到会客室后面的电话室，摇好电话，把电话递给蒋纬国，对他说：“给妈妈（宋美龄）拜年。”接着，教蒋纬国怎么说：“对父亲就不要拜了，父亲日理万机，请妈妈代我说一声，儿子给他拜年了，说这些就够了。”通完话后，胡宗南又对蒋纬国讲：“你看看客人吃烟不吃烟啊？吃烟的给点上烟啦。”

蒋纬国做好这些事后，胡宗南又说：“纬国，等一下宴会一开始你帮我做件事。”

蒋纬国站起来：“什么事啊？”

胡宗南说：“帮我布菜。”

其实蒋纬国对“布菜”是个什么事情并不清楚，只好含糊答应：“啊啊，布菜。”

蒋纬国坐下来问我：“哎，老大哥啊，胡先生要我布菜，是干什么事情啊？”

我说：“布菜啊，我告诉你，胡先生今天请客，他是最高长官，把我们这些亲信都请来了，包括你在内，本来布菜这些事情是他的事，现在要你代劳。布菜就是给每个人的盘子里夹一些菜。”

他恍然大悟：“噢，我晓得了晓得了。”

我说：“哎，布菜这个事情可是有道理，有分寸的呀。”

“一个盘子夹一筷子就行了，还有什么分寸哪？”

“不是那样简单，这里面有分寸。”

“那怎么夹法？”

我说：“你第一筷子要夹到胡长官盘子里，他是主人，而且除了他，没有官阶再高的人了，第一筷子给胡长官夹，他心里很高兴，觉得你很尊敬他，其他人看了，也认为你很懂道理，会做人，有礼貌。”

“哎呀，老大哥，你真是帮了我，要不我几乎搞错了。”

我说：“你还没有完全搞懂呢。”

“怎么办呢？”

我问：“这第二筷子夹给谁呀？你搞清楚了吗？”

“第二筷子夹给谁啊？我不晓得。”

“这第二筷子，要夹给那个参谋长，他资格老得很，又兼二十四集团军的总司令。第三筷子，你顺着桌子右边挨个过去。”

蒋纬国说：“哎呀，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哪，我都不懂。”

我又说：“你夹菜要站起来，坐在这里光手指动还不行，坐着夹菜是老人家的态度，你年轻，官阶低，一定要站起来，站起来就有礼貌了。”

他点头：“我懂我懂。哎呀，我今天上了很好的一课啊。”

再说到胡宗南。孔祥熙的女儿非要和胡宗南结婚，可是胡宗南就是不愿意和孔家小姐结婚，直接拒绝又不好，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约孔小姐：“我们到饭店里吃点东西吧。”孔小姐如约而至，一看，是一个最脏最小的馆子，胡宗南还故意叫了两碗面条吃，搞得孔家小姐很不高兴。吃完面条，胡宗南又说：“我们去游游山吧。”山很高，孔小姐穿着高跟鞋，怎么在山上走呢？走到半截，孔小姐就发脾气不走了。回来后，孔家小姐果然不理胡宗南了，胡宗南的小计谋成功了。

美国人送给我一条很贵重的皮带，我想，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也用不出来，干脆送给胡长官，他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要去郑州主持日本投降仪式。我拿着皮带到胡宗南的房间里去，他问：“哎，你拿的什么？”

“是一根皮带，美国人送的，用最好的牛皮做的。”

胡宗南仔细地看看皮带：“哎呀，这个皮带恐怕委员长都没见过，真是太漂亮了。”

“嘿嘿”，我直笑：“委员长见没见过我不知道，我送给你，你是第八战区长官，还要去受降，你当着日本人的面去摆摆威风嘛，只有你才够这个资格，我嘛，不够资格。”

听我这么一说，他很高兴：“我收了，我收了。你这个话讲得好，咱们去日本人面前摆摆威风。”

有人跟他开玩笑：“胡长官，你这个皮带啊，再没有比你这

个更好的了。和皮带相比，你的这身军服不行，你搞套好的军服嘛。”

胡宗南没有换过军服，总是那么一套。他一想也是，这套旧军服不配漂亮的皮带就对部下说：“赶紧找个裁缝来，给我做一套新的，这身旧衣服不配这个皮带嘛。”

裁缝干了一夜，把新军服做好了。胡宗南穿上新军服，把皮带一系，喜滋滋地问我：“看，配得上吗？”我说：“好好好。”

有一次，我在南京，陕西省主席周晓舟住在中央饭店，到处打电话找我，我想周晓舟找我干什么呢？我就去了。周晓舟拿出一把红绸子包的日本战刀，说：“这是胡先生送给你的，要我亲自转交给你。”我打开一看，是日军连级干部用的刀，并不是很高级的。我说：“现在这样的刀我有三把，其中两把是日本将官的刀。这把刀是个尉官的刀。”周晓舟不懂，说：“噢？你还会识货啊？我看胡先生不大送人家东西，特别送个刀给你，说他的皮带是你送的，胡先生给我看过那条皮带，很漂亮。”

胡宗南比我大12岁，对我特别好，有时我跟他开开玩笑，他也对我开开玩笑。有一次，我请蒋纬国岳父石凤翔吃饭，正在席间的时候，胡宗南派副官孙健坐着汽车来了，叫我：“胡长官请你马上去一趟。”我说：“好吧。”然后对桌上的人说：“我去去马上就来。”

我去了胡宗南那里，问胡长官找我有何事？他说：“西北军的蒙治中，他要起义，你给我发个电报过去，要他后天起义。”起草好了电报稿，胡宗南连名也不签。我说：“你不签名，这算什么电报呢？”

他说：“哎，胡宗南这个名字不能随便对外嘛。”

“你的名字不对外，人家知道这是谁的命令，谁的电报啊？”

他说：“噢，一定要签名的啊？”

我说：“你这样大的官，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懂呢？”

他签了：“宗南。”

我说：“你‘宗南’两个字也不行，要加上‘胡’字，

‘胡’字不能少。”他又加了个“胡”字。

蒋介石派了一个参谋次长邢斌到西安，这个人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冯玉祥的参谋长，当过陕西省主席。他到西安的主要任务是搞策反，因为汉奸部队里冯玉祥的人很多。到了西安，他去见胡宗南，对胡宗南说：“我奉委员长的命令，进行策反工作。委员长给了我一个宣抚使的名义，要我把冯玉祥手下投降日军的人策动过来。胡宗南大包大揽：“噢，你就归我管。”

过了些日子，邢斌对我说：“今天在胡长官那里碰了一个钉子。”

我问：“碰了一个什么钉子呢？”

邢斌不高兴地说：“经过策动，有伪军来投诚，胡长官说第八战区归他管，要我不要管这个事。”

我说：“胡长官做事就是这样，他是我们校长的学生，我也是校长的学生，我也是在这里搞策反工作的，他更相信我，所以他认为你就不要来过问。你不是黄埔学生，又不是部队里的人，是不是？他有门第之见。你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来的，有事应当跟你商量嘛。”

所以我看胡宗南这个人，很书生的。

蒋介石是把胡宗南选作接班人的。上海一家外国报纸上登文章，预测蒋介石百年之后，谁是接班人。文章提出了三个人，第一个是何应钦，第二个是陈诚，第三个是胡宗南。文章的分析是，何应钦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陈诚是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的，胡宗南是黄埔学生，将来这个接班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黄埔系统的胡宗南。胡宗南很高兴，把这张报纸贴在桌子的玻璃板上。他好像生怕我没有看到这张报纸，把我约到他房间里，说：“你看看，看看这里。”

胡宗南办公室里总是摆着《左宗棠全集》，还送了一部给我。

有一天，我对他说：“胡长官哪，《左宗棠全集》我都读了。”

他高兴地问：“哎，你知道左宗棠是个什么地位呀？”

我说：“我读了左宗棠写的文章，读了他写的诗，他这个官位呢，和你这个官位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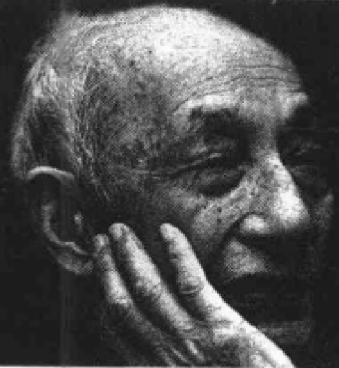
“怎么？跟我这个官位差不多？”

我说：“你在西安，掌管陕、甘、宁、黔、新等五省，西北华北是你的根据地，左宗棠也是你这样的官位。”

“你说得很不错”，胡宗南说：“这个地盘是委员长给我划的，这五省是最苦最穷的地方。”

打下延安后，胡宗南升为上将，当时，黄埔学生中升为上将的，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胡宗南这个人，一天到晚想做中国的接班人，一直到失败后，跑到舟山群岛还搞了两年，后来回到台湾。

我直到现在还想，蒋介石手下的这些人，陈诚很能干，很有办法；胡宗南是真善义，但是才干不够。



第二十四章 走脱军统

- 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
- 我决定退出军统，但是不能明退，如果明退，他们会采取手段对付我。
- 程潜问我：“你是在我们这里当个厅长还是当个军长呢？”
- 杜聿明向蒋介石写报告，一定要把我调去，蒋介石批准了。

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我跟着胡宗南到郑州参加受降。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军。蒋介石正式批准我升为中将，这一年，我40岁。

日本人一投降，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我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

胡宗南问我：“你现在奉命调东北，以后我怎么跟你联系呢？”

我说：“你怎么规定我就怎么办吧。”

“给你个密码，你打电报不要称胡宗南，我姓陈，名字嘛……”胡宗南翻着黄历看：“哦——有了，陈继生。你打电报给我，称陈继生。”

“行。”

胡宗南说：“你把掌握的华北、东北的情况经常告诉我。”

我说：“如果有整理好的文件，也送一份给你。”

胡宗南又说：“我告诉你，我当这个第八战区长官，相当于西安战区长官，我没有到过别的地方，也没有到过北京，现在我要派一个集团军到河北，到北京。”后来，胡宗南果然派了三个军到了北京。我觉得他手伸得很长，由西北伸到华北，还想伸到东北。

当时苏联在沈阳还没有撤兵，东北去不了，我暂时在北京办公三个月。这时戴笠到了北京。戴笠打电话给我，要我去见面。

见到戴笠，他说：“内战看来是越打越大。”戴笠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文件给我看，说：“这份文件是我们校长召集的一个秘密会议的记录，是胡宗南亲自记录、整理的，这个文件只给你看。看了之后，明天早上归还我。”

我一看这个文件，是蒋介石的讲话，说共产党在山西晋东南发动了战争，把阎锡山的队伍吃掉了，在太行山也发起战斗，把四十军、三十军消灭了。蒋介石说，各部队都要督察不利于剿匪的言论，这个战争会打下去。

我到了沈阳后，四平街发生了一次很激烈的战斗。杜聿明把林彪打败了。

东北的空军副总司令到沈阳找到我，说：“哎，不是我找你，是胡宗南找你，他叫我们空军把你送到西安，说这样保密一些。”

我说：“我也没有什么更多消息要报告他呀，再说可以发电报嘛。”我就没有坐飞机去西安，而是写了一封信给胡宗南，向他报告了一些消息，其中有杜聿明打四平街的情况。

1946年3月，戴笠坐的飞机失事，戴笠摔死了，我又回到重庆，参加追悼会。戴笠的摔死好像是上苍的安排，他姓戴，而他坐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江阴这个地方的戴山上，戴山并不高，说是山，还不如说是一个小山坡；飞机撞在山上，戴笠的身体冲进山中的沟里，这条沟叫做“困雨沟”，而戴笠的别号恰恰叫做“雨衣”，戴笠的小名为“春风”，他摔死的日子，正是春风轻轻。

我回东北后，蒋经国也到了东北。他是外交特派员，在东北有个办公室。他请我吃饭时对我说：“你过去研究日本问题，现在日本问题结束了。你现在最好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朝鲜问题、研究苏联问题，研究后向我汇报。我来东北也是这个任务，也在关注这三个问题，苏联问题我了解，但是朝鲜问题我不大了解，我们两人合作吧。”

过了几天，蒋经国又对我说：“外交问题由我办公室的秘书负责，我走了。”

我问：“你到哪里去呢？”

“我到新疆去。新疆问题很严重哪。”

“新疆有什么严重问题呀？”我问。

他说：“俄国有很大的野心，他们的力量超过我们在新疆的部队好几倍，一下子把伊犁那些地方都占了，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去看看。”

一个多月以后，蒋经国从新疆回到东北，我和杜聿明又见到他。他说：“我到新疆跟俄国人谈，他们不理我，根本不见，还是蒋夫人去干涉的。”

我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问：“蒋夫人在重庆怎么干涉这个问题呀？”

蒋经国说：“蒋夫人到了新疆。蒋夫人说，这个问题还是要英美出来说话，没有英美出来说话，俄国决不会撤兵。”

果然，后来宋美龄请英美出面干涉俄国。宋美龄对俄国人说：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你俄国如果没有美国支持，就不可能把这场战争打胜，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中国呢？我们和蒋经国一起，都很称赞宋美龄。

我跟蒋经国长谈过几次之后，做出了一个我自己的决定：虽然我没有回到共产党那边，但是我视共产党为友人。现在我看到蒋介石反共是越走越远了，再加上戴笠也死了，我失掉了一个后台，我下决心，军统方面我不回去了。

当时，军统局内就分为三派，相互争得厉害，郑介民，是黄埔第二期的，他是十三太保里的人，第二个是戴笠的主任秘书毛人凤，也是个黄埔学生，第三个是唐纵，他是黄埔第六期的，也是十三太保之一，他们都要当局长，我看三派势力都很强，我如果再在这里搞，就会出问题。他们哪一派都会随便把我打掉，我接近哪一派，都会有杀身之祸。我决定退出军统，但是不能明退，如果明退，他们会采取手段对付我，怎么办呢？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有一个人可以找，就是程潜，他是国民党的元老。我跑去找程潜，说：“颂公，你这个党国元老，我

愿意来帮你的忙。”

他说：“噢，我早就想到了，你来帮忙我很高兴。你华北东北都工作过，你的关系特别多，你帮助我工作，我特别欢迎你。”

程颂公告诉我：“我这个武汉行营主任哪，干不了几天了，白崇禧来抢这个位置啦。”

我问：“那你干什么呢？”

他说：“要把我调到湖南长沙，当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湖南和江西两个省，还兼湖南的主席。”

我说：“好，这个官不小啊。”

他说：“你就这样吧，你跟我一道来干，你如果要当文官呢，我在湖南或者江西给你安排个厅长什么的，你要当武官呢，我正好要在绥靖公署成立三个兵团，你当一个军长是足够资格了。你到我这里来。”

“好好好。”我向程颂公表示，“我到你这里不是来做官的，也不是想要什么地位。你是老前辈，和我父亲是朋友，你把我摆在哪个位置，我就服从。”

他说：“你暂时给我当办公厅主任吧。”

我想了想，又对程潜说：“戴笠死了，军统的三个头头争得很厉害，我如果不辞而别，他们一定莫名其妙，认为你怎么到程潜那里去了呢？我必须先跟他们先打个招呼。”

程潜说：“那可以呀，可以可以。这样吧，我给你写三封信，你交给他们，我告诉他们，这里很需要人，要把你们那里的文中将借过来，来帮助我。”

我说：“对对对。”

程潜给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人分别写了信。

我首先跟郑介民商量，他不高兴了：“我在这里干，你不能离开，中国的华北、东北你都干过，你离开那我还干啥？你不能走！”

我说：“颂公写了封信给你。你看看吧。”

他看了信，说：“那这样，你要离开一下也可以，你一定要

在我们这里挂一个名，我们这里有个设计委员会，你就做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如果你连这个名都不要，那就不好啦。你保留一个名义，愿意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回来嘛。”我说我按你的意思办，给我保留一个名义。

我说：“我告诉你，我到了程颂公那里，国家有钱给我，我只在程颂公那里拿一份钱，不能拿你的一份，如果拿两份，那又不好。”

他说：“你这个人真是很廉洁的啊。你这样办也好，你的粮饷我们就不给了。”

我又到毛人凤那里，毛人凤的资格比我低，我已经是中将，他还是少将。他说：“你要离开？我们这里分成三块了，还不晓得鹿死谁手？你也不参加到这里头来占一份？你这个人很难得，很自爱，我们不像你，你的面宽，你到哪里去都有人欢迎你。我们是跟戴笠起来的，靠着他又死了，没路走啊。”

我说：“我跟郑介民谈过了，颂公也给他写了封信，也写了封信给你。”

“我看看，我看看。”毛人凤一看信，说，“你这个人呀，不愿意在这里跟我们争什么，不愿意争长论短的。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我说：“你们两个都同意，唐纵那里说没说都没有问题了，他也不管这个事，不过颂公也给他写了一封信。”

毛人凤“咳”了一声，说：“这封信给不给他看都没有问题。我同意了。”

我回去后告诉程潜，程潜很高兴：“哈，那很圆满了，很圆满了。”

就这样，我脱离了军统。

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

我跟着程潜到了绥靖公署，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有一天晚上我在他屋里聊天，我说：“你这个湖南人哪，是湖南人的家

长，你过去的地位都比现在的地位高嘛，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武汉行营主任，都比现在的官大，你在湖南称家长，湖南人一定很高兴。你怎么不写一篇告湖南人民书？”

“噢？”程潜说，“你的这个想法很好啊。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就帮我写一篇。”

我说：“那倒很容易。”

晚上，我就把《告湖南人民书》写好了。第二天交给程潜一看，他很高兴，说：“比我自己写得还好。如果我自己写，我还不知道怎样落笔呢。写得好，写得好。”

我说：“你不要说是我给你代笔，这样一说，很多人还不愿意，颂公那样高的地位，哪还要文强代笔呀，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这个《告湖南人民书》总得拿出去啊。”

我出主意：“颂公，就说你自己起草一个《告湖南同胞书》，起草后把你的参谋长，还有湖南的几个写手叫去了，把我也叫得去，给我们看看，这样不就行了吗？”

我在程潜这里差不多一个月后，程潜成立了三个兵团，他问我：“你是在我们这里当个厅长还是当个军长呢？”

我没有考虑，说：“你让我当军长我就当军长，你让我当厅长我就当厅长。我个人没有意见。”

对于我的安排，我也不知道程潜是怎么决定的。第二天晚上，程潜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家里吃晚饭。我想：哎，他是不是要把我升官呢？怎么要我去吃饭呢？

我就去了。他夫人跟我讲：“委员长来了电报，让你到差。”

我很奇怪：“到什么差？”

程潜夫人说：“杜聿明担任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要你去当副参谋长。”

我说：“我不知道啊。”

她说：“电报都来了，你在我这里吃了晚饭，明天你就要坐飞机去到差了。明天还要给你送行呢。”

这时，颂公说话了：“好吧，我要留也留不住了。你的校长

给你升的这个官也不小啊，指挥十六个军呢，中将副参谋长啊，你的这个校长要调你走，我留你留不住了，你是他的学生，他调你去，我没有办法留你。你到我这里来，地都没有踩热啊。”

过了一会儿，程潜的参谋长来了（程潜的参谋长是黄浦第一期的，叫刘家绪），他说：“哎，你晓得不晓得，你升官了。”他说：“光亭（杜聿明，字光亭）他有个信给你。”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参谋长说：“信在我这里，你看看。”

杜聿明写给我一封长信。大意是：刘峙要当徐州前线指挥部主任，请我去当副总参谋长。杜聿明那个参谋长舒适存过去给彭德怀当过参谋长（舒适存过去从江西彭德怀那里跑出来，自己投降来的，过来之后他在陆军大学旁听，毕业之后当过师长，又跟廖耀湘当过新六军的副军长，以后还当过兵团副司令），杜聿明还不大放心他。让我管人事，管司法，管后勤。

参谋长说：“一切都归你管。你是黄浦学生嘛。你和那个参谋长都是中将，待遇一样，你也是1200块钱。他也是1200块钱。杜聿明特别看重你。”

这天晚上，程潜跟我谈了很多话，他说：“你去了要小心啊，共产党你是打不倒的，共产党的战法你也知道，他没有五六倍的力量不给你打，他没有把握也不打，他白天不露面，晚上出来跟你打，你找不着他，你机械化部队有什么用呢？杜聿明掌握着二十六个军的机械化部队，但是打共产党没有用，机械化部队打共产党，等于高射炮打蚊子，怎么打得到啊？”

程潜望着我一笑：“我看共产党并不成气候，可是一打起来，我们总是失败。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

我说：“我不去也不行。去呢，我忧心忡忡。不过你讲要准备当俘虏，我还没有想过。我们是高级司令部的人，难道还跑不掉吗？不见得当俘虏。”

我心想：颂公给我钱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准备当俘虏？我认为他的话说得太过火。现在想起来，颂公的话一点也不

过火，颂公还真说对了，时间不长我真的当了俘虏。

事后我觉得，人很难逃脱宿命。当时，我决定不再参加内战，逃脱反共的范围，费了好大的劲才脱离军统，到了程潜老前辈的旗下，我以为走脱了，结果可能是命运决定，还是走不脱，杜聿明向蒋介石写报告，一定要把我调了去，蒋介石就批准了。想躲躲不掉，这不是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吗？

1975年我特赦出来，参加宴会，第一桌有黄维，第二桌是我，第二桌跟我作陪的人，有原国民党后勤部的部长张宗胜，是个上将。他说：“文先生，我也是黄埔第四期的，我今天来参加宴会，让我作陪，见到你这位同学，敬你一杯酒。”

还有一个作陪的是孔从洲，他原是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一个负责人，他也端起酒杯：“我也敬文先生一杯酒。”我没有问他是哪里毕业的，但是我认识他，我跟胡宗南一起到郑州参加日军受降仪式时，他是三十八军的一个师长兼郑州的警备司令，郑州的守备军队就是三十八军一个军。当时，孔从洲见了我，对我说：“我听外面讲，你要晋升中將了，我做一套衣服送给你。”我说：“我有衣服啊，你不必做。”他说：“我一定要做，这是日本将官呢，料子很好，你虽然有衣服，我也做一套送给你。”他叫裁缝给我量尺寸，没有过三天就做了一套将官呢的军服。就是这个孔从洲在宴会上对刚刚特赦出来的我说：“我和毛主席是亲戚，是亲家。”“哦？”我说：“你还有这样一层关系啊。”

我看见一位夫人坐在我们第二桌，她看着我笑。这位夫人我好像认识，但一下子怎么叫不出名字呢？

这位夫人端起酒杯对我说：“文将军，你怎么不认识我呢？”

“很面熟，我一下子叫不出名字。”我有些不好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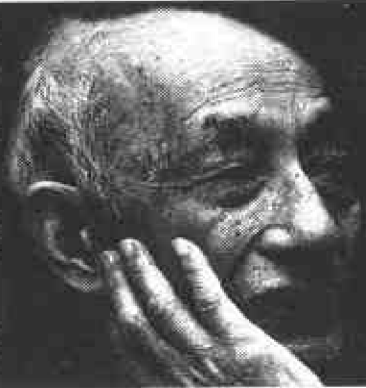
她把桌子上写着她姓名的牌子转过来给我看，啊，是程颂公的夫人！我感慨地说：“原来是你呀。我在湖南绥靖公署见到你的时候，恐怕你只有二十多岁吧？”

她笑着说：“差不多。以后颂公把我送到香港去了，他起义

之后，又把我接回来了。那天晚上，我们给你饯行，送你走的时候，颂公讲‘你恐怕会当俘虏’，我看你那天晚上很不高兴，我也觉得颂公那个话说得太重，人家到差怎么咒人家呢？今天看来，颂公说得没有错，他到底有经验。你的老太爷在日本留学时跟颂公是同学，我们颂公在日本读书时不过是个士官生，你的父亲是个学者。颂公从日本回到湖南，搞了个建国军，当了总司令，其实他也没有多少队伍。你的父亲跟颂公、黄兴他们关系很深。那天晚上颂公因为你父亲的关系，跟你说了那一番话，现在想起来很亲切。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不去又不行。”颂公夫人的名字叫何英芹，当时我听了她的一席话，我流泪了。

她安慰我：“事情都过去了嘛，你不要流泪了。”

后来，我跟颂公夫人两个同时成为第六届政协委员，又同时是第七届政协委员。她比我小二十多岁，现在已经去世四五年了，而我还活着。



第二十五章 战地轶事

- 电话那边说：“你是文中将吧，你明天早上到飞机场来，我们单独给你配一架飞机送你到锦州。”
- 杜聿明跟我讲：“从林彪部队里来了3个团级干部，向我们投降了。”
- 抓了七八个好像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还缴获了炸药包、手榴弹。
- 我拿过笔来写了4个字：“暂缓执行。”

我先讲一件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时的事情。

抗战一胜利，林彪带着大概一万多人守着山海关，李运昌也有一万多人，和林彪一起堵住山海关打，不许蒋介石的部队进入山海关。杜聿明带了一个军跟林彪打，没有分个胜败，没有打进关去，后来汤恩伯的十三军来了，还有五十二军也来了一部分队伍，这样一打，林彪就垮了，山海关守不住了，林彪带着他破破烂烂的部队向锦州撤退，杜聿明的部队一直顶到锦州。我要到东北到差，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但是锦州有敌人，我暂时去不了东北，就在北京等待。

圣诞节前后，杜聿明有一天晚上很高兴，冲着我喊：“打开了，山海关打开了，林彪不晓得逃到哪里去了！”

我问：“那你的部队怎么办呢？”

他说：“追击！我的部队已经到了锦州了。”

“噢？”我说：“部队已经到了锦州了？”

他说：“廖耀湘、孙立人的部队到达后，我们就有足够的兵力了，我们的兵力超过10万呢。哎，你怎么还在北京呢？”

我说：“东北行营现在还去不了啊。”

我正在北京，想东北也去不了时，宋子文到北京来了。宋子文对我说：“你拿我一张名片，现在北京到锦州已经有飞机了，你可以离开北京了，锦州已经安排好了你的一切。”

我问：“飞机归谁管呢？”

宋子文说：“是中央调来的，你拿我的一张名片，就会给你派飞机的。”

我就跟航空司令部通了电话，电话那边说：“你是文中将吧，你明天早上到飞机场来，我们单独给你配一架飞机送你到锦州，锦州地面有保护的部队。”

第二天，我带着一批人坐飞机来到锦州。后来听人家讲，中将以上官衔的，头一个到东北的就是我。

我到了锦州后，杜聿明也来了，杜聿明跟我讲：“从林彪部队里来了三个团级干部，向我们投降了，三个都是大学生，是在林彪部队里搞政治的。这几个人交给你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好，他们是自己来投降的，我想了一下，决定先见见他们再说。我对部下说：“把那几个人送来见我。”

这三个人被带来见我，我一摸他们身上的衣服很薄：“哎呀，东北的冬天这么冷，你们还没有棉衣呀，这是怎么过的日子呀。”

我就喊部下：“我们的棉军服还有没有啊？一人发一套给他们，把衣服换了再来跟我谈话！”

一人给了他们一套棉衣，一件大衣，他们感觉到很暖和，说：“你这个长官好啊，什么都没有谈，就送衣服给我们。”

我说：“你们看，我们穿的皮衣服，脚上穿的长筒皮靴，天气太冷了嘛，东北这个地方好冷啊。”

我问：“你们为什么要跑过来呢？”

他们说：“我们三个都是大学生，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这个国家跟日本打了八年，为什么搞到现在还要打内战，我们想不通。我们到了锦州之后，非常想家。”

“你们三个人是什么地方人呢？”

他们说：“是济南附近的人。”

“我今天晚上不跟你们多谈，我让伙房做点东西给你们吃吧。希望你们三个人自己写个自传，什么学校毕业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在共产党里搞了多久？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投降？写好了早点睡觉。”我又对秘书说：“他们写完让我看看。”

第二天我一早起来，秘书把他们三个人写的自传交给我，都

是大学生嘛，写得不错。我把他们三个人叫来说：“这样吧，二话不谈，准你们三个人一个月的假，你们回家去，找到你们的家属亲戚，一个月以后到这里来报到，我会安排你们的工作。另外呢，给你们拿点路费。”

我又问：“你们结婚了没有？”

他们说：“婚是结了，可是好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妻子。”

我说：“你们尽量去找，找到了带着一道来，我把路费给你们。不过我限期一个月，希望你们不要违背了，准时回来。”

一个月之后，这三个人都回来了，妻子也找到带来了。我说：“我也不跟你们谈道理，你们都是为国嘛，大道理不谈了，我介绍你们到政治部去，按你们的能力分配你们的工作。”

他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三个都是共产党的团级干部，你考察得怎么样呢？”

我说：“我没有考察别的，他们现在不愿意在共产党里面搞了。不愿意打内战。我就考核这一点。你们再要作什么考核，你们去考核吧。我不干涉你们。”

政治部那些人可能对他们三个态度不大好，没有过多久他们三个人又跑回来了，说：“我们不到政治部去了，那些人对我们不好，把我们看成敌人一样。我们还是要跟着你这个长官，在你这里派我们点事做吧。”

我表示：“可以。”其中有个姓王的，叫王世奎，是学历史的，我问：“你想干什么工作呢？”他说：“我不反对共产党，你们对我又这样好，我想在沈阳找家报纸搞历史。”我说：“可以吧，你去当大历史学家就对了。”我当即打电话给长官部的秘书长，秘书长说：“好好好，投降过来的嘛，我们负责给报社介绍。”

我又对另外两个人说：“派你们做一个事情，日本人在我们东北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我派你们两个人，另外还派一个人给你们，成立一个工作室，清理日本人的那些东西，日本人过去在东北搞了些什么坏事？有些什么机构？查查这个事，你们把这些

材料集中起来，作为我们以后对付日本人的一个窗口。”

这两个人很愿意。我又派了一个姓毕的，叫毕玘，他是戴笠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个大学生。

他们做了很多事，把日本人的许多档案找到了。可是，我派的那个毕玘，看不起那两个投降过来的人，认为他们是叛徒，把他们的玻璃板打破了。那两个人又跑来找我，我把毕玘叫来，说：“人家也是大学生，你打人家的玻璃板，搞成这个样子，多么不好啊，我让你负一点责任，领导他们去办，把事情办好了就对了嘛，怎么把人家得罪了呢？”

毕玘听我一讲，向我哭了一顿，我说：“不要哭了，你也承认是工作上待人家不好，你需要改正，你这个拳头往玻璃板上一打，把自己的手都豁开了，不好啊。我现在把你辞退，你没有资格领导他们嘛。”

没想到，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找我，要我把毕玘派回去，说这个人脾气稍微暴了一些，别的地方还是很好的，我又按他们的意思，把毕玘派回去了。后来，毕玘一直到解放后还和我通信。

下面我要讲的，是到了杜聿明手下，在徐州时，遇到更棘手的事情。

我们从徐州撤退的路上，一天晚上，我们撤到安徽和河南交界的地方，叫做孟溪。第二处处长跑来报告，说后面有一座小山，小山上面有个宝塔，发现宝塔里面有火光，恐怕那里埋伏有解放军，问我们怎么办？

我说：“你这个人，身为处长，这个问题还来请示我？你派个特务连，围住宝塔喊话看看有什么动静，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办，还来问我？”

二处处长调了一个营包围了宝塔，冲着里面喊了一会儿，里面没有动静。他们就把门炸开冲进去，抓了七八个好像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人，还缴获了炸药包、手榴弹。

在宝塔里有潜伏的八路军武工队一事，给宿营地造成了恐慌

文

文

①

②

③

④

的气氛。到了半夜，忽然有枪声，枪声由疏而密，经查，是特务营警戒兵打的，他们说：“共产党的部队到了，有冲进寨子的可能。”特务连连长杜宝惠（杜聿明的侄孙）也这样报告，搞得杜聿明一夜没有睡觉，几次打电话要邱清泉调部队增援。一直闹到天亮，连共产党部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一夜乱打的结果，是我们自己在寨子外露营的坦克兵和辎重兵打死打伤了不少。事后追查责任，才发现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几名电话兵在夜里查线路，相互之间为了联络，喊叫：“来了！来了！”警戒兵听到，以为是解放军来了，举枪乱打。

我审问抓来的几个人，他们承认自己是八路军的武工队，说知道你们要在这里宿营，准备晚上把你们干掉。

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杜聿明，杜聿明拿支笔一批：“就地枪决！”

我把军法处长和第二处处长找来，对他们说：“你们糊里糊涂的，判断不对呀。”

“怎么不对呀？”

“如果他们要炸掉我们的指挥部，这个罪就大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得手，法律上叫做‘犯罪未遂’，就是有罪，也要减刑，不能杀，要杀也只能杀为首的一个，把那七个人都杀掉？哪有这样的法律啊？”

军法处长说：“杜总司令已经批了，按他的批示办理，就地枪决，我们没有权力改变，恐怕你参座也没有权力讲这个话。”

我气得很：“要杀也不能把七个人都杀掉，这是第一；第二，上面有个通报，讲不要杀俘虏，我看他们就是几个农民嘛，杀了俘虏，违反国际公法啊。”

我这样一说，军法处长软下来：“杜老板已经批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就签个字吧。”

我说：“我不敢签这个字，我一签字，这七个人都枪毙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里又没有铁笼子，又没有监狱，往哪里关这些俘虏呢？”军法处长很为难。

我拿过笔来写了四个字：“暂缓执行。”

军法处长和二处处长都不愿意，瞪着眼睛看着我，我火了：“你们看着我干什么？赶快把俘虏押回去，跑掉一个人，我杀你们的头！”

第二处处长姓李，他私下对我说：“你说得不错。杜老板这样批也太过了。”

我说：“按我的意思办。”

第二天，我们转移到陈官庄附近，这七个人随我们转移。我再一次对军法处长和二处处长说：“要优待这七个人，给他们弄饭吃。我这样做了，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如果要杀头，就杀我的头，不会杀你们的头！”

这两个家伙挺厉害，说：“你签的条子我们复印下来了，带在身上，条子是你批的啊。”

杜聿明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这七个人关了半个月，军法处长天天埋怨我，说你看这个事，还要天天给他们弄吃的。军法处长天天催我执行。

二处处长偷偷跟我说：“这样办，我让第二兵团邱清泉那里开个口子，假装我们有任务，把这七个人派出去。咳，把他们都放了，他们在这里还要吃要喝的。”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办法：“可以呀，就从熊笑三那个军开个口子，把人放了，邱清泉这个人很马虎，不会追究的。如果邱清泉说放了共产党的俘虏，你们就推到我的头上，说我们副参谋长管这个事。”

按计划行事后，果然，邱清泉打电话来了，问你们抓的那几个人，为什么放了？

我和他打官腔，说：“另有任务。”

“噢，另有任务啊？”

我很肯定：“另有任务！是我批的，我负责。”

邱清泉不说什么了。我放了这七个人。

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因为两条罪不能特赦，一条罪是放

毒气弹，一条罪是杀了七个八路军武工队的人。北京去的人审查这件事的时候，我向他们讲清了这件事的原委，直到这时候，杜聿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得不得了，在我面前要哭了。我说：“今天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告诉你，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已经过了10年了，如果这七个人还在，恐怕都升官了。”

杜聿明说：“你跟我讲的是假话。”

“现在咱们都是战犯了，这个时候我还跟你说什么假话呢？是我办的事情嘛。”我又跟他说放毒气弹的事情：“放毒气弹的事情你也无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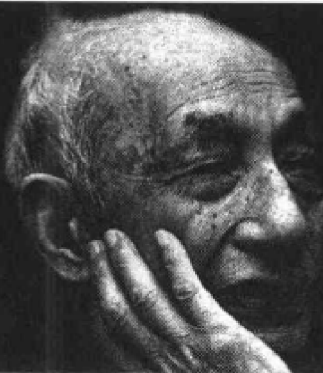
“我怎么无罪？”

我说：“我们陆军没有毒气弹嘛。那是南京派空军来投的，这个罪归南京，你揽到自己身上干什么呢？再说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东西，只是辣椒水嘛。”

杜聿明说：“你还帮我辩护呢。”

“你这两条罪状都不成立，我已经向北京来审查的人讲了，他们也点头。”后来北京审查组专门寻找那七个人，七个人都在。

杜聿明得到特赦了。比我早出来15年半（杜聿明是1959年3月特赦，我是1975年3月特赦），杜聿明特赦时对我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第二十六章 战败徐蚌

- 我到了淮海，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
- 徐州“剿总”在两个作战方案上徘徊，不能做出决定。
- 我当时难以解释两个王牌军团寸步难行的原因，后来读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才知道华东解放军用了一半以上的兵力打援。
- 邱清泉开始埋怨蒋介石，“校长是怎么指挥的？怎么搞得这么乱呢？”

我到了淮海，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

徐州“剿总”是继东北、北平两个“剿总”成立后成立的。当时，陈诚派下台，何应钦派上台，起用了一批老将。顾祝同接替陈诚做了参谋总长，卫立煌出主东北，刘峙出主徐州。徐州方面调刘峙曾经有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刘峙是败军之将，但蒋介石、何应钦认为刘峙忠实可靠，还认为刘峙是“福将”，如果配合一个少壮得力的干将，或许能够成功。于是决定让杜聿明做刘峙的副手。

刘峙、杜聿明一出台，王耀武就丢了济南。刘峙、杜聿明和手下的军官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强大的王牌军，解放军“吃不掉，啃不动”，一方面口出大言：“在王耀武手里丢了济南，一定要在刘峙手里把济南收复，让共产党得不偿失，尝尝厉害！”参谋总长顾祝同，曾飞到徐州与刘峙密商，杜聿明也两次飞往南京、北平，面见蒋介石、何应钦，当面请示机宜。

徐州“剿总”在两个作战方案上徘徊，不能做出决定。

第一方案是北向阻止解放军南下，以佯攻济宁，收复济南为目的，采取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

第二方案是南撤蚌埠，放弃徐州，扼淮河而守，加强南京外围防卫为目的的战略撤退。

究竟哪个方案实施起来把握更大一些，谁也不好说。在济南有生力量被歼不久的情况下，北向可能正碰在解放军的钉子上，造成进退两难的局面；而第二方案南撤扼淮河而守，恃淮河天堑以阻敌之直捣南京城下，被顾祝同视为上策。但是蒋介石、何应

钦考虑撤防而守，部署不易，一旦解放军跟踪南下，并渗透淮苏皖地区，不但南京直接处于威胁之下，而且中原屏障尽失，武汉三镇必将陷于动摇之中，再加上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决不可放弃。

这两个方案上自国防部下至徐州“剿总”，久久争论不决。刘峙拿不出主见，只有杜聿明自恃兵力雄厚，力主乘解放军打下济南的休整间隙，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攻势，出其不意地佯攻济宁。蒋介石同意了杜聿明的这个方案。

杜聿明奉蒋介石的命令，放弃郑州，缩短战线，西起商丘，东止连云港，机动地集中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作北向进攻的主力部队，调孙元良兵团自蒙城、涡阳地区，星夜靠拢徐州。又调集另一王牌部队黄维兵团，自驻马店附近出发，靠拢徐蚌之间，既可策应以徐州作中心攻防战，又可以隔断解放军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的会合。黄百韬兵团一字横陈于陇海线东段，由碾庄圩迄于海、连一线，随时配合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机动地向济南进攻。

碾庄圩一战，是徐蚌战役的第一战。刘峙亲临前线督战，到了我们指挥部。杜聿明说：“打了两天两夜，碾庄圩为什么打不下来呢？两个最大的兵团，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全都用上了，就是打不过去。”

邱清泉是黄埔第二期的，李弥是黄埔第四期的，邱清泉和李弥原来都是共产党，加上我也是共产党，所以徐蚌战役可以说是共产党打共产党。

杜聿明向刘峙汇报说：“看来共产党在这里打援的至少有两个纵队。”

我说：“我看打援的部队不只两个纵队。”

刘峙问：“你看有多少啊？”

我回答：“我看至少要加一倍，起码有四个纵队。”后来，从解放军的战况中看到，他们在碾庄圩放了六个纵队。杜聿明的判断很轻敌。

我们到战场上的最高点去视察，杜聿明亲自指挥作战。

那一天，我很冒险。心想，我要看看究竟。我就坐着军用吉普车，一下子冲出阵地，我四面看，怎么看不见自己的兵呢？我这是跑到哪里了呢？正在奇怪，身边的副官着急地说：“不好，咱们已经跑到共产党的阵地里来了！”我也急了：“赶快回去！赶快回去！”解放军没有追击，也没有开枪。

我捡了一条命回来后，杜聿明说：“你这个人好勇敢，你怎么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呢？”

我说：“我还不知道已经到了敌人的战地，以为还在自己的阵地上。”

杜聿明连声说：“你的命大，没有把你抓到。”

这时，刘峙还没有走，他也看到了，说：“我看到很奇怪，你的吉普车跑得那样快，怎么冲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了呢？”

刘峙很着急：“这样打，要打到哪一天呢？已经打成一个消耗战了。”

我说：“要破这个阵，死打是打不过去啊。”

刘峙看着我：“你的意思是怎么打法？”

“我们正面要佯攻，至少调两个师迂回到后面去打，邱清泉兵团抽两个军，李弥兵团抽一个军，迂回到后面，趁今天黑夜打过去，里外夹攻，这个阵可破。两边迂回，碾庄圩之围可以解了。”

杜聿明对刘峙讲：“我的副参谋长制定了突围的战略，转到解放军的后面去打。”

刘峙点头：“哎呀，好计划，好计划，早该如此。”

杜聿明看着我说：“你怎么早不说呢？”

我说：“我没有看到这个情况，瞎说一顿也不行啊。”

杜聿明用自动电话（就是现在的对讲机）找到邱清泉，命令：“你抽调两个军，迂回到后面去！”

邱清泉回答：“我的兵力已经消耗得很厉害，如果再抽调两个军迂回，恐怕我的正面不保，一旦敌人从正面突破，徐州也不保！”邱清泉很坚定地表示不能执行命令。

李弥的态度是：如果邱清泉派出兵力，我也派，如果邱清泉不派，我也不派。李弥说：“我只有两个军，邱清泉有六个军，他的力量比我大两倍，他为什么不抽调力量？从我这里调个师，我的力量就更单薄了。”李弥也不肯调兵。

杜聿明的指挥不灵了。

我对杜聿明说：“他们不听你指挥官的，命令都不能执行，怎么办呢？”

如此坐失良机，碾庄圩那边的炮火越来越急了。我说：“我们在碾庄圩的部队可能已经被吃掉了。”刘峙在自己的大腿上捶了一顿，长叹一声：“天亡我也！”

由徐州出击的部队与碾庄圩困守待援的部队炮声相闻，相距不到40华里，却无法解围。

我跟杜聿明说：“现在解放军离我们没有多远了，碾庄圩已经被解放军控制住了，我的看法是今天晚上准备夜战，我们一失败，十几万人就被解放军吃掉了。”

杜聿明问我：“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说：我们打一个假仗。这里离徐州15里路，我们撤退10里，解放军一定是跟进打我们，我们一个回马枪，可以转败为胜，我们告诉碾庄圩的黄百韬，我们撤退的时候让他们赶快跟进。”

我们按这个计划撤退，没有料到，解放军不理我们，并没有跟进。

碾庄圩没有什么炮火的声音了，糟糕了，黄百韬十几万人已经失败了，碾庄圩没了炮火了嘛，我们不能再撤退了，如果我们再撤退，今天晚上徐州就没有我们的部队了。我就跟杜聿明商量：“你也不能动，我也不能动，参谋长也不能够动，死守在这个地方。”

杜聿明说：“好，要死死在一起！”

第二天，二十五军的军长陈士章从碾庄圩逃过来了，他告诉我们，黄百韬自杀了。

“解放军呢？”我问。

“解放军认为已经胜利了，撤退了。”

我当时难以解释两个王牌军团寸步难行的原因，后来读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才知道华东解放军用了一半以上的兵力打援。刘峙指挥之下的有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四十多万人，而解放军的部队已经超过200万了，苏联把全部的武器给了林彪，林彪的装备力量超过卫立煌两倍，是四个野战军中最强大的一个。我向杜聿明讲：“这个仗没办法打了，根据收到的消息，解放军的部队超过200万，我们这里四十多万人跟解放军打，这个仗怎么打法啊？”

杜聿明跟我发脾气了：“唉呀，你真是，长人家的威风，不说我们自己的志气！”

我说：“大势已去啦。现在林彪采取包围的政策，并不积极打反击，把我们这里40万人暂且留着不打，先解决黄百韬兵团（碾庄圩战役），把那里吃掉，再吃黄维，把黄维的部队也吃掉了，搞到最后来打我们。那还打什么？没办法打。敌我悬殊啊。”

听到碾庄圩的炮火逐渐消失，我们要邱清泉无论如何保住徐州，总部要撤到徐州。

我们撤到徐州后，一看徐州的街上乱哄哄的，老百姓和军队都在抢粮食，我大声喊：“警察到哪里去了？县政府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对我说：“佯攻济宁，收回济南。地面上抽六个军，沿铁路线打过去，从空军空运三个师，在济南降落。封锁运河，封锁黄河，使共产党不能增援。”杜聿明又说：“北伐的时候我们打张宗昌，就是这样打的。现在我们也这样打！”

这是个好计划。我说：“这个计划我看了，赶快执行！”杜聿明下了决心，他和参谋长舒适存上前线，徐州这里由我坐镇。

第二天，1948年10月15日，天下着倾盆大雨。刚刚要按照计划行动的时候，第二处处长从前线跑回来，气喘吁吁地报告：“参座，出问题了！”

“出了什么问题了？”我赶紧问。

“十分钟前，委员长从南京到了徐州，召见副座（杜聿明），

没有谈几句话，就让副座上了飞机，跟委员长到北平去了！”

“啊？”我吃惊极了：“杜聿明怎么走了？”

刘峙知道此事大发脾气，大声嚷嚷：“岂有此理！我们的副座怎么一下子被搞跑了，徐州不管了？完蛋了，我们的计划执行不了了。他走了，全部责任在我了，我办不了！光亭走了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

我直着急，马上给刘峙挂电话：“总座，今天委员长从这里经过，怎么把我们的杜老板弄走了呢？”

刘峙说：“锦州那边打起来了，让杜聿明去那边指挥。听说要让杜聿明担任冀热辽三省边区总司令，不但指挥东北，还要通过傅作义指挥华北。你看这一搞，不就乱了嘛。你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

我挂上电话，到了刘峙那里。我问刘峙杜聿明走了以后的前线指挥问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还是有所改变？刘峙回答：“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经命令前线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

刘峙说：“光亭回不来了。我想再调一个人来指挥这边的战斗。”

我问：“你调谁来呢？”

“我想把宋荫国（宋希濂）调来，他指挥过滇缅路的战争，这个人是个勇将，也是我的学生。调他来可以。”

我说：“我的想法，总座，我可不可以说啊？”

“这个时候不说，你什么时候说呀？什么都可以说，说错了没关系。”

我说了几条：“第一，宋希濂指挥不了邱清泉，也指挥不了李弥；第二，宋希濂在新疆那里指挥五六个军，你把他调来，要通过委员长啊，别人调不动的。就是打电话打电报给宋希濂，不通过我们校长，又起什么作用呢？我们校长不批准的事情，你这个电报就不能打。”

刘峙说：“你说得对，我糊里糊涂，我这个命令到新疆，不

文

文

11

11

11

11

起作用。唉，这个事情棘手了。”

我出主意：“有个办法，就地取材。现在这边的部队，只有邱清泉有六个军，把他升起来做副总司令，主力部队由他负责，这样还可以执行计划。”

刘峙考虑了好久，说：“不行不行，玉安（邱清泉的别号）这个人我知道，他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跟李弥一点也合不来，孙元良是第一期的老大哥，两堆集那边还有个黄维，也是第一期的老大哥，邱清泉这个第二期的去指挥孙元良和黄维，他们也不会听。再说他听不听我的命令，我也没有把握，如果战役打败了，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哪，不行不行不行。”

我说：“那我就提不出意见了。”

刘峙说：“好吧，你回去好好休息吧。看看你们的校长有什么办法，现在搞成这样，越搞越乱了。”

刘峙直接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答复，杜聿明的任务很重要，你们那里的计划迟缓一步再执行。

接连几天都是大雨，到处是烂泥巴地，机械化部队动不了了。我急得很，打电话给邱清泉，邱清泉还没有得到杜聿明走了的消息，我说：“玉安哪，请你回徐州一趟。”

邱清泉冒着大雨从前线回来了。我把情况给他说了，说杜老板到北平去了暂时回不来。邱清泉问：“总座是什么态度？”我说总座大发脾气，想把宋希濂调来。

邱清泉很生气：“啊？宋希濂能挽救这个局面哪？我就不相信，我们徐州就没有人啦？”他的意思是怎么不把我邱清泉升起来。

我请邱清泉吃饭，他还是气冲冲的。

我说：“佯攻济宁，收复济南的计划，只好放弃，总座（刘峙）说他负不起这个责。”邱清泉跟我讲，这样一个重要的事情，朝里就没有人啦。意思是说，为什么我就不能执行呢？像冲着我发脾气的样子，他是黄浦第二期，我是第四期的，我不好多说什么，只是说：“你不要忘记了，我们都是杜聿明的部下，我们都

是委员长的部下，我们只能听他们的调遣，这样发脾气没有用，对你也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

我说：“我们这个计划暂推迟，黄河和运河我们还是继续封锁。佯攻济宁，我们先摆着一个架势，在京浦铁路要收复济南的六个军暂不动，你现在在陇海路要负起责任，把陇海铁路把守住，使解放军没有办法活动。请你回去封锁黄河运河，控制这条铁路，不能落到共产党手里，这是你的任务。”

邱清泉开始埋怨蒋介石：“校长是怎么指挥的？怎么搞得这么乱呢？”越说越生气，我怎么安慰也没有用，他说：“我也不回前线了，在徐州住一段时间再说吧。”

饭后，我又安慰他，说：“你赶快回商丘，佯攻计划要摆开架势，收复济南那六个军不要动。”

他说：“你这个计划很好，我的脾气呀大了一点，杜老总回来后你就不要提了，总座面前你也不要提。”

我说：“你的任务是守住这条铁路。这是一条长蛇阵，我们这条战线不好，假如敌人打过来，这条长蛇阵啊，我们顾得头就顾不得尾，不一定守得住，你还要注意把重点摆在商丘，商丘的对岸就是济宁，你要把那里守住。”

当时，我们摆的是长蛇阵，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西起商丘，东止连云港，摆成一字长蛇阵，从战略态势看，是所谓以徐州为中心的一点两线的机动部署。后来的事实是，刘峙没有料到华东解放军切断了右翼黄百韬兵团与徐州之间的联系，切断了两淮与海连间的联系以及和徐蚌之间联系，不但徐州右臂被捆绑住并被斩断，连中间一段及左臂也只好缩到徐州一点，一条长蛇变成瘫痪孤立的死蛇，动弹不得。

刘峙给北平的杜聿明打电话，杜聿明说计划不能执行，只能放弃。现在我回不了徐州了，如果锦州打得好，我就可以回来，如果锦州打得不好，我回来的机会就没有了。

刘峙还在打算盘：“解放军没有三五个月消化不了我们。”

我说：“你这个看法不对。共产党有连续作战的能力，不像

我们国军，我们没有三五个月整理不好。你看共产党还没有看清，等着看吧，如果共产党在一周之内还没有行动，还没有进攻徐州，那就是总座你说得对，如果三到五天共产党有力量进攻徐州，那就是我判断得对。”

第三天，解放军向徐州发起进攻，拣弱的先打孙元良。孙元良叫苦连天：“我只有两个军，共产党向我打来了，我怎么撑得住啊？”孙元良只有4000人的部队，装备也不好。4000人的部队不经打，眼看徐州动摇，我又跑去找刘峙，问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办？

刘峙说：“我准备撤到蚌埠去。”

我说：“放弃徐州，还要长官部通过。没有长官部通过，恐怕不行，不能乱动。再说放弃徐州也不容易，共产党已经把铁路切断，火车不通了，部队通不过去，你只撤个指挥部有什么用？”

“是啊”，刘峙说，“现在陷入困境了，越来越不行了。”

“怎么办呢？”我又一次问。

刘峙说：“没办法，只好等光亭回来再说。”刘峙说这个话的时候，有着现代化防御工事的锦州，已经被解放军攻克了。

这时，参谋长舒适存私下对我说：“我不想干了。弄成这个样子，自己给自己造成困境，由主动变为被动，前途无望啊。我想请假回南京，把家眷送到南京再说。我去请假恐怕不准，还是你帮我请个假吧，你有黄埔这层关系帮我说话，恐怕我还走得了。”

“送走家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嘛。”我说：“我帮你说说看。”

我对刘峙说：“舒适存不是黄埔同学，他不敢当面向你来请假。他请求到南京去一趟。”

“他到南京干什么？”刘峙感到很奇怪。

“送家眷。把家眷送到南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刘峙考虑了一下：“你帮我出出主意，是不是让他去？”

我说：“你准他10天假吧。我也想把我的家眷送走。让舒适存把我们的家眷送到台湾去，这样，我们在这里作战就更方便一些。”

“噢？”刘峙问：“你也是这样想的？也送家眷哪？好好好，

我准舒适存的假，但是你不能走啊。”

“我不走，我留在这里！”

1948年11月24日，我写了一首诗：

淮海战役军中纪实

连年烽火月中霜，云树低迷古战场。
北上援师悲末路，西征劲旅渡关乡。
漫漫白雪张天幕，冷冷旌旗蔽日光。
倦倚战场穷无策，无情把酒煮牛羊。

舒适存走后，形势越来越乱了。十多天后，我跑去对刘峙说：“杜老板不回来，舒适存假满也不回来，怎么办呢？”

“哎”，刘峙问，“舒适存怎么不回来呢？”

我说：“只好我去南京催一趟了。”我到南京还有两个目的，一是想把粮弹等作战的物资多准备一点，一是想跟参谋总长顾祝同谈谈话。

刘峙考虑了一下：“你坐飞机去吧。”铁路已经让解放军切断了。

我到了南京，住在中央饭店。正好，舒适存也住在中央饭店。我找到舒适存，他说：“乱成这个样子，你还在那里搞什么呢？简直是——”

我说：“不行啊。我们从责任上从道义上都不能说不过去啊。”

他很不高兴：“你回去能干出什么名堂呢？”

“你不回去，我还有责任呢。我帮你请的假，我是你的担保人，将来会追究我的。你好好考虑考虑。”

两三天以后，杜聿明到南京来了。杜聿明的一个弟弟是驻南京的办事处处长，他告诉杜聿明，参谋长和副参谋长都住在中央饭店。“噢？”杜聿明说：“赶快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我。”

杜聿明的弟弟找到我：“我的哥哥回来啦，找你和参谋长，

让你们两个人今天下午跟他坐一架飞机回徐州。”

我急急忙忙到杜聿明那里，杜聿明问了徐州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之后，他就叹气：“这个老头子不负责，责任不在我啊！我身不由己！”

杜聿明告诉我，锦州完了，林彪已经人关包围傅作义，咱们这40万人马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一步棋没有下通，都错了。“那边完蛋了，又要我回到这边来。我现在赶来南京开会，你和参谋长两个人不能离开我，你们两个人是我的左右手，你们在飞机场等我，下午四点钟我到机场，我们一道坐飞机回徐州。”

我回到中央饭店，跟舒适存商量：“如果我们不听杜聿明的话，会军法从事，会杀头啊！”

舒适存不表态。

下午3点多，我准备出发到飞机场，跟杜聿明回徐州。舒适存叹着气说：“那我只好跟你一道走，回徐州！要死也死在一道吧！”

下午4点还不到，杜聿明到机场了，他看到我跟舒适存都到了，跟我们讲：“如果我没有你们两个人，我什么都不行了。你们两个人要跟我死在一道！现在蒋委员长派宋夫人的飞机送我们回去，这是很荣耀的。上飞机！上飞机！”

这架飞机是宋美龄的专机“美龄号”。我当时想，顾祝同打了胜仗坐过这架飞机，我坐这架飞机从沈阳到锦州，现在又坐这架飞机从南京回徐州，这是很难得的。我这是第二次坐“美龄号”了，生出很多感慨。

12月的天气，雾沉沉的。天晚了，好像一下子就黑了。

杜聿明跟我并排坐。他一上飞机就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我一看表，心想，平常从南京到徐州顶多20分钟，今天飞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0分钟，怎么回事啊？往窗外看，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我问驾驶员：“从南京到徐州，平时只要20分钟就到了，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多钟头了，怎么还没有到？什么道理呀？”

我就把杜聿明碰了一下，杜聿明还是迷迷糊糊的：“怎么还没有到？怎么还没有到？”

驾驶员说：“我们已经到了徐州的上空，跑道上没有灯光，不能降落，现在我们飞往济南，正在找飞机场。”

杜聿明一听济南，一下子就醒了：“下面不是大明湖吗？怎么搞到这里来了？”杜聿明吼起来：“王耀武在这里失败了，共产党重兵在这里，我们如果一降下去，不是成俘虏了？赶快回头！”

我向飞机下一看，确实到了大明湖，我说：“这是济南，王耀武是在这里被俘的，现在这里是解放军的地方了。”

驾驶员就慌张了，说：“我还准备降落呢。”

我说：“降落？我们还没有到徐州，早就被俘了。”

驾驶员说：“我们经过徐州，下面一点灯火都没有，看不见跑道，也不能盲目降落呀。”

杜聿明问我：“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说：“会不会是徐州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杜聿明问。

我说：“我的判断，可能是徐州的电厂出了问题。”

杜聿明急了：“那怎么办？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了。”

我突然想起来，说：“有一次戴笠在重庆迫降，用了一个办法，我们也可以。”

“什么办法？”杜聿明急问。

我没有直接回答杜聿明，而是说：“马上跟徐州通话！”

飞机上的电话通徐州，我就打电话给刘峙，说：“徐州机场没有灯火，我们回来了请总座派人买二三十个风雨灯，沿跑道把灯摆起来，隔五尺摆一个，飞机可以降落。”戴雨农就这样办过。

刘峙告诉我：“这里的发电场被起义部队破坏了，现在徐州是一个黑暗世界了。希望你们立即回来！”

杜聿明也对着电话喊：“赶快去买风雨灯！”

我们掉转机头飞徐州。徐州机场的跑道上摆着风雨灯，能

看清楚跑道了。驾驶员说：“好了，我们可以降落了。”

飞机降落之后，只听见有个军乐队还吹着大喇叭欢迎我们，又听见刘峙在喊杜聿明，喊我的名字，黑暗中我们就是看不见人在哪里。杜聿明也大声喊：“总座总座，老师老师，你在哪里？”

刘峙喊：“我在这里！”

我们就是这样回到了徐州，情况多糟啊。

回到徐州，一片黑暗，到处都没有灯，刘峙的总部里点着一根根的蜡烛。刘峙派人搞了一点饭，我们马马虎虎吃了一些，杜聿明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怎么搞成这样？

我们在刘峙总部开了一个小会。刘峙说：“张克侠（原来是西北军的，现在是兵团副司令，后来是共产党）和何基沣（后来是共产党）这两个家伙叛变了。现在解放军先发制人，我们十几万人跟他们打，打到碾庄圩这儿打不过去了，碾庄圩离徐州只有15华里，你们回来就好了，把邱清泉那六个军也拿上去，还有李弥的三个军，都拿上去。从左右打出去。放弃徐州吧！”

当晚，我和杜聿明住在铁牛学校（蒋纬国办的坦克学校）。我写下这样一首诗：

无 题

一夜无眠又无语，彭城暗暗难安处。
何张造反名其谋，刘杜悲慌悲几许。
北望关东席卷空，南归吴楚机中苦。
错看灯火好辉煌，五岳泰山今易主。

“何张”，指张克侠和何基沣率部起义；“刘杜”，指刘峙、杜聿明；“错看灯火”，指济南早已解放，有灯火处是济南而不是徐州；“五岳泰山今易主”，指济南泰山已经归于人民。

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失败后，徐州右臂已失，徐蚌段被解放军切断。12月1日，从徐州撤退的前一日，杜聿明上午匆匆飞到南京见蒋介石，下午又飞回徐州总部。蒋介石的机宜是：放弃徐

州，迅速转移兵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

杜聿明立即把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这三个兵团司令叫到总部，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限于当晚将撤退的部署准备好，次日拂晓按照指定的路线向西撤退。

晚上杜聿明写了一个计划，是写给蒋介石的，叫做“三策计划”。

第一策，把白崇禧在武汉控制着的十几个军调到徐州这边来，增加我们的兵力，来一个主力作战，把解放军打垮（实际上，桂系白崇禧这十几万兵力他不动，这第一策就失效了）。

第二策，固守，消耗敌人的兵力，等待外围组织兵力来救援。

第三策，12月2日我们自己以军为单位撤退，撤至淮河，死守淮河，巩固南京。

杜聿明的“三策计划”当时是极端保密的，他工工整整地将“三策”写好，交给参谋长舒适存，让舒适存飞南京面呈蒋介石。

对于这三策，蒋介石就批准了第三策。

徐州危机时，正赶上杜聿明的老母70寿辰，杜聿明不能抽身，他的夫人曹秀清在上海主持祝寿。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到上海祝寿，馈赠了10万金元券做寿仪，杜月笙也前往祝寿，并赠以厚礼。夫人曹秀清通过电话把这些情况告诉在前线的杜聿明，杜聿明受宠若惊。在徐州，刘峙派副官处长在总部礼堂的讲台上悬挂了一个大大的金色的“寿”字，刘峙亲自率领总部高级幕僚和各兵团司令官，向金寿字三鞠躬，还请来京剧班子助兴。

总指挥部归杜聿明指挥，刘峙撤退到蚌埠。这时，南京的慰劳队男男女女飞到徐州前线，运来了一飞机的现洋作为犒赏。这里打了败仗，那里还来犒赏。

徐州的店门都贴上了欢庆胜利的标语。我自己也感到好笑，黄百韬兵团十多万人被解放军吃掉，还说打了胜仗，还跑到徐州来慰劳，真是天大的笑话。

杜聿明对我说：“你到机场去招呼慰劳队，这都是南京来的

一些大员哪，上海市市长，南京市市长，都来了。你还要去应付这个门面哪。”

我到飞机场去张罗。发现空军因为慰劳队只慰劳陆军，没有慰劳空军而吃醋了。这时，慰劳队察觉到部队有撤退的迹象，便慌慌张张地丢下慰劳品，返回机场逃命。空军正因为没有受到慰劳而生气，不但死活不让慰劳团上飞机，还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慰劳空军。我就做空军的工作，说：“你们要识大体，这里的情况你们也了解，慰劳慰劳，谁不明白我们打了败仗嘛，赶快把慰劳团送走。你们不要罢工，不要耍小孩脾气。”

我又转过来对慰劳团说：“你们为什么只慰劳陆军，不慰劳空军呢？”

“哦——，我们忘记了，忘记了。”

我说：“赶紧拿些礼物出来，现洋也拿些出来，慰劳空军。马上去办，这里不能久留，不安全哪。”慰劳团把现洋和礼物分一部分给空军，空军高兴了，这样才把慰劳团送走。我心里挺不好受，心想，我当这个副参谋长，搞到这里头，真是倒了霉！

总部在撤离徐州之前，杜聿明下命令将直属部队编成两个直属纵队，指定我任第一纵队指挥官，指挥特务团、宪兵团、工兵团、炮兵团、通信团等，指定警备司令谭辅烈为第二纵队指挥官，指挥警备司令部原属部队和地方部队、机关警卫、留守部队等等。编好了序列，指定了集中的地点和出发路线。到了时间，我和警备司令两个指挥官在指定的集中地点等了三个小时，只有特务团团长和宪兵团团长等少数军官来了。其余的部队并不执行集中的命令，跟在先头撤退部队的后面逃命去了。撤退的部队乱成一团，各部争先恐后，互相穿插，徐州至萧县不到50华里，从早一直到晚，还是可望而不可即，杜聿明的汽车在混乱的队伍中无法开动，只好下车，由警卫搀着徒步而行。

杜聿明命令李弥兵团派一个主力师殿后，留在萧县附近的山头上，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撤退，挡住解放军的穷追猛打。掩护部队必须留置一天以上的时间，如果解放军猛追，必须拦截。但

是，李弥的这个师还没有等到徐州的部队撤完，就在此日清晨先撤走了。

撤退的路上，还在吹牛皮。空军侦察，说是解放军没有大部队追击我们，我们很容易脱身。

徐州撤退的第六天午后3点左右，杜聿明正打算在贾砦宿营，得到空军侦察报告，说解放军部队分成多路与我们竞赛式地尾追，有的已超过撤退的先头部队。杜聿明大为吃惊，立即召集邱清泉、孙元良等会商，一致决定于当日（6日）黄昏6点分头突围。杜聿明将总部搬到邱清泉兵团司令部，好得到掩护。

突围之前，邱清泉跑出来说大话，他说：我跟共产党作战，就从来没失败过。杜聿明要我去跟邱清泉谈，我就征求邱清泉的意见，他说：以军为单位撤退，能不能撤退得出去，还有问题。他一共指挥六个军，他说：“我这六个军能够打出去，李弥和孙元良呢，恐怕他们的部队都不经打，而且我这几个军打，他们也不会出力。”

天色已昏暗，6点整，到了突围的时间，邱清泉忽然说反对突围，然后自作主张，下令就地宿营。邱清泉说：“突围？陈矮子（陈诚）现在是台湾的省长，地位很高，我们突围把重武器都丢了，将来我们到台湾，陈矮子要算我们的账啊，要杀头的。我看共产党吃不了我们，我不突围。”

邱清泉就是不动，杜聿明很生气，便问邱清泉：“为何不照决定行事？”

邱清泉：“一切由我自行负责。突围时将重武器丢掉了，即便是到了南京，又如何交账？”

邱清泉有六个军，李弥只有两个军，李弥一天到晚看着邱清泉，邱清泉怎么办，李弥就怎么办。李弥表示：“力量比我大两倍的都不突，要我去突啊。”李弥也按兵不动。

杜聿明竟然同意邱清泉的意见，又打电话给李弥，令他就地宿营，到第二天再说。

我听了一下子，炮火打起来了，很密集。我说：这个炮

文

文

II

述

II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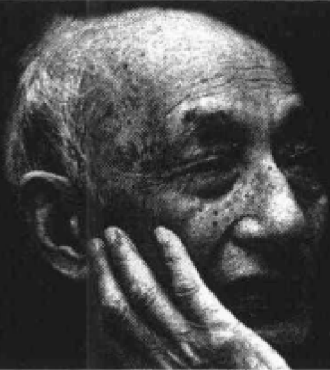
火——？邱清泉那里突围了？杜聿明说：不是邱清泉，是孙元良。

孙元良只有两个军，是四川部队，没有什么美式装备。我急了，对杜聿明说：“你这个总司令是怎么回事呢？决定突围，结果军令都可以违反了？”

杜聿明唉声叹气的：“邱清泉不突了，有什么办法呢？”

我说：“那就大家都不突了嘛，怎么搞得孙元良一个人去突呢？他的力量是最弱的了，一出去不就被吃掉了？本来我们的力量就不够！”

孙元良刚一突围出去，就被解放军吃掉了，白白送掉了两个军。孙元良率卫士数人化装逃到武汉，参谋长张益熙在突围中被解放军击毙，只有第四十一军严翊师的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在西逃途中也被解放军骑兵冲散。



第二十七章 围困陈官庄

- 我们四十多万人，被解放军二百多万兵力包围。
- 空投飞机每天达到120架次，很奇怪，都空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每天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
- 野草、树皮、青苗和骡马皮都吃光了。

1月2日那天晚上，我们撤到陈官庄，向邱清泉靠拢。我们的指挥部住在邱清泉第二兵团的防守地区。指挥部跟邱清泉住在一个大院，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防空掩体，杜聿明占一个，我和参谋长舒适存占一个，邱清泉也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防空掩体，他住一个，他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住一个。

我们四十多万人，被解放军二百多万兵力包围。

到陈官庄的第三天，下起了大雪。每天下大雪，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没有占一样。

一连半个月，天天下大雪。

我们在包围圈里，没有粮食，没有医药。

8日，赶修临时机场，请求南京空投粮食弹药，再作突围之计。

在雨雪交加中，南京派飞机来空援，空投飞机每天达到120架次，国民党的运输机和“中国”、“中央”两个公司的民航机，几乎全部出动了。

空投的事情是归我负责。我派人去收空投的粮食和弹药，可是，到空投场一看，很奇怪，都空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每天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

我想，这个空投司令是不是有问题呀？我就问杜聿明，杜聿明说：“这个人应该没有问题呀。这个空投司令在滇缅路还跟我去打日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我经常跑去看天，认为是风向不好。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共产党。我们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

来看我们，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共产党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共产党了。”

“噢，我知道了。”直到当了俘虏，我才知道为什么一空投就投到解放军阵地上的原因。

投下来的粮食弹药大部分都投到解放军那里去了，我们还有三十多万人要吃饭啊。就算是按空投一日最大量计算，也足够10万人一天所需。仍有二十多万人没有吃的。平均分配给三十多万人吃呢？每天晚上分配下去，只能吃一次稀饭，一天吃不到一顿干饭，军队一天只吃一顿稀饭怎么打仗呢？

我为这个事情搞得一天到晚睡不着觉。

粮食不够分配，偏偏各部队要粮食时，把数字搞得很大。

粮食弹药一投下来，许多官兵一窝蜂上来抢，抢粮食的抢粮食，抢弹药的抢弹药。我就派部队守着，说：“如果再有人抢，我就枪毙他！”

解放军那边一些女政工队员整天喊：“你们饿饭了，我们这边有吃的，树上挂的有馒头啊！”我们这边的兵就爬过去，从树上取馒头。看见他们爬过去，解放军也不开枪，女政工队员唱起了歌。我们没有办法禁止，怎么办啊，没有办法，很伤脑筋。一些官兵甚至还到解放军那里作客两三天之后再返回来。后来才发现，在包围圈中布满了解放军的地下工作人员，1月9日夜间突围开始时，包围圈中到处是给解放军发联络信号的火光。

我们不断有伤亡，但是没有医药，我看见士兵的伤口都烂了，发臭生蛆，既得不到治疗，又没有地方送，很惨。我就伤兵问题请示杜聿明，杜聿明说：“不病不伤的都顾不了，还顾得上他们！让后勤医务自行解决吧。”

邱清泉和李弥为粮食的分配吵闹不休，各个军师团营也因为粮食闹得如同水火一样。李弥向我提出，说邱清泉第二兵团粮食分得多，要求在他一兵团控制的地区开辟空投场。李弥嚷嚷：“我们不相信分配，你们不公平。”李弥自己开辟空投场后，试投

文

强

①

②

③

④

时，一投就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为了多分配一点粮食，李弥又放弃了另辟空投场。

有一天，我们看见地里小麦青青的，杜聿明说：“我们好久没有吃过青菜了。能不能到地里挖点麦子吃啊？”我们就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到地里挖了些青麦子回来，做菜吃。一吃——吃不得！青麦子看起来跟韭菜一样，实际上那上面都是小毛毛，根本不能吃。杜聿明很丧气：“唉，不是我们理想的。”

南京空投下来一些罐头，我们当官的可以吃罐头，当兵的可就更苦了。接着，南京又空投下来一些大饼。可是几十万军队光靠空投怎么过呢？实在饿极了，把一些辐重骡马也都杀了吃，到后来，野草、树皮、青苗和骡马皮都吃光了。

19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停止了。

23、24日，天气仍没有转晴的迹象。我们特地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学会使用，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哪知雷达发生故障，无法使用。

29日，天居然晴了。空投又开始了。

我在空投场视察，解放军打了几炮过来，把我们一个伙夫和政工队的两个女孩子打死了。我一看这个情况，很危险哪，如果炮火密集打过来，不到掩蔽体的都会轻则受伤，重则被打死。

陈官庄整天下雪又下雨，烧柴也没有，老百姓的房屋被拆光了，连老百姓坟墓里的棺材都挖出来了，但是埋在土里的棺材挖出来是烧不着的。

我说：“这是天要亡我哪！”大家也在讲：“这回完了，这回完了！”杜聿明自我安慰说：“我们有现代化的空投补给还这么困难，共产党军队一定比我们困难得多。”

在包围圈中，除了编入建制的官兵，还有不少闲散的国民党人员、机关公务人员和海、连、徐州随军而逃的男女学生、市民、地主之类的“难民队伍”，他们不在编制之内，因此一点口粮也没有。邱清泉乘机将他们编入部队，建了一个暂编旅，并委任兵站司令耿文哲为暂编旅旅长。最可怜的是那些随军跑到这里

的女学生和妇女们，被迫做了“临时太太”。在空投场的周围田地上挖了一个一个洞穴，上面盖着张开的降落伞，里面是军官和“临时太太”，还有准备化装逃跑的假夫妻。

包围圈中，竟然出现了“小集市”，几乎一切日用品，以及手表、戒指、手枪、银元、衣着和柴米等物，都可交换，俨然成了一个闹市。有权有势的军官们，利用贪污、巧取来的粮食、大饼、罐头之类的空投品，信口开河地去换取人家贵重之物。

总部办公厅主任郭一予和总部政务处处长左偕康，听说在包围圈东南角解放军控制的青龙集阵地上，准许难民来往，以为有空子可钻，密商借此脱围。他们将包围圈中国国民党机关职员及由徐、海撤退的军官眷属等，组成一个名为“难民还乡团”的大队伍，用白布做了一面旗子，上书“难民还乡团”字样，以为这样就可以由解放军封锁线混过去。开始，杜聿明认为非战斗人员走一个少一个，听任郭一予和左偕康两人去办。后来为了通过防守线的放行问题，不得不正式批准，并通知李弥兵团的防守部队放行。这支“难民还乡团”刚刚通过李弥兵团防守线继续向前走的时候，解放军方面发现这大队人马中夹杂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便向队伍密集扫射，而国民党军这方面，又惟恐泄露包围圈中的军事秘密，于是也就一阵乱枪扫射，企图灭口。在双方的炮火下，“难民还乡团”伤亡不可计数，郭一予、左偕康两人以及最后一批还没有走出李弥兵团阵地的，见情况不对，马上折返，向杜聿明诉苦。邱清泉事后知道郭一予、左偕康企图脱逃，认为丢了“中央军”的脸，要将郭左两人枪毙。我出来为他们两人说了许多好话，才保住了两人的性命。

有时天晴了，但只晴了一下，马上又下雪。机械化部队动都动不了，一点用处也没有。蒋经国办了一个训练坦克兵的铁牛学校。打了败仗之后，铁牛学校的全部坦克车都跟着我们部队走，这时也被困在陈官庄，到处是雪，到处是烂泥，坦克一步走不动，陷下去就出不来了。没有一件顺利的事，所以我说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占一样。

一次，杜聿明正在院子理发，院子的四周是房屋，中间有一棵树。天忽然晴了。有个孙元良兵团的少将视察官，黄埔第六期的，叫尹晶天，他来了，对我说：“参座，我们坏就坏在我们院子里的这棵树上。”

“怎么坏在院子的树上呢？”我很奇怪。

他说：“你看，树被围墙围在里面，是个‘困’字嘛。”

正在理发的杜聿明听他这样一讲，抬头看看树，说：“把这棵树搞掉！”尹晶天自告奋勇地把树砍掉了，逢人便说：“杜老总要我砍的，从此我们就大吉大利啦。”

舒适存受杜聿明的指派飞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增加空投。舒适存动身之前，我对他说：“你到了南京，到我一个朋友那里去看看，让他给我买一套便衣，你替我带回来。”

舒适存面见蒋介石，报告了陈官庄的困境，蒋介石批准每天空投增加到300架次。蒋介石还写了一封手谕交给舒适存，要他立即到联勤部去查询有多少库存的防毒面具，次日押运回部。舒适存回到陈官庄时，随运输机带回了800具防毒面具，以备突围时用。就在舒适存回陈官庄的当天，蒋介石空投给杜聿明一封亲笔信，意思是积极作突围的部署。

同时，杜聿明收到了刘伯承的信，我收到了林彪的信，但是我们把信烧掉了。

一天到晚，都是着急，想不出办法，正在很困难的时候，又传来黄维兵团失败的消息。黄维距陈官庄还不到100里路，在双堆集那边，差不多有12万多人，一下子被解放军解决了。当时说黄维没有指挥好，后来一了解，也不能怪黄维。刘伯承部队尾随黄维，一直追到了双堆集，黄维部队就走不动了，停了下来。黄维有个计划，到了双堆集附近，向南过去60华里到浍河边上，如果渡过浍河，部队就有可能得救。对于这个计划，他没有跟谁商量，自己放在心里。这时他手下的少将师长廖运周，是黄埔第五期的，他向黄维献策，说：“我家住在浍河边上，是安徽寿县人（廖运周是个共产党，他三个兄弟都是黄埔学生，都是共产党），

你如果突围，我打头阵，60华里顶多三个钟头就过去了。搭个浮桥，只要过了浍河就安全了。”黄维一看廖运周是黄埔学生，就说：“好好好，你带路。”结果廖运周率部起义。黄维的主力军是十八军，全套的美式装备，十八军并不知道黄维的计划，部队出发后，忽然之间开了几个口子，解放军进去了三四个纵队，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黄埔第七期）连声说糟了糟了，赶快把汽车集中起来，摆开一道防线。黄维也急了，坐上一辆坦克车想冲出去，被解放军堵住了。“下来！下来！”黄维被俘了。

我特赦出来后，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在宴会上，他讲当年怎样向黄维献策，讲得非常高兴，说黄维怎样糊涂，他自己怎样立功，后来民革让他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黄维一见他，鼓起两只眼睛，不跟他说话。黄维对我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杨伯涛也在座，也骂廖运周。我说：“那时我们对刘伯承、邓小平很轻视，认为他们不是军人出身，现在看起来，我们是错误的。你们不对，不要骂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各人命里一块天，不要到了这个时候还骂人家，还不理人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嘛。”

黄维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天下多少事，都是转眼间，跟做了一个大梦一样。黄维比我大一岁，他死了差不多30年了，我这个人还在。

包围圈里传开了12月27日黄维兵团被歼的消息，我们预料到解放军第二步进攻的行动就要到来，突围的部署也就更加迫切。

空军总部作战署副署长董明德飞陈官庄和杜聿明商订陆空联合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由空军大量投放瓦斯弹，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董明德在陈官庄停留了一周，作战计划不见诸于书面。

杜聿明到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召开会议，他说：“有美国杜鲁门总统支持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怕！南京蒋总统已经准备好了60个美械团的装备，谁先冲破包围圈到达南京，就先装备谁！”

刘峙从蚌埠坐着飞机在上空给我们打气，空军副司令员也在

文

文

11

12

13

14

飞机上喊：以后的空投由他负责，一定保证粮食、弹药投够，让大家吃饱饭。

舒适存从南京回来，说我那个朋友不在南京，只有他的夫人在家。舒适存没有讲没买衣服的事，他自己上街给我买了一身便衣。他说：“我给你带了一套便衣回来，不晓得合身不合身？”

我解释：“我这是备而不用。”

我打开箱子一看，一套崭新的西服！一件豪华的呢子大衣！“你看看，我们突围要化装出去，这个衣服穿得出去吗？要是当个外交使节还可以。”

舒适存说：“哎，很贵的呀。”

“贵？穿得出去吗？”

他也好笑：“我找人帮助去办的，人家也不知道是特为化装用的。”

突围时，我穿的是一套尉官的棉衣，一直到被俘虏。

杜聿明肾脏有病，身体不好，邱清泉有一天到杜聿明的掩体里，表面是恭维杜聿明，实际上是想把他挤走。邱清泉对杜聿明说：“我很感激你，我有今天都是你的提拔。我怎样报答你呢？你有病，还是离开这里到南京去吧。我们这里有空投场，有飞机，很方便。这里的事情呢，我们这些兵团司令推选一个人来指挥。”邱清泉的意思是由他自己来指挥。杜聿明坐在掩体里不吭气，气氛很尴尬。沉默了一会儿，邱清泉对我说：“哎，念观兄，你这个参座也来参加意见嘛。”我只好说：“玉安先生的动议很好，很爱护杜长官。但是这里维系军心的中心人物还是杜老爷，没有我们校长的批准，他不能走。”

杜聿明这个人很稳重，他不说话，既不说“由邱清泉负责”，也不说“向校长打电报请示”，无论如何不开口。

邱清泉一出掩蔽体，杜聿明就一拍桌子，显然是有话要对我讲。他气呼呼地说：“你听到没有，他是向我将军哪！”

我说：“我知道，我说了那些话，就是给你解围。我主张要突围就早一点突，没有粮弹，没有医药，为了空投问题，搞得我

一个多月没有睡过觉。现在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对了，天不晴，人事上的纠纷也特别多，如果早一天突围，就好一天，再不突围，就来不及了。”

蒋介石批准的突围时间是1948年1月9日晚上。

解放军知道我们要突围了，在8日拂晓到9日下午4点左右，发动了全面总攻。李弥兵团一攻就垮了。邱清泉的第五军还能支持一下（第五军的军长叫熊笑三，是黄浦第四期的，邱清泉手下的一员战将），其他各军还能支持多久，谁也没有把握。邱清泉丢下杜聿明的指挥部不管，自己跑到第五军军部，杜聿明为了安全起见，也到了第五军军部。

杜聿明打电话给我，要我到第五军熊笑三那里去一趟，我就去了。杜聿明说：“参谋长到南京去了，回不来了，把你升起来，做我们总部的参谋长，一切都归你指挥，等时间一到，我就跟第五军突围了。”我是临危受命啊。

指挥部交给我负责。

我们准备晚上9点钟以后突围。解放军的炮火打得很密集，我们的炮火也打得很密集，杜聿明跟邱清泉在第五军的掩蔽体里，只等时间一到，他们就行动。

我们连房子都没有了，我选了一个空地上的冰窖作为“徐州剿总”的临时指挥部。

各方面都通过电话找我，都是紧急电话，说被解放军的炮火打得抬不起头，要我派队伍去增援，我就告诉他们：这里没得队伍增援，只有死守，哪里的部队都调不动，我还没讲杜聿明要离开这个话。

到了晚上9点多，杜聿明又来电话，要我去熊笑三那里。我又去跟杜聿明见了面，跟邱清泉也见了面，邱清泉讲：“你放心好了，我别的保不住，一定要保护我们的总座，我们的总座还是能保护得了的。”他又向我说大话。我说：“但愿如此吧！”

我又回到我那个冰窖指挥位置，哎呀，又是电话，要我救援，派部队增援，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只有死守，别无部

文

强

①

②

③

④

队可调!

晚上10点多钟，解放军的炮火从四面八方陈官庄轰击，包围圈中到处都是枪炮声和火光。

到了午夜12点整，杜聿明又来个电话，对我说，他已经决定执行“第三策”，要指挥部全体人员到第五军军部随他行动。

我们在密集的炮火中赶到第五军军部时，杜聿明也没有见到，邱清泉也没有见到，那个掩蔽体里连灯火都没有了，我喊杜老爷，喊邱清泉，没有回声。特务营营长杜宝惠在寨子外面喊了一阵，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原来，杜聿明挂上电话后，就和邱清泉一道自己突围了。

我说：“杜聿明，杜聿明，你就顾你自己了，连最后跟你说句话都不行!”

我只好又回到我的冰窖指挥部，一会儿调兵，一会儿增援，一会儿说“顶住”。其实还顶住什么呢？局面全乱了，到处是乱枪，有一个炮弹车也爆炸了，我从冰窖里钻出来，摸摸没有受伤，一看满地都是尸体。

12点以后，我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不了了，就问身边的人：“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杜聿明的主任秘书提了一句：“这里有一封很重要的信，是刘伯承写给杜聿明的，这封信怎么处理？”

我说：“这封信我看到过，是要杜聿明去投降，这封信你们处理掉。”他们就把这封信撕得粉粉碎，让风吹跑。主任秘书又问：“还有些文件呢？”文件中有杜聿明的“三策”原稿和蒋介石给杜聿明的亲笔信，我说都毁掉。

我的下面还有一个副参谋长，他说：“报告参座，现在参座也是你，总指挥也是你，这个地方呆不了了，你准备怎么办呢？”他又说：“他们突围了，我们也突围，要死就在战场上打死！”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一直跟着杜聿明的这伙人就散了，自己逃命去了。

一直打到快天亮了，各方面也没有电话来了，炮火还是打得

很密，我就跑到战场上一看——满战场都是丢掉的行李，丢掉的包袱，打死的也就不知道有多少！

我一数我身边的人，还剩九个人了。我们逃出冰窖，到东南角约20华里处的小河边停下来，找到一个洞，钻了进去，我说：“这样吧，你们靠近我，这条河岸还可以靠得住，解放军的炮火还打不到这里来。”大家倒在地上睡着了，这样，又挺过了一个多钟头。

醒来之后，天亮了。我说：“现在大势已去，我们蹲在这里也没有用，出去看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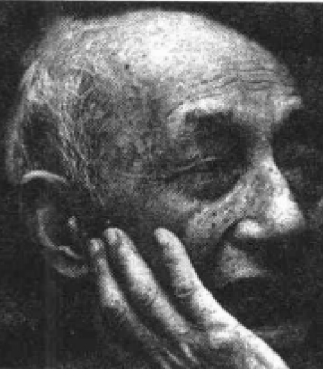
看见来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都是十五六岁，年纪很轻。他们发现我们了，拼命往我们这里跑，喊：“我们手下一个不留，都干掉！”我们赶紧往地上一倒，手握卡宾枪，身边的人说：“把他们干掉！”

我一想，大势已去，还是不要打了。把他们打死了，还不晓得解放军有多少人呢，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也不能挽回大局了。我喊：“不要打了。我们的武器摔在地下，让他们捡武器吧。”

这些小孩很勇敢，上来就抢武器，背枪回去报功了。我身上还有一支三号左轮手枪，把手枪握在手里，准备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这时，我的卫士（从徐州招募来的一个水泥匠）一看我摸手枪，就一把抢过手枪，丢到后面的地上去了。我要用枪自杀也不可能了，那些小兵把武器抢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收武器了，顾不上理睬我们。我一数，还是那九个人，我的参谋啊，副官啊，警卫人员啊，我就跟他们讲：“现在大势已去，怎么办呢？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们各自逃命吧！”我一说这个话，他们都不离开我，他们说：我们不忍心离开你，我们逃出去有什么意思呵？你放心好啦，看他们把我们怎么办吧。

不一会儿，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我们俘虏了，送到离陈官庄大约二十多里路的解放军的俘虏营。

程颂公的话应验了，我当了俘虏。



第二十八章 成了战犯

- 我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
- 解放军说我应该吃细粮。什么是细粮？我不懂。
- 诉苦的那个人原来是黄百韬兵团的，他说：“我被俘才一个多月，已经在解放军里立了功。”我心里想，共产党厉害啊，国民党训练好几年的部队，一个月就成了他们的人了。
- 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72号。

我到俘虏营的时候，正是开晚饭的时候，被俘虏的一共有好几百人。

站队的时候，那个水泥匠把我往后一拉，让我站在最后排，小声对我说：“前面站的参谋让我告诉你，你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

那时正是三九天，很冷啊。看到我去了，一个炮兵指挥官，是个少将，他从自己脚上把呢子绑腿摘下来，缠在我的腿上，解放军就注意到我了。一个工兵团长，是少将，他送筷子给我。还有给我送缸子的，有给我送毛巾的，解放军一看，这个人不懂得是他们这里面的什么官，这个人的官职一定不小。

解放军清查到我这里，我说：“上尉书记官。”他们问：“上尉书记官？怎么有将官给你送东西？”我不说话。

吃完晚饭后，解放军的政委（也是个湖南人），他们喊肖政委找我谈话。他们跟我讲：“等一下，肖政委准备了水果，准备了香烟，请你去谈谈话。”

我去了，屋里摆着个八仙桌，政委和其他工作人员对我很客气，政委说：“你是个什么官呀？你一来时的时候，你们那些被俘的将官，有的送裹腿，有的送水缸，你是个什么官啊？”

我说：“我不是个什么官，我是前线指挥部的上尉书记官。”

“噢？上尉书记官？那些少将、中将都对你那么客气，你的地位可不像上尉书记官。”

我说：“我就是上尉书记官。”

他说：“你放下包袱，我们解放军对于你们，作战的时候是

敌人，你们放下了武器呢，我们就是朋友，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要怕。”

他跟我讲了一番话，我也不说别的，就说：“上尉书记官。”

搞到很晚，解放军政委说：“明天上午，我们要召集一部分人学习，你是个上尉书记官，总是有知识的人吧，明天有篇社论，请你读一读。”我说：“可能我读报纸还行。”

第二天，从俘虏中挑了几十个高级军官学习，要我读报纸。这个报纸的文章我现在还记得起：“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拿着这个报纸读了。读了之后。解放军就鼓掌，说读得好，读得好，到底是有文化的人，不愧是个上尉书记官。

姓肖的政委又摆起水果香烟，把我请了去。他这次的问话就不对头了，他说：“你们那个前线指挥部原来有个中将副参谋长，打到最后又升起来当了代参谋长，高高的，瘦瘦的，你这个上尉书记官认不认识这个人啊？”

我说：“隔得太远，我只是上尉书记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他说：“这个人是湖南长沙人。”

我说不晓得。

“那个中将姓文，叫文强。”我看他们很了解情况，但我就是不承认。

他们不问我了，让我抽烟，我说我不抽烟，水果我也没有吃，这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解放军说我应该吃细粮。什么是细粮？我不懂。他们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条，里面打了两个鸡蛋，说本来至少应该有两个菜，现在是作战时期，暂时委屈一点。过了一会儿，又给我送来了被子（我的吉普车不见了，上面放的旅行袋也不见了）。

政委来了，说：“你就是那个中将参谋长。你在东北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将！”他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不正是我自己吗？他说：“你那个时候好威风啊。”

好了，把我戳穿了。解放军已经把我搞清楚了，就是要我自

己承认，我心理很明白这一点，当时只想找机会逃出去。

他说：“我们就是要你自己承认，让你读报呢，就是让你亮相，让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你们里面已经有不少人检举你了。给你当卫士的那个水泥匠，我们已经给他安排工作了，水泥匠嘛，工人阶级。放下武器就是朋友，你自己承认比我们揭穿好。你一定很辛苦，晚上我看见你冷啊。胳膊缩在大衣里，两腿蜷着，现在三九天了，这样冷了，你呀，晚上不晓得你怎样过的，现在请你吃细粮，给你准备的帽子，准备的衣服，优待你。政委把自己戴的帽子取下来，戴在我的头上，政委说：“今天晚上哪，还要你做一件事情，请你给战俘讲讲话，你只要上去承认你是中将代参谋长。只说这一句就行了。”

当晚，在场子上摆了一个八仙桌，有三四百俘虏，围着八仙桌站着，我说：“这边的政委让我讲两句话，讲什么话呢？是我们指挥部的代理参谋长，是个中将。”

我一讲完，解放军把我从八仙桌上接下来了，送我到屋里去，到了屋里，我听见外面讲话的声音，还很大，听他们说：“你们的最高指挥官都承认了他自己是中将代参谋长，你们里头还有打埋伏的没有？如果有，希望你自己暴露一下子，我们优待俘虏。”

散会了，我刚一出屋，好多人就包围我了，说：参座参座，你刚才一两句话立了很大的功劳，我说：“怎么？”

“李弥兵团的一个政工处长，是个少将，自己也承认了，他是打埋伏的。你说完，一下子站出来11个。”

我一听，“哎呀，解放军真厉害啊。”

那天晚上，我单独住在一个房间，吃细粮，还有被子。

两三天后，把我送到徐州上火车，经过梁山，送到山东潍坊。到了微山湖边的一个村庄，要我们就地休息，听诉苦。诉苦的那个人原来是黄百韬兵团的，他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我被俘才一个多月，已经在解放军里立了功。”我心里想，共产党厉害啊，国民党训练好几年的部队，一个月就成了他们的人了。

到了山东潍坊益都，住在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他原来是山东省主席，黄埔第三期的。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后来又出来七八个人，都是中将以上的。其中有两个是孙元良兵团的军长，我问：“你们的兵团司令呢？”他们说：“现在恐怕在台湾吧。”

我们这十几个人被列为战犯，编了一个“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不能出院子大门，大门外有警卫，在院子里，一切都优待，可以随便活动，自己办伙食，还自己拿钱做点好饭好菜吃，高度自治嘛，解放军不限制我们，我们的事情归我们自己做，王耀武对这里比较熟悉了，他说：“分工合作吧，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自己报名。”他先说：“我报名洗碗筷，全部的碗筷归我洗。厨房里的清洁卫生归我来办。”我们要跑十几里路去挑水来吃，有的就讲我年轻，体力还好，挑水送开水归我。还有山东省省党部的一个委员说：“我报名扫地，扫地归我，外面的地方太宽，大家帮我的忙。”

我一想，我争取个什么事呢？我就说：“我会做湖南菜。我报名做湖南菜！”听我这样一说，有个在四川部队当军长的，他报名做四川菜。后来实在没有事做了，有人就报名“我来烧火”。15个人都争取到工作啦。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说起来也有意思。溥仪什么都不懂，人家告诉他要懂礼貌，处事要让人，上车让人家先上，溥仪就让人家先上，下面还有个服务员，他还让人家先上，等服务员上去后把车门关上，车开了，把溥仪拉下了。

王耀武说一口广东话，每天起床都说：“吃糖吃糖（起床起床）。”

在这个地方住了将近三个月，搬到济南附近，住在城外的一个大地主家。有一天学习的时候，忽然让我转移，把我弄到济南城里的一个图书馆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英国的领事馆，后来是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部，里面有很多的房子，图书不少，都是俄国的，是苏联国家书店送给解放军军区政治部的，

文

文

①

②

③

④

我的床铺设在这里头，我很高兴，我想这里有很好的图书呀，马列主义的书，都是我没读过的啊。我到图书馆不久，来了一个馆长，我叫他蒋大胡子，他说这些图书你什么时候要看都可以，你就在这里安心读书吧。有一天，门口的卫兵忽然送给我10包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我觉得奇怪，问：“这个香烟是什么人送我的？”

卫兵说：“就是你那个头头。”

我想我哪个头头？

他说就是杜聿明，他就关在你的隔壁。他也知道你就关在他的隔壁。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周恩来致函济南，还有康生也到了济南，说对于你们要优待。所以让你们读书。

我就一天到晚看书，什么书都看。我在这里关了八个月，在这八个月里，我读了不少书。

蒋大胡子是管监狱的，一天，他拿着一本《马克思传》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留胡子的老头是什么人哪？你认识不认识呀？”

我说：“这是马克思嘛。”

“哟，你怎么知道他是马克思呀？”蒋大胡子说，“我没有文化，也没有读过书，看见上面的人也不认识。那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呢。这里这么多书，你读吧。”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拿了一本《列宁传》。他问：“这个小胡子的人，你认识吗？”

我说：“这是列宁嘛。”

“列宁你也知道啊？”蒋大胡子挺惊奇。

以后，他把《恩格斯传》、《斯大林传》都拿来了，要我给他讲，他说：“你这个人的学问还不小啊。我们不知道的，你都知道。”蒋大胡子虽然没有文化，但对人很好，和我处得很有感情。

有一天我们开饭，卫兵把饭菜拿过来，一开门，我看见对面那个房间里也是个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我看到他，他也看到我了。我就告诉蒋大胡子，对面房间那个人我认识，叫做陶默庵，

是国民党的一个厅长。他说：“你认识他啊？”

我没有回答蒋大胡子的问题，而是说：“你们没管好，我看见你们用一根绳子把人家捆在床铺上。搞得人家直喊冤，你们是个监狱，怎么一点监规都没有啊？”

蒋大胡子说：“我们过去没有搞过监狱，监狱应该有什么监规，我们也不知道。”

我说：“监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肃静，不要搞得犯人打犯人，犯人骂犯人，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

蒋大胡子问：“你怎么知道啊？”

“我在国民党里也坐过牢，我怎么不知道啊？”

“哎，那你写几条给我看看。”

我就给蒋大胡子写了十几条，意思是监狱里要肃静，不许打骂犯人，使犯人心安。蒋大胡子他们拿回去一研究，认为很有道理。蒋大胡子又来了，我问：“你拿绳子把那个人捆在床铺上，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们有三个人，跑到我们监狱附近，不知道是不是要搞破坏，那里是我们的汽油库，我们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我说：“你们问问嘛，是什么地方人，什么职业，跑到监狱汽油库来干什么？是来搞破坏还是来干什么，你们问问嘛，调查嘛。”

过了三天，蒋大胡子又来了，说：“问清楚了，是傅作义的逃兵，不是来偷汽油的，也不是来搞破坏，他们还并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个汽油库，我们的人就把他们抓来了，他们又哭又骂，觉得屈啊。”

蒋大胡子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监规贴在监狱里，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条。这些条子贴起来，监狱里再没有哭的了，再没有吵架的了，蒋大胡子说：“你的那些条子写得好。”

蒋大胡子下面还有一些年轻的管理员，有时我就跟他们讲：“一方面你们当看守员，另一方面你们可以好好学习嘛，买些小

文

文

11

12

13

14

学课本读一读，文化就慢慢提高啦。你们可以吹笛子，可以拉胡琴，学点东西嘛。”

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监狱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我每天在监狱里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周恩来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72号，72号就是文强。

我想，俘虏也送到监狱？周恩来也没有见到，是怎么回事呢？

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个东西。我说：“写个什么东西呢？写封信吧。”监狱长说不是简单的信的问题，你们反共反人民，要写个悔过书。

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说：“我不写。”

我说：“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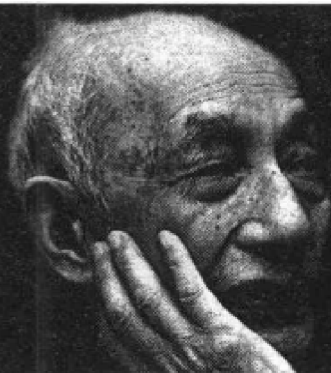
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说：“毛泽东是我的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我想我是文天祥的23代孙，不写就是不写！这样，我26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我曾经问过，这个监狱为什么叫做“功德林？”有人告诉我，这里清朝时是一个古庙，这个古庙就叫做“功德林”，古庙被拆后，修建了功德林监狱。为什么又叫模范监狱呢？戊戌变法后，学习外国实行新法，起了个名字“模范监狱”。监狱里还有块碑，碑文是梁启超写的“功修维新，改良司法”。

功德林是个旧式监狱，中间有一个高堡，站在上面，东西南北都看到了。我在里面思想波动很大，因为把我列为甲级战犯，杜聿明倒是乙级战犯，我想，甲级战犯，怎么把我搞得这样高呢？够得上杀头的了。后来，又给我加上一个“审”字，我不明白，这高高低低地是怎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审”字就是这个人还在审查。我以为是要审判了，要定刑了，思想波动，其实是多余的。

在功德林关了十多年后，1958年，我被送到了秦城监狱。



第二十九章 最后一批特赦

- 1975年3月19日，我被特赦了。
- 我马上拿起笔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惟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
- 1983年，我们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 我为黄埔同学会的事跑遍了全国。

1975年3月19日，我被特赦了，是最后一批被特赦战犯中的一个。

这一天，是个平常的日子，但对子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向全体在押战犯宣布特赦释放。

特赦后，让我填个表格。我拿起笔就填，工作人员说你考虑一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去向，留在大陆我们欢迎；去台湾我们欢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创造条件。我觉得共产党对我们的宽大可以说到了极点。我马上拿起笔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惟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我非常高兴这件事。

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我们到鸿宾楼参加宴会的那一天，全国政协一个副秘书长特别通知我：“你分配到全国政协工作，做文史专员，工资每月200元。”他还说：“在你之前，杜聿明、溥仪、溥杰等等，都是文史专员，这一个制度是周恩来总理定的，这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位，你虽然后来一步，也是这个职位。”

特赦这一年7月，组织我们到延安参观，还到了西安、宝鸡，到了三门峡，到了红旗渠。这一路上，我很兴奋，即兴写诗：

西安至三门峡道中

行遍秦川梦亦甜，云山惆怅出潼关。
陕州旧址成追忆，狄市新城正好看。

高坝欲穷千里目，大河轻挹巨龙澜。
人民双手无边力，遍地愚公不畏难。

特赦这一年10月1日，我被邀请参加了国宴，也写诗一首：

国宴即席吟

辉煌璀璨夜灯红，国宴欢情八亿同。
祝酒我心知感戴，交觥杯影入秋容。
普天荣庆隆青史，万里澄明净碧空。
爱国一家赢一醉，挽弓同扫害人虫。

参观回来后，要成立学习小组。把过去的组长撤销，重新选举组长，二十多个文史专员无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选出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过去，组长是政协指定的，可是这次，政协副秘书长说指定的不如无记名投票好。第一次投票结果，我是票最多的一个，副秘书长就宣布：“选举结果，由文强做学习组长，还有个票居第二的，当副组长，得票第三多的是沈醉，他也当选副组长。”

这个组长一当，就是5年。5年后，我提出辞掉，我说我不能再当这个学习组长了，按民主制度，另选别人。结果投票选举，又选的我。

又过5年，再选组长。我说我都干了10年了，够了，不要再投我的票了。政协的领导说：“现在你们这些人都老了，人数逐渐减少了，你们学习的时间不像以前那样限制了，自由学习就行了。”结果我又当了学习组长。我这个学习组长一共当了15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为组里每一个人服务，谁家有什么困难，我就跑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上报，把每一个人的生活搞得很愉快，得到大家的赞誉。

1983年，我当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次很有意思，一下子增加了我们8个做政协委员，而过去都是增加一个两个的。这

一年，我们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当上了政协委员。我记得新华社有个记者采访我，问这次你们当选政协委员的有多少？”

我说：“8个。我们这8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记者说：“你这个说法很好。你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显什么神通呢？”

“我们的神通哪”，我说：“是和平统一祖国。我们是黄埔学生，希望国家早点统一，这是最大的任务。我们黄埔学生有资格说这个话。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

我晚上睡觉做梦都希望祖国早一天统一，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没有变，只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

文史专员一定要写文史，如果不写文史，就不是一个文史专员了嘛。我尽可能地写出文史材料，写过西北王胡宗南，写过军阀孙殿英，写过汤恩伯等等，这些文章在我们这里登了，在台湾也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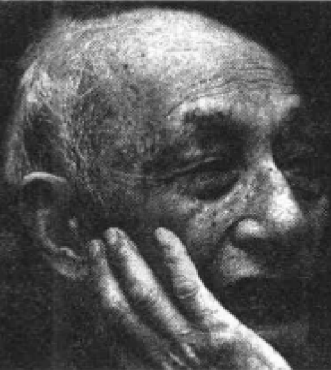
一天，来了个姓赵的人见我，我问你是干什么事的呀？他说：“我是北京工人日报的记者，我的名字叫赵云生，是赵朴初的堂弟。”他说：“那时卫立煌，带着他的参谋长到延安，见了毛泽东，见了周恩来，见了朱德，他走的时候，刘少奇把我派给卫立煌当秘书，现在我倒霉呀，连我是共产党都不承认了。”我说：“那这个问题就困难了，找我有何意义呀？是恢复你的党籍吗？我是国民党的呀，你找我有什么用。”他说：“跟你谈谈，我心里边舒服一点了。”后来这个人死掉了，赵朴初还写过一篇文章吊他这个弟弟。

1984年，正式成立黄埔同学会。我为黄埔同学会的事跑遍了全国。我除了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的理事外，还是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那时在北京的黄埔同学有六百多人，在筹备会上投票选举，还是以票数的多少来决定谁当会长，我的票最多，大家选我当会长，我对大家说：“你们不必这样安排，我是个爱国人士，选会长需要找一个党员同志，是党员可以根据党的政策办事，落实党的政策比较方便，我不是党员，凡事只能建

议。要我当副会长呢，我当。”我推荐别人当了会长，说：“你来当这个会长，我跟你合作，把我跟台湾的关系、海外的关系拿出来。”一直到现在，我跟黄埔同学会合作得很好。在黄埔同学会之下，我们还办了黄埔大学，我是副董事长。现在我老了，我说：“我这个副董事长不当了，当个顾问就行了。”

共产党还把我安排到民革中央，做顾问，做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的重要会议，都请我出席，只要来个通知，我就一定到会，每次提出一些建议。

特赦后，我做了这些工作，我把这些活动叫做蜻蜓点水。



第三十章 老大归乡

- 这么多人都因为我而被枪毙了，尽管我很想回老家看看，但是又觉得回去不太方便。
- 湖南省政协主席的到来，使我觉得应该回湖南老家看看了。
- 湖南第一书记毛致用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
- 我跟黄维到岳麓山去故地重游，兴致勃勃地爬到了最高峰。往下走的时候，突然遇到一大群男男女女把我们团团围住。

我被特赦之后，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可是又觉得老家的那么多人因为我而遭殃，就没有回去。

我的亲弟弟、弟媳妇，在土改的时候把他们关到山里打了一顿，又放出来，说他们在地下埋有金子，非让他们挖出来不可。弟弟没有儿子，我把我的二儿子过继给他，他把儿子寄在伯父家里，带着妻子，两个人跑到屋后，抱着石头沉水死了。

大伯父经我的介绍，在唐生智手下当译电室主任，没有做过大官，也没有作过恶，后来回家没有饭吃，饿死了。

二叔父，是我害了他。当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跟毛泽东同学，毕业后在学校教体育。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政治部当主任，想给家里人找点出路，这个二叔父体力好，有头脑，我就想把他弄出来。我写信给他：“二叔，你在乡下干什么呢？还在教体育吗？你愿不愿意出来呀？如果愿意出来参加抗战，我这里办了一个政工训练班，你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可以参加这个班。”

二叔回信：“谁个愿意当小学教员呢？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出路，只能混口饭吃。你那里要我，我就来。”

二叔就这样找我来了，我把他安排在安徽荆门受训，三个月后分配工作，当了一个连指导员。因为他会体育，训练有方，很快升为少校。一次，一个支队长跟我讲：“要你二叔调到我那里去，我那里成立了一个政工室，让他去当政工室主任。”我说：“可以啊，不是又升了一级嘛。”二叔又升为中校。

后来，我又对二叔说：“成立了一个军训团，团长是黄埔第

一期的，跟我很要好，现在东北很需要县长，你到这个军训团受训练，将来安排当一个县长。”二叔挺高兴，我就调他和另外四个人去受训。我又告诉杜聿明，说我有五个人，在部队里当过指导员，现在在军训团里受训。

杜聿明说：“现在我们东北很需要人，你看他们当县长够不够？”

我说：“够！”

杜聿明说：“我们已经收复了松花江以北，很需要人，让他们去当县长吧。”

但是我们没有过松花江，拖来拖去，拖到停战协定，他这个县长就没有当成。我把他调到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当处长，又升了一级，升成上校。

我的黄埔同学廖宗策在21兵工厂当稽查处处长，他调到别动军当司令时，把兵工厂稽查处处长这个位置交给了我二叔。二叔到了兵工厂后，又把他一家人和他哥哥的儿子、弟弟的儿子，都弄到21兵工厂，还把我另外一个叔叔弄到兵工厂当了个招待所主任，在这个兵工厂里，他安置了老家的十多个人。

后来形势紧张，国民党里可以自由辞职，发一笔退休费。二叔对厂里说，“我的靠山是文强，文强到淮海打仗去了，我想退休。”他得知我被俘后，又坚决要求退休，拿了一笔退休金，回到乡下老家，不做事了。哪里想到，一解放，他的事情就成问题了。他是文强带出去的，当到了上校。整天让他交代问题，他说：“我交代什么呢？我在兵工厂，再说我受训的时间多，没有杀过人，没有放过火，交代不出什么啊。”二叔被枪毙了，他的妻子死得也惨，被淹死了。他们是因为我而死的。

我当时在长沙公署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时，这个二叔给我推荐了几个乡下老家的人，这几个人我都不认识，也不姓文，他们要我到这里搞点小差事干。我就跟长沙县县长讲了，把这几个人安置下来了。土改时，这几个人也倒了霉，说是靠文强做了事，被枪毙了。

还有一个姓文的，是敬信学校的教员，土改时从他家里搜出来一张我的照片，就问他跟我是什么关系？他说文强原来是敬信学校的，后来到外面做事，发达了回来请我吃过饭，送个照片留做纪念。就是为了这张照片，把他也枪毙了。

这么多人都因为我而被枪毙了，尽管我很想回老家看看，但是又觉得回去不太方便。

1984年，我们这些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大家就议论，这个说家里死了九个，那个说家里死了八个，还有的说我是起义的，家里也搞得很惨。我说，我家里亲戚朋友死了十几个，回去也没有面子。过了几天，湖南省政协主席（我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的时候，他是程潜身边的一个秘书）到了广州。他找到我，说：“你们这些高级将领都不回湖南，是我们湖南的耻辱。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

我对他说：“我们是朋友，你又是程颂公的侄子，我在办公厅当主任时，我们两个走得很近，有感情嘛。按道理我们应该回湖南，但是为我死了那么多人，我太不光明了，回去怎么交待呀？我不回去！没有办法回去！其他的人不回去也都有原因。”他表示这次一定要把我们接回去，而且要我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我一想，我的子孙还不少，有五个儿子，我也得给子孙留个后路，将来他们不回湖南也不像话啊。朝代变化，谁跟谁也没有私仇嘛。湖南省政协主席的到来，使我应该回湖南老家看看了。

湖南省政协主席说：“我带了请柬来，你帮我发一发吧。”

我说：“你慢一点，不是那样简单的，我回去一个一个地搞通。”

当天晚上，我就向那些将领做工作，原湖南绥靖总署第一副主任李文安说：“我不回湖南，我回湖南干什么？我家很苦，是个农民，饭都没有得吃，后来我官做大了，连累了父亲。”他反问：“你也不打算回湖南，怎么还来劝我啊？”

我说：“你死了父亲，我的伯父、叔父、弟弟、弟媳妇死了不少于10个人。”

他说：“我回去交待不了，我不回去。哎，你现在怎么个想法呢？”

“我现在想留个后路，我有子孙，你也有子孙哪，应该回去看看。”

他气鼓鼓地：“你要回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没有面子！”

我们谈得很僵。这个工作做不通啊。我想，这个冤仇保留下去，对子孙也不好，明天我再去找李文安，一定要说服他。

第二天，我找到李文安，他没有好气地问：“你又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啊？”

我说：“你不回湖南是有道理的，可是我想来想去，你还是要回去。”

“你呢？”他反过来问我。

“我决定回去！”

他很固执：“你去我不去。”

“哎”，我说，“老大哥啦，我把昨天晚上想的问题跟你讲讲。刘少奇是怎么死的？彭德怀是怎么死的？陈毅又是怎么死的？他们都是开国元勋，都是冤死的，你的父亲是穷苦人，如果你父亲和我说的这些人相比，谁个重要啊？共产党里那么重要的人都冤死了，这是历史的不幸，我们和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相比，那还不是地上的蚂蚁一样啊？”

他想了想，说：“你讲的有道理，这个冤仇不能再结了，我不能为死了父亲就不回湖南，我听你的，你回去我也回去！”

我说：“那好，你考虑好了没有？”

“我还是一句话，你回去我也回去。”

工作终于做通了，我很高兴：“我就让他们准备请柬了，他们欢迎你回去，也欢迎你的夫人、儿子回去。”

计划我们一行要去10个人，好事成双嘛。但是我们只有9个人，还需要动员一个人。我想了想：“哎，上海黄埔同学会有个

文

强

II

II

II

II

当过军长的，怎么样？”那九个人说：“他是山东人，我们是清一色的湖南人，找他来做什么？”

我说：“他的妻子是湖南人，他是湖南的女婿。这样，我们10个都是黄埔学生。”

他们一听：“这个对这个对，要他来，我们不好请，非得你请才是。”

我表示：“我打电报。”

那个当过军长的接到电报，打电话给我：“你们到湖南干什么去啊？把我也拉了去？”

我说：“你这个女婿回湖南，是沾了你夫人的光，大家欢迎你，你来吧。”他坐着飞机就到了广州。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终于回到了湖南。一下火车，就受到了欢迎，湖南第一书记毛致用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他说：“把你们的工作做通了，你们回到自己家，我很高兴，今天晚上，我把几个副书记都找来，见见面。今天晚上请你们吃饭，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晚上大家一道研究研究。这次接你们回来，我们准备花十几万块钱。”

在晚上的接风宴会上，我提出想回乡下老家看看，毛致用说：“让政协秘书长，还有长沙市政协秘书长陪你去，要公安厅准备一部车子，你回乡下看看，再回来，如果再想回去看看，再送你去。”

我回乡下老家转了一天，看到我家的祖坟被挖掉了。随后，我又到了另外一个县，我的一个儿子在这里当县干部。县长要我向科长以上的干部讲一次话，我说行，一定录音，录音带我拿回去，给毛书记听听。

我讲了四个问题，第一，落叶归根；第二，台湾问题；第三，当前的国际形势；第四，我提出了挖祖坟的问题。我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现在提出的红五类黑五类是很好笑的，哪里有

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啊？朱元璋是个要饭的小和尚，后来做了皇帝，就变成了贵族了，这就是历史。对邓小平我是很拥护的，邓小平派人修了蒋介石母亲的墓，花了一百多万，还有东北张作霖的墓也修好了，花了几十万。中国历史上政党斗争采取的是敌对手段，国民党采取敌对手段，共产党也采取敌对手段，国民党暗杀共产党的人，共产党也暗杀国民党的人，这不对呀。以后，像这样扫除封建不要历史的事情，不能再干了。”我大骂了一顿。

我又说：“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我从关押到特赦，在新中国生活了差不多四十多年，我发现共产党很封建，里面还有三六九等，我们政协委员里就有三六九等，这就是封建主义。要人格上平等，不能说我的地位高了，就可以作威作福，我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奴隶社会，应该在人格上人人平等，现在你们共产党没有做到，不但没有做到，还加强了。”

我大发了一顿议论。讲话之后，我儿子悄悄跟我讲：“你在那里讲，我很紧张哪。”我问：“我讲完后，他们是对我有好感还是有反感？他们怎么评论？”

儿子说：“我们回去后开了小组讨论会，会上大家说：文强先生今天的讲话是带着气的，他有气是难免的，我们原谅。不过，他讲的理论讲得好，给我们开了脑筋。”

我回长沙后，把录音带交给毛致用，毛致用很高兴，对工作人员说：“先放录音带，这是文老在下面的讲话，我们听听。”

听完之后，大家鼓掌。毛致用说：“你们认为讲得好，以后我们哪个县政府开会，把这个录音让大家听听，开开脑筋。文老把共产党骂了一顿，实际上他是爱护我们的共产党，拥护邓小平。讲得好。”

毛致用又问省政协主席：“你听了以后认为怎么样？”

省政协主席说：“我以为讲得好。我建议请文老到省政府讲，请科级以上的干部来听。”毛致用又问几个副书记：“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几个副书记说：“我们赞成政协主席的意见，可以请文老到

文

文

中

述

中

传

我们省政府讲一讲。这个录音里文老有理论有事实，批判得好。现在我们请湖南的将领回来，是开了一个头。”

我把在县里讲的四个问题修改了一下，改得更好一些，到省政府去讲，我们回湖南的那些将领也坐着听。宋希濂说：“文强讲得挺好啊。”毛致用在下面鼓掌。

省里招待了我们十多天，花了差不多三十多万。

一天，我跟黄维到岳麓山去故地重游，兴致勃勃地爬到了最高峰。往下走的时候，突然遇到一大群男男女女把我们团团围住，黄维就很不高兴，说：“给我们划的这个路段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再一细看，男男女女都看着我们笑，我说：“老黄，没有问题，他们都笑嘻嘻的。”黄维往后退，想绕道走。

我拦住黄维，问那些人：“你们不让我们走，围住我们干什么呢？”

那些人说：“你们不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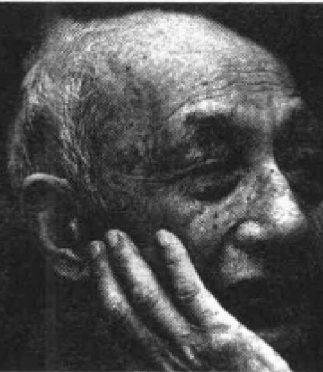
我很奇怪：“你们什么时候认识我呀？”

“你那次在省政府讲话，我们听了。你胆子大，讲的有道理。我们是银行工会的，在山上开会，想跟你照个相，留个影。”

我把黄维招呼过来介绍：“这是黄维先生。”

他们热情得很：“噢，报纸上登了，一起来照，一起来照！”

我们一起照了一张相片。



第三十一章 一件错事

- 黄维对我说：“你给我们安排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婚呢？”觉得我很奇怪。
- 文史专员们基本上都有了归宿，而我还在孤军作战。
- 我给政协写了个报告，意思是说我要结婚了。
- 我一生三次结婚，最后这一次，是我自己搞坏了。

我讲讲我后来的第三个老婆，姓张，张瑞馥。

我刚一特赦出来，杜聿明、溥仪他们就跟我讲，说周恩来定了一个制度：国民党回来的这些将领，如果结了婚家属在海外的，我们都把她们接回来，使他们团聚。如果他们的配偶不在了，允许他们在大陆结婚。

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一些将领结婚了，那时，我们文史专员24人编成一组，因为我是学习组长。黄维结婚，还有一些人结婚，都是我安排的。是我通知黄维，要按周总理的号召，选择一个人，跟你结婚，黄维接受了。赵子力当过河南省主席，也是个黄埔学生，他有两个老婆在台湾，那两个老婆不回来，所以我又安排了赵子力在大陆结了婚。黄维对我说：“你给我们安排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婚呢？”觉得我很奇怪。

我有好多部下也都跟我讲，说你帮助别人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呀？

黄维等到我家来，看到我还要自己烧水，就劝我也结婚。我说：“一方面我已经70岁了，再有一方面，我已经有五个儿子在大陆，我就不结婚了。”

黄维说：“你看你这个家里，我们来看看你，你自己要烧开水，连烧开水的人都没有了。你这个生活怎么过啊？你年纪老了。老了应该有个伴啊。”

我说：“我这个情况你也都知道，我不想结婚。”

文史专员们基本上都有了归宿，而我还在孤军作战。

我考虑这个问题，认为我被特赦的时候，差不多70岁了，有

五个儿子，还结什么婚呢？不结了。

可是，我的婚姻成了大家关注的事情。我的一个部下的妹妹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是打太极拳认识的，你们两个见见面吧。”

我和张瑞馥在一个朋友家见了面，我就问张瑞馥是什么地方人？

她说她是天津人，她的丈夫是个开银行的，死掉了。一问她的年龄，我比她大15岁。我们聊起天津的军政要人，她认识天津市市长杜建时，还有天津的好多人她都认识，那一天，就这样跟她认识了。

我说：“你还有一定的地位呀？”

她说：“我那个丈夫是开私人银行的，后来他去世了。”

我给政协写了个报告，意思是说我要结婚了，找了一个对象叫张瑞馥，我说：“按道理我要向你们报告，你们考察一下。”

政协派了我们学习组的小赵秘书（是个大学生），调查了张瑞馥，还找张瑞馥谈了话。之后，小赵秘书就跟我讲：“文老，张瑞馥这个人，你最好放弃。”

我问：“怎么啦？”

他说：“根据我们的调查，她这个人哪，第一，她没有职业，她嫁过来一切的生活都要你管，新社会没有职业是人家最看不起的事儿；第二，这个人古怪，我们调查了好多地方好多人，都说她脾气古怪。群众关系不好，到哪个地方，都把群众得罪了。她没有朋友。你结婚呢，是为了有个伴啊，你如果跟这个人结婚，这样古怪，不好。”

我认为他讲得很对，我说：“我感谢你，调查这么细。”

我结婚这个念头就要取消了，介绍人又跑来找我：“我给你介绍的张瑞馥，你为什么也不理人家啦？”我就把政协的调查结果告诉了她。

介绍人说：“你糊涂！”

我问：“怎么糊涂呢？”

文

文

11

11

11

11

她说：“那是‘文化大革命’搞的，阶级出身不好，没有职业，群众关系不好，脾气古怪，你说说看，这些哪个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哎，她这一说，我觉得有道理呀。我对介绍人说：“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嘛，阶级出身不好结婚也结不得啦？脾气古怪，整天整人家，哪个脾气还会好啊？”我一下转过弯来了，我就告诉介绍人：“这样吧，我准备跟她结婚。”

张瑞馥高兴了。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在清华，还有一个在房山，两个女儿同意不同意呢？还要问问她们，她们也同意。

这样，我又去问小赵秘书，我说：“你讲的几件事情，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没有职业，阶级出身不好的没有职业，就结不了婚？”

我这么一说，小赵秘书也信了。他说：“文老，我也是个大學生，调到全国政协来，我们做了好多坏事啊？认为阶级出身不好，没有职业，现在我们有好多政协委员都挨斗了，还给人家挂上破鞋，去晒太阳，我们还整过荣毅仁哪，给荣毅仁妻子挂上破鞋，把臭鸡蛋和红颜色倒在人家头上。”

我问：“那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结婚呢？”

小赵秘书说：“我不敢说反对。由你自己去决定吧。我不参加意见了。”

好了，我和张瑞馥到居民委员会去登记，就结了婚。

结了婚，一开始还不错，没有过两三天，我发现张瑞馥简直是个流氓，她那坏脾气，流氓的行为呀，都暴露出来了。

她原来丈夫开的银行让共产党给抄了，跟我结婚以后，非得让我给他要回来，我还真的给他要回来三万块钱，他爹妈陪嫁的房子被没收了，也让我出面去要回来，我不愿意了，说：“你爹妈为你陪嫁房子时，你又不是跟我结婚，我不要，再说现在这样的事情多了。能办的事情我就办，不能办的事情我不办。”她就不给我做饭吃。

我是这样想的，我结了婚，就是错了，也要原谅她，她看我

对她是宽容的态度，就越来越过分。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有2000元，人家送来，她全收了，但是她还说不够，我也没有钱花。后来我又发现，海外的朋友们给我祝寿寄了一些美元，她都给我收了，我连信都看不到。

蒋纬国来信，说你过90岁大寿，我寄了1000块美金，你收到没有？我不知道这个事啊，还有我的一些部下给我祝寿的赠礼，她都没收了。我就装作不晓得。

这样的日子呢，过了好多年啦。邻居说：“每天你的老伴不到9点不起来，她也不做早饭给你吃，我看见你自己买点油条在那里吃。”吃完饭，她把我关在房子里（我有四间房子，她住在楼上），我要到政协上班，也出不去，我就打电话给邻居，要邻居找她下楼来开门，我还有事要上班。她跑到楼前骂那些邻居：“你们怎么管事情管到我家里来了？管我家的事呢？我还没有睡好，你们来吵什么？干嘛要我给他开门？”邻居们很气愤，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怪呀。”

2000年7月，她要我向在美国的大儿子要钱，说：“你给我的2000元钱不够用。我没有职业，我还要医药费，你的儿子都有钱，在美国当教授的儿子一个月就有一万多美金，他一个月拿个千把块钱也应该呀，你那个做生意的儿子也有钱啊，你跟他要钱！”我说：“我一生没有伸手要过钱，我一生也不向自己的儿子要钱。”

我说：“我左右的这些邻居，他们的收入还不到2000块钱，他们的人口还比我们多，为什么我们的日子就过不好呢？你这个毛病不对。从下个月起，工资我自己来管，不归你管了。”

政协送工资来，我就自己签字，收了这个钱。我说：“我每个月拿1000块给你。吃饭的钱我管。”一个月下来，两人个人吃饭四五百块钱都用不完，我就告诉她：“你没有道理，你跟我将近20年了，你把我们的钱搞到哪里去了？国外朋友送给我祝寿的钱搞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把过去的开销给我看看。”

她说：“我在你家里，你每个月起码要给我1000元劳务费。”

我说：“你也要吃饭，我也要吃饭，怎么叫劳务费呢？”

她说：“我伺候你呀？我凭什么来伺候你呀？”一天到晚找我吵，她把我住的房子防盗门安一道锁，胡同门安一道锁，住的房子安一道锁，三道锁，钥匙都她拿着，把我关在家里，就这样，搞得越来越坏，越来越坏。

我没有办法，就召集我的四代子孙开家庭会议。这个会议一开，我那些子孙把她做的坏事都揭发出来了，说这个妈妈坏极了。我就总结了，说：“这个家庭会议开得很好，要定一个办法。办法是我跟她分开，分开住，考验一个时期，看她能不能变好，假如她不能改变，还是那个坏态度，我就跟她离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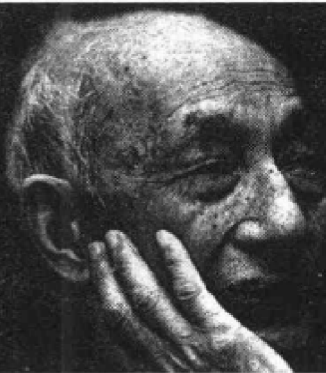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她，我说：“在家庭会议上，大家都赞成我的决定，我们两个人分开，我每个月顶多给你600块钱就够了，人家外边下岗的人是两三百块钱，我给600块钱顶多了。”我问邻居每月挣多少钱，人家说是400块钱。后来我还加100块，每月给她700块钱。分开以后，她一点都没改变，搞得我一点人格都没有了。

我要恢复过去人格上的自由，就对她说：“你也没有办法改正，我要起诉解决了。”

法院里经过调查，判决我们离婚，她不服，又告我，法院维持原判。她没有生活费，要我给她三万块钱，我怕三万块钱太少点，又拿出两万块钱，给了她五万块钱，政协分配给我的房子，我也让她住着，这才解除了婚约。

我的儿子买了房子，安排我住在这套新房子里，我终于解放了，恢复自由了。

我一生三次结婚，最后这一次，是我自己搞坏了。这是我特赦之后所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



第三十二章 探亲美国

- 我写了一份报告给邓颖超，对政协杨副秘书长说：“请送邓大姐，我要到美国去。”
- 公安部几天就给我办好了出国手续，还请我吃饭，欢送我。
- 蒋志云提出一个问题，说欢迎我到台湾去，说我在台湾存有100万美金，希望我去台湾领这笔钱。
- 我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

我决定访美是缘于一个偶然的机。1985年的一天，我到原国民党的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作客，他也是文史专员，跟杜聿明、宋希濂一道特赦出来的。他高高兴兴地从屋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照片上，大约有一两百人合影，前排有一个女士，穿着红旗袍，其余的人都是一身西服。

我问：“老郑，你这个相片是哪里来的啊？”

他说：“刚刚美国一个朋友寄来的。你看看你认识几个人？”

“前面这个穿红旗袍的女士我就认识嘛。”

他问：“你怎么认识的嘛？”

我说：“她是我的学生啊。”

“她现在在台湾的地位很高啊，是台湾的国大代表，蒋志云。”郑军长说。

我告诉郑军长：“我和她都在上海时，日本人抓我，她救了我的命，我把她送到了香港，我又救了她的命，她当台湾的国大代表，我和湖南方面给她出了力。她的丈夫是黄埔第六期的，和我也认识。”

他又问：“你看看穿西服的里面你认识几个人哪？”

我问他：“你呢？”

“我认识三四个。”

我仔细看着照片上穿西服的那些人：“我认识四十多个。”

“哎呀”，他有些吃惊：“你怎么认识这样多啊？”

我说：“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再一看照片背面，写着：“为蒋志云祝寿”，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给蒋志云祝寿的。

他说：“哎呀，我只看出三四个人，你叫出名字的就有三四十个。我向你提个建议，你写个报告，到台湾去看看嘛，台湾去不成，就到美国去看看。”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到台湾去嘛，还不可能，到美国去还是可以的。那好吧，我给蒋志云写封信，看她怎么表示，她如果表示欢迎，我再打报告给邓颖超。如果表示不好，我就不报告了。”

我回家后，给蒋志云写了一封信，说好多年不见，现在我看到你的照片，在照片上还看到三四十个认识的人，老朋友这样多，我就有一个想法，到台湾看你们不可能，我很想到美国去和你们见见面，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的话，希望复一封信。

信发出去后，大约半个月，就收到了复信，蒋志云热烈欢迎我到美国去，在旧金山见面，一切由她安排。她在信中说，她的女儿、儿子、儿媳都在美国。我把信给郑军长看了，他说：“你的部下对你都很好啊，很有感情啊。”

我写了一份报告给邓颖超，对政协杨副秘书长说：“请送邓大姐，我要到美国去。”

在这里，我要说说我与周恩来的关系。

我进入黄埔军校时见到了周恩来，他是我加入CP的介绍人，我们一见面就感到很亲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周恩寿是周恩来最小的弟弟，比我大两岁，1925年，他到广州的时间比我早半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对我讲：“我的哥哥也在这里，他要我找你去一趟。”

我问：“你的哥哥是谁呀？”他说：“我的哥哥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谁啊？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他是黄埔的政治教官，是政治部主任，你还不知道啊？”

我说：“你不讲我就不知道。你有这样好的哥哥在这里，那好啊，可是他找我干什么呢？”

周恩寿说：“我也不知道。”

我让周恩寿带着我去见他哥哥。到了政治部，周恩来热情地让我坐下，说：“你认识了 my 弟弟，现在又认识了我，好啊。”

我坐下后，周恩来对我说：“你有个姑母，还有个姑父，姑父姓李，你知道吗？”

我说：“我的姑姑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她是湖南省立师范毕业的，嫁到李家，我姑父是宁夏人，这两个人都到法国留学去了，这个我小时候就知道。”

周恩来高兴地说：“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学，后来他们到里昂大学去了，你姑父学建筑工程，你姑母学美学。”

“不错，我的姑父已经当了湖南公路总工程师。”

“噢”，周恩来说：“那么高的地位了嘛。”

我说我的姑母在湖南大学教美学，周恩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搞得很好啊。”

他又问：“你晓得徐特立吗？”

我说“徐特立，我喊他老师嘛。他也是我姑母的老师，后来办了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徐特立是校长，我是他的学生。另外，我的父亲跟徐特立关系特别好，都是湖南长沙人嘛。”

周恩来说：“徐特立跟你父亲是同乡，我跟你姑母是同学，你到了这里，我们又是革命同志了。”

我当时想，哎呀，这么近的关系了。

这时，周恩来又对我讲：“我要跟邓颖超结婚了，你算是我们的亲人吧，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说：“邓颖超我没有见过嘛。”

他笑着说：“趁这个机会见见面。”这时是1925年10月。

我感到周恩来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去参加他的婚礼之前，我跟周恩寿商量：“得送点礼呀。”周恩寿说：“不用送，他们是革命结婚嘛。”

我很坚决：“那不行，我们这样深的关系，礼都不送，太不像话了。”

周恩寿说：“革命，革命！”

“革命，革命，革得连礼都不送啦？”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应该送！”

“那送什么？”周恩寿问。

我说：“我也不晓得送什么。”

我们两个人想了一会儿，周恩寿说：“一定要送就这样好了，我去买一张红色的宣纸，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你写几个字就行了。”我同意，这样挺好，也省事。

周恩寿跑到外面买了一张宣纸回来了，我考虑了一下，写下了六个字“花花圆圆寿寿”，接着落款：周恩寿、文强。周恩寿一看，喊了起来：“怎么把我的名字写在前头？这又不是我写的！”我说：“你比我大两岁，纸也是你买的，你哥哥结婚，你这个弟弟就不送礼啦？”周恩寿听我这样一说，看着这六个字，说意思好，字也好，那就这样吧。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上，我把字带去，周恩来看了，邓颖超也看了，都非常高兴。

周恩寿黄埔毕业后，在蒋介石部队里当过师里的政工人员，后来脱离了蒋介石，到天津王光英那里做生意。周恩寿一生都在搞恋爱，周恩来看不起他，说他是花花公子。其实周恩寿才干很好，可惜很早就死了。

话再说回来。我给邓颖超写了个报告说要到美国去，邓颖超接到报告后，很快找我谈话，她说：“你有这样好的关系，蒋志云，了不起啊，这个关系好。听说你还认识三四十个，看来你过去的活动面很大嘛。”

我说：“我那时跑的都是高级司令部，从西北、华北到东北，接触的都是高级人员。我认识的这些人，相互都是很有感情的，如果没有感情，我们几十年没见，怎么还能在照片上一下子认出来呢？”

邓颖超说：“他们很热烈地欢迎你去呀。我让公安部给你办出国手续，经费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国家会拿钱给你。”

我表示，我到美国只需要一些路费就行了，我们国家困难，不要拿钱给我，我也不带人，带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钱，我就一个人去。到了美国见到旧部应该是什么立场，应该怎么说话，我还要做充分的准备。我有几个到过美国的黄埔同学，到了美国不敢见老朋友，那有什么意思啊？我去美国后，要了解台湾的情况。

邓颖超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做工作啊。”

很快，邓颖超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几天就给我办好了出国手续，还请我吃饭，欢送我。

1985年9月20日我启程赴美，开始了为时三个月的万里之行。在跨越太平洋的飞机上，我写下了杂诗两首：

出国机中

东西抵足浑如梦，划破长空历海涯。
万里雄风来大国，五洲荣誉数中华。
探亲访友云情重，无限乡思望月搓。
纵令荆藜铺满地，灵犀精卫自由花。

话旧情殷梦里年，何期相聚异乡眠。
天高气爽清秋月，海阔洋空自在船。
全为探亲倾肺腑，不辞劳瘁与颠连。
长城万里欣然掠，乐载锦帆奏凯旋。

我的意思是全世界都非常尊重邓小平，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我想，到了美国，我一定要把邓小平的旗帜插到美国，一定宣传邓小平主义，让我那些老朋友了解现在中国搞得很好。

我刚一下飞机，海关的一个美籍华人迎上来，用英文招呼我：“文将军”，我想他怎么知道我是文将军呢？我用华语跟他

讲：“你是个中国人啊，为什么拿外国话跟我讲话啊？”他有些不好意思，改用华语答复我：“将军不要生气，我现在是美籍华人，在海关服务，按照美国海关的规定，只能讲英语。现在你让我用华语，我就用华语了。”

他接着又说：“你是个特殊人物，你的行李免检。”

我说：“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很礼貌。”

他说：“在美国认识你的人很多，现在机场外面有一个台湾来的贵妇带着儿孙在等着迎接你。我帮你拿行李，把你送出机场，你见到那位贵妇，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连连道谢。他拉着行李，把我送出机场，我一看，蒋志云来了，她冲着我喊：“老师，我们三代人来欢迎你呀！”她的丈夫、女儿、儿子、儿媳、外孙，都来了。

我们先到了蒋志云女儿家里，气氛很热烈。蒋志云说：“我们早准备好了，有给你开车的，有给你当翻译的，还有给你做湖南菜的。你这次来，一定要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我们安排你到10个州，在旧金山住一个礼拜，然后到休斯顿住几天，再到华盛顿、纽约，就按照这个计划周游一下吧。一切费用你不要担心，我们给你准备好了。”

“我在旧金山有很多朋友，我跟他们见见面”，我对蒋志云说，“我把电话告诉你，你派人替我联系，约好时间，招待他们吃饭，我们是老朋友嘛。”

蒋志云说：“你开个单子，我派人去办。”

很快，老朋友都联系上了。其中一个王昌杰，是我的一个部下，在我身边当过军法官，在美国，他成了大艺术家，在旧金山有他的画廊。王昌杰马上给我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来看我，请我吃饭，至少要请三桌，都是些认识我的人。还有一个是林伯渠的女儿林慰君，是个医学家，也是明天来看我。

我给来见面的老朋友都题赠了诗，给王昌杰和林慰君的诗是这样写的：

题赠艺术家王昌杰老友

艺坛美髯晤仙翁，原是军书益友雄。
 无愧风云挥画笔，山河日丽九州同。

题赠林慰君夫妇

英烈千秋俎豆歆，篇篇金玉锦文心。
 一门孝友泰山重，潮发闽江入武林。

记得我特赦出来填表，表示去向的那一次，其中有十几个人申请去了台湾，后来他们有的到了美国，有的到了香港。这次我在美国见到他们，彼此都很高兴，他们问：“你怎么到美国来了？”

我说：“我不但到美国，我还要跑10个州，要到好多好多地方去，计划用100天。我是自由自在地探亲访友。”

他们好多人表示：那时我们考虑不周，要是在中国生活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中国呢？他们很后悔。

我说：“你们既然走了，到美国也好，到任何地方也好，只要生存得下，就行了。不过，要生活得有意义，如果生活得没有意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好。”

什么叫做“意义”？

我认为，如果在任何地方都会生活得很幸福，而且使各方面——家庭、社会、国家都很满意，在生活上不妨碍人家，你就有意义了。

我说：“我这个人四海为家，这块天地，我随便在一个地方都行。”

老朋友们说：“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对他们讲：“任何事情我都不悲观，我愿意做个乐观主义者。”

我在美国的公开场合，到处讲邓小平主义，我说：我在有生之年能够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我现在

正在写，我要写一本《邓小平主义》。我认为俄国搞乌托邦把自己搞垮了，中国如果不受俄国的影响，可能共产党还搞得更好一些，后来中国共产党从俄国的乌托邦之下解放出来，有了自己的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这些是我的想法，我要把这些想法写进《邓小平主义》。没有邓小平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一切，我希望邓小平的历史要长到百年以后，长到200—300年以后。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我的这个想法就不止，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我在旧金山住了一个礼拜，我还有个老弟文国仪也定居在旧金山，我想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不知道我到了美国，如果他知道我来了，他一家人会把我接到他家去住，我也不能不去啊，所以我到了华盛顿才通知他。文国仪生气了，说：“你到了美国怎么不来个电话，我好到机场去接你，你到了旧金山也不通知我，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向他解释：“人家一切都给我安排好了，我也不愿意麻烦你们，所以一直到了华盛顿才给你打电话。我还要游几个州，恐怕要在美国住100天，到我回国之前，我还要到芝加哥去看我的儿子，等我到了洛杉矶，再打电话给你，我要到临回去才有时间见你。”

文国仪说：“你这个人真是，要到回去才见我，你的朋友这样多啊？”

到了洛杉矶，我打电话给文国仪，告诉他：“我的儿子我也看到了，我现在就要回国了，准备在你家里停留几天，然后回国。”

就这样，我跟文国仪见了面，他一家人热情地招待我。这时，我在台湾的一个老弟文中侠也知道我在美国，打电话给文国仪，要来看我。

文中侠是黄埔第十四期的，原来在廖耀湘手下做少校，我又把他升为中校，又把他升为大校，以后他到了台湾，是反攻大陆的副总队长。

我问：“文中侠在台湾，多年不见了，他怎么知道我到了美国呢？是不是你们打电话告诉他了？”

“我们没有打电话。”

“那他怎么会知道我到了美国呀？”我觉得奇怪。

文国仪说：“你呀，在美国的台湾人多，你来美国的消息，蒋经国他们恐怕早就知道了。你保密保密，保得住啊？保不住的。”

文中侠从台湾专程到美国来看我，我跟文国仪到机场去接他。我们一道住在文国仪家里。我问文中侠：“我这次到美国来，连国仪我都没有通知，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他说：“哎呀，你刚一到美国我们就知道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的行踪哪，台湾都知道。”

一个台湾来的老弟，一个住在美国的老弟，一个大陆来的哥哥，三个人见了面。我最大，80岁，文中侠那年七十多岁，文国仪最小。

1993年4月，文中侠老弟去世了，我给他写了吊文，写了挽联。我写的挽联是：

挽中侠老弟

祭黄陵申夙愿，孝子报三春，正亲临修墓守庐，未完统一大业，何身先死！

抗日寇建奇功，忠臣无二致，幸坚持归根落叶，预见乐叙天伦，其志乃安。

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正好过中秋。中秋节的晚上，蒋志云邀我一道过中秋。她一会儿叫我“老师”，一会儿叫我“长官”。我说：“你不要叫我‘长官’了，让人家听了笑话我们。我们是同乡，你是我的部下，我年纪又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大哥’也行，这样喊亲密一些，外人听着也好听一些。你就叫我‘大哥’，我就叫你‘小妹’。”

我们坐在屋外赏月后，回到屋里，她丈夫高高兴兴地从楼上端着一张照片下来，说：“今天晚上是你的80大寿，又正是中秋赏月，我们送给你一件礼物。你看，这张照片你有没有啊？”

我一看，这张照片24寸，大大的，镶在镜框里，是我穿着中将军服，40岁那一年升为中将时照的。

我说：“我没有了。”

他说：“台湾给你保留了。我家里也有你这张照片，我给你放大了，带回去作纪念吧。”

“啊啊”，我说：“这个礼物很好。”我不敢说，大陆抄家时把我的照片和军服等等都搞掉了，我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我没有这张照片了。”

蒋志云说：“我们想了一下，给你祝寿，光给你照片还不够啊，我们合计了，拿1000美金给你作寿，表示点意思。”

我说：“照片我收了，钱我不要。我现在身上还有一两千美金，回去的路费够了。”

她表示一定要给。

说着说着，蒋志云的丈夫说：“我的生日跟你只差一天。”我很高兴：“好啊，我们两个人又是祝寿，又是赏月，好好好。”

我们坐在屋里看电视，蒋志云提出一个问题，说欢迎我到台湾去，说我在台湾存有100万美金，希望我去台湾领这笔钱。

我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

蒋志云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400美金，每月还有1200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1600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100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是在职，你在大陆坐牢，应该给你钱。”

我心想，台湾方面用心良苦啊，也不能不感激。但是这个钱不能拿，我如果拿了这个钱，回去就对不住邓小平了，对不住邓颖超，他们要我做爱国人士一直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太不光明了。

文

强

①

②

③

④

我又想，我没有钱还好一点，如果拿了这笔钱，我在大陆上不好做人，以后到台湾看看，在台湾也不好做人，败军之将嘛。不拿这个钱，我比谁都高大，拿了这个钱，我就一点人格都没有了。而且我拿了这笔钱，回到大陆上就不得了，我那个老婆还得要一半，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人家会认为文强这个家伙不知道有多少钱，把我绑架去了呢。

我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坚决不能拿这个钱。我向蒋志云表示：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那么一个败仗，还跑到台湾拿100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回国之前，我写了一首诗题赠蒋志云：

题赠志云贤妹

孟欧画获贤声著，巾帼英雄玉女龙。
天马行空堪比拟，放翁豪唱吐长虹。



第三十三章 世纪老人

- 我活得这样长，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九十多岁，还在活。
- 我看到十大战犯的结局，一个一个看下来，没有一个比得上我。
- 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
- 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的后半生很长。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

我活得这样长，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九十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我在共产党的红旗下，过了几十年的太平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衷心地感谢共产党。我家里遭到镇压，死了好多人，但是我亲生的几个儿子都在，我这样一想，自己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我看到十大战犯的结局，一个一个看下来，没有一个比得上我。

武汉有一个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上面列了10个战犯，把我列在第10位。第一个写的是杜聿明，说杜聿明是脱胎换骨，改造得很好；第二个是黄维，说黄维刚直，个性很强，刚直倔强，绝不妥协；第三个是王耀武，说王耀武这个人是大起大落；第四个是李仙洲，说李仙洲是黄埔老大哥；还有一个是宋希濂，把他说是鹰犬将军，宋希濂自己写了一本书，说自己给蒋介石做鹰做犬；还有一个是廖耀湘，说廖耀湘是“文革”的冤魂，廖耀湘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打了一顿，心脏病发作死了；再有一个是守天津的陈长捷，说陈长捷是杀妻自刎，把老婆杀掉，然后自己把自己杀了……最后一个写的是我，说我这个人诗杰侠义，留下了很多诗，对于家庭，对于社会都很侠义。

这是我很大的幸福嘛。我活到九十多岁，感觉非常圆满，感觉越活越有意义，我还有充沛的精力，不知老之将至。

从另外一方面讲，人生有一定的年限，我究竟还能活多久？

听其自然吧。我同意古人说的：人生如梦。

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2000年是世界老人节，《北京青年报》把我评为“世纪老人”，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到人民大会堂领了奖，还上台讲了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2001年1月，全国政协举行了一个56个民族大团结的盛会，政协把我请去，要我致闭幕词，我说我资格不够，我们国家有多少人物啊，谁都可以致闭幕词，不要找我。没有想到，在会上，主持会的人直接就喊我，要我致闭幕词，他已经在会场上喊我的名字了，而且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篇稿子交给我，我也就只好上台致了闭幕词。散会后，我出来了，听见有人说：“这不是致闭幕词的那位老人吗？”一下子，大家把我包围起来，要我签名，有的还要跟我合影，还有的喊：“我是西双版纳来的，还没有给我签字，没有跟我合影呢。”从新疆来的，从内蒙古来的，从海南岛来的，很多很多人，把我团团围住，工作人员看着我说：“这么大年纪了，签字、合影，搞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工作人员叫来几个武警，武警很有礼貌，向那些会议代表举手敬礼，说：“请大家原谅，这位老人九十多了，你们都要签名照相，那今晚老人就回不了家了。”武警把我“抢”出来，送上汽车。我自己很高兴，我觉得给了我一种“人”的待遇，这是很高的名誉。这是我过去不敢想像的事。有时候，我一坐下来想这些事情，很高兴！

一家报纸的总编问我：“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我答复他：“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我写日记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损于别人？是不是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不

吃烟不喝酒，天天记日记，生活很愉快，很正常。我虽然离开了全国政协，但是政协对我说：“你作为一个老委员，政治待遇不变，你要汽车，就打个电话，随时给你开来。”我感觉真是很愉快。共产党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而且我的子孙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都生活得很好，都自由自在地发挥着他们的能力，走在我们国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这个幸福不仅在我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我的子孙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我很乐观，希望在感召着我。

附录一：文强年表

1907年9月19日（农历）

出生于湖南长沙县。

1925年6月

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

1925年8月

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

1926年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国民党。

1926年3月

脱离国民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

1926年7月

跟随朱德入川，在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

1927年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

1928—1931年

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

1931年8月

脱离共产党。

1931年底至1935年

回家从事新闻工作，任少年通讯社社长。

1936年

加入国民党，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任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

1937年“八·一三”起

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

1937年11月

任国民党军队前方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政训处处长。

1940年

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军统局驻上海，负责对东南五省汉奸政权进行策反工作。

1941—1944年

任驻上海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1942年春到重庆，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后被派往华北，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

1944年春

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5年12月

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等职。

1948年夏

被程潜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

1948年9月

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参加淮海战役。

1949年1月

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1975年3月

获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

1981年

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委员。

1986年起

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

任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1989年

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2001年10月22日

在北京去世，终年94岁。

附录二：文强先生口述时间、地点纪实

口述实录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中，口述的时间、地点是口述真实性的佐证之一。我作为文强先生口述的采访者和撰写者，将文强先生口述实录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情况等记录如下：

◆时间：2001年6月15日，上午9点至12点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路曼（林豆豆）、康国雄（文老亲戚、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康宏通（康国雄之子、香港美丰行驻京办事处董事经理）、刘延民、王南海（摄影）、刘艳艳（刘延民同事）

这是在路曼大姐的介绍下，我与文老第一次见面。文老坐在沙发上，精神很好，声音洪亮，全然不像94岁的老人。文老谈兴相当浓，两个半小时以后，众人劝文老休息，文老仍然滔滔不绝。

文老从沙发上起身，自己借助一个专为老人和走路不便的人设计的“行步车”走回了卧室。

◆时间：2001年7月31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路曼、康国雄、康宏通、刘延民、王南海、王寻（王南海之子）、刘艳艳

自从6月15日采访文老之后，我因为很忙，并没有确定第二次采访，也就是文老正式开始口述的时间，时间在不经意中过去了。7月28日，接到康宏通的电话，说文老希望抓紧时间开始口述。于是从7月31日早9点开始，正式启动文老的口述实录工作。

上午11点半口述结束，文老要去卫生间，康国雄、康宏通、王南海等将文老拥架起来，文老显得很不得劲，在卫生间里浑身大汗，脸色惨白。后被架到床上，昏厥过去。

◆时间：2001年8月6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刘艳艳

当我走进屋时，文老已经坐在沙发上，做好了准备。照顾文老的陈阿姨说：上次很吓人，文老经抢救才脱离了危险。文老笑道：“那几条大汉把我一架，找不准劲儿了，我自己推着车慢慢走才能找对劲儿。”

我看文老身体恢复，精神很好。口述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时间：2001年8月13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文老依然是坐在沙发上，等待我的到来。我问候文老的身体，他说：“感觉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文老、陈阿姨和我都笑了。

口述两个半小时后，我和文老约好明天再来。临走时，我对文老说，“以后就没有那么多人来了，您还是躺在床上讲吧。”文老说：“坐着好，坐着便于思考。”

◆时间：2001年8月14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我走进文老家中，文老尚在卧室，我对文老说，还是躺在床上讲吧，但是文老执意要坐着口述，少顷，在陈阿姨的照料下，文老推着步行车出来坐在沙发上。

就是在这一天，我感觉到文老的精力、身体好像不如前几次。（两个月后，文老去世了，每当想到文老口述时其实已经身患重病，我就很难过。）

◆时间：2001年8月18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文老躺在床上口述，显然身体已不如前。文老看到我来，很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欢迎欢迎。”我问文老身体有何不适，陈阿姨说，文老说腰疼。文老要陈阿姨给我拿水果，倒茶水。口述结束后，我们约好明天继续。

◆时间：2001年8月19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刘艳艳

天气很热。我刚到楼下，保安问我找谁，我说到文老家，保安说文老病重，已不会客。我犹豫着走到文老家门口，只见门口贴着一张纸：“文老身体欠佳，谢绝会客。”我正不知是进是退，陈阿姨已经给我开门，说：“文老说对你是个例外。”

我一去，文老就说：“欢迎欢迎，我们很有缘分。”文老躺在床上，开始了今天两个半小时的口述。其间，文老多次对我说：“你辛苦了喝杯茶吧。”

◆时间：2001年8月21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天下着大雨。文老的精力明显不如前日。口述到10点多时，

文老休息了一会儿，用吸管喝了一些水。接着，继续口述。我原以为文老不愿意讲使他成为战犯的淮海战役，但是从今天开始，伴着窗外的大雨，文老开始详细地口述淮海战役。

◆时间：2001年8月25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我感到文老的精力明显不如前日，我第一次采访文老时，文老是精神地坐着，而现在，文老已经坐不起来了。我心里很难受。文老躺在床上，口述得非常认真，把我带进了淮海战场的烽烟之中。其间，文老休息了一下，吃药、喝水，他对我说：“你也喝点茶吧。”

◆时间：2001年8月27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刘艳艳

文老躺在床上迎接我们。陈阿姨说，文老非常欢迎我们。文老对我们说，昨日朋友送来一些外国水果，一定要我们尝一尝。于是我们的面前堆起了好多叫不出名字的大水果，文老不断地催促我们吃。今天，我感到文老躺在床上显得不安，好像不舒服的样子，一会儿就喊：“小陈，我要拉尿了。”一会儿又喊：“小陈，我又要拉尿了。”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尽管这样，口述进行得依然很顺利，文老是一位很认真的老人。今天的口述结束时，文老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继续吧。”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文老口述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一早，接到陈阿姨的电话，说文老情况不太好，不要来了。

过了两三天，陈阿姨告诉我，她刚从医院回来，文老住院了。

文

文

II

III

II

II

9月初，我到医院看望文老，文老正好清醒了一会儿，看到我去了，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欢迎欢迎”，很快，就又昏睡过去，文老的病状，我不忍描述。

10月，路曼、康国雄、康宏通、王南海、刘艳艳，还有我，参加了文老的追悼会。我流下了眼泪。

想到文老的传奇一生，想到文老口述时的精彩，再看到今天文老乘鹤而去，我体会到一句话：人生如梦。

刘延民

2002年8月6日上午

附录三：摄影者手记

我为文强拍照

2001年夏的一天，作家朋友刘延民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由路曼组织的名人口述史活动，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文强。我当即表示有兴趣。见我有兴趣，刘延民告诉我，口述史不是应景之作，作品出来后，不会很快发表，也没有人投资，摄影所需全部成本要自己承担。

其实，钱不钱的，是次要的，尽管我也需要钱。当时我正在到处找工作，我的原单位——中航天民品实业有限公司经济效益一直不好，不上班也没人过问，自2001年春节之后，干脆工资也停发了，自己虽然有十几项发明，可是市场的不规范，使我在对外合作中感到很累。于是，我干脆把我的摄影爱好当成了“主业”，几年下来，也照了不少名人的照片。

文强是何许人也？说实在的，我当时知之甚少，而真正促使我痛快地答应刘延民的原因是：采访文强是路曼组织的，她是共和国开国元帅的女儿，其父曾是文强的黄埔四期的同班同学。再一个原因，通过刘延民的简述，我知道了文强的经历很奇特。我喜欢摄影，对镜头前的每一张脸，我都力求拍出“彩儿”来。几年的摄影经历告诉我：每个人经历不同，脸部的气质表情也会有很大不同。我想像着为这样一个老人摄影，镜头前一定是一张很有内涵的脸，更何况这位老先生年已94高旬且有着不同

文

强

II

述

II

II

寻常的经历。

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过阶级斗争理论盛行的年代，那时影视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被脸谱化的，简单、生硬，我想见文强，看看生活中的文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要用相机记录下来一个活生生的人。

文老是一本厚厚的书

几天后，路曼大姐带我们到了朝阳区光华路的一座公寓，文强的家就在这里。

走进文强家，在宽大明亮的客厅里，一眼便看到北墙悬挂着蒋纬国先生亲笔为文老76岁寿辰所书写的条幅。这年正是文强先生作为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共产党监狱里度过第二十五个年头后刚刚被释放出来的那一年。条幅左边写的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右边是：“道义乃是根法天乃是轴典型乃是训”；中间则写道：“浩气长存”。在文老所座沙发后面的墙上，高挂着文老自己书写的一段文字：“天道酬勤心安理得，先忧后乐无欲则刚。”

在这间有着历史感的房间里，我的镜头对准了文强老人。通过调整尼康相机的长焦镜头，仔细观察镜头里的这位老人。镜头前的这位老人，正叙述着他的故事。这时已是94岁高龄的文老先生，讲起亲身经历，思路仍然是十分清晰，每次叙述连续近三个小时，但始终不知道疲倦。尽管浓厚的湖南口音常使在座的人要反复核实，才知他所讲话的准确含义。文老说的故事，有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有的在我看过的史书上却是另一种说法的。说故事，和看书，是两种感觉。文老幽默诙谐的语言，令我不禁对镜头前的人饶有兴趣，也让我对他老人家的故事感兴趣。

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表弟——黄埔第四期学生——周恩来、叶剑英的学生——与林彪、周恩寿、李运昌同班并担任班长——在共产党内，官至中共四川

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负责二十三个县——后先是在程潜处做国民党上校参谋，接下来又在戴笠手下任要职——40岁时由胡宗南在蒋介石面前力荐，而成为国民党中最年轻的中将——在辽沈战役中，与同班同学林彪大战三个回合——后又在淮海战役中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成为解放军小战士的俘虏——25年的监狱生活，76岁时出狱，不久又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

听着听着，我忽然感到我镜头前的这位老人，是一本厚厚的书，以我的阅历难以读懂它。

几次与文老相处，我也力求超越我手中的镜头，去读懂这位老人，但经过努力我没有做到。因为它所经历的，太有意思和深度了，只能叙述，难以评说。

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独有一道风景，记录下来，使我摄影经历中难忘的。

文老说我是个靠得住的人

我曾三次为文老拍照，我的手中有近两百张文老专题照片，足足装了三本相册呀！

记得第二次到文老的家，我带去了一张经过精裱放大的24吋照片，送给了文老，看得出来文老对这张照片还是满意的。刘延民对照片的评价是：照片中的文强是典型的职业军人。一位朋友说有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我的爱人则说是一个有味道的老人，我的儿子感觉他是一个距离很遥远的人，其实我喜欢我拍的照片让人有不同的感觉。经历是刻在脸上的，是抹不掉的。文强就是让人有不同感觉的人，只有具备丰富经历和特殊阅历的人才会这样，何况文强的经历不同寻常。我挺欣赏我为文老拍的照片，如何评价？我认为这就是真实的文强。

文老的家中曾有两幅照片，引人关注。一幅是在全国政协会上，由新华社一位高级摄影记者为他拍的放大照片，身穿西服、

胸戴全国政协代表出席证，显示出中国特有的政治身份，一幅是文强 40 岁时胸戴国民党中将徽章的放大照片，英俊、盛气，显示出文老所经历的那一段历史，但是我拍的这张照片，显示不出政治含义，只是一个生活化的老人，虽不失军人的威严，但有着老人经过世事后常有的平和。

后来刘延民告诉我，文老对她和路曼讲：“这个拍照的记者靠得住。”想起来也有意思，这话出自现在的文老口中，普普通通的一句夸奖。但是若让历史倒退，这句话要是出自当年身为共产党的高官时的文强口中，我的前景会如何！或者，这句话要是出自当年身为国民党中将的文强口中，我会弄个国民党的师长旅长当当！不过要是“文革”中的红卫兵知道，国民党的中统将军如此评价我，恐怕我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2001 年 8 月 11 日上午，是我第三次到文老家为他拍照，近三个小时的采访，文老太累了，我们多次劝他不要讲了，他没有听。以至我在扶他在上厕所时，瘫倒在我的怀里，我用力将他包上了床，他太累了！……2001 年 10 月 22 日下午 4 点 30 分，文老乘鹤归去。

王南海

2002/9/1 于上海日本森松公司

后 记

采写文强先生，缘于一个偶然的机。记得2001年6月的一个晚上，丁东给我来电话，说林豆豆介绍了一个老人，叫文强，很有采写价值，问我是否有兴趣。丁东是我的朋友，他要我去采写的，我是一定要答应的。当时，我还真的不知道谁是文强，就去问我的哥哥（他是搞党史的教授），他的回答是，当然知道，文强是很有名的。我又问爱人（他也是搞党史出身）是否知道文强是谁，他的回答也是当然知道，闹了半天，就是我孤陋寡闻。路曼大姐（林豆豆）来电话说：“要先读一些书，掌握一些背景资料。”于是我在采写之前，先读了一些有关资料，认识到文强的确是一个很有采写价值的老人。

我以为就是写一篇千把字的文章，然而，第一次听文强老人口述，我被其间的精彩和历史价值吸引住了，继而很兴奋，我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本书，因为，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与世纪一起绵延、一起风云跌宕的历史老人。

第二次如约去文老家，我满怀信心，满怀兴奋。但是没有想到，文老不像第一次那样滔滔不绝，他一句也不讲了，劈头就说要签订一份合同，否则不讲。当时的局面竟然有些僵持。

文老拿出他昨日写的日记给我看，他说写了几条他思考的有关合同的问题。我非常之惊讶，我简直不相信面对的是一位94岁的老人，惊讶他的思维之厉害，惊讶他的现代意识。

丁东对我说过，搞口述实录的人有三种，一是鼓手，专门吹

捧人，如写一些企业家的业绩等等（我经常做这类鼓手）；二是枪手，专门替人操笔，如替一些明星写书，书上属明星的名字，枪手则拿上一笔钱后就销声匿迹（我差点做一次枪手，在朋友们的讥讽下才主动放弃）；还有一种是杀手，所谓“杀手”，要和采写对象斗智斗勇，虽然做起来困难，但是一旦成功，就能采写出真东西。

我知道，面对这位将近百岁的老人，我要做一次杀手了。在尴尬的局面中，我想，只有把林豆豆叫来，才能签这份合同。毕竟，文老相信的是林豆豆，而我和文老，才只是第二次见面。

当时在这尴尬的局面中的，还有康宏通、刘艳艳。康宏通给林豆豆打了电话，说明情况，让林豆豆马上到文老家来，一起拟个合同。林豆豆很快赶来，文老口述了两点，构成合同的主要内容，一是鉴于文老和林豆豆的父亲是黄埔同学，文老决定把本书的版权送给林豆豆。二是口述的录音带复制三套。合同拟好后，双方各保存一份。接着，文老很痛快地开始口述。在其间，文老看着我几次问道此书是否能尽快出版，他举例说，陈诚的儿子在台湾写了一本书，两个月就出了。当时，我心里觉得文老过于心急了，但是，当两个多月后文老远去时，我忽然明白了这位94岁老人的心思。

我很快得到了文老的信任，文老很欢迎我前去采访，每当我在约定的时间走到文老家门前的时候，门总是开着的，我奇怪地问陈阿姨为什么不关门，陈阿姨说：“这是专门等着你来。”即使在文老病重谢绝会客时，文老也总是躺在床上等着我的到来。文老称我“刘大姐”，开始我不大习惯，后来我竟觉得挺亲切，文老说，“刘大姐，我们很有缘分哪，”说完，我们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我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在为文老写口述实录，笑道，你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后代，给国民党干部写书，真是历史的玩笑。想一想，也好笑。我家是个红色家庭，四代共产党员，前三代是打下共和国江山的功臣，据说我母亲的爷爷党员资格很老，老到只要

他站在村口一跺拐棍，全村的党员都得吓尿了裤子。就是我这个第四代党员，掐指一算，也有二十多年的党龄了。如果是在从前，提到什么“剿共指挥部”之类的，一定是恨之入骨，不共戴天，没有想到现在居然给“徐州剿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写口述实录，的确是历史的玩笑。不过这一出玩笑，使我认识到了什么叫做“历史”。

文老曾经是个共产党的干部，后来成了国民党的中将，不管他是哪个党派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文老对我说过：“百年之后，希望人家说‘文强这个家伙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不是一个什么坏蛋。’”当时，我被文老的幽默逗得直笑。现在，文老走了，我要说一句，文老是一个善良的老人。我走进他的房间时，他笑着说，“欢迎欢迎，”我告辞时，他总说，“你辛苦了。”即使在他病很重的时候，他还总是对我说，“你喝杯茶吧，”“你吃水果吧，”我很感动。自从我的父母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得到来自长辈的关心，经常感到孤独伤感，但是就在这次采写中，我感受到了一位几乎与世纪同岁的老人给予的温暖。随着老人的离去，我又一次深深的失落。

关于这本书，我要说明一下的是，本书留下的遗憾。我的哥哥是研究党史的教授，他是这本书刚刚“杀青”时的第一位读者，他读完后问我：为什么文老成为战犯在监狱里的事情写得很少，特别是被关在秦城监狱那一段只字没提？因为文老还没有来得及口述这一段，便悄然离去，没有带走一片云彩。却给我留下了遗憾。

为文老撰写口述实录，从采访到完稿（2001年8月到2002年8月），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感谢路曼大姐，感谢丁东，是他们使我认识了文老这位世纪老人，丁东为本书的出版尽了力。

感谢康国雄先生，他是一位长者，是他带着我熟悉了文老的湖南口音。

感谢我的哥哥，他在百忙中帮助我校正了书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

感谢我的丈夫和儿子，静寂的雨夜，书房中儿子在我左，丈夫在我右，我们一起坐在电脑前，查证书中的一些人名，这是我感觉很温馨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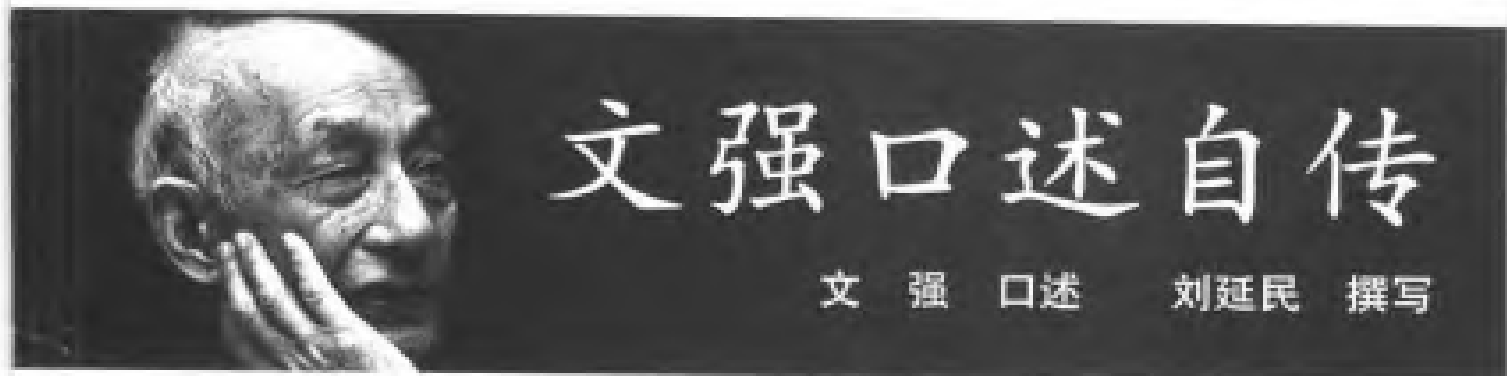
感谢徐媛，她是一个19岁的姑娘，我在用笔整理文老的口述录音后，是她帮助我录入到电脑中，有时工作到凌晨两点多。

感谢刘艳艳，她曾经是我的同事，她经常同我一道去文老家中听故事，还要感谢摄影师王南海，他为文老拍下照片，还放大了送给文老，文老很高兴。正是因为王南海和刘艳艳的帮助，才有了文老对我说的一句话：“刘大姐，你的班子很可靠。”

本书完稿，我终于了了一桩心愿。我想，文老在天也一定非常高兴。

刘延民

2002年8月12日星期一



文强口述自传

文强口述 刘廷民撰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强口述自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丛书策划 靳沂斌 王 磊
市场策划 纪 宏 胡 靖
装帧设计

●他出身于湘江岸边世代为官的豪门之家，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

●他曾入黄埔军校，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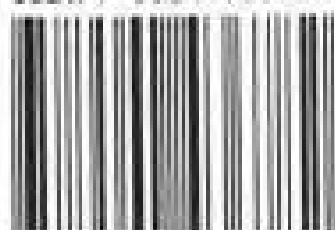
●他作为共产党的早期干部，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历任连营团旅师长，也曾任四川省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

●他脱党后曾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

他在2001年病逝前一个月，以94岁高龄在病榻上完成了这部口述自传

文强先生跌宕起伏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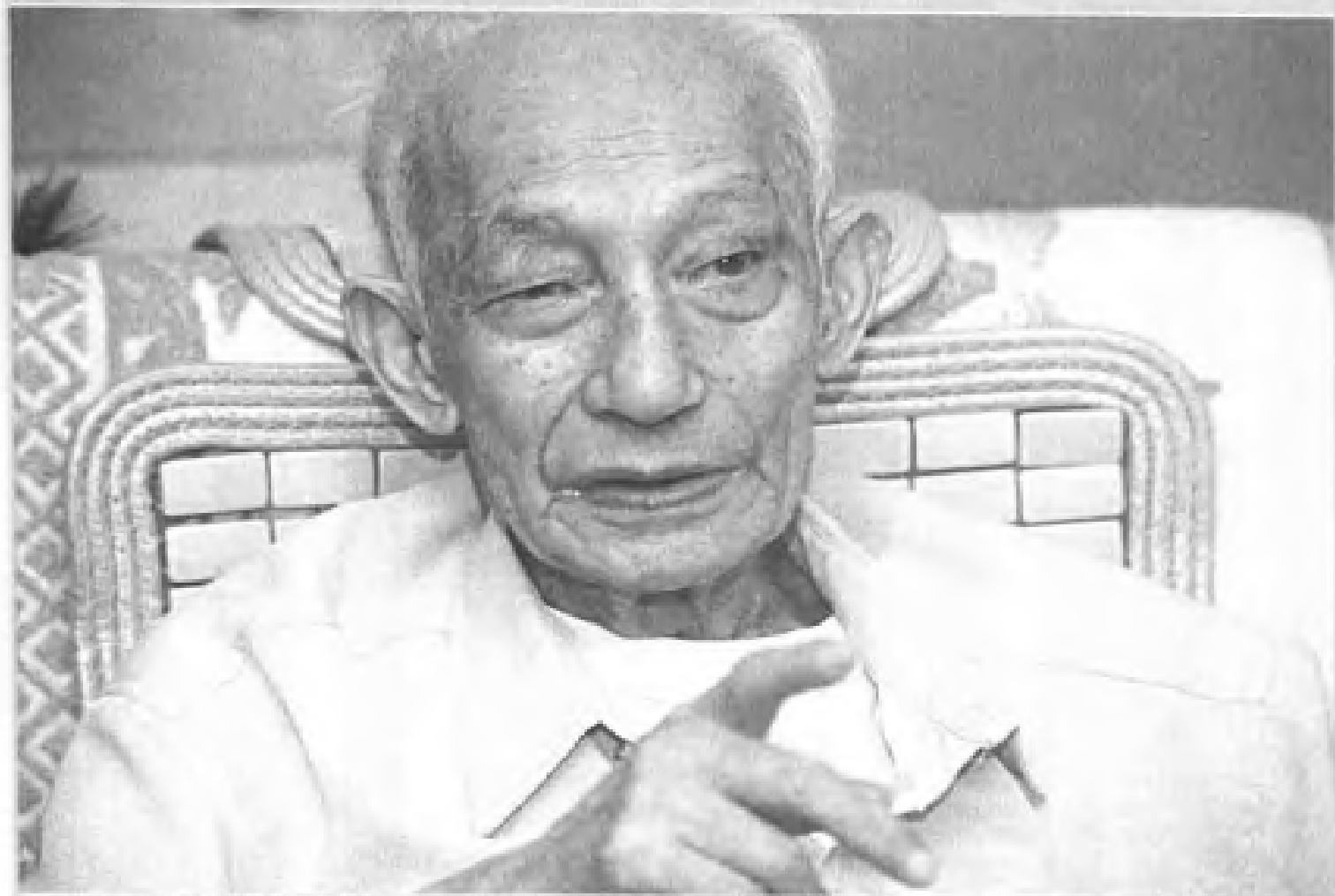
ISBN 7-5004-3678-5



9 787500 436782 >

ISBN 7-5004-3678-5/K·539

定价：26.00元



▲ 文强老人在口述(王南海拍摄)



▲ 口述现场,口述人文强(右二),撰写人刘延民(左二);路曼(右一),摄影师王南海(左三),刘艳艳(左一)(王南海拍摄)



▲ 1933年文强任长沙少年通讯社社长



▲ 1936年在浙江中央警官学校合影。从左至右：前排文强、廖寅译；后排程致敬、谢勋成



▲ “我们这些少年通讯社的年轻人在一起拍了一张风华正茂的照片。1975年我特赦之后，当年的一个年轻记者的弟弟找到我，说：“我哥哥临死的时候，把一张照片交给我，让我保存到死。”文革”很乱，我把照片藏在棉里，用漆封好，在地下挖个洞埋起来。现在交还给你。”我一看，正是当年我们拍摄的那张照片。”第一排中为文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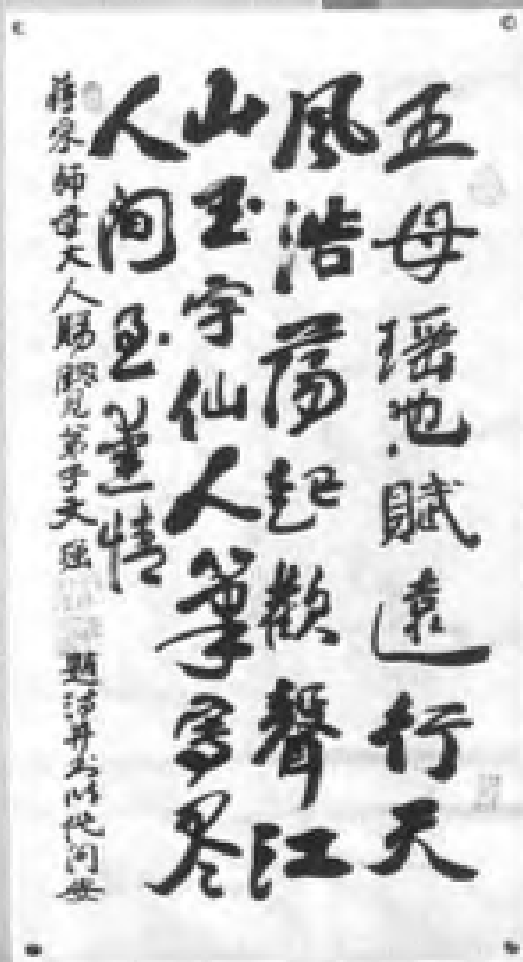
▲ 2001年文强子家中



▲ 1995年7月文强子家中

▼ 2000年6月16日文强子纪念黄埔军校建校76周年会后在北京中山公园内中山堂前合影





▲ 蒋经国为文强七十六寿辰题字(王尚海拍摄)

◀ 文强送来美龄的字



▲ “1985年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正好过中秋。中秋节的晚上，蒋志云邀我一道过节。我们坐在屋外赏月后，回到屋里，她丈夫高高兴兴地从楼上托着一张照片下来，说：‘今天晚上是你的80大寿，又正是中秋赏月，我们送给你一件礼物。你看，这张照片你有没有啊？’我一看，这张照片24寸，大大的，镶在镜框里，是我40岁那年晋升为中将军衔的。我说：‘我没有了。’他说：‘台湾给你保留了。我家里也有你这张照片，我给你放大了，带回去作个纪念吧。’”



▲ 文强指导五子文定中创业



▲ “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



◀ 1997年9月27日文强于汕头

▼ 1997年9月27日文强在汕头与武术本家严农切磋武艺,表演大翻平功



《口述自传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季羨林	戴逸	冯其庸			
主	编	王俊义	张树相	丁东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青	于沛	马晓光	印红标	李辉	刘小萌
		刘丽华	张冠生	定宜庄	陈徒手	杨奎松	柏裕江
		郑仲兵	涂光辉	徐友渔	笑蜀	唐葆林	绛云
		郭沂纹	傅光明	雷颐			
常	务	郭沂纹					
编	委						

出版前言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口述历史在海外就已成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在中国内地亦备受关注，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口述自传》丛书，就是在这样的势头下组织策划应运而生的。

其实，在文字产生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之所以得到流传，不就是靠人们的口耳相传与考古发掘相印证才记载下来的吗？在浩如烟海的各种史籍中，也都包含有不少的口述史料。被称为“千古绝唱”的《史记》，就是太史公依据大量实地考察得到的口述访谈资料与丰富的文献记载相印证而撰写的。只是后来人们过于偏信文献史料，轻视口述史料，认为“口说无凭”，口述历史才逐渐被淡忘。实事求是地说口述历史与文字历史各有其功能与特点，既不可厚此薄彼，也不要厚彼薄此，二者理应互相映照，相辅相成。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向有“正史”与“野史”之分，相较而言，由于“正史”“涂饰太厚，废说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鲁迅《华盖集》）。口述历史显然不属正史，却可补“正史”之不足；再者，“正史”经过史官、史家的修补与剪裁以及各种正规体例的限制，成书后往往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难免读之乏味，而口述历史的内容，因系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包含有许多历史细节。录之于

书，往往显得具体、细腻、生动，读起来兴味盎然；再有，口述历史以当事人述其所经当代之事，史料更富有现实性、鲜活性。当然，口述历史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当事人或记忆有误；或自我拔高；或有难言之隐等等，这些局限当可经过公众舆论，以纠其失，以正评价之不当，以求其真。

由于历史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大都是人所策划、参与、进行的。尽管每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由于各自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其所参与的程度不同，但历史上任何成败得失，无疑都是由人类群体创造和形成的。惟其如此，我们组织编辑了《口述自传》这套丛书，传主多是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或者其本身是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活动中有重要成就、重要影响的人物；间或虽非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但其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人生阅历引人入胜，对读者富有借鉴启迪价值。我们期望能通过《口述自传》不同类型传主的自述，从各个侧面再现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一般说《口述自传》的传主，大都是耄耋之年甚至是期颐之年的老人。其口述的内容需要适宜的人选进行采访和整理。这就需要采访者与采访者、整理者互相默契、密切合作。只有这样，一部部上乘的《口述自传》方能问世。国际上著名的口述历史大家唐德刚先生在谈及其之所以坚持多年从事口述史工作时，曾深有感情地说：“作为一个流落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其逐渐流失，内心所发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之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于万一也。”我们这套《口述自传》丛书的整理者和编者，大都工作、生活于“中华无价之宝”所依存的中华大地上，更应有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使那“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且莫“眼睁睁地看其逐渐流失”。因此《口述自传》的编辑出版，还有着抢救史料价值的意义。

为了把《口述自传》组织好，编辑好，出版好。我们还诚恳

邀请了一些或是深孚众望的学界前辈，或是对口述历史有研究、有实践、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担任这套丛书的顾问、主编与编委。企望在大家的支持与合作下，把这套丛书出版好，以推动口述历史的蓬勃发展。

编者
2002年11月

引子

1907年，那是辛亥革命的前五年，我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天叫做望城县金良乡。我的母亲说，她生我的时候，梦见菩萨送给她一条大鲤鱼，她就用做饭菜的围裙包住了。梦醒了，肚子疼，就生了我。我的母亲从此吃斋行善，而我的字，就叫做“念观”。

我的家是一个封建古老、四世同堂、子孙繁衍、富甲一乡的大家族，人称书香之家，官宦之家，其实拿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大地主官僚家庭。

我们这个家庭在清朝出了两个“上大夫”。我们小孩在家里写字要写“薄”（家谱），我就问：“我们家里头怎么有两个‘上大夫’？这是个什么官呢？”老人们告诉我：“清朝的时候设的这个官。”现在来说，这个清朝官是什么地位呢？相当于国会议员吧。我记得家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是皇上亲赐的，经过这块牌子，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圣旨”啊。

我家是文信国公（文天祥）的子孙，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以背得滚瓜烂熟为荣，这是我家的一道传统家风。

那时我的父亲到日本去了，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专修法科。我问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到日本留学去了，他在那里干什么呢？”

“小孩子问什么！不能说，不能说。”

“怎么不能说呢？”

母亲说：“他是孙中山的朋友（我的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又是黄兴的朋友，蔡锷也是他的朋友。这三个人一说呀，我们全家就要杀头，问不得，问不得哟。”

“噢。”

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我的父亲回家了。他在客堂里设了一个香案，把孙中山和黄兴的照片放得很大，用镜框框起来，在香案上并排摆着。每天早上，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除了我的祖母），去客堂向孙中山、黄兴，行三鞠躬礼。那时我五六岁，还不太懂事。

到了民国三年，蔡锷起来打倒了北洋军阀，打倒了袁世凯，我家的香案上又多了一张蔡锷的照片（我的父亲到过云南，跟着蔡锷当司法官，是蔡锷的秘书长），孙中山的照片摆在当中，左边是黄兴，右边是蔡锷。每天向他们行礼。

要说到家，就要说到与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父亲是个放高利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10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在活下来的三兄弟中，毛泽东是老大，毛泽民是老二，毛泽覃是老三，那七个都夭折了。毛泽东比我大14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

有一天毛泽覃跑来跟我讲：“我告诉你，以后你叫我的哥哥，不要叫什么毛老师了。”那时，我正在湖南明德中学读书，这是湖南的一个贵族学校，办得很好的。毛泽覃说：“我告诉你，你要改口，跟我一样喊他大哥。”

我不解：“你姓毛，我姓文，为什么要让我改口呢？”

他说：“你糊涂呵，我的妈妈是你的姑母！”

我知道我的姑母叫文七妹，原来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啊。我说：“还有这样一回事呀，我也不知道，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看他知不知道？”

我跑回家问我的父亲：“你认识毛泽东吗？”

“认识呀，毛泽东是我们文家的外甥呵，到过我们祠堂里头呵，她的妈妈是我们文家的呀。”

“噢”，我说：“他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妈妈是我的姑母呵，他让我叫毛老师做大哥，要不要喊呀？”

“那有什么不要喊的？可以喊大哥。”

我就改口了，叫“毛大哥”。

通过毛泽东，我又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何叔衡，湖南长沙县教育局局长，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是谢觉哉，当过民政部部长，也是共产党员。毛泽东在他们当中排行老三，三个人一出来，毛泽东站在最后，那两个比毛泽东大十多岁。

我见到毛泽东，就叫：“哎，毛大哥。”

他瞪起眼睛看着我：“怎么回事呀？你怎么不喊毛老师啦？怎么变成毛大哥啦？”

我说：“你问问你老弟，他不让我叫毛老师呵，让我叫你毛大哥，我还不叫哩。”

毛泽东问老弟“怎么回事啊？”毛泽覃说：“我们的妈妈是文家的，我让他改口喊你大哥。”

我说：“叫就叫了，你还笑我。”

毛大哥笑了：“噢，你还在这攀亲戚呀。这样一说，我们两个人要认真了。我要考考你，你们文家是文天祥的子孙，你会背《正气歌》吗？”他还不相信我呢。他说：“我也会背《正气歌》。文天祥的《正气歌》背不出来我就不配当文家外甥。”我望着他笑，我说：“毛大哥呀，今天是我考你，还是你考我呀？”

他看着我：“噢，你还考我啊？”

我说：“你只比我大14岁，文天祥的事情，恐怕我知道的比你多。”

“噢？那我得要考！你也会背《正气歌》吧？”

“我不但会背，还可以默写给你，你默写得出来吗？”

他说：“哎，我还没写过呢，能不能默写得出来，我还不知道。你默写得出来啊？”

“当然。”

他挺吃惊：“你还知道什么啊？”

我说：“文天祥的著作里面有个《指南录》，差不多有三百多首诗，我会背一半。”

我这一讲，毛大哥不知道了：“文天祥还有个《指南录》啊？我没有看到过。”我说：“你没有看过啊，那你就差得很远啦。”

他说：“你还知道什么呢？”

我说：“文天祥还有个‘路歌’。”

“这个‘路歌’干什么用的呀？”

我说：“写他的家史，写他的父亲，写他的子女。”

毛大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还多了。文天祥最后死在元朝，临刑前用血在衣服上写了一首诗，这是文天祥的自传，你知道吗？”

他说：“我还不知道这事情呀。”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背给你听：‘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哎呀，以前我还看不起你呀，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个大家人物呀，书香之家，你们家出过两个官大夫呀，我们毛家比不上呀。你真的知道很多呀，可不得了。”

我们就都高兴了。我接着就背《正气歌》给毛大哥听。

何叔衡、谢觉哉都住在毛大哥的隔壁，听到有人背《正气歌》，和毛大哥一道也背起了《正气歌》，一时间，整个宿舍都包围在一种悲壮的环境中了。附近的人家看了觉得很好笑：这老的老，少的少，在背什么东西呀？

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拍杠子。以后，我跟他拍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拍到底。我说：“你知道什么东西呀，革命革命。”我并看不起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强口述自传/文强口述;刘延民撰写.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

ISBN 7-5004-3678-5

I.文… II.①文… ②刘… III.文强-自传
IV.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103400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装帧设计 李颖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 页 18

字 数 29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定 价 2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